

乔姆斯基文集

失败的国家

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

【美】诺姆·乔姆斯基 / 著 白璐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ailed States

就其思想的广博性、新颖性、震撼力和影响力而言，乔姆斯基可能是在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纽约时报书评》

乔姆斯基以无情的逻辑，引导我们仔细倾听领袖们的言论，甄别他们所省略的东西……不管是否同意，我们无法忽略他的观点。

——《商业周刊》

乔姆斯基的作品是理性和激情的混合体。他述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然而，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知道和不能遗忘的东西。

——马库斯·G·拉斯金

上架建议：政治、国际关系

ISBN 978-7-5327-4698-9



9 787532 746989 >

定价：3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世纪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失败的国家

| 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 |

【美】诺姆·乔姆斯基 / 著 白璐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美)乔姆斯基著；白璐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2

(乔姆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Failed States -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ISBN 978 - 7 - 5327 - 4698 - 9

I. 失… II. ①乔…②白…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②公共政策-研究-美国 IV. D871. 20 D771.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001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by Noam Chomsky
Copyright © 2006 by Harry Chomsky, as Trustee of Chomsky Grandchildren Nominee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07 - 05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失败的国家

——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白璐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84,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698 - 9/D · 095

定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数十年来,他一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伪善,尤其是批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西方知识界往往率先关注他的表现。例如“9·11”事件之后他接受了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媒体的专访,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予以严厉的批评。他对时事精辟独到的见解、对美国政治入木三分的批判,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也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

本文集所译介的几部著作分别成书于不同时期,均为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基本上涵盖了作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而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文集有助于国内学人及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政策,这也是我们引进这套丛书的初衷。当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西方学者,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和提法同我们有一定差距,相信读者是会理解和把握的。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

——代序

陆建德

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

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的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着、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哈罗德·品特^①

(一)

作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英国剧作家品特所说的现象：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在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中，形容词“Orwellian”(奥威尔风格的)出现的频率很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描写了一种“新语”，它以模棱两可、颠倒黑白为基本特征。乔姆斯基屡屡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中奥威尔式的“新语”。比如，美国把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数百名战俘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些数年前就放弃武装抵抗的中亚

穆斯林是名副其实的战俘，但是有了“敌方战斗人员”之名，他们就被美军强行剥夺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所规定的种种权利。

揭开“新语”的假面具，诊断并治疗语言的核心已染上的顽疾，这是乔姆斯基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业。世有“无多言，多言多败”的古训，但是乔姆斯基早已置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于不顾，直言无隐。这位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已 77 岁，著述之余仍时常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接受采访。他像中国古代的圣哲一样，忙于公共事务，不遑宁处。难怪 U2 乐队的主唱博诺把他称作“永不停息的叛逆者”^②。

奇怪的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乔姆斯基在我国只为少数语言学家所知晓。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一起推出他的五部著作，堪称今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件大事。《恐怖主义文化》(1988)、《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和美国的政治文化》(1993)、《宣传与公共意识》(与戴维·巴萨米安合著，2001)、《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1986, 2002)和《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4)基本上反映了作者政论的主要方面和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渊博的学识、雄辩的风格。

(二)

乔姆斯基半个世纪前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都有重大的理论和

实用意义,据说人机对译系统的开发也得益于他的学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被普遍认可。在由弗兰克·克莫德主持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里就收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撰写的《乔姆斯基》(1970),这套丛书介绍的“大师”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必说,乔姆斯基在这批现代思想家里是最年轻的。

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是不是与他的政论著作(例如这五本书)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要准确介绍他的语言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他与当时流行美国的行为主义者的差别。乔姆斯基划时代的《句法结构》问世那年(1957),美国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发表《言语行为》一书。乔姆斯基写了言辞激烈的负面书评。斯金纳当时是哈佛的知名教授,乔姆斯基虽有天才之名,毕竟只是麻省理工的一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员。斯金纳相信,人的行为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程序操控,即使是知识的获得,也可由所谓的“学习机”的强化和奖励机制来主导;人与动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经训练后连鸽子也能打乒乓球),人类自由、尊严之类的语言无助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基于这种信念,斯金纳把言语行为也解释成对环境或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然而乔姆斯基把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心智天生具有创造活力的象征。婴儿的心智在学说话的时候并不是白板一块,因此他(她)不简单重复,创新是他(她)的固有天性,这就是人的本质。行为主义者以科

学的名义贬低人性,驳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们眼中的心智没有独立性可言,它不是被动的容器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狗。乔姆斯基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赞赏的是笛卡儿和洪堡的语言观,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潜能,使这种潜能不受拘碍地发展是社会和教育的长期目标。

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也许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某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犹如斯金纳的激励机制训练他的乖乖的动物。美国意识形态的大氛围是不是会像斯金纳设计的护理婴儿的空调柜子那样无微不至地养育并决定美国民众的好恶?

越南战争和美国主流媒体为之正名的宣传更使乔姆斯基意识到,美国普通百姓知道的信息有限,他们掌握的“事实”是经人选择、描述的,于是久处“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而不自知,稍稍受到一点点拨和刺激,他们就会作出预料中的理想反应。在冷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过程中,这种旨在操纵人们思想的“新语”都在积极运作。但民众一旦觉醒,也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战活动是最好的证明。1967年,乔姆斯基因参加向五角大楼进军被警察拘留,一同被临时关押的是小说家诺曼·梅勒。参与反战的经历触发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趣。《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和《对亚洲作战》(1970)两本书预示了美国社会一位古代以色列国耶利米式的批判者的诞生。

1970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

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罗素晚年发起禁止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可以断定,乔姆斯基得到这一荣誉的原因是剑桥学者在他上述两部政论著作中看到 he 继承了罗素和平主义的精神。这次演讲名为《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分两部分,分别为“论解释世界”和“论改造世界”。乔姆斯基说的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在演讲涉及越南战争的部分,乔姆斯基提到“东京湾事件”纯系捏造,这一指控已为2005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证实。^③

(三)

乔姆斯基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裔,父亲是美国颇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也算是克绍箕裘了。年轻时乔姆斯基曾在以色列生活学习,他从来未曾因自己的族裔原因而放弃对以色列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方面对巴勒斯坦都是一味袒护。他指出“以-巴冲突”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应改为“美/以-巴冲突”。以色列始终以美国为后援(或者说美国外交由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所左右),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美以联合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乔姆斯基的《致命的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了解中东问题缘起的必读书,也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犹太民族确曾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令乔姆斯基失望的是,当一些

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很多犹太裔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同胞在巴勒斯坦欺压本土阿拉伯人的行为是痛心的,以色列修正学派史学家、海法大学的伊兰·帕泼博士的新著《现代巴勒斯坦史:一块土地,两种人民》(2004)试图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立国前后的历史,这表明以色列国内也存在批评政府的声音。在《霸权还是生存》一书里乔姆斯基简略地谈到以巴和平进程。他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说阿拉法特)在压力下不断作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让步。当乔姆斯基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时他引用的是来自以色列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例如:以色列史学家、后来继列维任以色列外长的什洛莫·本-阿米的话道出实质:“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把这种彻底处于依附状况的“巴勒斯坦国”比为南非在实行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为黑人族群圈定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令人遗憾的是以往中国读者只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协议,仿佛它是外交解决的典范。

既然提到乔姆斯基严厉批评以色列,还得提一提 2005 年 11 月 29 日乔姆斯基和哈佛法学院讲席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就中东和平进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人以为乔姆斯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只是业余水平,真正的专家不会重视他的论证,^④那就大大地错了。这位德肖维兹是美国的明星学者律师(曾为辛普森辩护),他的《为以色列一辩》(2003)一书竭力以律师的

语言解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⑤，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学者中已很难找出比德肖维兹更能言善辩的斗士了。我相信，乔姆斯基敢于就他曾讨论过的议题（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洲的战争与和平等）与美国有关领域的任何“职业选手”辩论。对纷繁复杂的细节的透彻了解，对各类原始材料的驾驭引用，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和敏锐的识别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被他批评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畏而又可敬的对手。

（四）

有一种宣传是标语口号式的，目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宣传者强聒不舍，效果适得其反。另一种宣传作用于无形之中（说得肯定一点就是“润物细无声”），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宣传”的名号。美国多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为了取得实效非得小心翼翼地隐瞒真正意图，也不让有些话题背后的推动者露出马脚。一些对所谓“事实”的讨论后面往往潜藏着利益。政府为推动某一政策也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一般不命令受众全盘接受，有关部门会通过隐匿的权力网的徐徐引导之手“制造赞同”。^⑥问题的形成、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公开讨论，其根源并不是澄澈透明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一实例来了解乔姆斯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揭露所谓“事实”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美国媒体不断传来消息：建立于30年代“市场失灵”

期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破产，政界人物也提出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该体系的基金管理人预测，到 2032 年，基金将严重不足，工人保障金只能拿到应得数额的四分之三。乔姆斯基坦然说道，要预测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几乎是开玩笑，发出警报的人所依赖的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基金管理者假定的美国今后经济年增长率为 1.7%，这数字远远低于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它居然会被用来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像是别有用心。乔姆斯基乐观预言，将来的美国工资和社会保障税款都将有可观的增长（这已被证实）。“狼来了”的呼声之所以出现，乃因基金管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想把这笔巨款投入股市，它将成为华尔街的财源。当时投资股市的收益要比购买政府国债高。但乔姆斯基反对把社保基金用来投机冒险。他坚持，如何管好基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反之，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互相扶助，团结一致。如基金真的遇到麻烦，调高甚至不设社保基金征税最高限额（当时为 72 600 美元，年收入中高于此数的部分不必付社保税），就可解决。乔姆斯基作这番分析时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正在疯涨，第二年股市急转直下，当时若动用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美国中下阶层受害最大。预言危机者实际上想把美国的公共事业私有化，他们先要说这些事业机能失常，然后交给私营企业去管理。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和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时，乔姆斯基不断显示出类似的犀利眼光。

我国的拉美研究是较薄弱的，对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与我国尚未建交的中美洲各国（有的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历史文化

与政治我们更是所知不多。乔姆斯基的这几部作品(特别是《恐怖主义文化》)中牵涉中美洲的内容很多,对我们的帮助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欧美知识分子对中美洲政局议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奥特加总统的朋友。

1979年7月,独裁统治尼加拉瓜多年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美国担心根据门罗主义早被圈定为自家后院的拉美会继古巴之后再出现一个左翼政权,于是就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深表关切。后来美国国会竟直接干预尼加拉瓜内政,表决通过支持该国反政府军的法案,其内容几乎与宣战相去无几。反政府军在美国支持下袭击教育设施和农场,桑地诺政权的社会建设规划无法正常付诸实施。美国一次次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罪魁祸首总是有碍于它实现霸权的一方。1984年,美国以桑地诺政权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诸国提出的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欧共体各国向尼加拉瓜施压。不料尼政府出其不意地接受协议,美国羞怒交加,立即另找借口展开新一轮宣传攻势。此事个中细节读来虽然有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人寒心:美国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感兴趣。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致使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出丑(但在美国国内,诺思上校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翌年8月5日,亦即国会“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两天后,里根政府抛出中美洲“和平方案”,以此作为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指导性文件。方案要求尼加拉瓜改变政治制度,交战双方都停止输入武器。乔姆斯基如

此评论这一方案：

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常常如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必理会协议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⑦

幸好这方案在首脑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乔姆斯基上面这番经验之谈何其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将国际条约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手段。其实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早就在对美国国际法学会发表演讲时明言，涉及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的问题便不复存在，美国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与限制。也许在艾奇逊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还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精心制作合法性的幌子，但近年来则是对外界的反应毫不在意，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尽由美国自由选择。乔姆斯基不无感叹地写道，正是通过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或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美国尝到并迷恋上做“人类的老爷”^⑧的甜头：

悲惨的事实是高压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以暴行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

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非较为弱势的民族所能享有。

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制裁同样残暴不仁。为了更易一国合法政权，“解放”所谓受压迫的人民，先对该国实行严厉制裁，借饥饿和疾病之手夺去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妇孺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灾难归罪于受害国政府及其政策。乔姆斯基追溯了这一符合所谓“法律程序”的毒计的渊源，发现早年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和后来的美国人清除印第安人的手法也讲“人道”。《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写道，美国人“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完成了西班牙人未竟的事业：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灭绝印第安种族。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镇压、征服要比托克维尔所知道的血腥得多，当今的美国史学界已无意为自己国家与生俱来的污点遮遮掩掩。

（五）

比较或对比，这是乔姆斯基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中用得特别频繁的方法。他会将两次事件突兀地并列，让读者意识到两者如此类似，然后指出美国政府或舆论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1918年1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议会，为此受到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的责难；同年几个月之后，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解散

了海地的国民大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一些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恐怖行为受到广泛的谴责,最近还有电影强化人们的记忆;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时被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炸毁,机上73人罹难,其中包括获奥运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此事已被人们扔入记忆的空洞。在80年代,波兰一宗教界人士被暗杀,美国不依不饶,波兰政府严惩凶手;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广受教民爱戴的罗梅洛大主教被害(1980),六位耶稣会教士遭暗杀(1989),美国不加过问,歹徒逍遥法外。胜利的入侵者追究萨达姆部下使用毒气的责任;美国自己在越南打了一场化学战,橙剂、脱叶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并致使很多婴儿畸形;英国于1919年入侵阿富汗时,国防大臣丘吉尔下令使用毒气,在阿富汗人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借此“迅速结束前线普遍的无序状态”。这样的比较事例,乔姆斯基可以举出很多。现在的国际社会对非法入侵和占领已经习以为常。乔姆斯基指出,如果30年代的国联默认德国的侵略,我们就会谴责可耻的绥靖政策。易位思维导致惊人的结论:“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

对类似的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这是美国实施双重标准吗?乔姆斯基告诉我们,其实美国有多重标准,所有标准自始至终都为一个宗旨服务:谋求美国利益(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年初的《告别演说》里提醒美国人警惕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感触尤深的是美国媒体紧密配合政府，实行自我审查十分积极。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乔姆斯基写道：“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狺狺狂吠。”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⑨

美国式宣传的成功来自精心培养的民众心中的“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美国政策往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1987年，英国《卫报》驻华盛顿记者布鲁默在评前面提及的美国版中美洲和平方案时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美洲各国和平努力的台，惟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这几本书中有很多分析美国媒体、揭穿美国宣传的内容。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⑩。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极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掌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

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为维护本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履行承诺，切实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文件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官员一次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交代了相关的各种细节，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制裁有何合法性可言？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演示了“窃钩窃国”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丛林法则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在这过程中，国际组织也常为强权提供方便。在《海盗与君主》的1986年初版序言里，乔姆斯基转述了一个故事，其主旨与这两条中国成语十分相似。亚历山大大帝曾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说：“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强权即公理，所以恶人、战犯都是被打败的。只有崇拜权力和胜利的人才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的事例绝非鲜见。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是一个现实，在他所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还是可以容忍，当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非凡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波斯人的军旗上点缀起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迷人符号，世人不免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侮辱，也会挺身而出，好意劝说：“这又何必？”上帝之友来到为战火所蹂躏的别国领土，向当地那些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终获“自由”。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当仁不让地纠正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六)

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乔姆斯基的这套书将大大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同时又提升我们与美国对话的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往我们经常凭一些简单概念、抽象名词来为一个国家定性。说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之类空洞无用的套话。其实美国国家政府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乔姆斯基在60年代末的科研项目大都是为国防部做的,实验室经费来自三个军工部门,而且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预算的90%来自五角大楼。后来,随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在预算中比例的扩大,名为私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国家主导了美国的研究开发系统,那些富有开创性、风险高而且又不会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国家的资助。计算机、卫星、晶体管都先由公共部门开发,然后转交私人企业。假如研究没有经济回报可言,那么它的成本和风险是社会化的,亦即由纳税人大家来承担。如果研究取得成功,国家机构就会把成果转让给私营公司开发,收益是私有化的。乔姆斯基因此称美国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阅读乔姆斯基,我们也得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绝非始于中国纺织品冲击美国市场之时。里根经济学是所谓放任自由的经济学,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吊诡的真理:里根政府是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政

府。为挽救本国工业，里根政府大大增高贸易壁垒，市场并未充分向外开放。正是这些措施防止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冲垮美国工业基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社会上却流行“消费者选择”一说。也许是出于远见，里根政府一面限制进口，一面将公共资金注入工业和高科技，取得惊人成就，因特网开发的费用最初也由政府提供^①。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更无所顾忌，中海油和迪拜港口公司海外业务受控就是明显的例子。

乔姆斯基和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用战斗性的修辞和不屈不挠的博学对美国的权势中心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作为教师、同事和朋友，他却是和蔼温良之人。罗素曾描写的理想的世界也是乔姆斯基追求的目标。那是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创造的精神生机勃勃，“生活是一次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冒险，其基础不是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冲动”。这位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也是孜孜不倦的知识和情感的养育者，不少中国学生曾受他亲炙。乔姆斯基相信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同情、团结和互助，因此激烈反对学校和社会灌输并崇尚竞争意识。他认为争强好胜是社会刺激的结果，而非人的天性。他曾说教育体系不应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这是“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如果连小学也要以公布考试分数的形式来激励学生，那更是一种野蛮的措施。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制度暗中鼓励幸灾乐祸的心态，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欣赏别人的成就，只喜欢看到别人被比下去，他们相互之间也无法精诚合作。

这种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不正是他一切政论的出发点吗？

2006年3月15日写毕于东夷小舍

注释：

- ① 摘自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于1990年5月31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演讲《啊，超人》。该文即将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3期发表，译者肖静。
- ② 英文是“Rebel without a cause”，由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直译是没有原因或事业的叛逆者)演变而来。
- ③ 《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纽约万神殿书局，1971)，第103页。正是这“东京湾事件”导致越战全面升级。乔姆斯基在后来的论著中一次次指出美国发动侵略或实施轰炸的借口都是编造的，即使谎言被戳穿，当局还是若无其事。他引用塔西陀的名言：“罪行一旦被揭露就无所遁形，惟有厚颜无耻。”
- ④ 萨义德曾就此抨击美国那些所谓的“专家”。见《论知识分子》(三联，2002)中关于业余精神的部分。
- ⑤ 美国史学家芬克尔斯坦在《超越无耻》(2005)一书中暗示德肖维兹的著作涉嫌剽窃。
- ⑥ 这是由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也可译成“制造共识”。
- ⑦ 《恐怖主义文化》，第15页。此前(尼加拉瓜1984年选举后)，美国媒体曾炒作米格战斗机进驻尼加拉瓜的虚假消息。美国对国际协议的态度让我想到拉·封丹寓言诗《搭裢》(远方译)：

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
对自己，我们的目光像鼯鼠。
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恕。
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最近的所谓“伊朗危机”反而提醒世人注意美国自己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 ⑧ 英国 18 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作《漫游者》中用语。英国史学家基也南一部出版于 1969 年的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以此为名。
- ⑨ 在伊拉克受制裁时期,美国媒体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 ⑩ 这本书系与爱德华·S·赫尔曼合著,1988 年出版。书中的个案研究写得透彻精湛。赫尔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全美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教授,他还与乔姆斯基合写了《人权的政治经济学》(1979)。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著有《真正的恐怖网络:事实上的和宣传中的恐怖主义》(1982)。2005 年 9 月他在《Z 杂志》上发表文章《伊朗“危机”:侵略的前奏》,很值得一读。美国全方位的跨国宣传的效果也十分惊人,详见谢·卡拉-穆尔扎著《论意识操纵》(2000),中译本于 2004 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 ⑪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1969 年建 ARPA 网,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类似的 NSF 网,采用了 ARPA 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因特网,并负责维护网络主干网。

序言

在关乎人类权利和利益的诸事当中选出应该居于优先地位的几项,自然是一个主观判断的过程。但无论由谁来选,有几项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类将来能否继续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其中至少有三项:核战争的威胁、全球环境恶化,以及世界第一强国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在加大这些灾难发生的可能。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因为美国民众并不愿意那样做。由此又产生了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关注的第四个问题: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的严重错位。由于这种错位,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整个‘体制’正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麻烦——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摧毁美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信奉的价值观:平等、自由和有意义的民主”。^①而这种担心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

这套“体制”正逐渐显现出那些失败的国家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征。所谓失败的国家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通常指那些被看作是对美国存在潜在威胁的国家(如伊拉克),或是需要通过干预把其国民从严重的国内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国家(如海地)。尽管有人承认这个概念“不准确得令人失望”,可它所归纳的失败的国家所拥有的一些主要特征确实存在。其中一个特点是这些国家都不能或无意去保护他们的公民不受暴力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灾难的侵害。另一个是他们习惯于无视国内或国际法的存在,因而肆意侵略和滥用暴力。如果他们有某种民主的形式的话,他们那些法定的民主机构也会因国家巨大的“民主赤字”而毫无实际作用。^②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当中,有一些是很不易的,而且其中

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就像照镜子一样。如果这样做，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自己的祖国也有那些“失败国家”的特征。诚然，对于关心各自的国家和后代的人们来说，承认这一点是件十分难受的事。之所以说“各自的国家”，不仅是因为美国有着广泛的海外势力范围，还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在时空上都不局限于美国本土。

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论述了由于美国践踏国际法、滥用强大力量所造成的安全威胁和毁灭风险日益上升。无论人们如何对相关的威胁进行评估，这都是美国公民特别关注的焦点。第二部分主要用来分析美国的民主机构，在上流社会文化中它们被如何看待，它们在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包括怎样在国外“推进民主进程”和在国内形成民主体制。

这些问题产生于不同的背景之中，但彼此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为避免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加脚注过多，一些被引用的内容如果出自我近期出版的书中，我将不再介绍其来源。^③

| 目 录 |

序 言	001
第一章 严峻,可怕,无法逃避.....	001
第二章 法外国家	047
第三章 非法但合理	098
第四章 推进他国的民主	128
第五章 确实证据: 中东	208
第六章 推进国内民主	258
后 记	318
注 释	335

第一章

严峻，可怕，无法逃避

半个世纪前的 1955 年 7 月，伯特兰·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不寻常的呼吁，让他们“暂时放下”对许多其他问题的强烈感受，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有着杰出历史的物种的一分子，其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希望这个物种消亡”。全世界所面临的抉择是“严峻，可怕，无法逃避的：是让我们亲手毁灭全人类，还是让全人类都来拒绝战争？”^①

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拒绝战争。恰恰相反，如今的世界霸权力量授予自己任意发动战争的权利，且仅需要一个不甚明确的理由——“预期自卫”。长期以来，美国都以一副自以为是的正直姿态要求其他国家严格遵守国际法、各项条约和国际秩序规则，而自己却对它们视若无物。这种行径在里根和小布什执政时期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②

普遍平等是公认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即对自身与对他人至少

要用同一标准衡量和要求,当然也可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口碑却很差,因为他们经常忽略这条原则,即使有人偶尔提及也会被斥为蛮横无理。这对那些自称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尤为可耻,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一定听过“福音书”给伪善者下的定义。^③

仅靠唱高调,一些评论家就要求我们欣赏政治领袖们对他们“纯净的道德”和“理想主义精神”所做的真诚表白。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著名学者菲利普·泽利科(Zelikow)提出了布什政府“新的道德原则核心”一说。其依据就是布什政府的“官方发言”和一个简单的事实:政府提出了增加发展援助的建议,以及其他富国提供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成比例的一点微薄援助。^④

那些政治口号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布什总统在2002年3月创立为第三世界提供扶贫资金的“千年挑战账户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时说:“我诚挚地许下这个承诺。”可到了2005年布什政府已经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预算,该集团只得将那句宣言从它的网站上删除。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文章里写道,那个集团的总管在“几乎一分钱也没拿出来,无法启动该援助项目”的情况下辞职,而最初的承诺足有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布什还回绝了托尼·布莱尔提出的将援非资金增加一倍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同其他工业国一道减除非洲国家无法偿还的债务,但前提是必须相应地减少对非援助。萨克斯说,这个举措“等于在一年内判了六百万非洲人死刑,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被挽救的”。布什的

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在2005年峰会即将召开时赴任,他一上任就立即命令删除所有文件中的“千年发展目标”字样。那些文件是在美国为消除“贫困、性别歧视、饥饿、文盲、夭折、母亲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和疾病”^⑤而进行艰苦谈判后精心制定的。

政治口号总是振奋人心的,我们则要奉命去赞美那些口号的制造者,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想起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观察录中的观点:美国能够“灭绝印第安人,还在全世界眼里不违背任何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⑥

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原则常常被称作“双重标准”。可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准确地说那是非常明确肯定的单一标准。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这样解释的:“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格言。”今天与亚当的时代已有许多不同,但那句可恨的格言依然盛行。^⑦

那条单一标准已根深蒂固到不被察觉的程度。拿当今最热点的问题——“恐怖主义”来说,用的就是十分明显的单一标准:他们对美国 and 美国的附庸国的任何恐怖行为都是极端邪恶的,而我们对他们的恐怖行为压根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也是正当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对尼加拉瓜发动的战争,其恐怖行为的性质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无可疑的,因为总有人相信两个谴责美国的机构——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对此类事件有自己的立场。当时美国国务院确认,由美国指挥的军队从洪都拉斯的美军基地出

动攻击尼加拉瓜时有权袭击其“软目标”，即没有任何防护的民用目标。美洲观察(Americas Watch)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招来了猛烈的回击。回击者是受人尊敬的“左派”发言人，《新共和》周刊编辑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他耐心地解释道，对民用目标的恐怖袭击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评价：“明智的策略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即“我们在行动中承受的痛苦和流的血应最大可能地换取他们的民主”。当然，那是美国上层所定义的“民主”。^⑧

可见对这种单一标准的认定在美国仍然不可动摇，甚至没有被意识到。在2005年，媒体报道说布什政府正面临着一个十分“困难的选择”：委内瑞拉要求美国引渡一个臭名昭著的拉美恐怖主义分子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Luis Posada Carriles)，指控他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造成73人死亡。这项指控是有效的，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波萨达逃出委内瑞拉的监狱后，“被美国秘密特工雇佣，指挥对萨尔瓦多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再补给行动”。换句话说，华盛顿需要他在对尼加拉瓜的恐怖战争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样就产生了那个“两难境地”：“如果把他遣送回国接受审判，那么就给为美国做事的外国秘密特工们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即他们不能指望得到美国政府无条件的保护，那么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就可能因为被某个前特工披露而尴尬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很明显这个理由有一点问题，可要想进入美国的高知识阶层有一条要求，就是不能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⑨

在委内瑞拉不断向美国提出它的引渡请求时，参众两院以压倒

性优势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向拒绝其引渡要求的国家提供援助。然而华盛顿频频拒绝引渡他国所追捕的大恐怖主义分子却没人提起。不过倒是有人表示担心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理论上可能遭到禁止,原因是以拒绝向美国引渡一个被指控为“1997年在马里兰州犯下残忍的命案后逃往以色列,并通过其父亲获得以色列国籍的罪犯”。^⑩

谢天谢地,“波萨达两难选择”至少暂时被法院解决了。法院拒绝了委内瑞拉的引渡请求,尽管这违反了美委引渡条约。一天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却督促欧洲加快处理美国引渡要求的速度。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快引渡程序,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们让我们感到正义的实施必须有效和有力。”在随后召开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西班牙和拉美国家领导人“支持委内瑞拉为古巴客机爆炸案向美国要求引渡罪犯”,可美国大使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他们只得作罢。此外,华盛顿不仅仅是对他国的引渡请求予以拒绝或不加理会,甚至还动用了总统权力赦免被他国确定有罪的罪犯。老布什就赦免了一个跟波萨达有关联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奥兰多·博希(Orlando Bosch),尽管司法部提出了反对,要求把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驱逐出境。博希后来安全居住在美国境内,他所在社区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基地,^⑪兴许他正同波萨达勾结在一起。

小布什抛出了“包庇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与恐怖主义分子同罪”的论调,其背景是阿富汗政府要求美国拿出证据证明他们要阿富汗交出的人是恐怖主义分子(罗伯特·米勒事后承认确无可信的证据)。

估计没有人会傻到为小布什的这句话认为美国应受到轰炸和入侵。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文章中写道: 布什的理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关系准则”, 它废除了“一些国家的主权, 只因它们收容恐怖主义分子”。还好只是“部分收容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这得感谢单一标准容许的例外情形。^⑫

单一标准还包括武器及其他毁灭手段。美国军费开支大约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而北美 38 家(其中一个在加拿大)企业的军售额相当于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世界超级强国在发展毁灭性武器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著名的以色列军事分析家鲁文·佩达佐(Reuven Pedatzur)写道, “在这个时代, 世界仅存一个冷酷的超级大国居于统治地位, 它企图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 核武器就成了一个有用的战争工具, 可以被任意使用, 甚至是对那些没有这种武器的对手。”^⑬ 这位分析家只是把那些致力于了解真相的人们已知的说了出来。

在国务院长期从事对外关系工作的马克斯·布特(Max Boot)被问及“为什么美国可以在军费上大量投入, 而中国却不可以”时, 他给了一个很简洁的回答: “我们要确保的是全世界的安全, 要保护我们的盟国, 还要保持重要的海上航道的畅通并发起反恐战,” 而中国却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并“挑起军备竞赛”——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 除了某个“阴谋理论家”外, 没人会说美国控制海上航道根本不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而是为实行其对外政策, 也没人会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华盛顿(尤其是在小布什当政后)当作世界安全的最

大威胁。最近的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整个欧洲和中国,法国在“最大范围内被认为是产生积极世界影响的国家”,而“被普遍认为在全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俄罗斯”。当然,对此他们也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民意调查说明全世界都错了。原因很容易理解,正是布特在别处宣扬的,欧洲“总是被贪婪驱使”,“目空一切的欧洲人”无法理解使美国对外政策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风格”。“再过200年,欧洲还是不会明白是什么让美国运转得如此之好。”是的,其他人都想不通,特别是我们的邻国,由于有许多相关经历,邻国也就特别容易被误导。在那些被调查的国家里,墨西哥是认为美国对世界影响“最消极”的国家之一。^⑭

在2005年5月,各国对《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美国即将重新参加该条约)进行了评审。评审的过程和结果都显示出危及全人类的严重威胁继续存在并有所扩大,而最主要的责任者就是美国。各与会国最担心的就是华盛顿“松开核刹车”的意图,那样“就向着核武器的合法化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⑮

全人类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罗素和爱因斯坦强调的核毁灭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曾在核战争的边缘徘徊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两个著名的研究者认为,我们能从“核湮灭”中幸免的确是个“奇

迹”。2002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一次历史回顾会上,曾为肯尼迪担当顾问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把那场危机形容成“人类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许多与会者得知当时的情形比他们所了解的还要凶险。据会议的协办单位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Blanton)介绍,自原子弹在长崎被第一次使用后,当时全世界距核战争爆发只有“一字”之遥。他指的是前苏联潜艇指挥官瓦西里·阿希波夫(Vasily Arkhipov)取消了向美军发射核鱼雷的指令(当时他的舰队遭到了美国驱逐舰的攻击),从而避免了可怕后果的发生。^⑥

在参加那次会议的高层决策者中有在肯尼迪政府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他在2005年时回忆说,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世界与核战争仅以“一根发丝”的距离擦肩而过。他借这个警世录提出了“灾难即将发生”的警告,认为“当前美国的核政策是不道德、不合法、在军事上无必要且极其可怕和危险的”。这种政策制造了“对别国和对我们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危险”。(既有“因意外和疏忽造成的核弹发射”的“过高”危险,还有遭受恐怖分子核攻击的风险。)麦克纳马拉认同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的判断:“在未来10年中,美国遭到核打击的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⑦

格雷厄姆·阿利森报道说,“在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圈子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核武器的核心部分——裂变物质不被全部收回并加以控制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受到“脏弹”的袭击是“无法避免”的,

而遭到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也非常高。阿利森说,回顾 90 年代初以来在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和理查德·卢加尔(Richard Lugar)发起下,回收控制裂变物质的努力已初有成效,可自从布什当政第一天起这些计划就开始受阻。布什的幕僚们一面把这种计划束之高阁以避免“难以逃避的核恐怖”,一面全力把国家拖进战争,而后又举全国之力处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灾难。^⑩

在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期刊中,战略分析家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和南希·加拉格尔(Nancy Gallagher)毫不夸张地说布什政府的军事战略及其进攻态势带来了“相当大的毁灭危险”。理由十分简单,美国完全寻求单方面的安全,为此赋予自己任意发动战争的权利和“松开核刹车”(佩达佐语),牺牲了他国的安全,因而别国可能采取相应对策。为实现拉姆斯菲尔德主张的军事转型而在研制中的可怕技术“将确定无疑地扩散到别国”。在“军备竞赛和相互威慑”的国际环境下,“单边行动—别国回应”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会制造出“不断上升的,未来无法控制的危险”。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政界不能认识到这种危险并降低其影响的话,那么它能否继续生存就很成问题”。^⑪

斯坦布鲁纳和加拉格尔表示希望热爱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消除美国政府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的威胁,而这个国家联合应由中国来领导!其实从权威团体的核心发出这样的声音时,我们普通人早已有同感。而美国的民主状况——一个在选举论坛和公众讨论中都很少出现的话题,被暗指存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民主赤字,这同样给人惊

讶和紧迫感。斯坦布鲁纳和加拉格尔提名中国的原因是在所有的有核国家里,中国是“到目前为止在扩军备战方面一直都最为克制的国家”。中国还在联合国率先呼吁和平利用外太空,相反美国和以色列却抵制了所有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活动。

太空军事化并不是从布什当政开始的,克林顿的太空司令部就曾提出“控制太空领域的军事活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而且前几年陆海军就已经着手开展有关行动。为了这一目标,美国就必须发展“太空武器,以实现来自太空,打向太空和通过太空的精确打击能力”。美国情报部门和太空司令部也认同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全球化”将会“扩大发展差距”以及“深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和文化冲突”,进而导致穷国的动乱和暴力局面,而相当一部分不安定的因素是针对美国的。太空计划成为克林顿政府官方政策框架结构的一部分,克林顿的政策赋予了美国“单方面运用军事力量的权力”以确保“控制关键市场,获取能源供给和战略资源的畅通渠道”。^⑩

克林顿的智囊团战略司令部(STRATCOM)进一步提议华盛顿应该树立一个“在重要利益被侵犯时会变得毫无理智且报复心强”的形象,包括威胁向无核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司令部指出核武器比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有价值得多,因为“核爆炸的极大毁灭力是瞬间产生的,而且几乎无法减轻其后果”。另外,“核武器会给任何危机或冲突蒙上一层阴影”,从而延伸了常规武器的效力。这种战略理论同样不是什么新发明。举个先例,卡特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曾呼吁国会为发展战略核打击能力提供资金,理由

是它能使美国的“其他武装力量成为有用的军事和政治工具”,而且这种工具必须可以在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使用,“主要是为经济上的原因”,还因为“愈演愈烈的国内骚乱和苏联的干预”——后一个原因其实更多是一个借口,这一点当局往往毫不隐晦。^①

到了布什当政时期,这种威胁又深化了。布什的智囊团把克林顿为了军事目的而控制太空的理论发展为“拥有”太空,这种拥有“意味着随时可以介入世界任何地方”。2005年美军高层告知国会,国防部正在研制新的太空武器系统,用战略司令部长官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将军的话说,该武器系统将使美国有能力“高效地策划和实施对地球表面任何地方的迅速打击”。有了这一套先进和致命的太空侦察和攻击系统,再加上美国的太空政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被瞬间毁灭,当然反过来也危及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安全。^②

布什政府还扩大了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选择范围,日益模糊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的界限。军事分析家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认为这提高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目前美国正在研制的武器系统能够“经有效指挥和发出解控指令,在数分钟内向目标发起具有常规杀伤力的精确打击”。这与空军战略理论相符,按照这种理论太空军事优势的定义是:“自由地发起攻击并有效地防止被攻击。”武器专家约翰·派克(John Pike)对这个新研究计划的评价是,它使美国能够“仅通过30分钟的观察即击中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无须借助于附近的空军基地”。目前美国为保证全球控制力在世界各地设

置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引起了一片反对声,考虑到这一点,该计划确实相当有益。拉姆斯菲尔德于2005年5月1日签署的国防战略“使美国能从世界各地坚固的军事基地向任何地方发起攻击”。按照战争预防理论,该战略考虑到了“在事态变得更为危险或更难控制的情况下施加影响的重要性”。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长官兰斯·W·洛德(Lance W. Lord)将军告知国会,正在研制中的武器系统将使美国有能力“经有效指挥和发出解控指令,在数分钟内向目标发起具有常规杀伤力的精确打击”。——不用说,同样也能发起具有非常规杀伤力的打击。^③

不出意料,美国的这些举动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批评和反应。欧盟、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的高层军事和太空官员警告说:“太空军事化同发射核武器一样,后果都是难以预测的。”在我们预料之中的是,面对布什大幅度提高导弹进攻能力,俄罗斯也相应地大举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对五角大楼透露的太空军事化计划,俄罗斯宣布将“考虑用武力作为回答”。被各方均视为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如果该计划显示出任何成功的迹象,中国可能会提高自身的攻击能力以保持一定的威慑力。中国已经发展出了更强大的多弹头核导弹,能打到美国本土,这被一名世界一流的军事周刊的亚太编辑称为“进攻性防御”策略。在2004年的全球太空军事开支中,美国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但世界其他国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从而使每个人面临的风险都大大提高。^④

美国分析家们认识到五角大楼正在酝酿的计划“可以看作美国迈向太空军事化的重要举措,无疑,发展太空武器已经被确立为空军转型计划的一个方面”。这种进展“从长期来看极有可能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军事分析家也认为华盛顿所谓的防御计划“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看来更像是在发展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种‘死亡之星’太空船,用于攻击军用和民用卫星及地面上的任何目标……太空武器易于攻击,因此是一种进攻性武器而不是防御系统。所以说,各国会从发展太空武器一事认为美国企图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中国及其他国家可能会做出反应,发展低成本的太空武器。这样一来,美国的政策就“可能挑起一轮太空军备竞赛”。进一步看,“中国为了防止失去潜在的威慑力,还可能会扩大其核力量,从而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纷纷效仿”。另外,俄罗斯已经“警告过若有任何国家部署太空武器,它都会有所动作,因而发展太空武器可能会破坏本已脆弱的核不扩散体系”。^⑤

另一方面,五角大楼仔细分析了其首席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提交的一份令人不安的研究报告。那名专家在查阅了一些中文军事文章,并走访了它们的作者后得出了一个“让华盛顿许多人都感到紧张的”结论:“中国把美国看作它的军事对手。”这样,我们就得摒弃中国是个“一贯温和的国家”的观点。^⑥

曾在北约担任策划人的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cGwire)向我们提起一个历史事实:1986年时,由于意识到了核武器的“可怕逻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呼吁彻底消灭核武器。可这项提议被淹

没了,换来的是里根的太空军事化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麦圭尔写道,西方的军事理论“很直白地以核武器可以‘先发制人’为前提。这样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俄罗斯以前也曾一直采纳这种理论,可到了1994年它开始改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然而在克林顿违反华盛顿曾经许下的一个承诺,推进北约东扩后,俄罗斯为了报复又回到了北约的“先发制人”核政策,并放弃了其消灭核武器的主张。华盛顿向戈尔巴乔夫做出的那项“绝对保证”是,只要他“同意东德和西德合并后仍是北约的成员,北约就不会吸收前华约成员国向东扩张”。无需提战略上的常识,仅看看前面一段历史即可明白,克林顿破坏华盛顿的那项坚决保证给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并且“对立于重要的‘排斥原则’,这项原则是无核区(NWFZ)存在的基础”。克林顿的违约行为解释了“为什么北约要反对既成事实的中欧无核区(包含北极到黑海一带)正式生效”。麦圭尔进一步指出,使该无核区生效“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但它会影响北约东扩计划。反过来想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华盛顿要支持在中亚建立无核区。原因在于,如果前苏联共和国决定同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那么这个无核区将使俄无法在那些国家部署核武器”。^⑦

“灾难就在眼前”

“即将发生灾难”的可能性有多大尚且无法准确估算,但这个概率是相当高的,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能等闲视之。尽管猜测未来会发

生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对爱因斯坦和罗素所说的“严峻,可怕,无法逃避的”选择却不能无动于衷。相反,我们需要马上做出选择。特别是在美国,因为华盛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在整个历史上都独一无二的军事优势,加速着灭绝人类的进程。前参议员萨姆·纳恩是降低核战危险活动的先行者,他警告说:“因意外情况,误操作发射和越权擅自发射核武器的几率可能增加。”纳恩认为,由于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问题,“我们正面临着哈米吉多顿*的不必要的风险,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美国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预警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准确性”。纳恩的意思是,由于美国大举扩张的军事计划打破了世界战略平衡,造成“俄罗斯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加大——有预警即迅速出击而不等核实预警是否准确”。由于“俄罗斯的预警系统年久失修,发出导弹来袭警报的错误率提高”,核战危险进一步增大了。美国对“核战高度戒备状态的依赖,使核弹能在数分钟内发射出去”,这迫使领导人们“在接到警报后几乎立即就得决定是否发射核武器,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交换情报,全面了解事态,以及发现错误并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的风险俄罗斯也有,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备战模式同样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战略分析家布鲁斯·布莱尔(Bruce Blair)认为,“印度、巴基斯坦及其他核扩散国面临的早期预警和风险控制问题更为严重。”^②

*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战场。现喻大决战,核武器出现后,常用来形容可能发生、标志世界末日的核战争。——译者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它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就出现在了一些技术文献里，那就是核武器迟早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恐怖组织掌握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就可能会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这种可能性是布什政府的智囊们提出的，但从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相反倒是他们穷兵黩武的政策不仅促使俄罗斯大幅度提高攻击能力，包括装备威力更大的核武器和更先进的运载工具，还驱使俄军不断在其广阔的领土上转移核武器以应付美国的一再挑战。华盛顿的智囊们肯定清楚车臣叛军已经从核废料处理厂和核电站窃取了放射性物质，并且还在一直窥视“俄国的铁路系统和运载核武器的特殊列车”。^{②9}

布莱尔提醒道：“俄罗斯不断重复地转移核武器很容易产生问题，因为运输对核武器安全来说就是阿喀琉斯的脚踵*。”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性不亚于让战略核武器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他推测每天“在俄罗斯境内都有数百件核武器在移动”。其中一枚被窃“最终都可能导致一座美国城市的毁灭，但这还不是核武器的转移战术可能导致的最坏结局”。更可怕的是“一枚处于待发状态的远程战略核导弹或一批能袭击数千英里外目标的导弹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就可能带来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灾难”。还有一种重大的威胁来自网络黑客，恐怖分子有可能侵入军用通讯网并输入发射指令，使携带数百枚核弹头的导弹被发射出去。这绝不是幻想——几年前五角大楼就曾发现其安

* 阿喀琉斯的脚踵(Achilles' heel),即致命弱点。——译者

全系统存在重大缺陷,并需要对三叉戟核潜艇的发射成员进行重新培训。而其他有核国的此类系统就更不可靠了。布莱尔在文章里说,如果所有这一切共同发生作用,“那么迟早会出现某个意外”,而那将是个灾难性的意外。^⑩

在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武力不仅人为地提高了核武器的危险性,还催生了伊斯兰圣战组织——早就有人预测会出现这种情形。正是在里根政府的策划、组织、武装和训练下,一群伊斯兰激进分子相互纠结而形成了这个恐怖组织。里根政府的意图并非像他所宣称的是保护阿富汗,而是为了常见的丑恶的政治目的,结果让阿富汗的底层人民受尽磨难。里根政府还很庆幸地看到并听任巴基斯坦在穆罕默德·齐亚·哈克(Muhammad Zia ul-Huq)的统治下逐渐成为一个伊斯兰激进主义国家。哈克是华盛顿的当政者及其顾问所支持的众多独裁者之一。里根及其同僚在发现他们的盟国巴基斯坦研制核武器时会佯作不知,并每年拿出一份假证明声称巴基斯坦并没有搞核武器。他们和克林顿政府还对由巴基斯坦的核扩散大户滋生出的世界第一大核走私者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视而不见,时至今日也只是对其轻描淡写地惩罚了一下了事。用哈佛大学原子计划管理的行政主管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的话说,“卡迪尔·汗在10年里造成的危害比任何一个国家在拥有核武器的前50年里都大。”^⑪

华盛顿不断地扩军备战并不是让全人类面临“即将发生灾难”的惟一因素,但肯定是个关键原因。美国目前的各项计划和政策产生的

背景十分深远,可追溯到克林顿时期或更早的时候。但一直以来它们都只是隐约出现在公开文件或演说中,根本没有进入选民的选举参考内容。这又说明了在美国起作用的民主正在衰退,向我们预示了一个不明朗的未来。

惟一勉强可以与核武器威胁相提并论的问题是环境恶化。2005年7月,在八国峰会的准备阶段,八国的科学院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同中国、印度、巴西一道,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号召发达国家领导人尽快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环境灾难。他们在宣言书中写道:“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理解已十分清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所有国家都应找出能马上实施的经济有效的方法,以持续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净排放,这一点至关重要。”《金融时报》在它的头条社论中肯定了这一“感人的号召”,但同时遗憾地说,“然而有一个人并不支持我们,不幸的是他就是白宫的布什总统。尽管西方八国的科学家们史无前例地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可布什仍旧坚持人类对这一影响全世界的现象知之甚少”。于是华盛顿“成功地去除了号召采取措施控制全球变暖的文字”,并删除了“我们的世界正在变暖”这样有煽动性的宣言,原因是“布什先生说过,全球变暖还是个很不确定的事实,各国应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措施”。《金融时报》编辑的评论是,这样的改动导致的最后结果是除了“虔诚的废话”外几乎什么有用的都没留下。^⑩

为了紧随布什的科学判断,在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上排斥科学证据是常有的事。在2005年召开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年会上,“美国权威气象专家发表了‘迄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人类活动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该协会对未来主要的气象后果做出了预测,其中包括以冰川和融雪为主要河流水源的地区将面临水资源量严重下降。在那次会议上还有一些著名学者提出论据说明北极和格陵兰岛冰面融化将破坏海水盐浓度平衡,可能致使“墨西哥湾流这样的海洋传送带停滞,那样,热带地区的热量就无法被输送到两极地区”。其中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欧洲的气温显著下降。没过多久,又有气象专家报道说两极冰盖在进一步缩小,并警告说一种早有预测的“气候反作用正在占据主动”。即不断扩大的地球水面会吸收更多太阳热量,而不会将其反射回去,这将加剧全球变暖的严重威胁。然而,各国科学家的警告和“迄今最有力证据”的公布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多少注意。另外,在同一时期生效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尽管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那个政府却拒绝参加。^③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政府”。如果说美国几乎是形单影只地站在了《京都议定书》门外——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那“美国”这个词就不能包括其国民,因为美国人民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协议,甚至大部分布什的支持者都同意参加,他们还以为总统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错了。总的来看,在2004年大选中选民们受到了蒙蔽,没能了解到各政党的真正立场。这不是因为他们没兴趣去了解或缺乏判断力,而是因为那场选举的结果是在精心策划下产生的,我们即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④

伊拉克与“反恐战”

英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十分清楚入侵伊拉克可能会造成恐怖活动增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许多分析家和情报机构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曾在2002年10月告知国会,入侵伊拉克可能会促使萨达姆·侯赛因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预计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会使穆斯林政治组织得到更多的支持,加深伊拉克社会的分裂,激发伊国内暴力冲突”,从而导致恐怖活动在伊拉克和世界范围内的滋生。2004年12月,国家情报委员会证实了这一预测,报告了它得出的一个结论:“伊拉克战争和未来的其他冲突可能为新一波‘专业化’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成员、训练基地、技术手段和语言培训,而政治暴力行为将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国家情报委员会还预测由于美国入侵伊拉克,“散布全球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构成的国际网络为保护穆斯林的领土不受“异教徒的侵犯”,会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他们原来的训练基地阿富汗将被伊拉克取代。中央情报局2005年5月的一份报告证实,“伊拉克就像20年前被前苏联占领的阿富汗和90年代的波斯尼亚一样,已经成为伊斯兰军事组织活动的圣地。”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伊拉克可能是一个比基地组织早期活动的阿富汗更好的训练场所,因为它可以成为城市战的全真实验场。”伊拉克战

争两年后,政府高层出具了一份“反恐战”总结报告,报告的结论也和上面的一样。围绕着“如何对付过去两年在伊拉克培训出来的新一代恐怖主义分子”,这份报告指出,“政府高层决策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根溯源上,即到伊拉克培训的数十万圣战组织成员的家乡去找,可那些国家遍布整个中东和西欧。如一名老布什政府的高官所说:‘这是一回事。如果在伊拉克找不到那些人,又如何能在伊斯坦布尔或伦敦发现他们?’”^⑤

几乎无须质疑的是入侵伊拉克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极大地增加公众对基地组织和宗教激进主义圣战组织这样的反民主极端分子的同情”。印度尼西亚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圣战活动的发源地。在2000年,75%的印尼人对美国的评价是积极的,到了2002年变成了61%,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这个数字跌到了15%,同时80%的印尼人都表示害怕遭到美国的攻击。一名研究恐怖活动和印尼问题的专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认为,“这种心理表示,超过80%的印尼人都愿意伊斯兰教在国家和个人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表示印尼人把更多的人接纳为教友,包括极端武装分子,而且他们会把任何细小的对伊斯兰领袖和国家的不利行为放大成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攻击。”^⑥

危险并不遥远。2005年7月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遭到致命炸弹的袭击后不久,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Chatham Hous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把情报机构和分析师们的标准结论又重申了一次:“毫无疑问,入侵伊拉克帮助基地组织扩大了知名度,增加了人员和资金来

源,还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训练地。”这篇研究报告认为:“英国的处境特别危险,因为它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美国历次军事行动中都出兵相助,像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战争等等……”如果美国政策是一辆摩托车的话,那英国就是摩托车“后座的乘客”。对伦敦爆炸事件进行总结后,英国军情五处国内安全部门得出以下结论:“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是他们的各种愿望和‘理想’的共同结果,但伊拉克战争是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纷纷出现在欧洲和英国的主要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前往伊拉克参加战斗后,“可能会再回到英国并考虑在这里发动袭击”。^⑦

布莱尔政府恼怒地否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在不久后它又一次得到了证明。那是在爆炸案发生后,恐怖主义分子又策划了一桩爆炸但没有成功,其中一名嫌犯在罗马被捕获。他“声称策划爆炸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国参加了伊拉克战争”,还讲述了“几名策划者连续看了几个钟头电视实况的情形,镜头里的伊拉克寡妇和儿童在死于战争的平民尸体旁悲痛欲绝。据说他告诉检察官在看了这些镜头后,‘一种仇恨涌上心头,他决心要采取行动,向外界传递某种信号’”。^⑧

一个以色列智囊团和沙特阿拉伯情报机构的报告都认为“绝大部分”在伊拉克打仗的外国武装人员“以前并不是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在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极端主义者”。他们看到了侵略,在“穆斯林同胞的召唤下前去驱逐那些破坏穆斯林宗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十字军’和‘异教徒’”。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参加伊拉克战争的沙特武装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五都不属

于政府盯防对象、基地组织成员或恐怖主义的同情者”，而“几乎都是出于对联合侵略行为的义愤而采取极端行为的”。这份报告证实，自从战争开始后，伊拉克就成了世界上吸纳和训练宗教激进主义分子的中心之一，完成训练的恐怖主义分子大部分都可能回到本国，四处传播他们学到的手段和脑中的极端世界观，获取那些“孤立和愤怒的穆斯林的支持和信任”，从而使“恐怖行为和暴力”到处生根。在多年工作中积累了独特经验的法国情报机构总结道：到伊拉克打仗的结果就是使许多人变得极端化，其中一部分随时准备支持恐怖主义者。伊拉克是个出色的“征募官”，为“训练出将来回到本国战斗的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崭新且“广阔的圣战家园”，就像“以前的阿富汗、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一样”。美国官员报道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高级成员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正训练出越来越多的伊拉克战士扩充其队伍”，而相比之下外国成员的比例下降到“不足伊拉克叛乱分子的百分之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认为实际数目大约只有百分之四。^⑨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布什总统“认为伊拉克是反恐战的前线是正确的，但那是我们制造的前线”。他说，“由于伊拉克战争扩大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来源，2003年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是过去20年里最多的，令人惊讶的是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又升了两倍。”伯根谈到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确定反恐战成败标准”时说，“似乎有一个能沾上边的标准，那就是恐怖袭击数量的指数级上升。”^⑩

对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研究表明，“伊拉克看起来在新一轮的自杀袭击中起了核心作用——传播极端思想，充当袭击目标。”在1980到2003年之间，全世界发生了315次自杀袭击事件，起初大部分都是一个非宗教组织泰米尔猛虎所为。可据估计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后，大约有400起自杀袭击行为，战前这种事在伊拉克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恐怖主义问题专家们说，“在伊拉克，用炸弹勇敢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行为”吸引了许多穆斯林青年去效仿，他们相信圣战组织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正在遭受侵略，他们必须奋起反抗。曾在国家安全档案馆工作的反恐专家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史蒂文·西蒙(Steven Simon)认为，布什“为伊拉克的恐怖活动创造了一个天堂，催生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和欧洲的报复行动”。布什的政策是“空难性的”：“在伊拉克接受训练的恐怖主义分子或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训练、组织和煽动的人都可能向我们发动袭击……布什为这些人在伊拉克设置了绝佳的目标，动员了圣战活动，还让武装分子积累了一定的城市战经验，大大增加了美国未来面临的危险。”^⑩

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对自杀式袭击做了极为广泛的研究后写道，“如今的基地组织并不全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产物，它产生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一个简单的战略目标：迫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从阿拉伯半岛和其他伊斯兰国家撤军”，正像奥萨马·本·拉登一再宣称的那样。慎重的分析家早已指出了本·拉登的言行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里根政府及其盟友组织的以阿富汗为基地的圣战人员在俄罗斯从阿富汗撤军后就停止了在俄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过从穆斯

林车臣发动的袭击仍在继续,因为俄在那里的骇人罪行自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在今天出版再合适不过了。本·拉登在1991年开始以美国为敌有两个原因,首先他认为美国将侵占最神圣的阿拉伯土地(后来五角大楼以此为从沙特阿拉伯转移美军基地的理由),其次是华盛顿阻止他攻击凡世的敌人萨达姆·侯赛因。就在1993年圣战组织试图炸毁世界贸易中心时,美国竟还在容忍和支持他们加入到穆斯林一边去参加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一名曾在政府任职的印度籍战略分析家进一步断定伦敦爆炸案的主凶就曾在波斯尼亚接受训练。^②

对伊斯兰武装进行了最全面的调查研究后,福沃茨·格杰斯(Fawaz Gerges)得出的结论是:“9·11”事件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对基地组织的总体态度是十分敌视的”,特别是圣战组织将其视为危险的极端主义集团。可是布什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穆斯林的这种态度为他们提供了“在基地组织的棺材上钉钉子的绝佳机会”——即由“情报部门在穆斯林里培养和支持反对本·拉登集团这样的武装分子的力量”,相反,他们做了本·拉登希望他们做的事:发动战争。对伊拉克的侵略使“最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宗教高等学府”——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发表的一份伊斯兰裁决书在穆斯林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份裁决书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向美国侵略者发起圣战”。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坦塔维(Sheikh Tantawi)是“最先谴责基地组织的穆斯林学者之一”,可这个“常常被极端保守的牧师批评为亲西方的改革者”却坚持“阻止美国的侵略行为是‘伊斯兰世界的天

职””。可见布什政府的决策者在激起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③

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员,他从1996年就开始追踪本·拉登。他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论述:“本·拉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美国,他袭击我们的原因正是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和在伊斯兰世界的所作所为,跟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毫无关系。”朔伊尔强调说:“是美国的武力和政策完成了使伊斯兰世界极端化的进程,本·拉登自90年代早期就开始朝这个目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也没有完全成功。这么看来,可以说美国一直是本·拉登惟一的坚强盟友。”贾森·伯克(Jason Burke)对基地组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美国每次出兵都是本·拉登的一次小的胜利”,因为那又为“恐怖主义组织带来了一批新的成员,让善恶的永恒斗争持续下去”。这是布什和拉登都预见到了的前景。^④

这种斗争形式很常见。看看另一起近期发生的事件,就是2004年3月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清真寺外暗杀了广受穆斯林爱戴的精神领袖——四肢瘫痪的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同时还炸死了他身边的好几个人)。结果报复事件立即就发生了,四名美国证券承包商在费卢杰被残忍地杀害。这起事件招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入侵,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还引发了遍布伊拉克全境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什么奥秘,除非敌人被斩草除根,否则对暴力的回答只能是暴力。使用武力和毁灭性的打击来对付恐

怖主义只能让“恐怖主义先锋”获得更多人的同情,这些人尽管不赞同恐怖主义分子的行为方式,但他们却关注着同样的事情,怀有同样的仇恨。对这一发展路径,二战后的西方决策者们同他们在帝国时期的前任们其实都很熟悉。

留意观察一下世界就能发现的事情却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在“伊斯兰法西斯”面前摆出一副英雄主义姿态或是谴责“找借口的人”会更好一些。所谓“找借口的人”就是那些寻找恐怖主义根源并努力去消除这种根源的人,可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口中,他们却“不比恐怖主义分子好多少,也应受到揭露和谴责”。可这些该谴责的人范围却相当大,包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最权威的专家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社会上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少见,这是美国向本·拉登献上的又一份大礼。^⑤

有一条显而易见的逻辑,就连某些倾向于布什那种好战的民族主义的严肃媒体都表述过,可有一些人却不把它放在眼里:如果敌人“畏惧美国肆无忌惮地运用武力,他们就会觉得使用恐怖的毁灭性武器对付美国那种进攻性的自卫行为十分必要。千真万确,历史上那些帝国的神话告诉我们,为防卫而发动战争的策略恰恰会带来布什和赖斯想避免发生的结果”。^⑥这种策略如果再加上克林顿时期以来彻底的“军事转型”、率先使用核武器的理念和“单方面使用武力”的权利,那上述结果就极有可能发生。

伊拉克与自由世界的民主

想了解世界就不能把刚发生的事情抛到脑后。美英以伊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赋予自己侵略伊拉克的权利,布什总统在2003年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简单的问题”使我们有理由入侵伊拉克。这也是布什、布莱尔以及他们的同僚们一再强调的立场。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也是国会授权布什使用武力的惟一依据。可侵略发生后不久,华盛顿就不情愿地承认了那个“简单的问题”的答案。遭到了这一打击,总统的智囊们立即开始编造新的战争借口和理由,这一次成了道德教条:布什总统和他的英国盟友是凭着他们的高尚的民主信念攻打伊拉克的。^{④7}

可在政府承认原先攻打伊拉克的理由不充分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有高层政客在重要场合重申这一理由。2005年1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以“必须制止危险的武器扩散,摧毁恐怖主义组织”为伊拉克战争正名。这样看起来政府公开放弃旧的入侵借口是件无伤大雅的事,而且侵略行为加剧了恐怖主义威胁和危险武器的扩散也无关紧要。^{④8}

弗里斯特是按照以前的旧剧本去表演的。国家安全和情报分析家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在十分细心地研究有关档案资料后说,布什“蓄意误导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让他们相信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必须和紧迫的”,这件事“反映了政府的不诚信行为……这种谎言需要

佐以有力的公开宣言和对情报机构的任意操纵”。其实决策者很清楚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不是刚出生就是临近灭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跟总统先生反复向美国人民宣传的完全相反”。为了实施这一骗局,“真实的情报全部遭到歪曲、操纵或搁置……目的是实现一项掩盖在假借口下的计划,那个借口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听上去对 21 世纪的美和全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故事”。普拉多斯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民不仅仅被乔治·布什的“三牌猜一牌”^{*}游戏蒙蔽了,他们还受到了羞辱……美国人不喜欢被看成侵略者,可在伊拉克发生的就是赤裸裸的侵略。”^④

谎言的证据不断出现。2005 年 5 月,一批称作“唐宁街备忘录”的文件被透露给了伦敦的《泰晤士报》。其中一部备忘录反映在战争开始两周前,布莱尔的首席法律顾问、司法部长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男爵曾忠告他:“不能把变更政权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他还写道,即便英军的行动真如宣称的那样只限于终止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也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裁定伊拉克是否违反了它的义务”,而不是由某个国家裁定。戈德史密斯男爵还表示美国“持不同的看法:他们坚持伊拉克是否违规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可以由单个国家来评判。但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支持这种观点”。男爵不必再对“某个国家”就是华盛顿这一点加以说明。戈德史密斯男爵这段礼貌

* 俗称“飞牌”赌,持牌者先将三张牌给众人看,然后将牌翻转,打乱其位置,放在桌上,让赌者猜其中一张牌的位置。——译者

的陈述的基本意思就是：英国至少应做出一点承认国际法的姿态，而不能像美国这个强盗国家一样丝毫不拘于形式。英美两国对那些被披露的文件的不同反应也颇有启示：文件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在美国却鲜有人问津。^⑩

就在戈德史密斯男爵的陈述被公开后不久，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又公布了一本政府备忘录，记录着布莱尔和他的高级顾问在2002年7月的一次秘密会晤。那份文件显示，布什政府早在被“蒙骗”的国会于2002年10月授权其使用武力之前就已经决定进攻伊拉克了，这同样也在美国请联合国要么批准它的计划要么“靠边站”以前。英国的中东问题学者托比·道奇(Toby Dodge)认为，“这些文件说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说的情报依据十分单薄，而且其证据被过分夸大已有造假之嫌。”英国又一次为所披露的文件轰动了，可用媒体的话说，消息投到美国却犹如一个“哑弹”。直到几星期后，公众压力促使媒体开始报道时，许多评论家却一如常态地开始唱反调：那些阴谋理论家干嘛要对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歇斯底里，还要大张旗鼓地加以公开？^⑪

戈德史密斯男爵还在给布莱尔的备忘录中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其政权”显而易见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英国就“有必要为合法地使用武力创造一定的条件”。于是伦敦和华盛顿为了诱使伊拉克采取某种行动作为它们宣战的借口，在2002年5月重新开始轰炸伊拉克的目标，并在2002年9月猛然增加轰炸的强度。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正式打响前的9个月里，英美的战机共在伊拉克出动了大约

22 000 架次,联合军事行动的指挥官迈克尔·莫斯利(Michael Moseley)称他们打击了 391 个“精心选择的目标”。他说这些轰炸行动是为下一步的军事占领“打下基础”,以避免延长在伊拉克的轰炸行动。伊拉克向联合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可并没有像英美设想的那样授人以柄。没有把柄的英美编不出任何宣战的借口,干脆就借那个“简单的问题”悍然入侵伊拉克。^②

按照英国记者埃德·哈里曼(Ed Harriman)的报道,伊拉克战争前最重要的一次轰炸行动应该是在 2002 年 9 月 5 日,那次行动中英美的战机“炸平了萨达姆设在伊拉克西部沙漠中的 H-3 空军基地”。哈里曼写道,“那次行动摧毁了伊拉克的通讯和防空系统以及许多战机”,因而为进一步的入侵行动扫平了道路。在那次轰炸的两天后,布莱尔到华盛顿造访布什,在那里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控诉了“伊拉克的诸项罪行,包括企图隐藏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隐瞒这一事实长达数年之久,而不是几个月”。布莱尔还貌似真诚地劝说摩托车驾驶员*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其实心里很清楚战争已是势在必行。自始至终,这两位领袖都在竭力确保议会和国会的批准与两国公众的认同能够掩盖他们使用的国家暴力。^③

2002 年 7 月 23 日,对外政策助理马修·里克罗夫特(Matthew Rycroft)披露给英国驻美大使戴维·曼宁(David Manning)的名为“长钉行动”的计划——创造侵伊借口的行动,是对“唐宁街备忘录”最

* 指美国。——译者

重要的一次披露。该行动是一种古老战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一名心理战专家就曾提议美国应“隐秘地挑起反抗美国的思想 and 行为，只要不发生大范围的叛乱即可……以诱使前苏联公开干预东德和它的其他卫星国”，这项建议在前苏联坦克镇压了东柏林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后立即被美国政府秘密采纳了。另一个使用这种战术的例子是1982年初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其目的是激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以作为侵略的借口。然而尽管以色列并没有创造出好的借口，可为了阻止巴解组织的外交努力以保证对西岸地区的控制，并在黎巴嫩安插一个附庸政权，以色列在1982年还是发动了侵略战争。还有一个例子，1999年初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撑腰的科索沃解放军袭击了科索沃的民用目标，公开宣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引出塞尔维亚一方的行动，以此赢得西方国家对攻打塞尔维亚的支持。美军目前跨越叙利亚边境的军事行动可能就是用来创造某种借口以教训那个不服从华盛顿的阿拉伯国家。^④

哪个更重要：恐怖威胁还是真实的利益

国家方针路线制定者的通常任务一是保护政权和帮助当权者应付外部监督，另外最重要的是将决策分析从客观理性的轨道引入对他们为之服务的真实利益的追逐上。高层的商议不会围绕着那些高尚的目标或是国家的安全，而有可能被误导。在伊拉克问题上，正确的目标应该是解除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和防止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因

而即使世界的石油资源不在那里而在中非,为了正确的原则也应当攻打伊拉克。可现实中仿佛这个目标还不够困难,我们还要挑战其他的事情,其中就有西方国家造成了伊拉克在战前的灾难性局面和英美的侵略行为给伊拉克和全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

将来还有隐患。首先,有人预计侵略行为可能会增加恐怖袭击和核扩散的危险,其实真正的后果是无法预计的。通常认为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说在努力搜寻无果后就站不住脚了,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其实侵略发生后在伊拉克发现储藏有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备,那都来自于英美对伊拉克的援助,是他们在80年代生产的。另外,这种援助还一直持续到两伊战争结束时,当时萨达姆最恶劣的行径都早已暴露。那些援助包括制造导弹和核武器的方法以及一系列毒性炭疽和其他生物毒素,这些行为违反了许多国际法,尤其是传播生物毒素的行为触犯了《生物及有毒武器公约》(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可如今伊拉克境内这些设施造成的威胁却成了英美入侵的理由之一。^⑤

那些设施以前被联合国检查人员保护起来了,但侵略者们却解除了这种保护。其直接后果就是对这些设施大规模的心怀叵测的抢劫。联合国检查人员在离开后通过卫星照片继续关注着这些设施,到2005年6月他们已发现109处设施遭抢。绝大多数抢夺事件发生在生产固体或液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工厂,85%的导弹生产设备都被拿走了,此外,失窃的还有生物毒素和其他制造生化武器的材料,以及组装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导弹的高精度部件。一名约旦记者从掌管约伊边

境的官员那里得知,自从英美军队接管约伊边境后,每八辆穿越边境去约旦的卡车就有一辆被测出载有放射材料,没人知道这些材料将被运往哪儿。^⑤

用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出事了。”

这件事的讽刺意味难以言表。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为了防止它使用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侵略为那些被侵略鼓动起来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件——换句话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了武器装备,丝毫不顾及萨达姆可能用这些东西犯下的可怕罪行,还反过来利用这个罪名换取别国对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支持。伊朗好像就在用美国在伊朗国王当政时期为其提供的裂变材料生产核武器——格雷厄姆·阿利森指出这种情形很可能正在发生。^⑥

执掌五角大楼的文官们的确也保证了某些场所的安全,可那仅仅包括石油和安全大楼,任由其他地方继续遭到掠夺和毁灭,其中甚至有无可取代的文明遗产。伊拉克战争两年后,设在伊拉克的美洲学术研究机构(American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e)主席麦圭尔·吉布森(Macguire Gibson)悲痛地宣布:“伊拉克正在丧失它的文化和财富。”当时,伊境内超过半数的古迹以及大部分主要的苏美尔遗迹都已被毁。吉布森还说:“美国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同时承认意大利和荷兰派遣的队伍在保护伊遗迹上起了一点作用。古迹的毁坏使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损失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就在美军抵达后不久至少有一万五千到二万件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被劫,它们

恐怕会就此永远消失。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Wolfowitz)和石油公司甚至可能已经让伊拉克的油田受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为了支撑侵略战争,油田被“超负荷开采”,这可能会使它们“永久性减产”。让我们回想一下战前的一个信心十足的设想:美国军队将受到伊拉克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奉上鲜花。现在看来这个欢迎仪式的开支得由美国自己用增加的石油产量来负担。^⑧

比如华盛顿依据《叙利亚责任法》(Syria Accountability Act)对叙利亚实施的新制裁,这部法案在2003年底在国会几乎得到一致通过并由布什总统签署。尽管华盛顿承认大马士革多年来没有卷入恐怖事件,但还是把叙利亚列入恐怖主义组织的保护国名单。然而看看克林顿向叙利亚开出的从名单除去的条件就能明白华盛顿关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组织的关联的真实内涵,克林顿提出的条件是叙利亚政府同意美以和平协约的条款。可叙利亚坚持要求以色列归还其占领的本国领土,于是克林顿政府把叙利亚继续留在了名单上。其实叙利亚在反恐方面十分合作,它向华盛顿提供了有关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重要情报。实施《叙利亚责任法》使美国丧失了关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重要情报来源。很清楚,对华盛顿而言获取这样的情报没有在叙利亚安置一个接受美以要求的政权重要。如果美国要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国家的名单上去除,那它就应当是1982年第一个从名单上消失的国家,可是那一年里根政府却把萨达姆从名单上除掉了,这样它就能和英国及其他国家一道向他提供大量援助。那件事又一次告诉了我们华盛顿对恐怖行为和国家罪

行的真正态度。^⑨

《叙利亚责任法》的宗旨与联合国安理会第 520 号决议有关,那项决议要求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尊重。叙利亚显然违背了该决议,因为它没有将自己的军队从黎巴嫩撤出,可 1976 年时美国和以色列认可了叙利亚这么做,因为他们要屠杀巴勒斯坦人;到了 1990 年美国仍然对此不加干涉,因为伊拉克战争即将开始,它需要盟友。这件事就这么一直无人过问,另一件国会和媒体都熟视无睹的事情是 1982 年安理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那项决议明确谴责了以色列的行为。然而在长达 22 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违反了好几项安理会决议后却无人要求制裁以色列,也没有人要求减少以色列得到的来自美国的巨额无偿军事和经济援助。这里面的原因很清楚,正像中东学者斯蒂芬·朱恩斯(Stephen Zunes)所说:“只有在占领军遭到美国反对的情况下黎巴嫩的主权才必须得到捍卫,如果占领军是美国的盟友,那黎巴嫩的主权则可有可无。”这又是美国单一标准的一个明证,因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是不受这一标准限制的。在一项调查报告中,赞成制定《以色列责任法》的美国民众是不赞成者的两倍,可见多数美国人要求以色列为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在占领区迫害人权承担责任。其他的民意调查研究结果与此一致,这些调查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它们很少得到公开的报道。^⑩

在中东以外的地区,也有大量例子说明美国给予“反恐战”的重视并不多。其中一个例子是布什政府对待 9·11 调查委员会的态度。这个组织是国会建立的,旨在就如何防止再次发生恐怖事件提出建

议。菲利普·谢农(Philip Shenon)在报告里写:“布什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成立这个组织,而9·11调查委员会在其存续期间不断与政府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查阅重要的政府文件和会见证人方面。”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提交一年后,委员们组织了一个由两党成员参加的公开演说活动,督促政府采纳委员会提出的防止恐怖袭击的建议,因为那些建议基本上都被政府束之高阁了。9·11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指出了特别令人担忧的事情,那就是政府没能认真采取措施管理核材料,因为这是防止发生核恐怖袭击的中心要素,而且情报分析专家认为缺少这样的措施核袭击将是不可避免的。演说活动的报告在9·11事件发生四年后被发表出来,报告“发现布什政府和国会在实施”9·11调查委员会提出的14项建议中的8项上“进展‘极小’或‘无法令人满意’”,而这些建议是“改进政府反恐职能的”。^⑩

就在2005年7月伦敦发生公共汽车和地铁爆炸事件之前,美国参议院大幅度削减了铁路和大众运输的安全经费。9·11调查委员会已经提出了国家交通运输安全战略,但从《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奥利芬特(Thomas Oliphant)的文章里看,该项提议的现状还只停留在“委员会一年前提出的具体建议中的一半,而且政府和国会刚开始着手实施这一半建议”,有时“产业界同政府会不正当地勾结起来,拒不采取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灾难的措施,而且那些灾难是不难想到的”。另一方面,为富人阶层服务的减税政策却被放在了比保护平民大众不受恐怖袭击更重要的地位上。奥利芬特还提到了一个

政府漠视公共安全的可怕事例，即化工业同其在“白宫里的盟友一道阻止了要求全国约一百家化工厂提高安全防护级别的严格法规生效”。国会采取的反恐措施“遭遇到的全是来自产业界和白宫的阻挠，而国会的努力是为了采取有效手段防止再次发生连9·11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另一次恐怖袭击”。在奥利芬特的报告中，参议员约瑟夫·比登(Joseph Biden)“借用了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项研究结果，据估计如果一辆满载九十吨氯的货车在密集的居民区被刺穿，那么十万人将在三十分钟内死亡”。奥利芬特的报告结论是：“布什政府同他在商界的朋友勾结在一起”使任何措施都无法执行。政府甚至企图废止一项法院决定，该决定支持的是一项地方禁令——“禁止在首都周边的特定区域运送最危险的化学物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美国反恐事业同商界利益相比是多么不重要。^②

再从其他领域找一个例子，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OFAC)的任务是调查可疑的资本流动，这项任务是“反恐战”的核心内容之一。2004年4月，OFAC告知国会，它的一百二十名雇员中只有四名负责追踪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的资产，却有二十多人监督实施对古巴的非法禁运。在1990到2003年间，OFAC办理了九十三件与恐怖行为相关的案件，总共罚款九千美元，而同期进行的与古巴有关的调查却有一万一千件，罚金高达八百万美元。这一事实的披露并没有在美国引起多少反响，除了国家媒体提到了“在美国面临着来自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严峻恐怖威胁的时期，政府一直与古巴纠缠的荒唐而古怪的行为不仅可

耻,还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脱离了我们面对的现实”。[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也谴责政府“滥用纳税人的钱”去处罚古巴。]^⑧

中央情报局特工瓦莱丽·普莱姆(Valerie Plame)的身份泄露一事进一步暴露了布什政府眼中真正重要的事。普莱姆事件是在她的丈夫约瑟夫·威尔逊(Joseph Wilson)发表一篇不受欢迎的报告后发生的。那篇报告拆穿了政府对伊拉克的指控,即伊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尼日尔购买了“黄饼”^{*}。一些退休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告诉国会,除了泄露事件,对美国情报事业损害更大的是政府的掩盖行为。用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吉姆·马尔钦科夫斯基(Jim Marcinkowski)的话说,政府的掩盖行为会“给办案人员的信誉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使他们的海外联系人无法确信自己的安全受到我们的重视”。他还说:“当政权机器充斥着在黄金时段上电视做秀的爱国者和只懂得党派斗争的蠢材时,他们就会发挥自己的无知,嘲笑瓦莱丽是个只会做琐碎文字工作的职员,或者轻视用来保护我们的公职人员的各种掩护,或继续玩党派政治拿国家安全当儿戏,这对国家是有害的,只会让反恐努力付诸东流。”^⑨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保护国家安全的地位对政府而言远不如保住对下面有力的控制重要,他们要把政府机构建得像独裁的公司结构一样。以布什为首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组合已经多次显示出

* 核反应燃料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的俗称。——译者

了对权威和纪律的酷爱。统治集团好像对中央情报局十分恼怒,因为这个机构一方面有能力,另一方面又不愿为上面提供他们要的“情报”,帮助上面实施他们的计划,特别是对伊拉克的计划。一项与高级情报人员及前情报官员的访谈调查显示,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把平庸的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比作“用废的球”(wrecking ball),因为他的作用就是让中情局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而不管事实如何。戈斯最称职的地方似乎就是对布什绝对的忠诚。而据报道已有数十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出于反感离职,使这个腐化混乱的机构被大大削弱,特别是在处理中东事务的能力方面。高层专横、机构无能和服从至上的奇怪组合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还很有可能为更坏的结局埋下了伏笔。^⑤

布什和资本家们甚至愿意牺牲“反恐战”的胜利以满足他们的惩罚欲望。为了把一名恐怖嫌疑人从意大利绑到埃及以对他进行惩治,布什政府的人打断了针对该嫌犯“企图建立恐怖主义分子招募网络”和“建立触及全欧洲的圣战人员招募组织”的调查活动。意大利人愤怒了,意大利法庭为此指控了十三名中央情报局人员。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控诉,指责布什政府破坏他们的反恐行动。穆尼尔·穆特萨迪格(Mounir el-Motassadeq)是惟一被确定有罪的“9·11”事件嫌犯,可由于布什政府拒绝向德国官员提供关键证据,最终导致对他的指控被推翻。还有一件这样的事,就是布什政府“拒绝让西班牙当局见基地组织的重要嫌犯拉姆齐·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使马德里对两名被告人的诉讼活动无法继续下去,而起诉的罪名就是

参与策划 2001 年的恐怖袭击事件”,即 9·11 事件。^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盛顿无视盟国的支持在反恐战中的重要作用,又一次“把同盟友的关系弄僵了”。事情的经过是:几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打死了一名西班牙记者和一名乌克兰摄影师,“西班牙法庭官员称,他们在两次请求美国当局允许其讯问那几名士兵均无回音后”,西班牙法庭签发了国际逮捕许可并向美国提交了引渡被指控士兵的要求。五角大楼对此事缄口不言。^⑦

中央情报局把嫌疑人绑到埃及的行为引发了媒体的纷纷议论,大家认为美国与欧洲在“反恐战”上存在着“文化差异”,正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轻蔑地把欧洲人比作“金星人”,而把美国人比作“火星人”。温和的欧洲人信奉刑事审判和法制这样的传统理念,而强硬的美国人更像西部电影里的牛仔,一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强硬的美国人在反恐过程中极少注意刑事审判和法制,这一点评论家们十分清楚,但他们每次都巧妙地避开而不谈此事。另外,美国还常对一些重要的恐怖主义分子网开一面,要么是总统先生不顾司法部的强烈反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把某些人(指奥兰多·博希)驱逐出境;要么纵容一些人(指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去从事更危险的恐怖活动;要么对一些引渡请求不加理睬,向一些外国罪犯(指伊曼纽尔·康斯坦特——Emmanuel Constant)提供庇护,还有一些人被法院释放(指波萨达)。以上还只是从参与“值得注意的恐怖活动”^⑧的罪犯中举了几个例子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不难想到但被政策法规拒之门外的范畴,

就是美国恐怖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国家恐怖主义的地位十分高,这可以用一件事来说明: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曾被任命为情报主管,主要负责反恐。而在里根和布什当政的时期,他作为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中央情报局分站。这不是因为洪都拉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是因为那里是美国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基地。为此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曾谴责过华盛顿(当时美国缺席,没有否决安理会的那项决议)。然而,这样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头目被任命为反恐最高官员却没有在美国引起任何反响。同期另一件事在社会上也是无声无息:领导人民推翻尼加拉瓜索摩查(Somoza)暴政的女英雄多拉·玛丽亚·特列斯(Dora María Téllez)却被美国拒签,以致不能进入哈佛神学院授课。她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者的真正原因,就是她参与推翻了一个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和杀人犯。⁶⁹

奥威尔(Orwell)要知道了真不知是会笑还是会哭。

2005年前,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就庄严宣布了:“关于恐怖主义是否合法的争论结束了。”事实上这场争论正式结束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3月对恐怖活动下的定义:“任何行为,只要其有造成平民或非战斗人员死伤的意图,以恐吓人民或逼迫任何政府或国际组织做或不做某事为目的,它就构成恐怖行为。”林德做出那项宣布后断言:“只要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不管是非国家组织还是国家所为,都毫无疑问应被世界各国视为战争罪行。”幸好西方评论家们不用做出这项没有疑义的结论,因为我们已经让自己免于遵守一项最

基本的道德规范——人人平等。^⑩

最高决策者们愿意冒险让恐怖事件增加,甚至准备好出现可怕的后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结果。然而防止恐怖事件显然没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地位高——尤其是控制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地这样的战略目标,早在20世纪40年代那些能源产地就被看成“巨大的战略能源库”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原料收获”。英国在其鼎盛时期深谙此理,自1921年石油时代开启时起,英国海军大臣就告诉石油技术专家们,“如果我们确保了世界上已有石油的供应,我们就能做任何想做的事。”认识到这一点后,美国就把英国赶出了委内瑞拉(1928年前委内瑞拉就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让自己的石油公司掌握那里的石油供应。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华盛顿“主动支持邪恶腐化的胡安·文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政权在委内瑞拉的统治”,迫使委内瑞拉政府不允许英国石油公司进入(同时继续争夺和保护美国在中东的权利,当时英法在那里占有优势)。^⑪

入侵伊拉克后不久,一名精明过人的高级策划和分析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美国对中东石油生产的控制“使它能间接地影响欧亚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经济同样也依赖该地区的出口。这种影响在政治上十分重要”。这实际是在重述战后一流的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论点,乔治认为控制住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将使美国夺得对工业竞争对手的“否决权”。这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其建立的前提是人类的生存与短期的霸权和

财富相比并不十分重要。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在历史中处处可见。只是今天有所不同的是,这样做的风险比以往大得多。^②

由于伊拉克已知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且居于世界主要能源产地的中心,美国只要继续控制住伊拉克,就会极大提高华盛顿的“战略能力”和对它的两个主要对手“关键的影响力”(近三十年里世界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为一极,以欧洲和东北亚为另外两极,其中东北亚又同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紧密联系)。战后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始终把这一目标置于核心地位,特别是今天美国的重要盟友已开始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正如我们所料,这种局面的深化是由布什发动的侵略战争引起的。^③

只顾眼前的利益和霸权的短视行为举不胜举。再让我们到别的领域看看,2005年4月国会颁布的《2005年能源政策》允许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开采石油。这一决定消耗了国内的石油储藏,增加了美国对石油进口的长期依赖。各石油公司却纷纷为这个决定欢呼,称赞它“创造了就业机会,减少了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溢美之词同华盛顿的宣传(可能都是说客们原创的)相呼应。可事实上这样做会使美国在未来更依赖石油进口,而且“就业机会”只是个隐晦的词,常被用来指代另一个不太好听的七个字母的词——“利润”。其实,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是消耗国内石油资源更合理的方法,因为它不像到北极保护区采油会污染环境,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但它也不像后者一样能获取利润。当然保护区采油计划被推广到公众中去的时候肯定会加上一个更好的包装。^④

国会的这项议案是在埃克森莫比尔石油公司发布名为《2030年能源形势展望》的报告后不久通过的。埃克森莫比尔公司的报告预计,在2010年以前来自欧佩克组织以外的石油供应将达到顶峰。在那之前,埃克森莫比尔公司在预测石油销售高峰时是相当保守的。放眼未来,这部报告没有将加拿大油砂层等其他石油产地列入开采范围,理由是这么做并不可行。此外,报告也没有预见到除了欧佩克组织(其中主要是中东地区快速增长的石油产量),还有哪里的能源供应能与之相比。如果这个报告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耗尽国内石油资源只会使美国比预想中更离不开中东的石油供应,那样就会有更多的军事干预发生在那里,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被鼓动起来,美国就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在未来继续阻挡中东建立民主,恢复主权的进程。^⑦

中东最大的石油产地是沙特阿拉伯,而最有开发潜力的产地就是伊拉克。伊拉克的石油特别招人垂涎,不仅是因为那里的石油储量巨大,还因为它是地球上仅存的有大量未被开发油田的地区,而且开采代价低廉。这样一来伊拉克的油田对于有优先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主要是英美的石油公司)而言无异于一棵摇钱树,前提是侵略那里并让华盛顿的规则支配那里。然而除了开采权和利润外,战后最关键的目標是国际控制力。在可见的未来,对“关键的影响力”的追求恐怕会继续存在于国际关系中。

失败的国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要么不去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暴力甚至毁灭性灾难的伤害,要么把这项职责置于为统治

集团谋取短期的权力和财富之后。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都属“法外国家”——国家领导层蔑视各项国际法律和条约，认为那些法律只适用于其他国家。我们在下一章阐述失败的国家如何免除自己在战争法和其他国际习惯中的义务。

第二章

法外国家

20 世纪后期,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晚期的一部作品里简要描述了他心目中道德风尚良好的国际社会。他创造了“人类法”这一概念,并强调这一法律应适用于“由自由民主的民族构成的国际社会”以及“正直的民族构成的社会”。后一种民族指的是那些虽没自由民主的制度,但拥有其他能被一个正义的国际社会接受的特征。罗尔斯指出,除了这两种“守法的民族”外,剩下的就是不遵守人类法的“法外国家”。人类法包括以下义务:“遵守条约,信守承诺”,承认每一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并且都受到它们所订条约的约束”,不为“自卫以外的原因”使用武力,“尊重人权”和其他被各国认同的原则——当然不包括那些法外国家和它们的同党。^①

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应受它们所订条约的约束”的理念早已被明文写入各项国际法,如《日内瓦公约》——1864 年订立的保护战时

伤员的公约,订立后至今(特别是1949至1977年这一段时期),又加入一些议定书使其得以完善;又如纽伦堡法庭原则——为制裁二战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制定,后被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认可为国际法原则。纽伦堡法庭原则第三条明确规定:“行为构成国际法犯罪者,即使是国家元首或政府官员也不能免除其依照国际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举例来说,德国外交部长就因其在德国首先袭击挪威事件中起的作用而被判绞刑。^②

此外,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在公约各成员国的法律里都属于可以被引渡的违法行为,而且成员国有义务“进行必要的立法,使从事或命令他人从事违反公约活动的人受到有力的惩处”。可法律的尊严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那个“惟一、冷酷的超级大国”受到挑战时,因为“它的领导层想按照自己的强权主义世界观来重塑世界”。^③

虐囚丑闻

2002年,白宫律师艾伯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向布什呈递了一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制作的备忘录,内容是关于虐待事件的。正像宪法学者桑福德·莱文森(Sanford Levinson)所指出的:“按法律顾问办公室的说法,‘必须是十分极端的行爲才能被称为虐待……虐待造成的身体痛苦,其程度必须与重伤带来的痛苦相当,如器官残废,身体功能丧失乃至死亡。’”莱文森进而说,按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杰伊·拜比(Jay Bybee)的看法,

“从法律的角度,只要施以的痛苦达不到那种极端的程度,就根本算不上虐待。最多只能算不人道和侮辱性的对待,那么对布什政府的律师来说就不必大动干戈”。^④

冈萨雷斯还建议布什彻底废除《日内瓦公约》。他认为这部公约尽管是“地球上的最高法”并且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石,但里面有许多“古怪”而“陈旧”的条款。他告诉布什,废除公约能“有效减小被国内刑事司法机关依《战争犯罪法案》(War Crimes Act)提起诉讼的风险”。《战争犯罪法案》于1996年被通过,此法对“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处以重刑,如果非法行为“造成受害者死亡”,那刑罚将是死刑。冈萨雷斯后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如果不是布什的支持者认为他“太宽容了”,^⑤那他可能还会获得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

司法部的行为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桑福德·莱文森指责布什的法律顾问们“纯粹为布什政府的利益说话,他们嘴里的总统权力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献给他的元首希特勒的权力已经相差无几了”。莱文森说的施密特是“纳粹时期德国的头号法理学家”,那些法律顾问则是“(布什)政府的幕后操纵者”。也许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应该是罗伯斯比尔,历史上的《法国公约》(French Convention)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制定的,这部公约规定雅各宾派应该“用恐怖来对付自由的敌人”。然而根据莱文森的观点,这样的规定还是有一定依据的。1994年美国参议院在批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时,为虐待杜撰了一个“对‘审讯者比较友好’(引自莱文森的说法)的定义——比联合国谈判代表所用的定义要友好”。总统的法律顾问们已经用这个名字形容了发生在关塔那摩、伊拉克、阿富汗及(似乎还有)别处的监狱里的虐待事件。英国记者贾森·伯克是研究恐怖活动的专家,他说,美国“同他的关键盟友一道”——应该是指英国,“正在操纵一个由秘密监狱和拘留所构成的‘看不见的’网络,自‘反恐战’开始后已有数千嫌疑人在这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达纳·普里斯特(Dana Priest)认为那个网络中还包括一个前苏联时期在东欧建的集中营。他们的命运没人知道,但不难猜测。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嫌疑人被“引渡”到了可以随意折磨他们的国家。^⑥

国际法学教授乔丹·波斯特(Jordan Paust)对布什政府司法部编造的那些理论痛加斥责,他写道:“自纳粹政权垮台后,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律师如此明显地卷入到违反国际法的犯罪中,罪行都涉及对战时被捕者的处置和审问。”那些律师们正在实施一项“2002年就在布什政府内浮出水面的计划……目的是废弃以习惯法和条约为主要结构,以规范对抓获的所谓‘恐怖主义分子’和敌对战斗人员及其支持者的处置和审问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法”。波斯特指出:“那项计划及其批准都有犯罪的嫌疑”,罪名包括“违反战争法,构成战争犯罪”,还可能有政府高层阴谋从事违反战争法的活动。波斯特还认为,2002年冈萨雷斯提交的备忘录“证明了政府正在执行一项不道德的计划,目的是在不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躲避法律的管辖,从事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活动”。与此不谋而合,2002年2月7日布什签发了

一项备忘录,实质上批准并下令实施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实为战争罪行的活动。波斯特在翻看接下来的总统决定时发现,里面既有违反《日内瓦公约》和《纽伦堡法庭宪章》(Charter of the Nuremberg Tribunal)的构成战争犯罪的决定,也有公然破坏美国宪法的命令。波斯特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法律顾问们的所作所为,尽管他们中有倍受尊敬的法学教授和其他法律界权威,可他们为了“实施战争犯罪的计划”,“参与了彻头彻尾的编造和虚构”,扭曲了长期以来的法律原则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他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现有“律师和政府的最高层”从事这样的罪行的先例,其中包括总统以及下达“公然违反战争法”命令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⑦

有两个主要的人权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已对纽伦堡国际法庭提出的政府高层官员应为本国犯下的反和平及不人道的罪行负责这一原则表示完全赞同。人权观察组织以关塔那摩监狱丑闻和美军直接或通过丑恶的“转移”活动虐待俘虏为名,要求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理查多·桑切斯(Richardo Sanchez)将军(前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和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关塔那摩监狱前狱长)进行刑事调查。人权观察组织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按照国际人权法律的规定,对“在虐囚事件中涉案的美国高官”展开刑事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支持起诉,“逮捕任何进入他们领土的涉案官员,并启动对他们的诉讼程序”。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过先例,那就是对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抓捕。而美国上流社会对此的反应又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他们自动排除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他们的约束,并免除了自己遵守国际法律和条约的义务。^⑧

即使没有关于布什及其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帮凶所作所为的详细资料,也没人会怀疑那里发生过的暴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向欧洲外交人员所做出的不会有任何虐待和转移行为的郑重保证,看来并不可靠。为什么他们要把犯人转移到埃及而不是瑞典?为什么选择关塔那摩而不是纽约的监狱来关押犯人?把防止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可能越狱进入纽约市当作借口是徒劳的,很显然布什政府选择关塔那摩是要维护美国尊重法律的美名,而那里是国内和国际法的真空地带。美国驻东古巴的基地是在19世纪末以武力夺取的,并用一个强加给古巴的“条约”使它成为美国的采矿地和海军基地。可后来美国连那个强加的“妥协”都违反了,因为从那时起那个基地就被改做了其他用途:包括关押海地流亡者和虐待俘虏——这些行为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九条及其他的国际法律。保留那个美军基地同时也是对古巴经济的公然损害,因为那使古巴不能使用它的主要港口,也无法发展内地经济。

两名法学权威在企图使另一部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公约被废止的过程中,无意间肯定了莱文森、波斯特和一些人权组织对布什政府方针政策的评论。国际红十字会是惟一能决定战俘法律地位的机构。然而曾

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司法部工作过的两名国际律师李·凯西(Lee Casey)和戴维·里夫金(David Rivkin)却说这部公约十分“可笑”，原因之一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自行解释(国际法)——这是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核心”。他们说的“每个国家”当然就是指美国或它的附庸国们——只要华盛顿愿意授予他们这项权利。凯西和里夫金不会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有权解释国际法以使对科威特的人侵合法化，他们也不会认为将来伊拉克的民主政府为了让以色列无休止地违反安理会决议和《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停下来，就有权轰炸以色列。他们要废止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的第二个理由——笔者谨在此替他们作答：是它与华盛顿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丢弃了它作为一个“中立的人道主义机构”的职能。^⑨

其实凯西和里夫金还可以把其他机构也列入到他们眼里的不够格者的名单中，像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美国强权下世界和平的卫道士”——英国一家国际事务主流媒体对英国政府的讽刺。2002年3月，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要求美国“立即采取措施让一家有资格做出裁决的组织决定被关塔那摩监狱收押者的法律地位”，这个组织指的就是国际红十字会。华盛顿拒绝了该组织的要求，理由是它的决定对美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美洲国家组织在一年后的第一次投票就将美国开除了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一名驻华盛顿的拉美外交官认为，美洲国家组织此举“是对美国的一次象征性的抵制，目的是表明我们不赞同它的政

策”。在英国那边，一家上诉法院一致裁定，一个未经诉讼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名叫费罗兹·阿巴西(Feroz Abassi)的英国公民是被不公正地关进了“法制黑洞”里，可英国政府却对此事拒绝表明态度。“法制黑洞”一说引自《大宪章》(Magna Carta)中的特别的条款。那些条款最终在2004年6月的《拉苏尔等人诉布什》(Rasul et al. v Bush)的决议中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部分承认。也许按照凯西和里夫金的标准，最高法院也成了不够格的机构——国会则不同，因为国会在2005年秋季废止了这一决议。^⑩

另外还有一些无权评判美国行为的机构，其中有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前者在1986年尼加拉瓜起诉美国的案件中做出了不利于美国的判决；后者则认可了国际法院的判决。而且国际法院的可恶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它在尼加拉瓜案件上的出格行为。2004年7月，它还发布了一个建议性的裁决：以色列为分割西岸地区修建的“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对这堵墙形成的非法格局不予承认，并不得为维持这种局势提供任何援助或帮助”。美国法官伯根撒尔(Buergenthal)一人表示不赞同国际法院的这项裁决，但也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他认同“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都适用于巴基斯坦被占领土，因此以色列必须遵守”。由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行为违反了公约，“以色列为保护定居点而修建隔离墙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隔离墙大部分都属违法建筑。看起来伯根撒尔也应属于没有资格评判美国的那类人，而以色列自己的高级法院还是判被

占领土上的聚居行为合法。一年后,该法院还规定在隔离墙中修筑任何通道“都必须考虑其是否有必要被用来保护住在西岸犹太定居点阿尔费-梅纳什的以色列居民的安全”以及所有“生活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地区(位处西岸)的以色列人社区里的以色列人的安全”,包括他们的财产权利。^①

美国的政党赞同以色列法院的判决。在国会的决议中,两党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对国际法院的决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以非常强硬的姿态谴责了国际法院。斯蒂芬·朱恩斯对此的评价是,这种态度反映出“两党对外界以法律约束美国及其盟国跨境活动——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活动,越来越反感”,还显示了两党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强硬对待任何对占领军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人”——这里的占领军当然指的是美国和它的附庸国。此外还有其他证据证明斯蒂芬的看法是正确的。^②

以色列无须多此一举去宣布修建隔离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如果是那样就应当将那堵墙建在绿线(Green Line),也就是世界各国承认的国境线上——当然那不是以色列和美国所承认的国境线(实际上美国曾经承认过那条边境,但到了70年代突然转而支持以色列,撕毁政治协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向被占领土扩张)。如果以色列真想建一堵用于防卫的墙,那它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无懈可击,不用像现在这样遭到各国的反对,害得美国还得出面否决那些反对意见或是对它们视而不见。事实上以色列这座墙修建得的确有问题,作为

一项防卫工程它的目标不应是把属于巴勒斯坦的不稳固的土地和重要的资源(首先是水源)圈进自己的领域。^⑬而且这样做首先会给以色列人自己带来不便,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可见尽管“安全”仍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和公共问题,但显然不是修建隔离墙的目的。

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的罪行

冈萨雷斯提出的保护布什免遭司法机关依《战争犯罪法案》起诉的法律建议不久就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那是一起比虐囚丑闻更加严重的事件,2004年11月美国占领军发起了对费卢杰市的第二轮主要攻势,各媒体在官方授权下立即报道了在战争中发生的大宗罪行。进攻一开始是一轮轰炸,目的是将成年男性以外的居民都赶出城,所有15岁至45岁的男性在逃离时都被遣回城内。这项计划同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杀的开始阶段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塞族军队是用卡车将妇女儿童运出城外,而不像美军用炸弹赶他们走。在轰炸行动进行的过程中,伊拉克记者纳米恩·穆夫提(Nermeen al-Mufti)从这座“布满清真寺尖塔的城市”发出报道:“那里曾经静谧地流淌着美丽的幼发拉底河,充盈的河水发出悦耳的回响,两岸是郁郁葱葱的草木……那里曾是伊拉克人的度夏胜地,他们在附近的哈巴尼亚湖里游泳和享用烤肉串。”她又描述了轰炸受害者的命运,有的全家都被炸死,包括孕妇和儿童,有的是在城市出路被侵略者封锁后无法逃离才最终遇害的。^⑭

穆夫提问当地居民在费卢杰是否有外国战斗人员。一名男子回答说他在城里听到了阿拉伯战士的声音,但没有看到过他们。后来他听说那些战斗人员都走了。那名男子接着说:“不管他们来这里战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给美国人屠城提供了一条借口,可我们有权利抵抗。”另外一个人说:“有些阿拉伯战士藏在我们中间。可后来轰炸越来越猛烈,我们让他们离开他们就走了。”他们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有权利召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给他帮忙,而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呢?”^⑮

相信去探究这个问题在西方新闻和评论界被提出的频率有多高肯定是件有趣的事,或者去调查一下上世纪80年代有关阿富汗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在前苏联的媒体被提到了多少次?像“外国战斗人员”这样的词有多少次被用来指侵略军?新闻和评论界有多少次绕开了一个假定,那也就是我们惟一注意到的“我们这一边”打得怎么样,“我们成功”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没有必要去调查。那个假定在人们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对它们稍微加以质疑也是不可想象的:要么会立即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和“把全世界的问题都归咎在美国或俄罗斯身上”等帽子,要么还会有其他的顾虑。

经过几周的轰炸,美军开始了在费卢杰的地面攻势。第一个被占领的是费卢杰总医院。《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医院的病人和雇员赶出房间,命令他们坐或躺在地板上并从背后捆住他们的双手。”报道旁附了一张现场照片,可这种行径却被当成一种值得称赞的成就拿出来展示。报道里写着:“军官们说,这次进攻还关

闭了武装分子的宣传工具：费卢杰总医院。因为从这所医院里不断传出平民伤亡的消息。”没错，美国攻击这样一个宣传工具的确合情合理，特别是当“里面的平民伤亡数字开始膨胀时”（膨胀的数字是我们的领导宣布的），就会“在国内煽起不满的议论，加大这场冲突的政治成本”。“冲突”这个词是对美军侵略行为的一种常用的婉转表达，在同一份报纸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报道：“现在，许多美国人正乘坐各种运输工具在伊拉克境内忙碌，他们将开始重建刚在冲突中被毁坏的伊拉克。”——凭空出现一个“冲突”，连主体都没有，就像是遭了场天灾。^⑥

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文件，也许是因为太荒唐和陈腐吧，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日内瓦公约》有条款规定：“固定和移动的医疗设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攻击，而且应该始终受到冲突各方的尊重和保护。”看来那家世界闻名的报刊用头版对一桩战争罪行做了精彩的描述，孰不知依美国的法律，如果美军把病人从床上掀下来铐在地上的行为导致病人死亡的话，那么美国的政治领袖有可能会被判处极刑。可这些问题并没有在社会上激发任何明显的质疑或反思。主流媒体仍在告诉我们美军“攻打满是瓦砾和硝烟的城市”，“拿下了绝大部分目标，进度超前”。但是他们的战果还不够完整，因为他们很少在“狩猎的围场”里或大街上发现“猎物”的尸体，这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美国士兵“在费卢杰街头发现一个女人的尸体，但不清楚她是伊拉克人还是外国人”。显然，这个才是关键问题。^⑦

另一则头版新闻引用了一位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的一句话，他

说进攻费卢杰的战役“应该被载入史册”。也许他说得对,那样我们也清楚该给这场战役在史册里找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和另一个面积差不多的城市格罗兹尼放在一块,旁边再配一张图,画着布什和普京互相盯视着彼此的灵魂。当然,那些赞美这场战争,甚至为此而容忍战争里所有残酷的事的人也可以为他在历史里找个让自己满意的位置。^⑧

媒体对美军进攻的报道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却因为“过度渲染平民伤亡”而遭到了美国高官的严厉批评。后来为了解决这家独立的媒体带来的麻烦,伊拉克在准备进行自由选举时先把它给封杀了。^⑨

撇开美国主流媒体的那些报道,我们还看到了“萨米·朱麦利医生控诉美军战机轰炸了他所在的中央医疗中心”,造成三十五名病人和二十四名医护人员死亡。为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一名伊拉克记者和费卢杰总医院的艾曼·阿尼医生都证实了朱麦利医生的话,阿尼医生还说他在轰炸后不久就到达了中央医疗中心,可那儿已经成了一堆瓦砾,把病人们都压在了下面。侵略军说这项报道“缺乏事实依据”,可他们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甚至起码道德准则的行为还不止于此,美军还拒绝让伊拉克红新月会(Red Crescent)组织进入费卢杰。英国红十字会主席奈杰尔·扬(Nigel Young)爵士谴责这种行为“影响恶劣”。他说:“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红新月会是经授权前去解救当地苦难人民和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国际红十字会曾发布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声明,公开指责伊拉克交战各方“对人道的完全漠

视”。^②也许美军的这一举动就是对红十字会那则声明的回应吧。

伊拉克医生阿里·法迪勒(Ali Fadhil)估计是伊拉克军事行动后第一个报道费卢杰见闻的人,用他的话说,那座现代化的城市“被彻底毁灭了,就像一座鬼城”。法迪勒在街头发现了一些伊拉克战士的尸体,他们在袭击开始前就接到命令撤离该城。医生们说战斗开始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关进了几所大医院里,美军要求他们“待在原地”,结果“谁也无法进医院,城里到处有人流血至死”。一座被毁房屋里的镜子上有一句用口红写的英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侵略者的心态:“去他妈的伊拉克和伊拉克人。”一些最恶劣的罪行是伊拉克国民卫队队员犯下的,他们被侵略军驱使去搜查房屋,抓捕“来自南部地区的穷苦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失业,绝望。这样的冲突可能埋下了内战的火种”。战地记者在几周后到达费卢杰,看到了一些“零散的返乡人”。可他们回到的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被坦克和炸弹袭击的残缺的房屋、漏油的管线和断开的棕榈树”。这座人口达25万的城市现在是“断水断电,停学罢市”,还处于严格的宵禁中,刚刚毁灭这座城市的侵略者和他们纠集起来的当地武装“清楚而明了地占领着它”。在严密的军事侦察下壮着胆回来的少数难民发现那里“街上污水横流,烧焦的房子里散发出尸体腐烂的气味。停水停电,各个关卡都有人排着长队等待美军士兵的彻底检查。到处是地雷和陷阱机关的警告。起义者和占领军的枪战时有发生”。^③

可能第一个国际观察者在战斗结束半年后才来到这座城市:巴格达基督教和平工作团(Christian Peacemakers Team)的乔·卡尔

(Joe Carr)。卡尔曾去过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5月28日到达费卢杰后,他痛心地看着类似的情形:进入城市的关卡很少,得花上很长时间等待检查,而检查过程就是刁难,看不出有什么安全上的必要。城市成为废墟,生产能力被摧毁,以致“食品价格在封锁中飞涨”。对载有病患的救护车进行拦截和随时出现的另外一些恶行与以色列媒体常常报道的内容十分相似。卡尔写道,加沙地带的拉法赫是被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恐怖主义分子完全摧毁的,可费卢杰的情形比那里更糟。美军“夷平了整个街区,将近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或受损”。只有一座带有住院部的医院幸免于难,但占领军截断了到那里求医的途径,导致费卢杰城内和周边地区大量的伤员死亡。在城里一些地方,数十人挤在一个“烧光的空壳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被炸家庭得到了一点房屋补偿,可补偿金还不到重建家园所需材料费用的一半。^②

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让·齐格勒(Jean Ziegler)谴责入侵伊拉克的英美联军在费卢杰和接下来几个月占领的其他城市里,“以切断被围城市饮食供应的手段来逐出武装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他告诉国际媒体,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切断或限制食品和饮水供应以促使市民在攻击发动以前逃难,利用饥渴作为对付平民的武器,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破坏”。可美国公众大多都没有得到这则消息。^③

甚至除了在费卢杰发生的战争罪行外,还有大量事实足以支持一位学者的结论。那是海军战争学院的一名战略学教授,他认为2004年“对不幸的伊拉克来说,是可怕而残酷的一年”。他指出,现在

对美国的仇恨已在这个饱受制裁之苦的国家蔓延开来。多年的经济制裁导致“伊拉克的整个中产阶级倒下,非宗教教育体系无力支撑,文盲数量上升,绝望和动乱使宗教势力在大量伊拉克人寻求宗教救助的环境里卷土重来”。现在伊拉克的基础服务能力甚至比制裁时期更低下。“许多医院常常缺乏最基本的药物……医疗设施状况极差。医学专家和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成批离开伊拉克,要么是因为怕遭受暴力侵害,要么就是因为工作条件太差。”同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美国领导的联合部队在2003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宗教在伊拉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稳步上升。”据伊拉克政府官员说,伊拉克战争以后,“那里的任何一项政治决策”都要经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的“同意或默许”。另外,“以前少有人知的反政府青年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发起的政治军事活动在伊南部地区和巴格达最底层的贫民窟赢得了数万名追随者”。逊尼派教徒所在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2005年秋季伊拉克宪法草案的投票活动变成了一场“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投票者们大都听从的是宗教法令。大多数伊拉克人甚至没有看过草案内容,因为政府根本没有下发过几份宪法草案文本。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拉克新宪法“比半个世纪前制定的那一部宪法有着更深的宗教内涵,老宪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赋予伊拉克妇女“和男性几乎平等的权利”。可这一切现在都被美国的军事占领给逆转了。^④

* 阿亚图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

西方世界对伊拉克多年的暴力和压制行为使伊拉克有文化知识的阶层彻底心灰意冷。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话说,他们吃惊地发现“作为虔诚穆斯林的绝大多数伊拉克人知识水平都不高,最多是半文盲”,他们无法“相信也不能理解有些外国人会无私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财富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⑤

评论者们看到美国“由一个谴责和禁止使用酷刑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常动用酷刑的国家”,纷纷感到痛惜。在真实的历史中各种暴行比比皆是,可很多可怕的酷刑同发生在费卢杰和伊拉克别处的战争罪行相比,或同英美侵略伊拉克的后果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04年10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当局偶然发现了这篇文章但很快就把它抛到了脑后。美国和以色列专家在该文中通过细致的研究后以保守的态度得出了以下结论:“因入侵和占领伊拉克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达10万人或更多。”后来瑞士发表了一篇对这一研究数据的评估报告,认为其中有将近4万伊拉克人是直接死于战争和武装暴力的。随后伊拉克人口统计局(Iraq Body Count)的一项研究显示,据各种报道有2.5万名非战斗人员在伊拉克被占领的头两年里被害——巴格达一次报道了500人,费卢杰一次报道了136人。遇害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死于美国领导的侵略军之手,百分之三十六死于犯罪,还有百分之九被“反占领武装”杀害。而且在伊拉克被占领的第二年,死亡人数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大多数遇害者是被各种炸弹炸死的,其中三分之二死于空袭。人口统

计局的这些估计都是依据各种媒体报导,因此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字,但这样的评估结果就已经触目惊心了。^⑥

英国分析专家米兰·雷(Milan Rai)把这些报道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做的“伊拉克生存环境调查”(2005年4月)报告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这些报告的内容相当一致,表面上有些数据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调查主题和涉及时期的不同。米兰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五角大楼一项研究结果的支持,那项研究认为自2004年1月起,约有2.6万名伊拉克平民和安全部队被所谓的“起义军”打死打伤。《纽约时报》对五角大楼的这项研究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另外几个数据,并顺便提到“还没有被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杀死的伊拉克人的确切数字”,但报告忽略了《柳叶刀》专文中那个最重要的数字。《纽约时报》刊登那个报道的时间是在《柳叶刀》专文发表一周年之际,并且还是国际社会活动家们定下的伊拉克死难者纪念日的第二天。^⑦

伊拉克遭受的灾难之深重难以尽述。新闻记者的活动范围基本上被限制在严防之下的巴格达“绿色区域”中,即使出行也要有层层护卫。但仍有一些记者不断突破主流媒体的局限,使伊拉克人的声音也偶尔被世界听到。罗伯特·菲斯克和帕特里克·科伯恩就是这样的记者,可他们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有这样一个报告是关于一些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巴格达知识阶层的老友聚会,人们在聚会中聊到了旭烈兀*

* 旭烈兀(Hulagu Khan, 1217—1265),蒙古在伊朗的统治者,曾创建伊儿汗王朝。成吉思汗之孙。受长兄蒙哥汗之命率军西征,1258年攻陷报答(今伊拉克巴格达)。——译者

在巴格达的野蛮行径。其中一位哲学教授的评论是：“旭烈兀比起美国人还算人道”，他的话引起了一些笑声，然而“大部分人都极力避开每天都困扰着他们的政治和暴力问题”。他们将话题引向了伊拉克的民族文化：花费了许多努力才逐步消除了种族和宗教分隔的伊拉克文化，现在在美国的占领下又历史地“倒退”成了过去的模样。在那里许多伊拉克乃至世界文明的珍宝都遭到了毁坏，自古代蒙古大军征服伊拉克至今这还是头一次。^⑳

侵略还带来了其他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是使伊拉克的中层收入从 2003 年的 255 美元降至 2004 年的 144 美元，另外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UN World Food Program) 称，“伊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糖、奶和婴儿食品短缺”。这个组织在伊拉克战争前就提出，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实行的定量配额制度是难以被他人成功借用的。据伊拉克报纸记载，现行的配额中甚至包含了金属锉屑，这是伊拉克在英美占领下滋生严重腐败的后果。伊拉克被占领 16 个月后，国内的严重营养不良现象增加了一倍，和布隆迪不相上下，远远超过了海地或乌干达。这意味着“约有 40 万名伊拉克儿童‘骨瘦如柴’，是长期患痢疾和严重缺乏蛋白质摄入的后果”。在这个国家已有数十万儿童因英美强加给伊拉克的制裁而死亡。2005 年 5 月联合国大会特别报告员让·齐格勒公开的一份由挪威一家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完成的报告证实了上面的数字。在七八十年代甚至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人的营养状况都比制裁时期好得多，而到了 2003 年英美入侵以后他们的营养状况更是进一步恶化了。^㉑

与此同时,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进一步扩大,超出了占领军和叛乱者的范围。安东尼·沙迪德(Anthony Shadid)和史蒂夫·费纳吕(Steve Fainaru)在他们的报告中说:“什叶派和库尔德民兵常常是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队的组成部分,他们为加强对南北伊拉克之间地区的控制,到处制造恐怖活动,包括绑架暗杀等。这些行径加深了这个国家种族和地区间的隔阂。”这场灾祸的可怕性从大量外逃的难民中可见一斑,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仅逃往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就达一百万。他们离开祖国是为了“逃避暴力和贫困”,他们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少有宗教狂热分子,是能够帮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的人”。^③

《柳叶刀》上的那篇论文估计伊拉克在2004年10月前的死亡人数可达10万,这在英国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应,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发布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声明加以否认。可同样一篇文章在美国却几乎无人理睬,只是偶尔有一些含糊其辞的报道提到有那么一篇“有争议的”文章称有“多达10万伊拉克人”在伊拉克战争中丧生。10万这个数字是在相当保守的前提下提出的最接近现实的结论,因此说报道里称“只有10万人”死去也同样准确。尽管那篇论文是在美国总统竞选的高峰期发表的,但两大候选人似乎都没有公开对此表示过什么。^④

对于恶劣的罪行,人们的反应似乎总是随着罪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印度支那战争就是一个有力证明。在关于越战中平民死伤数目的惟一一次(据我所知)民意测验中,大家给出的答案平均是10万人,仅达到了官方公布的死伤人数的百分之五。而越战到底造成了多少平民伤亡,以及有多少人在美军化学战中丧生或受伤还不为人知,大

家对这些也没有多大兴趣。那次测验的发起者说,美国民众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就像是德国大学生估计二战大屠杀中的牺牲者有 30 万人,而如果德国是那样我们就会认为他们有问题,要是让德国统治了世界,那问题就会严重得多。^②

华盛顿做出的免除自己遵守国际法义务的决定甚至超出了它一再违反国际法的先例,可这项决定还是得到了一些所谓人权先锋的部分支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是哈佛大学人权研究课题的主席,他支持在“并不邪恶”的前提下违反《日内瓦公约》及美国法律。至于“并不邪恶”的前提是以他的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准的,这一前提据说是用来支撑所谓“正义战争论”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因其对正义战争论的思索得到了高度好评,他的理论认为阿富汗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还是“正义战争论的伟大胜利”,对此他没有提供任何论据也没有加以论证——这大概也是正义的。在他的“关于战争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任何重要的结论能同正义战争论的论点或其他观点相呼应,除非我们在里面加上“我认为”或“对我来说完全合理”这样普通至极的话。沃尔泽告诉我们,大学里那些反对他把某些美国打的战争冠以正义之名的人是“和平主义者”,但他认为“和平主义”是个“差劲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暴力有些时候是合情合理的。也许我们能够认同他的看法(至少我能),但“我认为”这样的话很难在他所探讨的国际问题中成为一个有力的论证。他那些“左倾的对手”除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更聪明细心一些的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还不清楚有

哪些。爱德华和理查德据说为恐怖主义找了些“借口”，但到底是什么“借口”我们不得而知。沃尔泽“关于战争的论述”主要是针对那些“偏左的人”，有“批评战争的人”，“空谈家”，“左派分子”和“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的人”等。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的对象，照例应该是阿拉伯人。毫无依据地攻击身份不明的对手居然还被看成合理的（照上面的理论应当是值得赞扬的）举动，这在我们现行的道德与理性并重的文化中是很有趣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谦虚地自诩为“正直的左派”的人而言。^③

“有贼！”

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迅速征服伊拉克并扶植一个稳定的傀儡政权的指望并不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要不是那些执掌国防部的文官太无能，伊拉克战争可能会是历史上最轻松的军事征服之一，甚至都用不着使用“试探行动”（“spikes of activity”）等让伊军不会或不能抵抗的前序手段。原因是这个国家在制裁和战争的摧残下已经满目疮痍了，在防卫能力和开支方面同他的邻国相比都相当有限。入侵伊拉克终结了两个残暴的政权，美国也有着大量资源来重建这个国家。另外，抵抗者所能得到的外援是非常少的。然而，五角大楼的文官们却有效地在伊拉克制造出了大量武装抵抗和广泛的非暴力抵抗活动，还同时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的领袖们统治伊拉克的难度甚至比俄罗斯控制其卫星国和二战时德国控制整个

欧洲都大。和美国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是靠被占国自己的政府和安全部队来控制那些国家,自己则在幕后操纵。而且二战时德国还得同一些勇敢的反纳粹游击队作战,那些游击队是靠着外援才生存下来的。占着这些前辈们所没有的优势,五角大楼的文官们依然酿成了“历史上最不平凡的失败之一”——这是资深的中东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基于他的观察做出的精彩评价。^④

因入侵行动而终结的两个邪恶制度中,只有萨达姆独裁政权是允许谈论的,而且讨论的主题必须经严格的筛选。萨达姆再也不像1990年8月和1991年3月时那样受到美国的青睐了,当时老布什允许萨达姆镇压什叶派反叛者以免其政权被推翻。两人那次的勾结让数万人失去了生命。^⑤

另一个邪恶制度就是英美对伊拉克的制裁(在政治宣传中被称为“联合国制裁”,尽管大家都清楚联合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实施制裁的)。但这些制裁不属于人们议论的范畴,因为它们已经导致了比“历史上所有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要多的人死亡——这是两名鹰派军事专家的估计,据说死亡人数肯定达到了数十万。一个消息灵通的美国记者在分析了大量证据后写道:“在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可怕岁月里……伊拉克人的收入降到战前(1990年)的五分之一,婴儿夭折率增加了一倍,只有少数人有清洁的水可用。”另外,伊拉克有一半的污水处理设施同它的发电站一道在1991年被英美联军炸毁,这些设施至今仍未恢复使用,“引发了伤寒和霍乱流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道,伊拉克的教育文化事业一蹶不振,越来越多的

伊拉克人处于“半饥饿状态”，显现出“通常只有在饥荒中”才有的各种症状，导致 2003 年死亡率升至原来的 3 倍。^⑥

这些制裁摧毁了伊拉克的民间力量，巩固了独裁者的地位，迫使老百姓依赖他生存下去。很可能是制裁挽救了萨达姆，使他没有重演英美支持的其他独裁者的命运，像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苏哈托、马科斯、绰号“医生儿子”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和全斗焕等靠着英美撑腰，一直撑到了他们血腥统治的最后一刻。这些人足够拼成一本警局罪犯相片档案了，而且还不断有新人物加进去。因此制裁遭到了伊拉克主要反政府人物的猛烈抨击，卡米勒·迈赫迪(Kamil Mahdi)在他的书中写道：“美国的行为实际上破坏和瓦解了所有反对伊拉克政权的力量”，并且“让这个臭名昭著又摇摇欲坠的政府又得以喘息一阵”。迈赫迪还写道，制裁“让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大难民营，随时需要紧急救助。可伊拉克人需要的是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和获得发展。这意味着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要优先发展，要启动进口项目以刺激国内生产”。可这些正是美国强加给伊拉克的制裁所禁止的。^⑦

一些十分了解伊拉克的西方人士，如受人尊敬的国际外交家丹尼斯·哈利戴(Denis Halliday)和汉斯·冯·斯波内克(Hans von Sponeck)认为，如果不是那项邪恶的制裁，伊拉克人可能已经靠自身的力量摆脱了面临的困境。丹尼斯和汉斯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执行人，此外遍布伊拉克全境的调查人员也是真正了解伊拉克的人士。哈利戴谴责制裁是“种族灭绝”行为，已于 1998 年辞职以示抗议。斯波内克出于相同的原因在两年后辞职。制裁挽救了萨达姆独

裁政权这一推测得到了美国政府在战后一些调查的印证。那些调查结果表明伊拉克政府实际上是被透明胶带绑在一起才不至于瓦解的。然而除了政府调查之外,对此事的个人判断却无法引起关注。如果没有人给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的机会,那任何外来力量都不应有这项权利,况且任何人想这么做毫无例外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并会给伊拉克带来可怕的后果。此外据斯波内克称,美国还曾阻碍他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报告。封杀最了解实情的西方观察家的观点显然不是保护美国公民的必要措施,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寻常的身份和不受欢迎的结论。^⑧

政府似乎感到仅仅保持沉默已不足以掩盖制裁的真实后果,于是就差遣其喉舌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当贼把手伸进别人口袋被发现时就大喊“有贼”,并竭力指认他人,企图借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好趁机溜走。美国政府用的手段是指控联合国在执行石油换食品计划时存在腐败现象,并开展紧张的调查,围绕着可能被伊拉克人装进了腰包的200亿美元大做文章。不过我们要清楚一点,那就是即使美国最终承认了这项指控是错误的,它这一招也已经奏效了:斩断了正确的调查,让真正的大丑闻——制裁本身和它的后果,有机会逃脱公众的视线被遗忘,不管这种机会会有多小。

尽管美国蓄意发起调查本身不是主要问题,但贼喊捉贼的手腕还是有一点意思的。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人们发现联合国确实存在腐败现象,消失的那200亿美元中大部分是伊将石油卖给土耳其和约旦所得的非法收入,可这项交易得到了土约两国的盟友——美国的

批准。根据美国驻伊高级检查员查尔斯·A·迪尤尔弗(Charles A. Duelfer)报告,非法交易的主要部分中存在着伊拉克同其他国家达成的“政府间协定”,主要是约旦(报告中称约旦是“伊拉克渡过财政危机的关键”)和土耳其。这些交易都不属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但都得到了安理会——也就是华盛顿的认可。而其他交易在通过美国主导的制裁委员会审查时立即遭到否决。美国研究者乔伊·戈登(Joy Gordon)说,美国的否决权从不对非法回扣行使,却常常不放过人道主义的买卖活动。海湾地区发生的重大走私活动一定是得到了美国海军的默许,因为驻在那里的联合国多国拦截部队(UN Multinational Interception Force—MIF)实际上就是由美国海军构成的。对石油换食品惟一严肃的调查活动是联合国授权的对滥用权利问题的调查,由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负责。保罗经过调查初步认定,涉案回扣金额“约为17亿美元……同查尔斯·迪尤尔弗的结论相同”。这个数目只是美国庇护下的伊土和伊约石油交易的一小部分。而在涉及“联合国腐败丑闻”的诸多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是对科威特的超额军事补偿,涉案金额为4.19亿美元,仅占非法交易回扣额的四分之一。一家国际商业媒体在调查中发现了“联合国腐败丑闻”中的第二大涉案金额——2亿美元的非法利润,其中有5000万被萨达姆的同伙卷走。可这家媒体同时还发现:“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最大胆最严重的走私活动是在美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英美两国都得到了警告,可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有些警告还是通过多国拦截部队传达的。^⑨

《金融时报》经过调查发现，“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不仅仅知道伊拉克向土耳其和约旦走私石油的事，还把此事告诉了国会”，并且建议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纵容走私的原因是它“符合‘国家利益’”，因为约旦是美国重要的附庸国，而支持土耳其有利于美国的“安全、繁荣和其他重要的利益”，因此一直都是美国加强地区控制的基本手段。^⑩

不论伊战前非法石油交易的回扣有多少，它都不太可能接近伊拉克被美国占领后莫名消失的那些石油款项。在美国领导的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CPA)卸任时，交由它管理的大约 200 亿伊拉克石油资金，其中包括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未用完的资金和超过 110 亿伊拉克石油收入的去向成了一个谜。《金融时报》报道了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缺乏透明度，使人怀疑存在腐败行为”。《金融时报》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其中有一项研究认为价值超过 500 万，占伊拉克公共建设总额四分之三的合同未经有效招标就被承包了出去。还有“价值 14 亿美元的伊石油设施重建项目没有投标就交给了在美国的哈利伯顿石油公司(Halliburton)，哈利伯顿公司因此成了伊拉克资金最大的受益者，而它以前的总裁就是现任副总统迪克·切尼”。进一步调查发现，得克萨斯这家石油公司和“传奇式的石油人”企图阴谋消除“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给他们造成的限制”，相关的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撇开还未被发现的丑闻，已经暴露在我们眼前的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美国商业腐败的黑洞。^⑪

在媒体以美国官方审计结论为基础对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行为做出的最详尽的报道中,埃德·哈里曼指出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布雷默“确保了伊拉克的重建是由这个被‘解放’的国家自己来买单的”。布雷默治理下的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花费了近 200 亿伊拉克资金,却只用了 3 亿美国资金”。另外在布雷默的控制下,“新任伊拉克政府经手的 88 亿资金”的去向无据可查。得克萨斯的哈利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得到的报酬超乎常规,而联盟临时权力机构治理下的腐败现象更是异常出格。“应该从联盟临时权力机构管理的资金中受益的学校、医院、供水和供电设施仍旧是破烂不堪。毫无疑问是那些外国承包商同他们的伊拉克同伙勾结起来,将大把的资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哈里曼还发现萨达姆在位时“与美国人一道所得不菲”。那些年“大部分伊拉克石油都交给加利福尼亚的炼油厂炼制,结果那些炼油厂都发了财。如今的做法和当时如出一辙:伊拉克的石油又被运到了加利福尼亚,同时新任伊拉克政府毫无顾忌地大花国家的钱财”。斯图尔特·鲍恩(Stuart Bowen)是专门监督伊拉克重建的检察长,他发现真正被用来重建的资金很少。一部分原因是被占领军夺取的约 300 亿伊拉克资金和伊拉克石油收入在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人员的滥用和“可能的侵占行为”下严重流失。^④

比腐败事件更吸人眼球的是被热炒的俄罗斯设的圈套,或是联合国官员贝农·塞范(Benon Sevan)来历不明的 16 万美元,或是科菲·安南在某个集会上跟他儿子所在公司的一名官员说话(又好像是

没有说话)。总之不管事实如何,结论是联合国急需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改革。这样,布什政府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把它看成联合国需要深刻改革以便继续发挥作用的例证,因为这个计划帮萨达姆转移了数百万石油收入,成了联合国腐败的重灾区”。完成这场改革是新上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面临的“下一个挑战”。^③

沃尔克调查联合国总部腐败问题的委员会在最终调查报告中列出了两个事实,根据沃伦·霍格(Warren Hoge)的报道,塞范被指控“在银行存入了至少 14.7 万美元回扣。另有一名负责采购的官员,俄罗斯的亚历山大·V·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V. Yakovlev)被查出向一名承包商索贿未遂”。这些行为都可能使他们成为哈利伯顿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报告还指责安理会及其制裁委员会”——主要是指华盛顿——“放任石油换食品计划之外的走私活动,使约旦、土耳其和叙利亚不当得利。”报告最后对腐败的涉案金额进行了估计:“萨达姆通过收取回扣和贪污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的超额收入得到了 18 亿美元。”超额收入几乎都得到了华盛顿的允许,而回扣则与美国公司有着密切关联。调查委员会有意避开了去向不明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的 90 亿剩余资金,它们都被交给了占领伊拉克的美国当局。^④

毫不奇怪,在沃尔克的这个调查报告中很难找到什么最终结论,可是官方的宣传中有。《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用嘲弄和愤慨的口吻报道了当局嘴里的反腐败调查,说它揭露了“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一次

腐败事件”。当局还强烈要求对联合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解决它存在的浪费资源、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应由负有管理职责的副秘书长们承担责任，而那些副秘书长都是华盛顿任命的。^④

在最后汇总商业腐败案件时，沃尔克委员会列举了数千家公司涉嫌非法虚高定价和商业回扣行为，还确认了一些违法的个人，如掌管难民财务的里奇·马克(Rich Marc)，此人在离职时得到克林顿总统的特赦。沃尔克委员会还批评安理会(其实就是美国)未能有效监督腐败行为。沃尔克说：“腐败行为十分显而易见，好比走在外面的人都能听到屋子里的尖叫。那为什么听到的人不拉响警报呢？核心问题总是相似的，联合国需要进行深入改革。”而沃尔克委员会里的一位调查人员是这样回答他那个拉警报的问题的：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非法地流入约旦和土耳其等美国盟国之手，以满足它们的经济利益，会使安理会介入和阻止腐败行为的意愿打折扣”。他继而问道，如此巨额的非法石油交易都放过了，“还会有人严格追查其他小案子吗？不太可能”。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本来对石油换食品计划明察秋毫的美国，由于不正当地协助了萨达姆，使其反腐败的底气“打了折扣”，失去了对小额腐败“拉响警报”的资格，同时还牵涉进了许多美国公司。无疑“深入的改革”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联合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还不属于急需改革的机构。^④

沃尔克报告总结道，大多数石油公司通过中介组织帮它们掩盖

“非法抬高油价”的行为,当然不是所有公司都这么做。文件中写着:“有一家主要的石油公司被这则 623 页的报告曝了光,那就是雪佛龙集团(Chevron)旗下的德士古(Texaco)公司。”这对德士古公司来说有一些因果报应的感觉,不仅是因为它同得克萨斯的联系,还有它扮演的特殊角色。20 世纪 30 年代时,一个公开支持纳粹的家伙拥有着德士古公司,他违反合同和美国政府的命令将开往西班牙共和国的油船交给了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可美国国务院却假装“没有发现”入侵西班牙的纳粹军队已从美国手中得到了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都无法提供的那种关键商品。当时左翼媒体发现了这个事件,而且它后来也被公开承认了。后来历史又被重演,当克林顿要破坏对海地邪恶的军事恐怖组织的禁运时,德士古公司就被授权违反总统的石油运输指令,将这种特殊的商品提供给他们以支撑恐怖主义活动。历史重复的间隔在这里还不算太大。^{④7}

塞范收受 15 万美元回扣成为当月的最大新闻,可想找到报道他于 1999 年 7 月向安理会提出请求的新闻却难上加难。塞范在那项请求中提出“多部门协作提高伊拉克人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的努力正受到严重干扰,原因是对伊拉克的饮水、卫生和电力供应和设施配备的限制太多”。主要由于美国的反对,电闸、插座、窗框、瓷砖、颜料和心肺机等“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极为重要的物品”都遭到了限制。安南在报道中提到这些物品,并敦促安理会减少干预,以免“严重破坏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有效实施”,影响向伊拉克人提供必不可少的人道主义援助。^{④8}

世界上的各种制裁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单方面对他国实施的制裁,甚至不包括美国借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那些制裁。可强国如果反对某项制裁,就只需借助一两种手段把它的效力回避掉。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回避了联合国对南非的制裁;另一个是老布什和克林顿在位时回避了美洲国家组织对海地恐怖军事集团的制裁。研究过历史上各种制裁的人不难发现,伊朗改革者们认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的改革事业有害。伊朗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曾表示,“美国寻找了种种借口——核问题、恐怖主义、人权、中东和平进程等”向伊朗施压,可这只会使“伊朗的局势更加剑拔弩张,使民主遭到扼杀”。作为“伊朗改革者的智囊”,哈贾里安在2000年时面部遭穆斯林武装分子枪击,恢复得十分缓慢,成了“伊朗人为改革所付出代价的标志”。哈贾里安仍然反对制裁,认为制裁“对人民有害”,并破坏了民主和改革。然而他反对将伊朗同南非进行对比,在南非里根政府回避制裁的做法受到了当地黑人的欢迎,尽管美国的行为对他们的利益有害。对被制裁国的人民是否有益应当成为判断一项制裁是否正当的标准,可这个标准常常被忽略。^④

1953年英美在伊朗策划了一场政变,废除了伊朗的议会体制并扶植了一个野蛮独裁者上台。自从伊朗人民勇敢地推翻了那个独裁者后,华盛顿就“制造各种借口”对伊朗强加制裁。个中缘由不是什么秘密,也无须对制裁的背景反复争论,因为这对于诚实的观察者来说是一种嘲弄和羞辱。

自我免责

司法部的律师对酷刑做出的辩护引发了许多愤怒的言论。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同时又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的迪安·哈罗德·科(Dean Harold Koh)曾在国际社会代表华盛顿谴责了一切形式的酷刑。他说：“声称总统有允许使用酷刑的宪法权力就像说总统有实施屠杀的宪法权力一样荒谬。”如果按照最近发生的事情推理，司法部的那些法律顾问很容易就能得出总统有屠杀权的结论。^⑤

国际禁止酷刑公约在美国是不寻常的，因为它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尽管参议院对它进行了修改。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很少得到美国的批准，即使批准也要经过保留，结果使得那些公约无法对美国产生效力。而那些公约是不应被接受国“自我实施”的，接受国还应经过“保留、认可和颁布”的法律程序使公约生效。另外《灭绝种族罪公约》也得到了美国的批准，不过那是在它被制定出来40年之后了，并且照例也进行了保留。曾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案件被诉诸国际法院，其背景是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当时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有一个国际法庭被建立起来专门审判战争中发生的罪行。然而一些国际律师要求法院调查北约轰炸塞尔维亚过程犯下的战争罪，他们提交了由主要的国际人权组织记录的文件证据，并披露了北约指挥官的自白。而控方以他们得到了北约方面做出的诚实保证为由，未经调查就拒绝了起诉要求。于是南斯拉夫借用《灭绝种族罪公约》向国际法院提起

诉讼,可美国政府以其有权排除对自身违反该公约的指控为由向国际法院申辩自己无罪。国际法院遵循自己的规则,接受了美国的辩解。^①

美国免除自己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还不止这些,其他的自我豁免也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其中一则豁免出现在尼加拉瓜到国际法院起诉美国的案件中。据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前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布拉姆·蔡斯(Abram Chayes)介绍,国际法院没有受理尼加拉瓜的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是美国在1946年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时提出了一项保留,即免除自己依多边条约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由此国际法院将审理该案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国际习惯法和美尼双边条约。可就在如此有限的基础上,国际法院仍然认定华盛顿“非法使用武力”,换任何一种语言说,华盛顿的行为都属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院的判决是责令华盛顿停止武力侵害,并向尼加拉瓜足额支付赔偿。美国应承担的赔偿金额远超出了尼加拉瓜欠美国的巨额债务,可到现在尼加拉瓜仍被那些债务困扰着。这里我们谈到了侵略的恶果,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国际法院准确地认识到美国免除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则对自己的约束力,而正是美国在这些法则的制定和颁布过程中起了首要作用。^②

照这样推理就等于说华盛顿有权进行侵略和屠杀。而纽伦堡法庭把侵略界定为“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同其他战争罪的差别仅在于侵略包含了一切罪恶的总和”,举例来说,英美对伊拉克的侵略就是它们给这块受难的土地带来的一切罪恶的总和,包括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和费卢杰发生的战争罪行和侵略发生后“不幸的伊拉克人在一个可怕而残酷的年代”所遭遇的一切。如果我们按照合情合理的算法,把侵略给伊拉克之外的地方带来的损害也囊括在“一切罪恶的总和”中的话,那战争的罪恶就会变得更加罄竹难书,我们就将直接面对那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美国驻纽伦堡法庭首席律师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对侵略的概念做了清楚的表述,这个概念还在联合国大会的权威决议中得到了重申。杰克逊在向纽伦堡法庭做出的首次陈述中指出,“侵略者”是指“经过或未经宣战,首先使其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的”国家,或是“向形成于他国境内的武装集团提供帮助的国家,或是在被侵入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拒绝在自己的领土和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使入侵武装集团丧失一切援助和保护的国家”。第二款内容明显适用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尽管那次战争也可能被看成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不过这种看法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里根政府做出的一个有利的判断。第一款内容肯定适用于英美对伊拉克的侵略,当然如果我们参考国防部律师们那些有想象力的意见也许会做出一个不同的裁判。比如说一名有声望的法律学者提出,英美在伊拉克的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不过要先对《宪章》的条款做出“集体主义的解释”:英美是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履行一项专属于他们的使命,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而当人民大众被看作国际社会的成员时,国际社会大声甚至强烈反对他们的行为都无关紧要。^⑤

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法庭对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做了生动说明：“如果违反条约的某种行为是犯罪，那么不管行为主体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是犯罪，我们还不能制定一项仅针对他人的犯罪条文而自己却不愿受其约束。”当然，这样的说明对英美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另外杰克逊在其他场合还表示：“我们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对这些被告人的审判会被载入历史，成为后人评判我们的依据。给他们一杯毒酒，那我们迟早也要喝上一杯。”杰克逊旗下负责战争罪行的首席律师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写道：“语言表达的是美好的愿望，然而现实同愿望能够一致吗？”我对泰勒意思的理解是：很难。在法庭筹建的初期泰勒就曾对纽伦堡法庭的根本原则之一——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表示过质疑。他写道：“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只能是假设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包括失败的战争吗?)是应该或将被宣布为一种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纽伦堡法庭也的确是这么规定的。然而法律普遍性原则很快就被丢弃了，事实证明泰勒的担心没有一丝是多余的。^⑤

由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布拉姆·索费尔(Abram Sofaer)发表的华盛顿对其在尼加拉瓜案中免除自身法律义务的解释可能还得到了卡尔·施密特的认同。而国际法院则因为和国际红十字会犯了同样的错误——顶撞华盛顿，而失去了发言的资格。因而支持华盛顿不执行国际法院命令的《纽约时报》的编辑把国际法院形容为“敌对论坛”。华盛顿的行为使美国成为惟一蔑视国际法院裁判的国家，由于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最终执行了他们曾经不予理睬的国际法院的判决，

所以华盛顿也失去了尊贵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和恩维尔·霍查*的陪伴。索费尔说,对美国的偏见事实上不是国际法院特有的,而基本上是全世界共有的。地球上大多数人“常常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反对美国”,所以我们“必须要保留一定的决定权”,自己决定哪些“事务主要应由美国国内管辖,即由美国说了算”。——在这里由美国决定的就是要不要用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毁掉被美国盯上的国家。^⑤

索费尔教给这个世界的那些规则由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5年3月访问墨西哥时向这个国家做出了具体解释。赖斯出访旨在让墨西哥保证它将依照1944年签订的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为美国提供淡水。墨西哥媒体报道说,赖斯这次长达七小时的访问的主要成果就是墨西哥对条约的遵守,但她还谈到了另一件让墨西哥人感兴趣的事情:国际法院在美墨领事纠纷案件中判美国败诉后,美国干脆地退出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情经过是美国侵犯了51个墨西哥公民与墨西哥领馆官员协商的权利后,这51人被判处了死刑。赖斯的表态是:“我们仍相信领事通告的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国际法院的裁决对“美国是不恰当的”。墨西哥媒体对赖斯的来访进行了简要的总结:“赖斯是在告诉墨西哥人……要遵守他们的供水条约,而美国人却能以‘不恰当’为由随意退出自己签署的条约。赖斯来此的目的之一就是证明不同的条约效力也是不同的。”^⑥

*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 1908—1985),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1954—1985)。——译者

概括地说,国际法的精髓之一就是一国的立法权来源于本国公民的授予。无论是尼加拉瓜人,还是墨西哥人或其他人都无须对他们重申这一点。漫长的历史已经让人们明白了。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于1963年由美国提案,1967年正式生效。美国是第一个向国际法院援引这部法律的国家,背景是1979年美国就人质事件向国际法院起诉伊朗并获胜。国际法和国际法院的判决都是公正的,但前提是必须对美国有利,而不能让美国感到“不恰当”。^⑦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让我们懂得,国际法院和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曲解了国际法。博尔顿是美国政府的一名法律专家,他的笔下曾有这样的文字:“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国际法及其法律约束力都被低估了。”但对美国,这种法律约束力不适用,原因是国际法正以“越来越大的力度”干预美国的自由选择和行动,而且“未来对我们的妨碍还会更多”。条约对美国来说不是“法律”义务,最多是“政治”承诺。因此,不必理会其他人的错误观念,华盛顿从里根当政起直至2001年拒付联合国会费都是正当的。2001年起美国又开始缴纳会费也是正确的,因为那时美国需要国际支持。不过在1962年,正是在美国的倡议下国际法院裁定缴纳会费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国际法院做出这项裁定,是在被美国宣告为不合格的机构(因为与美国的分歧)之前。该裁定也只对美国的敌人有效,更没有涉及美国的会费额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问题。^⑧

上面的推理十分直白,完全符合布什所说的“对战争法的新构

想”。这种构想把国际法和条约看作是“私人契约性条文”，在契约中强势的一方“可以视情形自由选择是履行还是废弃合同”：换句话说，当这些契约能保障投资者的交易安全时就要严格执行，而当它们限制了华盛顿的侵略和其他犯罪的自由时就变得古怪而陈旧。⁵⁹

公正地说，在上述这些方面，布什政府还属于值得嘉许的那一小部分群体。“新构想”这个概念就完整地出现在与这个群体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它的阐述者是老牌政客、肯尼迪的顾问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是开明的“智者”中名望最高的，因创造了现代国际秩序而广受推崇。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的1963年1月，艾奇逊告诉美国国际法学会，当美国面临着像导弹危机这样危及自己“权力、地位和名誉”的挑战时，就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了。艾奇逊肯定清楚国际恐怖主义战争是将整个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一个重要因素，可随着肯尼迪化解了导弹危机后这个威胁就被消除了。设想出像“新构想”这样露骨的表达实属不易，不过它在历史中只不过是超级强国们的特权之一而已。⁶⁰

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法律体系

让我们回到罗素和爱因斯坦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还有一名著名的战略分析家迈克尔·麦圭尔也提出了人类面临核灾难的警告。他的著作写道，按每个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熟知的“可怕逻辑”，美国主导的现行核政策“终将引来一场核战争”。麦圭尔

预测道：“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被扭转的话，世界完全可能回到核军备竞赛的时代，各国将竞相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和太空攻防武器系统。核大战被无意间诱发的危险极高。”他号召英国迈出降低核威胁的一步，放弃没有作用的核武器，因为那些核武器只是“我们匮乏的政治策略的装饰品”。但大家都十分清楚，在核问题上只有华盛顿的决策是最关键的。麦圭尔在比较两种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后是这样说的，“销毁核武器的代价比缓解全球变暖要小，而核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逐渐发展的全球变暖问题，因为核灾难的发生是瞬间且无法减轻的。可有讽刺意味的是，消除核威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而气候的发展趋势却是人类无法改变的。”这里的“我们”还是主要指美国。^①

麦圭尔所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核不扩散条约》和2005年5月召开的每五年一次的评审会议，然而更主要的是法治缺失后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他把自己对伊拉克战争的思索写了下来：

从政治、军事、法律、种族、经济等很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事前的策划工作都可以说是漏洞百出。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发现，最重要的是这次行动（以及它的决策过程）可能会破坏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决定攻打伊拉克是与现行国际格局的决裂，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经过一个世纪缓慢甚至艰难的历程发展而成的格局，它建立在共同安全、多边协商决策、集体行动、公认的行为规则和不断发展的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上。

可如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称为“法外国家”，将国际法律体系

彻底撕碎,这是将人类引向“终极毁灭”的危险行为。

要想成功地“消除全球核战争的威胁”,关键是《核不扩散条约》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如麦圭尔笔下写的,“《核不扩散条约》曾被视为在国际合作上出人意料的成功典范”,可到如今“它更像是一颗烂到根部的智齿,脓疮已经开始毒害国际政治的机体”。《核不扩散条约》建立在两个核心协议的基础上:“第一是承诺放弃取得核武器的‘无核国’将畅通无阻地获取和平用途的原子能。第二是继续推进核裁军。”这两个协议是由五个被认可持有核武器的国家(英美俄法中)共同订立的。可华盛顿在2005年5月的评审会议上的目标竟是把这两个承诺都抛弃掉。麦圭尔认为,美国的这种态度理所当然会招致更多“蔑视现实的观点,即不管《核不扩散条约》建立的初衷如何,现在它已经沦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工具”。^②

华盛顿关于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的倡议可以成为一个好提案,因为那一条赋予了无核国生产核反应堆铀燃料的权利,而那样无核国将获取离生产核武器仅一步之遥的当代技术。但美国要想仅仅停留在满足于现状的空谈上,就必须按照有核国与无核国最初在《核不扩散条约》下达成的协议,保证无核国“畅通无阻地”获取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对此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建议。他提议将所有生产和处理核武器原料的活动完全限定在“由多国监控的场所中”,并且必须“首先保证这些原料将由预定的合法使用者取得”。他认为,那将成为向全面履行1993年联合国《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

约》(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决议迈出的第一步, 那项决议“能标明所有能获取的裂变材料并公开了其清单, 可成为未来核裁军的起点”。杰出的普林斯顿军控专家弗兰克·N·冯·希佩尔写道: “这个让所有核武器裂变材料的生产活动停下来的呼吁是最根本的核军控建议。”因为, 它首先给核武器的数量设了一道上限, 其次它确认了有核国履行销毁核武器的承诺是关键所在。^⑬

可惜的是, 巴拉迪的建议如石沉大海般地没有了回音。美国政治领导者肯定不会改变他们目前的立场, 也不会同意向 1993 年的联合国决议迈出那第一步, 从而剥夺自身免于履行国际法和条约义务的所谓特权。我们眼里的现状——更全面的构想还只停留在纸上, 恐怕不会有什么改变, 除非处于世界之巅的超级大国能弥补它的民主赤字。所以说, 华盛顿提出的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的建议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貌似批评, 实为另有所图——就像麦圭尔说的要把《核不扩散条约》变成“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国际社会的看法十分合理。

美国专家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 但都要求别人先相信华盛顿在核问题上的善意。格雷厄姆·阿利森引用了巴拉迪的提议, 可只提及了里面的第一步。他的评价是: “既不实际, 亦不可行”, 委婉地表达了华盛顿不会采纳这条建议。同时, 他也提出了一套办法, 但前提是要相信有核国(指的是美国)会向无核国提供获取核设施的“畅通无阻的渠道”。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得更周详的建议名为“有保障的核燃料服务倡议”(ANFSI), 也提出了一个比巴拉迪的提议“更为可行的

办法”，意指巴拉迪的提议会因“多样化的国家利益”而得不到实施——这又是绕着弯指美国可能会反对他的建议。ANFSI 提出了以“坚实的多边保障”为支撑的、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监督的一系列“国家和商业保证”（给予无核国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而后再把这一切都置于那个法外国家的控制之下，它可以排除上面两大组织的权威，任意决定所谓的“保障”。和阿利森的建议一样，ANFSI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其他人要相信美国不会采取单边行动，随意终止向无核国履行义务；为什么要相信美国会放弃对无核国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只有相信了这些，无核国才能降低保持威慑力的必要，至于要其他国家彻底放弃核武器，那就需要有核国全面兑现它们在《核不扩散条约》中许下的诺言了。^④

媒体对 2005 年 5 月《核不扩散条约》五年评审会议的少量报道同华盛顿的官方宣传保持得相当一致。会议开始时，《纽约时报》说，这场会议“旨在为弥补条约的巨大漏洞找寻方向，因为美国当局认为伊朗和北朝鲜已经利用了条约的缺陷发展核武器”。报道还附有一张地图醒目地标出德黑兰和平壤，加上这样的标题“在德黑兰和平壤的谈判使核不扩散的希望慢慢变成泡影”。这正是华盛顿的言辞，可世界人民和著名的战略分析家都不认同它。这篇报道也顺便提到了华盛顿准备“绕过联合国，避开一场关于美国的大争论，即它是否遵守了自己在条约中的义务”，另外还轻描淡写地说布什政府正单方面地在完成核裁军所需的 13 个步骤中舍弃某些步骤，而 13 步核裁军是 2000 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会议上与会各方一致通过的。当然，这些行为

不会影响本次会议“旨在”达到的目标。《纽约时报》对这次评审大会首场会议的报道几乎完全集中在了华盛顿下达的命令上：“伊朗必须拆除它在过去 20 年里为生产核材料而建造的所有‘装备和设施’。”另外，《纽约时报》还加上了一句：“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都表示担心随着伊朗七月大选临近，重新启动核计划的政治趋势可能会越来越强。”^⑤

上面的报道用语十分有趣，无意间表达了布什政府对民主的恐惧，从而显示了他们急于在伊朗大选中压制民意的企图。另一个有启发性的短语是“过去 20 年”。华盛顿选定这个时间跨度是为了避开一个令他们尴尬的事实：他们现在所谴责的政策和本次大会“旨在”弥补的“条约中存在的缺陷”，也正是 1953 至 1979 年伊朗国王当政时美国所支持的政策和缺陷。现在美国对此的官方意见是，伊朗并不需要核能，所以它肯定正在暗中发展核武器。亨利·基辛格是这样说的：“伊朗作为一个石油生产国，发展核能是浪费资源。”可在伊朗国王当政时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的立场却是：“向伊朗引进核能既能满足伊朗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更利于其石油储备的出口或用于石油化工生产。”当时华盛顿还积极帮助伊朗发展核能，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美国大学（比如我上的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不顾绝大多数学生的反对）都准备培训伊朗的核能工程师，毫无疑问，这不是有华盛顿的授意，就是通过了华盛顿的批准。当被问到为什么前后观点自相矛盾时，基辛格以他一贯动人的坦率回答说，在 1979 年以前“他们是一个结盟国家”，因此他们当时的确

需要核能。^⑥

华盛顿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控也许曾经是正确。许多分析家都认为,伊朗如果真没有发展过核武器才算不寻常的事。对伊拉克的侵犯不出意料增加了核扩散的危险,以色列军事历史学者马丁·范克雷韦尔德在他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一结论:“全世界都目睹了美国对伊拉克的践踏,而且事实证明毫无理由。如果伊朗人没有试图制造过核弹,他们肯定会疯掉的。”华盛顿费时费力做了两件事来告诉伊朗建立核威慑的重要性,一是入侵伊拉克,另一个是加强其盟友以色列的军事攻击力量。以色列已拥有了数百件核武器,它的空军和装甲部队比美国之外的任何北约国家都要庞大和先进。2004年至今,以色列从美国购得的先进喷气式轰炸机的数量空前。美国人公开炫耀他们的飞机装备了“特殊武器”(未详细指明是何种武器)和深穿透炸弹,性能足以轰炸伊朗。^⑦

华盛顿的武力威胁也许并不是要发动战争的信号,毕竟提前好几年发出战争警告没有太大意义。它的目的也许是迫使伊朗的统治集团更多地采纳自己强加给他们的政策。那些政策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动荡,从而将伊朗的国力削弱到一定程度,使美国可以冒险对它采取军事行动。那些政策还有助于华盛顿及其盟友一道孤立伊朗,这一目标其实已经达成。像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和英国的石油巨人——英国石油公司(BP)这样的欧洲大公司,由于担心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或是伊朗“冒犯美国”引起其他后果,已经撤出了它们在伊朗的主要投资。另外,有报道说美国施加的压力已

经促使日本放弃了在伊朗开发一个巨型油田的计划。⁶⁸然而伊朗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并非毫无选择,它可以借助更长远的国际事态趋势寻找自己的出路。我们稍后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麦圭尔考虑了华盛顿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和威胁,以及美国和它强大的盟国加上其他一些有核国对伊朗构成的无形包围等因素后,分析了伊朗有可能发展核威慑力量的原因。如果按照逻辑和道德上的常理判断,正是英美政府和它们“预先自卫”信条的追随者们促使伊朗发展核威慑。伊朗会主动发起核战争的说法实难令人苟同,除非它想自我毁灭。显然,伊朗所面临的来自美以两国的公然威胁远比华盛顿和伦敦想象的要严重和紧迫。每个理智的人当然都希望能找到办法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如果以此为目标,那理智做法就是认真考虑巴拉迪的建议,尽力减少而不是增加对伊朗的威胁,因为按照英美定下的标准,伊朗目前面临的威胁已足以构成(其实已远远超出了)它发展核威慑的理由。事实上北朝鲜也处于相似的境遇,这一点常有人指出。韩国总统卢武铉就曾说过:“北朝鲜公开声明它发展核力量是为了吓阻外来侵略和自卫。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可否认在北朝鲜的宣言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成分。”⁶⁹

美国的其他行为也造成了类似的后果。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坚定”了印度发展核威慑力量的决心。“印度不会忽视”这样一个教训:“如果那两次战争的对手拥有核武器,那美国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况且人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两次战争前都存在和平解

决争端的选择,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布什对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准许进一步催化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分解。国家安全分析家劳伦斯·科布(Lawrence Korb)指出,布什放任印度游离于《核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后果就是“印度甚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继续生产核武器用的裂变材料”。科布还说,这种趋势十分危险,但并不奇怪,原因是“布什政府在过去5年曾表示《核不扩散条约》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政府甚至还表现出了“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轻蔑,《核不扩散条约》召开重要的评审会议时美国派去的代表竟是低级别的国务院官员”。^⑩

除了伊朗和北朝鲜问题外,《核不扩散条约》面临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核国拒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协议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即“善意”做出消除核武器的努力。1996年国际法院做出的一致裁决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裁决规定有核国负有以下法律义务:“通过有成效的谈判,最终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控下全面实施核裁军。”可由于有核国背信弃义,当初和无核国达成的协议难以维系。巴拉迪着重指出的:“协议一方不愿履行义务,其他各方也不会守约”,只是在重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布什政府使美国开了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先河,又一意孤行拒绝承认2000年《核不扩散条约》大会各方达成一致的意见:“有核国在彻底销毁其核武器库上有不容置疑的义务”,还推翻了为此目标拟定的13步程序。尽管没有任何一个有核国履行了此项义务,但迄今为止布什政府的表现最恶劣,是惟一否定《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缔约方。在2005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大会上布什政府的声明是:“美国要在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义务与保持自身以

及需要美国保护的国家的安​​全之间维持平衡。”大会结束时，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理查德·格伦内尔(Richard Grenell)竟然说出“条约要求的是减少……又不是消灭核武器”这样赤裸裸的谎言。^①

比起有核国的言论来，危害更大的是他们的行为，例如发展新核武器的计划和出台以“假定美国无限期需要核武器”为理论基础的政​​策等。如果美国采纳那样的政​​策，《核不扩散条约》就会被葬送。在那种情形下，除非美国再次承认“要确立一个可行的核不扩散体制，关键在于各国履行核裁军和不取得核武器的义务”，否则《核不扩散条约》肯定会分崩离析。《核不扩散条约》协定的另一个核心部分是有核国致力于签订和履行一系列附加条约：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点麦圭尔和麦克纳马拉等人都反复强调过。可前者在 1999 年被参议院否决，并被布什排斥在议事日程之外；后者也已被布什废除。一部可实现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也许在那一系列附加条约中是最重要的。克林顿的军控特别代表托马斯·格雷厄姆曾说，《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将遏制世界上数量已经“十分庞大的核弹材料”进一步增加。然而在 2004 年 7 月，华盛顿宣布反对制定这样一部条约，原因是要有效实施《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需要十分广泛的检查机制，那样会损害主要签约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可联合国的裁军委员会在同年 9 月却投票通过了《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投票结果是 147 票赞成，1 票反对，2 票弃权。以色列投了弃权票，表示它在支持美国的立场的同时采取灵活的策略。英国也投了弃权票，理由是这一决议“在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时期分裂了国际社

会”——分裂的结果是 147 对 1。^②

几天之后联合国会员大会再次强调“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以及所有国家为此共同目标努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号召“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拥有航天技术的强国为和平利用太空和防止太空军备竞赛贡献力量，不从事妨碍该目标的活动”。这项决议以 178 票对 0 票通过，另有 4 个国家投了弃权票：美国、以色列、海地和贝劳共和国。^③

2005 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大会以失败告终，这不足为奇，但会议失败的过错却被归咎到了伊朗和埃及身上。伊朗被指责不肯放弃它在《核不扩散条约》下追求核技术的权利，尽管伊朗国王在位时这一权利曾得到过华盛顿的支持。埃及的罪名是坚决要求大会讨论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可很明显华盛顿不允许任何人将矛头指向他的头号附庸国。有一个国际背景没有被提到，就是埃及曾提出，接受无限制扩大《核不扩散条约》的条件是 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大会达成的协议得到遵守。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要求能确信：“国际社会关注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有核国的既成事实是违规的，因为它既没有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也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这一点是它们接受“《核不扩散条约》关于中东国家的决议”的条件之一，而那个决议“是 1995 年评审会议通过的‘一揽子’最终‘协定’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只几年的工夫，美国就一口咬定那个决议只和 1995 年各国商谈的内容有关，而拒不提及‘一揽子协定’的实施……毫无顾忌的自食其言”——食言者华盛顿也。因此埃及挑起这个事端被认为是不负责

任的行为,在安理会 487 号决议上穷追不舍也是埃及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那个 487 号决议的内容是:“要求以色列尽快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④

尽管媒体对 2005 年那场失败会议的报道基本是美国官方宣传的翻版,但细心的读者还是能窥见些许实情。美联社的报道中写着:“会上有任何人提到美国在 1995 年和 2000 年两次会议中许下的承诺,美国都全力为自己辩解”,这种行为激起了很多代表的愤慨,其中就有加拿大代表团领队保罗·马丁(Paul Martin)。他在发言时着重指出:“如果各国政府感到曾经的承诺于己不利时就将其抛弃或置之不理,那我们永远也无法在国际安全领域建立一个合作和互信的体系。”《波士顿环球报》认为,马丁的发言“几乎就是对华盛顿的直接批评”。评审会议结束后,前总统吉米·卡特也抨击美国政府是

瓦解《核不扩散条约》的元凶。一方面称要消除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和北朝鲜造成的核扩散威胁,自诩为保护世界的英雄;另一方面不仅抛弃了已订条约对自己行为的限制,还着手实施发展和试验新武器的计划,如反弹道导弹、钻地“掩体炸弹”,也许还有一些“小型”炸弹等。另外,华盛顿还背弃了自己过去许下的诺言,开始威胁对无核国首先使用核武器。^⑤

还有一个对此不满的高官,就是曾任托尼·布莱尔政府外交部长的罗宾·库克(Robin Cook),他因不满英国入侵伊拉克而辞职。他在文章里说,英国在履行 2000 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大会的承诺方

面本来是相当不错的,但理性的呼声却“被淹没了,原因是我们同布什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以及我们在评审会议上甘愿为美国的立场被人理解而四处游说”。而美国的立场就是:“《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对别国是强制性的,对美国而言却是任意性的。”这正是美国的一贯标准。因此,“评审会议还在进行中时”,华盛顿便随心所欲地实施其新式核武器计划,研制的是“并非威慑,而为进攻”的核弹,这同“美国向最近的评审会议”的承诺相矛盾。^⑥

克林顿的特别军控代表托马斯·格雷厄姆在2005年5月的评审会议前夕发出了一条警告:“《核不扩散条约》从未像现在这样脆弱,它的前景也从未像现在这般渺茫。”他还暗示如果《核不扩散条约》土崩瓦解,“世界将笼罩在一片核梦魇中”。格雷厄姆和许多分析家一样,都认为其他有核国分担了各自的责任,给《核不扩散条约》造成威胁的主要是美国的核政策。《核不扩散条约》可能还没有走到尽头,但2005年5月的评审会议已给了它沉重的一击。^⑦

于是我们跟随着我们的领袖继续前行,前往“我们自己打造的哈密吉多顿”。

第三章

非法但合理

20 世纪发生的可怕灾难促使有识之士倾力从战争的魔咒中拯救人类。说“拯救”毫不夸张，因为自 1945 年以来，“末日毁灭”的危险便一直远远超出任何理智的人的承受力。终结战争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对一些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的广泛共识。这些原则以美国称之为“地球最高法律”的《联合国宪章》为载体，《宪章》开篇即表达了各参加国“使后代免于战争苦难”的决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战争已两度给人类带来了无以言表的痛苦”。事实上“战争的苦难”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无以言表的痛苦”，更有全人类的毁灭，这一点所有的参加国都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提及。因而《宪章》中没有出现“原子与核”等字眼。

战后各国在使用武力上达成的一致看法，在 2004 年 12 月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中得到了重申。这份报告是联合国“威胁、挑战与变革”高级别专家小组提交的，专家小组里有许多著名人物，像曾任老布什政

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他在军事装备和安全设施领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该专家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武力使用的原则: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第一是在得到安理会授权之后使用武力;第二是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遭受武装袭击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有权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通常对第五十一条的解释都留有充分的余地,以利于受害国使用武力自卫。按照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经典表述,受害国使用武力的条件是:“自卫的必要性”是“刻不容缓的和压倒性的,既无选择的余地,也不能有丝毫的犹豫”。除此之外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属于战争罪行,纽伦堡法庭称之为“最恶劣的国际犯罪”。专家组的观点是:“第五十一条长期确立的涵盖范围既不需要扩大,也不需要缩小,它本身既不用重新制定也不用重新解释。”^①

200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再次强调,“《联合国宪章》中的相关规定足以调整所有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行为”,并特别指出:“安理会有下令以武力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在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同时规定了联合国会员大会“依《宪章》的相关制度”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能。峰会还进一步认同“各国应肩负起必要和恰当的责任,帮助他国形成保护自己公民的能力,使他们免于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及反人道罪行等灾祸。各国还应协助那些面临着即将爆发危机和冲突的国家”。峰会没有给任何国家以人权或自称的其他借口,对其他

国家或地区联盟实施“干涉的权利”。^②

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于2004年12月提交的报告进一步说明：“对于那些不满于《宪章》第五十一条对自己的束缚的国家，我们的回答是：在这个随处可见潜在威胁的世界里，国际秩序及其赖以存在的互不干涉的国际准则所面临的被破坏和被扰乱的风险十分巨大，因此单边采取防止侵害的行动已不能被视为合法行为了，它完全违背了我们倡导的集体一致行动原则。而允许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单边行动就等于放任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做。”^③

普遍性原则

普遍性原则是专家小组报告成立的先决条件，也应该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然而，这一原则在世界列强的高知识阶层、政治圈及伦理文化中被彻底否定了。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著名分析家对人类未来的警示——灭亡的灾难。

形式上，战后各国在规制武力使用的原则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仍然有效。然而西方精英阶层对此问题态度的各种变化，既让人们能一窥实情，同时又让人感到不安。尽管各国的一致意见并不会经常（但偶尔会）被公开否定，可它更多地会被遗忘——觉得它太极端因而不多加思考，让它滑向公众议题和政治选举活动的边缘。

各国逐渐脱离它们在战后达成共识的行为，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表现得十分明显。那几年，在美国广大的政治领域中，对克林顿外

交政策的喝彩声此起彼伏,称赞其步入了一个“高尚的境界”,发出“圣洁的光辉”,在“致力于结束不人道现象的理想主义新世界和将永无停歇的冲突归为宿命的旧世界之间划出一道意识形态的深刻界线”。历史第一次,由“理想主义新世界”,即一个国家,以“利他原则”和“道德热诚”为出发点,引导着“开明进步的国家”寻求“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因此,这个国家可以在其领导人认为适当时自由地使用武力。以上的引文只出自受尊重的自由媒体,是如今这类泛滥成灾的语句的一个样本而已。经过几年这样史无前例的自我吹捧后,美国就会采取一些行动作为它对外宣示的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 1999 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非法但合理”这一说正是诞生于那场战争。^①

高级别专家小组对第五十一条的探讨似乎有两种效果:一是回应了西方学者对按自己的判断自由使用武力的狂热支持;二是驳斥了布什在 2002 年 9 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提出的“预期自卫”理论。因而专家小组的讨论不仅为西方所谓的“国际社会”(就是指他们自己)以外的世界声张了自己的立场,还显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国际社会”以外的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例子是前不结盟运动召开的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2000 年的南方首脑会议(South Summit)。那次代表了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人口的会议发表了一则宣言,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的所谓‘权利’”,这显然是由于考虑到了最近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宣言还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可这样一则宣言得到的却是四处传来的嘲笑声。借用外交史学家马克·柯蒂斯

(Mark Curtis)的话说,这是世界对“人口不断逃离”的苦难地区发出的哀怨的标准反应。这句话出现在马克编写的《英国战后罪行编年史》(估计没多少读者)的最后一卷中。^⑤

布什的“预期自卫”理论是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拟定的。据报道,那位官员就是康多莉扎·赖斯,她解释道,“预期自卫”是指“美国‘认为’某个国家可能会攻击自己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利”。赖斯有这种言论不足为奇,因为她已经得出结论,国际法院的管辖“已被证明对美国是不恰当的”,而且美国通常不受“国际法律和习惯”的约束。这种观点反映出了许多上层人士的认知,可大多数美国公众还是认为国家只能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着被袭击的直接威胁时”才有权使用武力。因此他们并不认同得到了民主和共和两党肯定的“预期自卫”策略(有时它被误称为“先发制人的战争”),相反人们认可的是饱受诋毁的南方首脑会议及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的意见。在美国,公众和上流政客阶层产生激烈分歧的不仅限于使用武力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这些分歧直接反映了美国的民主状况,这个话题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⑥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在纽伦堡法庭的裁决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东京对战败国执行的审判,则比《宪章》的规定严格得多。尽管两个法庭阐述的原则都十分重要,但它们都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在建立这两个法庭时就排斥了普遍性原则。为了将战败国的战犯绳之以法,首先得界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起诉战犯的首席律师特尔福德·泰勒和一名优秀的国际律师及史学家讲述了这一过程: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都玩过炸毁城市的可怕游戏,而且盟军在这场游戏中成功得多。因此无法以此罪名对德国和日本提起刑事诉讼,当时也确实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指控……盟军和轴心国都广泛地使用了空袭这种冷酷的手段,所以最后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都没有将空袭列入起诉范围。

可见“犯罪”的有效定义应该是:你们犯过的而且是我们没有犯过的罪。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如果辩方可以证明英军和美军犯了和纳粹战犯同样的罪,那战犯的此项罪行即可被赦免。正因此法庭赦免了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违反国际潜艇战争法”的罪名,依据是英国海军部和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证词:英美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犯下了同样的罪行。^⑦

泰勒说:“如果以执行国自己也曾有过的行为惩罚它的敌人,特别是被击败的敌人,实在有失公正,是对法律本身的一种玷辱。”这话不错,可“犯罪”的有效定义也是对法律的一种玷辱。一些法庭也因为同样的道德问题而蒙羞——设在南斯拉夫的法庭我们已经谈到过了,更出格的表现就是华盛顿免除自己遵守国际法和普遍性这一根本原则的义务。

想想倘若那些手握特权的强国愿意对普遍性原则有哪怕片刻的接受会有何后果,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遵照它鼓吹的那些理论行动了。如果美国有对恐怖组织或它“认为”可能攻击自己的对象实施“预期自卫”的权利,那么不用说,古巴、尼加拉瓜和一大群其他国家早就

存在着向美国发起恐怖袭击的嫌疑,因为美国已经参与了对它们实施的一系列沉重的恐怖打击,这一点常常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不用说伊朗也有可能袭击美国,因为它面临着美国的公开威胁。这种蛮横无耻的理论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拥护。

蛮横无耻的结论也会跟随过去的罪行而来。几名很受尊敬的英国记者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两个月前,曾面临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这一发现告诉我们,“本·拉登很可能根本不是突发奇想地袭击了国防部和纽约世贸大厦,而是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依照英美两国的观点,这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预期自卫行为。当然,这种说法会再次被斥为不可理喻的。^⑧

同样道理,当日本轰炸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时,没有人会说日本是在行使合理的预期自卫权利,纵然日本人知道波音公司的生产线上正在生产出美军的飞行堡垒——B-17轰炸机,纵然他们可能从美国的媒体上得知,这种飞机能把东京这样的“由糊墙纸和木材建成的房屋”构成的城市炸成一片火海。1940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欣喜地接到了“轰炸东京和其他日本大城市的”的计划。罗斯福总统在听取轰炸行动的策划者,空军将领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用图表说明该计划时“显得很高兴”。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用燃烧弹袭击遍布本州和九州两岛的竹子房屋和蚁群一般的人口,

将日本的工业心脏烧毁。”为实施该计划,美军在1941年前就已将B-17轰炸机运至远东地区,大西洋航道上一半的大型轰炸机都被调往该地区。乔治·C·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在一次秘密新闻简报会上说,如果有必要,这些飞机将被用来“把日本那些用纸做的城市全部烧着”。他还补充道:“我们在袭击平民时不会有丝毫犹豫。”4天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报道了美军从西伯利亚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轰炸日本的计划,还说空军正向这两个基地紧急运送用于攻击平民目标的燃烧弹。也许,克罗克是当自己在扮演马歇尔在新闻简报会上的角色。此外,华盛顿还从解密情报中掌握到,日本已经得知了美国派出B-17轰炸机的情况。^⑨

上述事实比布什、布莱尔及其同僚所能想象的任何借口都更适合发起预期自卫行动。我们没有必要去分析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能被接受的话。

国内和国际法并不是一系列形式上被公认的真理。它们还有被解释的余地,不过它们的一般和隐含的意义本身就足够清楚了。正像国际法专家霍华德·弗里尔(Howard Friel)和理查德·福尔克所指出的,“国际法在使用武力和诉诸战争方面提出了清晰且权威的标准,应当被所有国家一起遵守。”如果在“特殊的情形下”需要对国际法规定的标准有例外对待,“主张例外的国家必须承担大量的解释义务”。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通常的认识。在美国民众中也的确如此,但美国的上层社会却鲜有这样的认识,这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弗里尔和福尔克还在导出结论的大量论据里又加入了详细

的分析：对“（《纽约时报》）一直拒绝考虑国际法某些主张”的分析。在两名专家进行研究的40年里，国际法就反对美国政治领导人发动或威胁发动战争的行为提出了其主张。弗里尔和福尔克向我们展示了《纽约时报》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斥责那些企图对美国公民进行侵略，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国际敌人”，并指控他们违反了国际法。可《纽约时报》却忽视了美国也有这样的行为。有一件事能说明这一点，弗里尔和福尔克指出，在《纽约时报》渐渐论及入侵伊拉克的70篇社论中，从未出现过“《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等字样，在其评论版面和其他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些词。两名专家选择了《纽约时报》仅仅是因为它的地位不同寻常，但《纽约时报》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这一点在许多其他研究中都能发现。^⑩

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表述华盛顿单方面使用武力的权利上没有什么新颖之处。2000年大选前，康多莉扎·赖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谴责了两种现象：“滥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的概念的行为，以及相信只有得到了很多国家甚至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的支持，才能合法地行使权力。”赖斯解释道，美国政府不需要遵守“虚幻的国际行为‘规则’”，也无须“按某些人的建议，遵守每个国际公约和协定”。当然，除了美国的盟国和附庸国，其他的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那些规则，而且规则的内容须参照美国的解释。不然的话……^⑪

长期以来这种态度在美国十分常见，在美国并不多的政治派别里，连最坚定的自由派都持这种观点，大家都相信：美国人是“上帝创世时就已存在的智者”；正如克林顿提出的理论，美国有权“单方面运

用军事力量”，以确保“毫无阻碍地获取重要的市场、能源和战略资源”。从字面上看，克林顿的理论比布什 2002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具扩张性，可《国家安全战略》却在世界上引发了更多的担忧和恐惧，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社会领域很快就传来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外交》杂志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反应是警示大家，布什的“新大帝国战略”会给美国及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危险。而与此相反的是，克林顿的战略虽更具扩张性，却没有造成太大反响。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对此的解释是，每一任美国总统其实都有着同布什战略非常相近的目标，但都没有表达出来，因为当着别人的面把这一套东西抛出来，并在实施它们的时候激怒自己的盟友是很愚蠢的。而用一点小策略就会有所帮助。最不明智的是公开宣称：“没有什么联合国。倒有一个国际社会能不时地被世上惟一的真正强国——美国所领导，但前提条件是它得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其他国家也得按我们的意愿一并行事。”不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的这番话倒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表达方式。他沿袭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的这种牛气冲天的风格。鲍威尔还曾指示联合国，如果它批准英美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它就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要不然它就只能是个辩论场。^⑫

康多莉扎·赖斯在宣布博尔顿的任命时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她对外表示：“历史上我们最优秀的一些大使都有着最强势的态度，像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都是这样的大使。”关于柯克帕特

里克在联合国的作用无需赘言,莫伊尼汉的经历更有意思,他被称为保护国际法尊严的孤胆英雄。特别是在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莫伊尼汉直言谴责了乌干达军阀伊迪·阿明(Idi Amin)并捍卫了以色列,这在纽约是需要不小的勇气的。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将典型的颂词献给了他:“莫伊尼汉在联合国的工作业绩应该让他得到巨大的荣誉。”先前同一部期刊就发表过赞美莫伊尼汉对国际法贡献的文章,雅各布的颂词又进一步提升了对他的赞扬。^⑬

事实上,莫伊尼汉任联合国大使时对国际法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过。他在回忆录中骄傲地列举出的那些成功事迹,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曾让联合国在试图阻止印尼对东帝汶的侵略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他还顺便提到,侵略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杀害了大约6万人,可能会是战后最接近大屠杀的一次惨案。这一切得以进行下去,要感谢在1978年侵略军的暴虐行为发展到顶峰时,英美两国慷慨地向他们提供了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协助。后来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加入进来,想通过与侵略者合作分取一杯羹。最后,在强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下,克林顿只得告诉印尼的将军们游戏结束了。于是他们迅速撤退,很清楚地展现出谁要为前面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发生的罪行负责。而莫伊尼汉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他把自己的功劳告诉了我们。^⑭

赖斯的选择帮助我们看清了华盛顿究竟要博尔顿到联合国干些什么。

亨利·基辛格嘴里的布什理论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打破了17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提出的国际秩序理论(强国间的秩序),和继而产生的在其中不可缺少的国际法。因此基辛格是赞同这一理论的,不过他是用自己在形式和方式方面的标准去衡量布什理论的。此外他还加入了一条关键性的附文——布什的理论决不能“普遍适用”,也就是说,以法外国家的身份任意使用武力的权利只能属于美国。也许美国可以将此项权利授予它的附庸国。基辛格以他一贯的坦率以及对上层观念的理解无愧于受到的赞誉。然而上层观念却没有对公开主张别人不能有的权利表示出担忧,在这里那些权利可是会带来致命的后果。^⑮

基辛格的评价在2004年他和尼克松的谈话录音被媒体公开后,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在那些录音中有尼克松指示基辛格下令轰炸柬埔寨的话,里面有这样的语言:“在柬埔寨搞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所有能飞的都投入战斗,所有能动的都要攻击。”恐怕在任何国家的档案中都难以再找到类似的命令,它的内容就是可怕的战争罪恶,就是大屠杀。可是据我所知,它的公开没有在美国引起任何评论,激起任何反响,尽管这些命令的恐怖后果早就为社会知悉。^⑯

让我们回头看看南斯拉夫法庭,米洛舍维奇在那里被指控犯有屠杀罪。对他的控告起初只限于在科索沃地区发生的罪行,而且几乎都是北约轰炸过后的事情。其实北约指挥部和克林顿政府早就预料到,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会激起对方用暴行来作回答。估计是控方觉得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的犯罪事实着实不清,于是把发生在波斯尼亚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大屠杀事件也列入了指控范围。可那样

也有问题,因为米洛舍维奇是在发生了波斯尼亚屠杀事件后,才被美国和它的盟国接纳为外交解决争端的伙伴的。另一个问题是,荷兰政府对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后,认为米洛舍维奇和这一事件没有关联。负责调查的情报专家组组长是一名荷兰学者,他说米洛舍维奇“得知屠杀事件后非常烦恼”。调查小组用了一个词描述贝尔格莱德政府及米洛舍维奇本人听到此事件后的态度——“怀疑”。^{①7}

即使我们接受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上面这些讨厌的调查与此事无关,控方想要使屠杀的指控成立还是相当困难的。可要是有人翻出了米洛舍维奇命令塞尔维亚空军把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炸成瓦砾的文件,里面写着“所有能飞的都投入战斗,所有能动的都要攻击”这样的话,那控方就会大喜过望地立即结束诉讼,米洛舍维奇就会被判处若干个无期徒刑,罪名将是大屠杀。而如果法庭遵循了美国的惯例,那米洛舍维奇就难逃一死。可一如平常,最后还是原则性地免除自身道德义务的那一方占了上风。

先例

美国上层对武力使用的主流观点吸纳了学术文集中有益的表达方式。耶鲁大学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是美国权威历史学家,他出版了第一部探究布什“先发制人战”历史根源的著作。加迪斯总体上是赞同这一理论的,同时照例附带性地提出了一

些形式和技术上的瑕疵,以及理论中可能存在的延伸过远的问题。该书在学术界很受推崇,而且“在白宫读者甚众,连加迪斯本人都被邀请前往参加讨论”。^⑮

加迪斯将布什理论的根源追溯到了他十分崇敬的学者,大战略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学说中。《纽约时报》重述了加迪斯的观点:“他表示,布什的反恐理论框架可追根溯源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崇高和理想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加迪斯只粗略提到了威尔逊,内容主要集中在他以防备德国为名出兵干涉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事情。不管威尔逊的出兵借口在他人眼中是否站得住脚,他在干涉的过程中,特别是出兵海地时犯下的骇人罪行倒是他“崇高”理想的一个奇特而普通的表现。加迪斯的中心人物是亚当斯,他同加迪斯提出的布什理论根源问题的联系更多一些。我认为加迪斯提出的是个务实的问题,它同理解历史和思考未来都有重要的关联。

亚当斯曾是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的国务卿,当时他为美国占领佛罗里达辩护时创立了那个“崇高、理想主义的传统”。佛罗里达原属西班牙,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在1818年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亚当斯称那是一场保卫美国的正义战争,加迪斯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占领佛罗里达有合理的安全需要。按照加迪斯的说法,在1814年英国洗劫了华盛顿后,亚当斯就发现美国的处境不安全,于是采纳了那条始终指导着美国的战略筹划的原则:“我们已经认识到,扩张是获得安全的途

径。”遵循这条不变的原则，美国征服了佛罗里达，现在布什要把这条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加迪斯令人赞叹的结论是，布什总统在呼吁“美国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先发制人以保护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人民’时，他并不是在创立一个新思想，而只是在沿用美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布什沿用的这条原则是从亚当斯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都十分理解的”。加迪斯解析道，布什所有的前任都认识到了美国的安全面临着“失败国家”的威胁：它们是一些危险的权力真空——从1818年的佛罗里达到2003年的伊拉克，美国有必要去填补这些真空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加迪斯引用的主要是历史学家威廉·厄尔·威克斯(William Earl Weeks)的著述，这个学术渊源找得不错，可他却省略了著述的许多内容。我们通过研究被他省略的那些内容，对目前理论和共识的所谓前例有了更多的了解。威克斯介绍了杰克逊将军“在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中大肆屠杀和劫掠”的可怕详情。而那场战争只是杰克逊“驱赶或灭绝美国东南的土著”的另一个步骤，离1814年华盛顿遭劫还有很长一段时期，而且英国抢掠华盛顿的那次战争是美国自己挑起的。因此亚当斯脑中的大战略根本不是因华盛顿被抢而生，相反，他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华盛顿发生的事件，即使在他代表美国同英国谈和时也是如此。^⑩

其实当时佛罗里达的真正问题在于，首先它还没有被并入扩张中的“大美帝国”的版图——这是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创造的术语；其次，它成了“印第安人和逃亡奴隶的避难所……在那里逃避奴役或杰

克逊的惩罚”。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借口是，印第安人袭击了美国。而事实真相是，美国军队将一族西米诺尔人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又干了些屠杀和焚烧村庄的恶行后，一些部落成员为了报复，袭击了军队控制的一艘补给船。杰克逊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发动了一次恐怖、毁灭和恐吓的行动”，摧毁了许多村庄，并“经过精心策划毁坏了印第安人的食物来源，让许多部落蒙受饥馑”。持续不断的暴行，使杰克逊在佛罗里达“靠着丑恶的暴力和流血建立起美国统治权”的企图得到了亚当斯的赞赏。上面那句是当时西班牙大使的话，威克斯写道，那句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亚当斯的立场。亚当斯曾“在国会和公众面前扭曲、掩饰或干脆以谎言替代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严重违背了他所鼓吹的道德原则，“暗地里保护了迁移、奴役印第安人和未经国会允许动用军队的行为”。杰克逊和亚当斯的罪行只是“对西米诺尔人进行第二次种族灭绝的序幕的一个缩影”，从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西米诺尔人要么向西逃亡，等待着同样的命运；要么“被屠杀或是被迫进入佛罗里达稠密的沼泽地避难”。威克斯发现，如今的“西米诺尔人只能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吉祥物的形态继续存在于美国的国民意识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太过熟悉的例子了，“一针见血”地反映出我们是如何地利用自己的自由，又如何轻蔑地指责那些不愿面对自己悲惨过去的人。

威克斯分析说，其实亚当斯也承认他那套理论的“荒谬性”，但又觉得：“为强大的一方犯错误比为弱小的一方犯错误要好”，这是他自己的话。迪安·艾奇逊后来在解释这种心理时说，它是一种“比说实

话更聪明的”表达方法。威克斯写道,亚当斯的记述是对“杰克逊夺取佛罗里达的原因和手段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歪曲,提醒历史学家们不要到官方记录里去寻找那件事的真相”。这是一个迄今都很受用的建议。此外,威克斯还提到,亚当斯歪曲史实的行为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被公开曝光。该委员会是专为调查西米诺尔战争而设立的,它的报告结论里写着,杰克逊在亚当斯的支持下给“美国的国家声誉涂上了一个污点”,亚当斯本人劝诱门罗总统批准杰克逊去犯罪。威克斯进一步指出:“然而很少有美国人注意到这些批评的声音,亚当斯明目张胆地为杰克逊辩护,将问题的焦点从对国际法和宪法的担忧转移到了一个神圣的对比上,即美国的‘对’与西班牙、印第安人和英国的‘错’的对比。”^⑩

威克斯所要强调的重点是,利用对杰克逊犯罪的批准,亚当斯把宣战权从国会手中篡夺到了行政部门,这违反了美国宪法。亚当斯因此受到了孤立,他的文件编辑者写道,门罗总统和除亚当斯之外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认为杰克逊的行为‘不光是擅自行动,更违反了总统的命令。他对西班牙发动了战争,而这没有正当理由,如果政府承认它具有合法性,就会被整个国家抛弃’”——不过这个预言很快就被证明是错的。^⑪

亚当斯在晚年时曾尖锐地批评这种篡夺国会宣战权的行为。1847年他给另一名激烈批评墨西哥战争的人写信时,公然抨击波尔克(Polk)总统发出的战争信号“是公然违背事实的恶名昭彰的行为”,还叹息道:“总统宣布战争的存在已成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先例……战

争实际已被宣布了。”最终亚当斯承认，他破坏宪法的行为“危害了美国的自由和共和政体”。威克斯对此的评论是，但他“似乎没有承认自己的行为也成了某个先例的一部分”。美国那条不变的原则仍旧屹立着，没有困扰那些“为理论寻根的人”，他们还为自己能紧密跟随理论设计者的意图而自豪。不变的原则继续危害着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更危害着美国政府发动的战争的受害者们。

威克斯指出，亚当斯还创立了“吸引公众（以及国会）支持政府政策的总统的‘帝国语言’”。那一套语言结构“长久以来是美国外交的一个根本要素，由几代政治家完善和流传下来，而且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它建立在三大支柱上：“一是想当然的认为美国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品质，二是断定美国有拯救世界的使命”，美国还四处传播它所鼓吹的理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来让世界相信它的道德和使命。第三是永远“相信上帝给这个国家安排好了未来”。这种神学般的观念把制定政策简单地视为在善恶间作出选择，削弱了制定前理性的辩论，掩盖了民主受到的威胁。

美国的政策中没有出现对英国的防备，而英国是美国惟一现实的敌人——准确地说是惟一对美国构成威慑的国家。当年英国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急于巩固英美关系，甚至无视杰克逊杀害两名无辜英国公民的事实。亚当斯则以“在惩戒和制造恐怖方面的有益功效”为名替杰克逊滥杀无辜的行为辩护。他辩护时想到的，是他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话，威克斯对此评说道：“罪行一经暴露，就只能借厚颜无耻来掩护自己。”

亚当斯的外交政策的目标绝不会是安全,而是领土扩张。可英国的军事实力使美国无力侵略加拿大和古巴。不过亚当斯预言,一旦美国的实力胜过了英国这个对手,加拿大和古巴就会依“政治重力”的规则落入美国的手中,就如“一场暴风雨把一个苹果从树上吹落后,它就别无选择只能掉到地上”。如亚当斯所言,到19世纪末政治重力的方向开始改变,美国在抑制了英国的威慑后便于1898年干涉了古巴,使用的借口是把古巴从西班牙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然而,干涉的结果却是阻碍了古巴的解放,还把它变为美国“实质上的殖民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1959年。^②

拥护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努力地转换政治重力的方向,加迪斯引用的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讨论了这一点,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希塔拉(Thomas Hietala)。可加迪斯又一次舍弃了其中许多有用的实情。希塔拉记述了杰克逊那一派努力夺取棉花市场的垄断地位,棉花在当时那个工业时代同现在石油的作用大体相同。在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并侵占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后,泰勒(Tyler)总统认为“稳固住对棉花种植实际上的垄断”后,美国已“形成了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再强大的陆军和再庞大的海军都无法造成这样的影响”。他进而说,美国在棉花上的垄断地位“目前已不可动摇,这让我们能把所有的国家都踩在脚下……一年的棉花禁运对欧洲的影响比五十年的战争还要大。我怀疑在那种情形下大不列颠能否躲过一场骚乱”。波尔克总统的财政部长告诉国会,夺得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领土能保证美国“对世界贸易的统治”。美国在棉花市场的垄断地

位,使英国对它占领俄勒冈的反对毫无作用。是上帝把俄勒冈赐给了美国——亚当斯在国会面前重复的这种观念都快成一种陈词滥调了。^③

有意思的是,有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原因和美国吞并得克萨斯的逻辑是基本相同的。当然,这里面也有许多差别。首先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权利主张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英国划定伊边境的时候。当时英国为保障自己,排斥土耳其对伊北部石油的控制,并利用自己的殖民地科威特阻隔伊拉克拥有出海口而划定了伊拉克目前的边界。此外,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效仿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表示惧怕邻近的国家独立会威胁到伊拉克境内的奴隶制度。他好像也没有借神的旨意,至少没有那么振振有词地用天意来包装自己的侵略行为。据我所知,伊拉克的高知识阶层既没有呼吁要接管“苦难落后的科威特”,来推行“在中东地区播撒高贵的(伊拉克)人种的伟大使命”;也没有宣称:“毫无疑问,强大的伊拉克民族已经征服了很多地区,还将朝着我们的目标继续征服下去,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将属于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用什么理由和手段对我们而言都不重要。”——其实这段原话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谈论美国征服墨西哥和俄勒冈时说的,当然里面的名词作了一点改变。另外,也不会有人断定萨达姆·侯赛因的黄粱美梦里会有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那样的野心——就用自卫这样的理由,并借上帝的名义来控制全世界。

把这些以及其他被省略的有用信息填补上后,我们发现加迪斯引用的学术渊源的完整内容,很好地支持了他对布什理论的实施及其根源——从亚当斯理论到“威尔逊理想主义”直至今日的各种理论前例的判断。至于他把理论先例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这一点读者就只能自己去思考了。也确实有人思考过,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恐惧和仇恨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发生恐怖事件甚至“末日毁灭”的可能性急剧升高。亚当斯的“扩张是获得安全的手段”这一理论到了当今的太空时代,也会带来上面的后果。

标准的革命

正如前面所说明的,在武力使用的问题上已经存在的观点有多种。在这个认识范围的一端是由《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战后各国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还得到了南方首脑会议、最近的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及在它一年后召开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的重申。这个认识范围的另一端——开明的国际主义者以及持其他观点的人,基本上都认同美国独有不受国际法约束和国际司法管辖的特权,并相应地可以对危及它“权力、地位和声誉”的挑战采取任何措施,以确保“控制关键市场,获取能源供给和战略资源的畅通渠道”。然而,我有必要再次强调,美国公众相当坚定地支持着战后各国的共识,而美国的政治圈和评论界对它却基本持排斥态度。

在这个认识范围的边缘,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与上述对武力使用

的观点有细微差别看法。科索沃战争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代表的就是这类看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由南非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领衔的委员会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行动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但他的批评都只集中在了主流观点的外围,因为其结论是那场战争“非法但合理”：“说它非法是因它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批准,但轰炸行动是合理的,因为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用尽,要制止发生在科索沃的杀戮和暴行别无他法。”戈德斯通提出,《联合国宪章》也许需要参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进行修改,但这一提议在2004年12月被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公开否决了。戈德斯通解释道,北约的干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例”,不容被视为“越轨行为”。相反,“在这个人权已不再只是国内事务的世界上,面对着全球化和多数人民的自决权,国家主权正在被重新定义”。戈德斯通还强调了“客观分析一国对人权的践踏”的必要。^④

戈德斯通最后那个提议倒提醒了我们,客观分析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也许就是,究竟“世界多数人民”会不会认同美国、英国和它们一些盟国轰炸塞尔维亚的决定。客气地说,从世界传媒报道和各国官方声明中很难找到对它的支持。事实上,轰炸塞尔维亚的行为遭到了北约以外国家的强烈谴责,可这些声音在美国很少有人去听。此外,那些自称“开明进步的国家”自我免除遵守《联合国宪章》和纽伦堡法庭规则的义务,恐怕也很难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客观分析还能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科索沃问题上,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用尽了”。上面的结论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当北约决定实施轰炸时就

有两个外交途径供他们选择：北约自己的提议和塞尔维亚的提议（这个提议在美国，也许还在整个西方世界被隐瞒了，不为公众所知）。而且在持续了 78 天的轰炸结束后，交战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可很快就被北约违反了），因此说到底在科索沃问题上是否存在外交选择的。第三个问题是，是否如独立委员会所称：“要制止发生在科索沃的杀戮和暴行别无他法”，显然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可到了这些地方，客观的分析都变成了特别容易的事。事实上在独立公正的西方消息来源中存在着大量资料和信息，它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科索沃的杀戮和暴行并非发生在轰炸之前，而是在轰炸以后。对米洛舍维奇的诉状也指出了这一点。持这种观点的有：国务院为轰炸辩护时汇编和出版的文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以及北约对这场战争做的详细记录；国际科索沃核查团（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的监察人员；联合国以及对此事做过漫长调查的英国议会。它们得出这一结论毫不奇怪，北约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在轰炸一开始就公开预计科索沃即将上演暴力行动。还有一些消息来源指明，克林顿政府也预测到了轰炸会引发罪行，后来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用更多的细节证实了这一点。很难想象其他的北约官方人士会被蒙蔽，不知道真相。^⑤

然而，在媒体和学术界撰写的关于科索沃战争的大量文献中，几乎完全找不到上面的信息，而且都颠倒了轰炸和暴力发生的顺序。我还从别的来源阅读过各种可怕的记述，但我打算把它们放到后面讨论，先看看现有的一些事例，以揭露为支持政治权力而捏造事实的后

果,以及整个社会都对自己不想知道的消息(即使它的来源为大家所信任)漠不关心的影响。

前任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写道,北约在“米洛舍维奇发动种族清洗行动”和其他暴行后轰炸了塞尔维亚。颠倒这两件事情的先后顺序是常见的伎俩,不足为奇,但不可辩驳的是,他所说的暴行是轰炸行为造成的可以预见的后果,而不是轰炸的肇因。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表了一个毫无凭据的看法:“防止屠杀是干涉的最好理由。”戴维·里夫(David Rieff)拿出了他所谓的证据:“根据德国情报官员和希腊外交官的话……贝尔格莱德当局一直都企图驱逐数量庞大的科索沃人(经常听说的数字是三十五万)。”就算里夫提到的那些未经确认的消息来源的确存在,那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引证身份不明的“官员和外交官”的话,来揭露贝尔格莱德有驱赶科索沃人的紧急计划。他们没有这样的计划反倒十分出人意料,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计划,包括那些“开明进步的国家”。有一种对西方文化界的评论相当脱俗,它说为自己祖国的侵略行为提出正当理由的人值得别人尊重,就算他本人承认侵略行为导致了约八十万科索沃人被强行赶出了自己的家乡,还遭受了暴力侵害。在大西洋彼岸,阿登纳基金会(Adenauer Foundation)的卡尔-海因茨·坎普(Karl-Heinz Kamp)对2004年12月的联合国专家组提出了批评,批评它否定了北约违反《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的权利。他举出了一个常见的例子,但没有拿出任何凭据:北约对塞尔维亚实施轰炸是因为“保护人权对北约而言比遵守《联合国宪章》更有

价值”——保护人权的方法是轰炸,尽管他们明知这样做会引起大范围的人权践踏,但他们还是去做了。^⑥

有一些例子则沦为了滑稽闹剧。评论家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为了批判在美国境外盛行的卖弄“反美国文化”的风气,举了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例子。特劳布对品特的评价是:“政治观点极端到难以调侃。”他的论据是,品特对“1999年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争”十分愤慨,把它说成是“为巩固‘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而策划的犯罪行为”。特劳布说,任何理智的人都明白,“轰炸实际上是在没有别的办法制止米洛舍维奇野蛮的种族清洗行动时,不得已采取的手段”。特劳布还说,尽管这种愚昧的想法在欧洲那些自认为有文化的人中相当盛行,然而在朴实的美国知识分子文化环境中,“除了诺姆·乔姆斯基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以外,其他人估计都会把品特的火气给堵熄掉”。其实除了我们俩,也不难找到赞同品特的人。口碑很好的学院军事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据我所知是惟一个“政治观点极端到难以调侃”的美国作家。他写的知名著作鞭笞了发动科索沃战争和干涉波斯尼亚是为人道主义的虚伪借口,指出它们的惟一目的就是确保“北约的凝聚力和美国力量的威信”,以及“维持美国在欧洲的首要地位”。其他不会去堵熄品特怒气的是不满于官方庸俗宣传的人,有些宣传内容庸俗到连日报新闻都不愿用。因此那些不满的人甚至可能去翻阅大量的官方原始记录,当他们看到了那些按照轰炸、种族清洗的先后顺序叙述的文件,就会发现事实与特劳布的痛

苦叹息完全相反。尽管上面的事实不容置疑,可它们却也无关紧要,原因就像特劳布正确指出的那样:“思想家就如圣战运动斗士一样顽固不化,无法劝说。”^⑦

戈德斯通法官能认识到科索沃的事实真相十分不简单。他说:“轰炸的直接后果就是近 100 万科索沃人逃亡到了邻国,另有约 50 万人在科境内被迁移,这对那里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一灾难又随着后来西方军事占领过程中发生的罪行而变得更加深重。戈德斯通法官在观察了轰炸(早有预料)的恶果后又说,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必须使自己相信塞族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实施清洗的‘马蹄铁计划’在轰炸前就已启动了,相信这一点才能得到一些慰藉”。而这只能是一点小小的自我安慰。从大量的西方文件记载中,看不出塞尔维亚方面的动作在轰炸宣告和监察人员撤离前有何显著变化,但它们很清楚地表明发生在科索沃的主要罪行,包括驱逐行动是在后来发生的。韦斯利·克拉克报告说,在轰炸开始几周后他都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暴行的消息。北约强国在轰炸的恶果已经充分暴露的时候公布的情报,在很久以前就被曝光可能存在捏造。奇怪的是那些情报至今还在被学术和新闻界引用,可现在已不存在任何捏造的必要了。前面已经提到,没必要怀疑塞尔维亚有遭到北约袭击时的紧急驱逐计划,正如以色列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也有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计划一样。我们所了解的一些美国的紧急计划十分触目惊心,所以它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在这种情形下表现得格外温和一些。^⑧

在北约轰炸之前,科索沃是一个丑恶的地方——不过这不是按

全世界的标准做出的评价。西方的消息来源说在科索沃战争的前一年,冲突各方共有约2000人被杀。西方公开承认其中有许多是科索沃解放军从阿尔巴尼亚向塞族发起袭击时打死的,其目的是诱使塞尔维亚猛烈还击,以吸引西方的同情。英国政府发布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声明指出,从1999年1月起发生的2000人被杀中大多是科索沃解放军所为,西方消息来源还一致报告,直至北约宣战和开战,当地局势没有太大变化。对此事做出的严肃的学术研究为数不多,其中一篇甚至估算出,2000名遇害者中只有500人是塞族所为。这篇细致和审慎的研究是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做的,可他却支持北约的轰炸,理由是不那样做杀戮会更多。这些就是能从认真的分析中得出的关于此事最有力的论点,这使我们对北约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在我们想起此事的外交选择时。^②

一些轰炸的支持者为这场战争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借口,也许值得一提:由于波斯尼亚,具体地讲是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那么多的罪行,因而北约的轰炸是正义的。不过英美当局没有公开这个观点。假如我们认真看待这条理由,那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人道主义者早该更加强烈地呼吁对伦敦和华盛顿进行轰炸。我们仅谈谈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在1999年前期北约对科索沃敲响战鼓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罪行也开始升级。那个时期在东帝汶发生的暴行远甚于从科索沃传出的任何报道,另外别忘了印尼还是非法占领别国领土。更有甚者,印尼军方还公开威胁东帝汶人:如果不在8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上投票使东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后面还会发生更恐

怖的事——后来他们确实兑现了自己说过的话。在那之前,印尼在东帝汶的罪孽就远远超过了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惨案,或其他被归咎于塞尔维亚的暴行。关键在于,这些近于大屠杀的犯罪行为得到了英美(还有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全力支持,使它们一直延续到了1999年八九月份美国国内暴发了抗议活动时,克林顿才不得已遣散了印尼的鹰犬。此事的结论十分明显,足以揭示北约以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事件为由实施轰炸是多么不仁不义。

北约轰炸的真实理由并没有被掩盖住。抛开侵略者自称善良的意图和颠倒轰炸与暴行的顺序不谈——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歪曲理由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真正的原因其实始终都被克林顿和布莱尔及其他人反复强调,即确立“北约力量的威信”,也就是美国力量的威信。这一点还得到了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的再次肯定并在克拉克的自传中被证实,安德鲁·巴切维奇又进一步将这一立场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在历史中已简化为一场军事胜利,可能为自由派人道主义者所用”,这是自由媒体《波士顿环球报》以赞许的口吻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准确评述。若历史是因为权力的需要而被编造出来的,那么事实和理性就都无关紧要了。^⑩

科索沃战争是被用作有追溯力的证据的两大成就之一,它们证明了两点:一是各国史无前例地在“高尚”和“无私”的英美导师的指引下,奉行了正确的“原则和价值观”;二是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允许西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另一大成就居然是在东帝汶发生的事,这个例子举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在这种现象面前我认为对西方

学术文化最好的评价就是,在举例时显示有些人的厚颜无耻。在许多出版物中对此事已有大量的评论,近来还有一些例子也值得讨论,得出的结论与此事相同,因此我不再对它们加以详述。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战争也被贴上了“非法但合理”的标签,一些曾经这样认为的法律学者,在伊战的借口无法继续成立之后纷纷改变了观点,转而认为“入侵伊拉克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这是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及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席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原话)。⑩

在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恰当使用武力更为重要。无疑我们可以想象出,甚至可能会找出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但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需要有大量证据支持,而历史的事实会使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踌躇不前。比如说,你也许能想起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以及对它的评论。其作者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署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期间,举出了三例这样的干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北方,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以及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他当然不是真的认为这些是“人道主义干涉”,而只是用证据把它们描述成了那种干涉。然而,英美两国却以一种矛盾,甚至是支持的心态看待这个怪诞的理论。⑪

*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1928年8月27日签订的多边协议。该公约同意摒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而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译者

通过调查,也许还能发掘出真正“非法但合理”的干涉例子,不过为此提供的奖励让这句话成了现时代的一个值得怀疑的口号。调查的结果也倾向于支持1949年国际法院做出的一项慎重裁决:“本法院仅认为一国自称有出兵干涉的权利,是强权政策的表现。这种政策在过去曾引发了恶劣的暴行,不能在国际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国际组织存在何种欠缺……;正常情况下,[干涉]将成为强国的特权,这容易导致滥施正义的后果。”^③

上面的调查很明显地揭示了,国家恐怖行为和其他形式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已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而且这些行为曾一度把世界推向灾难的边缘。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事实被我们的知识阶层很轻易地忽略了。这个认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它又将我们带回到五十年前罗素和爱因斯坦发出的那个呼吁。而我们对这个呼吁的冷漠态度,已经让我们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第四章

推进他国的民主

对“布什主义根源”论述的最详尽的研究论文以这段文字为开头：“推进民主是乔治·W·布什政府进行反恐战和执行其总体战略的中心思想。”出现这种论调并不奇怪，到2005年时它已经进化成了一种例行的程式。我们常常能在学术文章中读到，确信民主能够由外界力量建立起来“是促使美国干涉伊拉克的前提认识”，这种认识还“可能为美国对别国外交政策的宏伟目标铺下了一块新的基石”。上述宣言有时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推进他国民主”自伍德罗·威尔逊赋予它“强大的理想主义元素”称号以来，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罗纳德·里根当政时它得到了“突出强调”，接着小布什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贯彻这一政策。在新闻和评论界，这一认识更是被视为最纯粹的真理。^①

提出像这样一个明显很重要的命题，得到了几乎一致性的赞同。这时我们应有的理智反应是去查看支持及反对这一命题的依据，那

些依据是衡量一个生效的民主制度的标准。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朝鲜发出一个类似的宣言,没有人会去问它有何依据,因为伟大领袖是这样说的就足够了。然而在一个民主的文化中,这样的宣言不仅要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还要进行严谨的论证,排斥明显存在的反面证据。我们将在讨论布什主义时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先让我们思考一下相关的背景。

要弄清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并不容易,有时候它比自然科学研究要困难得多。大自然虽然不会把问题的答案放在银盘子里恭敬地献给我们,但也不会费尽心机妨碍我们求知。可在研究人类社会时经常会遇到障碍,所以研究者必须先撕开官方宣传中的假象,那些制造假象的手段常与权力集中的过程如出一辙。

有时一些大人物也会行些善事,帮我们认清这一点。在1981年,哈佛大学的政府科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解析了前苏联威胁的作用:“政府必须在宣传”出兵干涉行动或其他军事行动时,“制造一种错觉——美国要对付的是苏联。这正是美国政府自从推行杜鲁门主义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几年后,亨廷顿亲身实践了这一理论,他提醒全社会:“戈尔巴乔夫的公共关系政策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构成的威胁,不亚于勃列日涅夫的坦克。”^②

为了有效地推销自己的决定,官方宣传常常把眼前的敌人描绘成天生的恶魔。尽管有时这种描绘也并不虚假,但政府下令对这些目标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很少是因为它们犯了那些所谓的罪过。有很多事情都能证明这一点,其中之一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一个国家

从美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由于不知为何突然犯下可怕的罪行),转变成一个十足的恶魔,(为惩治它的罪恶)必须摧毁它。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萨达姆·侯赛因的经历。由于萨达姆的可怕罪恶,美国不得不责罚了伊拉克的人民,不过在当局对他的罪行充满激情的声讨中,没有出现这样的语句:“他的罪恶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施行的,因为我们不在乎发生在那里的将我们引向末日的罪行。”如大家所见,美国的规则得到了捍卫,因为萨达姆已经为他的罪恶接受了审判。首次开庭审理的是他在1982年的罪行,正是在那一年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名单中去除了,目的是给萨达姆提供军事上和其他种类的援助,直到他的第一宗罪事发:违背(也可能是曲解了)美国在1990年8月下达的指令。事情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可当事方“已达成默契不再提那件往事,因为‘没有任何意义’”——用奥威尔的话说。^③

“例外论”

亨廷顿的分析有很强的概括性,但还没有囊括各种情况。不仅要制造对我们面前的“大恶魔”的错觉,还要在人们心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高尚品质。尤其是要把侵略和恐怖行为包装成自卫和激发人们判断力的活动。日本天皇裕仁在1945年8月的投降宣言中说的话,只不过是一些听腻了的陈词滥调:“我们向英美宣战是出于保存日本和稳定东亚的真诚希望,我们从未考虑过侵犯别国主权和扩张自己

的疆域。”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位天皇的真诚，因为日本给其入侵中国东北和北方定的调门更高，而且还进了日本的内部文件。国际犯罪的历史充斥着这一类思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1935年写的宣言弥漫着黑暗的纳粹主义阴云，他说德国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德国以外的“世界被黑暗笼罩的危险”，使德国保卫“希腊曾造就的人类伟大前景”免受“正在消灭一切阶级和创造这个世界的精神动力的势力的冲击”。他认为，拥有了纳粹统治带回的“全新精神动力”，德国最终会肩负起将世界从其他国家——主要指美苏——的“冷漠的民众”手中拯救出来，以免于“毁灭”的“历史使命”。^④

甚至一些最为博学和正直的人都染上了这种病态思想。就在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罪恶行为达到顶峰时，对此十分熟知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却写出了他最经典的一篇人道主义干涉论文。在那篇文章里，他催促英国全力推进在中印的事业——具体地说就是占领更多的印度领土，以控制更多的鸦片生产，再用那些鸦片敲开中国的市场，获取大英帝国所需的开支。他声称，英国应当走这条道路，即使那样会遭到落后的欧洲人的“诋毁”，因为他们不懂得英国是“这个世界上的新鲜力量”，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毫不利己”的天使般的国度，英国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无可指摘和值得赞美的”。穆勒还说，英格兰无私地承担着给世界带来正义与和平的代价，而且“兄弟般平等地把果实分给全人类”，包括那些被它征服并毁灭的“野蛮人”，当然这是为他们好。这里我们就不必多说法国的“开化使命”以及许多与穆勒志同道合的人了。^⑤

世界闻名的“美国例外论”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因为正义的例外论应该是近乎普遍适用的。另一个有普遍性的是，知识阶层都应严肃而真诚地认同领袖提出的高尚原则，有领导的宣言足矣，无需任何依据。不过领导们经常用自己的行为全面推翻自己的高尚思想，这一点还得到了他们的承认。由此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还好美国用一个奇妙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突然宣布“改变路线”，把不恰当的历史抹去，以便继续踏向光辉的未来。过去我们常常唱响的一个口号，是致力于把自由和正义带给苦难的世界，最近它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登场，即“发扬民主”的激情。

总有一些蔑视权威的人对官方的宣传提出质疑，有的人还像亚当·斯密那样很出格，而后者的意见对于英国故意摆出的所谓意图高尚的姿态有害无益。斯密坚持认为英国全球政策真正的“主要设计者”——“我们的商人和厂家”，一直在竭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多的关照”，却给他人造成了“极大痛苦”。受害者不仅包括被他们“野蛮不公的行为”危害到的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人民，甚至还包括英国国内民众。结果斯密被打进“阴谋理论家”的行列，这个名词专指那些寻找真相的人。他们翻阅历史和档案资料，调查决策者们所服务的国内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格局。他们不懂得适时对领导宣扬的善良意图，像全力发扬民主、正义和自由表示崇拜。因此必须设法消除他们带来的恶劣影响——暴力政权用的是武力，比较自由的国家会用其他方式达到这个目的。^⑥

制造错觉

在整个冷战时期,有一套“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借口被用来煽起国内对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大屠杀的支持。然而到了80年代,这个理由变得越来越不充分了。依照一个详尽的研究报告,到1979年“前苏联在其境外仅能影响百分之六的世界人口和百分之五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⑦除了一些枝节情况,总体现实开始不容回避。此外美国政府还有内忧,特别是60年代的激进行动对国民的启迪作用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人们不那么容忍暴力手段了,这一点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十分清楚——一些被泄漏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可为明证。要“制造苏联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错觉”面临着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里根政府的公共关系组织到处疾呼“邪恶国家”的触须正伸向四方,企图扼杀美国——肯尼迪则把它简化成欲征服世界的“巨大而冷酷的阴谋”。里根主义者宣布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场摧毁“险恶的恐怖主义祸害”(里根语)的战役,尤其是那些以某些国家为靠山的国际恐怖组织。用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话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邪恶敌人传播的瘟疫,它们要使现代人类社会退回到野蛮时期”。1979年国会起草了一份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它在国家政策和官方宣传中被抬升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如前所述,它里面的国家都经过了巧妙的挑选。

当亨廷顿的警告变为现实,戈尔巴乔夫的公共关系政策对美国

的利益产生严重威胁时,对拉美常用的干涉借口就不再奏效,“‘毒品战’的旗号就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拉美一直是美国直接或间接以武力干涉的传统地盘,现在借着“9·11”事件的东风,美国的干涉也变为了“缉毒恐怖主义”。到2000年前,“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军援和警援已超过了经济和社会援助”。分析家指出,这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即使在冷战达到白热化的时候,经济援助也远远超出了军事援助”。^⑧

不难预料,美国的政策“壮大了拉美国家的军事实力,但代价是民用服务的萎缩……而且使当地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政局动荡”。2002至2003年间,接受美国军事训练的拉美军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美军南方司令部(Southern Command)目前派往拉美的人员比那里大部分民用联合机构工作人员的总和还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应付那里的主要威胁——“极端人民主义运动”和街头犯罪行为。当地的警察正在接受轻步兵战术训练。美国的海外军事训练的主管部门正从国务院转为五角大楼,这解除了国会对它的监督,使它不再受人权和民主这两个底线的制约。^⑨

在1989年9月柏林墙即将倒塌之际,老布什以大范围政府加媒体的宣传,再次宣布了“向毒品开战”。那次宣传来得正是时候,正好为美国入侵巴拿马、抓捕一名罪犯以及误炸贫民窟打死数量不明(据受害人讲有数千人)的穷苦当地人找到了理由。那名罪犯在佛罗里达就被认定为有罪,罪行大都是在过去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时犯下的。“毒品战”在国内也有重要的行动,同“向犯罪开战”的行动十分相像,

它的作用也是恐吓和驯服美国民众,让一些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政策得以施行,当然受损失的是大多数美国人。

1994年,克林顿扩大了“恐怖主义国家”的范畴,把“流氓国家”也包括了进去。^⑩一些年后另一个概念也被加进了清单——“失败国家”,对它们我们不仅要防备,还必须帮助,哪怕有时要用毁灭的方法帮助它们。再后来又有了“邪恶的轴心”,按照主的意愿,作为主的卑微仆人,我们必须为保卫自己毁灭它们。不过与此同时也会增加恐怖威胁,造成核扩散,也许还会使“末日降临”。

然而,上面那些名词也常常给美国带来麻烦。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论用什么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官方定义都使它们的范围过大,其结果是非但不能忠实地按领袖的理论去为美国辩护,反倒把美国自身也拖进去了。政府有纪律规定,不得承认历史学家阿诺·迈耶(Arno Mayer)对于“9·11”事件的评论有任何正确之处。他的评论是:“美国已成为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者,信奉‘先发制人’”,还干出了无数其他的“‘流氓’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却始终借着民主、自由和正义的名义”。^⑪

“流氓国家”这个概念也同样麻烦。到了克林顿当政的后期,很明显,世界很多地方都已把美国视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和“对它们最大的一个外部威胁”,“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眼中,当今第一大流氓国家首推美国”。而小布什上台后,代表主流的学者不再仅仅传达美国以外的观点,而是表示美国“已经染上了那些被它攻打的‘流氓国家’的习气”。尽管这些麻烦暂时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挡住了,但它们会始终

潜藏在美国身后。^⑫

在传统借口消失后,用“毒品战”作为理由来“填补这个真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防治毒品最经济和最人道的方法——防止吸毒和戒毒经常被忽视,相反在国内大肆搜捕、到国外出兵干涉的行为却大量增加,可这对毒品价格及吸毒行为的治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问题之二是美国在海外滥用武力和毒品贸易之间本来没有太大关联,可学术界却把它给创造出来了。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它,在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中我们又见到了这种关联。然而回想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毒品交易方面还没有谁的成就能与19世纪的英国相提并论,当时毒品是大英帝国的经济支柱之一。^⑬

“失败国家”的范畴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就像“恐怖主义国家”和“流氓国家”这两个概念,“失败国家”的“不准确性令人沮丧”,还容易受到过多解释的影响。这里政府同样要在搜罗符合条件的国家的同时,仔细拼凑证据把美国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以海地这个经典的“失败国家”为例,克林顿在1994年为“恢复那里的民主”而出兵干涉海地,可遗憾的是“并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倒造成了那里政局动乱,镇压再起,还使美海关系陷入僵局”。这是许多学术成果中出现的一个标准版本,还得到了媒体几乎一致的报道。同样标准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大家都对一些相关事实绝口不提,特别是克林顿入侵海地的真实目的:它是华盛顿阴谋破坏海地民主,故意带去动荡和镇压的一个步骤。美国行为的后果很快就被预料到了。^⑭

上世纪90年代,在那些自封为“开明的国度”里,有人公开提出了“标准革命”学说,就在“标准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失败国家”这一概念被反复提起,给了所谓“开明国家”以保护(他们精心选中的国家)的人民为借口使用武力的权利,他们的行为也许就是“非法但合理”的。自从“9·11”事件后美国政治讨论的主题就由“人道主义干涉”变成了反复宣布的“反恐战”,于是“失败国家”的范畴被扩大到伊拉克这样的被认定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国家,原因据称是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从事了国际恐怖活动。在那些寻找(也赞同)布什主义历史根源的学术文章中,“失败国家”这一概念被扩大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地带。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迫不得已要去占据这些地带,正如美国当年要“集中力量开拓自然疆土,砍倒树木并打倒印第安人”。^⑮

有了如此宽泛的内涵,“失败国家”不必仅限于弱国。伊拉克被列为威胁美国安全的失败国家,并不是因为它很弱小。一位法学权威写道:“侵略的、专断的、独裁的和暴政的国家同样也是‘失败’的——至少依照现代国际法和惯例可以作出这样的评判。”这一观点很有意义。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都不弱小,但它们被评为“失败国家”的资格丝毫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以最狭隘的标准去衡量,那些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在国内外的权利,或不能维持有效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组织的国家也属于“失败国家”。这个概念肯定还应包括“法外国家”,它们蔑视那些仰仗美国的倡导,经多年努力精心建立的国际秩序及其执行机构。至此,同前面类似的困难再次出现了:这个范畴涵盖太广,不能进入官方宣传的内容。^⑯

很明显,世界最强势的国家选择了典型的法外国家的政策,它严重危及了本国人民,破坏了真正的民主。在几个重要方面,华盛顿表现出了某些失败国家和法外国家的特征,还以此为荣。“这个仍需要公正有效的国际法制体系的世界,同与缅甸、中国、伊拉克和朝鲜……为伍的世界惟一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任何掩饰,它们间的分歧在于“美国已采用 17 世纪的绝对化的国家主权概念”,却不许别国使用,理由是那个概念早已过时而且荒唐透顶。^{①7}

亨廷顿的错觉理论得到了大量文件和史料的充分支持,不过它只是方便地借助了冷战思维,无知和谬误。逐个分析了内部记录和其他的标准资料后,我们发现的确存在过让美国获利的理智计划。历史学家查尔斯·伯奎斯特(Charles Bergquist)在评论美国干涉拉美的理由时的结论是:“为保护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信心”,分析家们必须“歪曲事实,把一贯理智的美国政策(保护资本家利益的政策)变成不理智的思维(对共产主义毫无根据的恐惧)”。在别的情形下也常常是这样的。^{①8}

一贯的理智

调查结果常常显示,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长久以来都是美国的真正敌人,特别是当它有可能成为“感染性病例”时——这是基辛格对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容。基辛格担心智利会影响到远在南欧的国家——它们是基辛格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共同关注的。

因此必须在某一天清除“感染源”，1973年9月11日星期二就是这样的日子，那天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件又被称为第一次“9·11”事件。自己去查一查前后两次“9·11”事件对受攻击的社会的影响，及被袭国的反应，我们就能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解得更多。^{①9}

美国以支持恐怖活动、“制造经济痛苦”等手段对智利实施了多年颠覆破坏后，1973年9月11日那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军队进攻了智利总统府。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死在了宅邸内，显然是不愿屈服而自杀。那场政变毁灭了拉美最古老又最有生机的民主政权，建立了一个压迫和折磨人民的专制政府。它的爪牙是秘密警察组织 DINA，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把这个组织同前苏联的克格勃及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相提并论。同时，华盛顿大力支持了皮诺切特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并且在它最初的胜利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②0}

官方公布的第一次“9·11”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00人，而一般认为死于那场灾难的人数是官方数字的两倍。如果美国有相同比例的人口遇害，那死亡数字将是5万人到10万人之间。那场政变发生30年后，一次官方调查发现了3万起酷刑事件的证据，按照相同的比例换算成美国人口将是70万人。政变结束后，皮诺切特很快就同由美国撑腰的其他拉美军事独裁政权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秃鹫行动”的跨国恐怖主义组织。那个组织不仅在它们的地盘内冷酷地残杀和动用酷刑，还把恐怖活动的触角伸到了欧洲和美国。就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发生的时候和发生很久以后，皮诺切特在很大范围内都得

到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那里。然而,1976年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暗杀事件就太出格了,被暗杀的是受人敬重的智利外交官奥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美国只得叫停了“秃鹫行动”,可恐怖主义的“流毒”仍在继续扩散。发生在阿根廷的最恶劣的行径还未上演,国家恐怖行为即将在华盛顿的当政者及其贤明顾问们的操控下,传播到中美洲去。^①

2001年“9·11”事件后,各国普遍认为世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可第一次“9·11”事件后并不存在这样的变化。那些爱恋财富、自由和特权的人也许会问:如果这个半球最古老的民主政权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其总统死于那场政变,5万多人被杀,超过70万人被迫害,还导致一场恐怖主义的瘟疫传遍了这块大陆并弥散了出去,这个世界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也许会问,人们该如何回应那些参与或赞美上述行为的人,又如何回应那些把上述行为看得不值一提的人。

对民族主义独立的恐惧可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发展,其中一个例子是对古巴的态度。参议员鲍卡斯称之为“政府对古巴越来越古怪的荒唐偏见”。如我们所见,古巴问题在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地位已超出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种偏见也许是很古怪,但在决策者眼中它们一点也不荒唐。对此,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一些内部文件给出了根本原因。当时国务院的策划人提醒说,卡斯特罗政权“只要存在”,就是对美国政策的“成功藐视”,再倒退150年都是如此。这不是来自俄国的威胁,而是对这个半球的主宰者的一种不可容忍的挑

战,就像伊朗在 1979 年时的罪行或叙利亚对克林顿命令的违抗。长期担任总统顾问的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曾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智囊团成员,他在 1960 年 6 月曾指出:“这种挑战将是门罗主义的终点”。美国进攻古巴的疯狂和野蛮的确不同凡响,以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在 1993 年将美国决策者们“固有的情绪化的要求”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戒。该学院认为决策者们不冷静地把卡斯特罗看成了“魔鬼的化身,认为他必须为自己藐视美国和其他该受责罚的行为付出代价”。

前苏联解体后古巴的处境极其不利,这时在自由派民主党人的极力主张下,美国加重了对古巴人民的惩罚。1992 年加强对古巴封锁措施的起草者曾是代表新泽西州的众议院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后就任参议员),他公开表示:“我的目标就是压垮古巴。”惩罚别国人民的合法性早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就被确立了。1960 年 3 月,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声称:“古巴人要为他们的政府负责”,因此美国有权在经济上扼杀古巴,让他们付出代价。艾森豪威尔赞同经济制裁,希望借此“让饥饿的古巴人推翻卡斯特罗”。肯尼迪也认为禁运会促使菲德尔·卡斯特罗下台,原因是:“面对饥饿的人民会让他感到难受”。除了扩大禁运范围,肯尼迪还发起并指挥了一场针对古巴的大规模恐怖战役,目的是让古巴“尝尽世上的恐怖”——肯尼迪的传记作家阿瑟·施莱辛格透露的原话。1960 年 4 月,副助理国务卿莱斯特·马洛里(Lester Mallory)表述了经济制裁的作用原理:“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和生活上的困苦,将使古巴

人不再拥戴甚至开始敌视卡斯特罗”，这样就能把卡斯特罗除掉，“因此美国要不择手段地迅速削弱古巴的经济力量，以催生饥饿和绝望，促使古巴政府倒台”。^②

回顾了美国对古巴长达 40 年的恐怖打击和经济封锁后，拉美学者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érez)写道，美国领导人无法容忍“古巴拒不服从美国”，以及它向美国表明态度：“这个民族仍然坚信他们拥有自决权和国家主权”。这 40 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是相当稳固的，设计过程也是理智的，对于其受害者也是明晰的，只是在制定者的思考内容中似乎无法感知到它们。

让肯尼迪政府惩罚古巴人民的，不仅仅是这个“有罪”的国家“成功地藐视了”美国。有人还担心古巴会变成另一个“感染性病例”，无数像智利一样遭受颠覆、侵略和国际恐怖打击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例。肯尼迪总统的拉美顾问阿瑟·施莱辛格在他即将就任时告诉他：古巴的独立，对于受“卡斯特罗当家做主意识”影响的国家来说，是一种鼓舞。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表示担心卡斯特罗已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了很高的威望，这意味着“其他政府由于敬畏本国暴民在卡斯特的蛊惑下可能做出的举动，会不敢坚决抵制他”。施莱辛格详细解释说，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在“土地和其他国家财富的分配过分倾向富人阶层时……贫民和普通百姓在古巴革命的诱导下，正要求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这种当家做主的意识传播到了古巴以外，那么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政治格局恐怕会土崩瓦解。

英国情报机构也持上述观点，它的依据是在别国反抗英国方面

的丰富经验。1961年6月,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曾发出下面的警示:“卡斯特罗在民众中仍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果古巴革命能较长久地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权,那么其他拉美国家就极有可能掀起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革命,因为它满足了受压迫阶级的需要。”对于美国那些致力于“促进别国民主”的决策者而言,这个严峻和持久的挑战始终都是一种打击,今天委内瑞拉及南美很多地区的运动又把这种威胁推到了他们面前。^③

如何防范那些国家传播病毒和感染别国是列强要面对永恒问题。审慎的欧洲政治家担心美洲革命的流毒会扰乱文明世界的秩序。1804年海地经过与文明国联军(美英法)浴血奋战后成为南半球第一个独立国家,此事远比其他类似的事件更让列强恼怒。当时海地北面的那个奴隶制国家美国尤其惧怕它的解放,甚至到1862年承认利比里亚时仍拒绝承认海地,尽管这两个国家都被认为可能是逃跑奴隶的归宿。后来美国取代法国成为使海地痛苦的最大根源,直到今天都是如此。^④

当俄国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脱离西方时,最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也让西方广为忧心。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感染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英美。这种担忧直到60年代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不前时才有所缓解。这得归功于肯尼迪总统,一是在他的主导下美国不断扩军备战,使前苏联不得不开发大型军事项目与其抗衡;二是他拒绝了前苏联领导赫鲁晓夫提出的两国共同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武器的动议。赫

鲁晓夫希望借此避免使苏联陷入军备竞赛,也避免远逊于美国的经济基础被拖垮。其实两国都清楚苏联的军事(以及经济)实力都弱于美国。

学术界研究冷战的泰斗之一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似乎摸准了冷战的核心,他指出冷战的根源就发生在1917—1918年。十月革命后,西方联军马上在1918年出兵干涉俄国。加迪斯表示西方出兵的目的是善意的,伍德罗·威尔逊拍板时,他“保障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急切愿望“压倒了其他任何想法”。当然,美国用武力保障的是在别国安插自己中意的领导。持这种正义价值观的空想家们都宣称,美国还为越南和中美洲等地人民的自决权贡献过力量,克里姆林宫则投身于阿富汗和东欧的人民权利事业,历史上还有很多这一类舍己为人的事迹。^⑤

加迪斯还解释道,西方在1918年攻打俄国确实是为了自卫,正像杰克逊与亚当斯解放佛罗里达也是为美国抵御逃跑的奴隶和无法无天的印第安人。西方的进攻是“为了应对新苏联政府将来深远的干涉行为,它干涉的可能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内政,还有全世界的事务”,那将会是“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挑战,这种威胁绝对会出现”。所以说,在1918年“美国的安全就已经处于危险中了”。加迪斯批评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把西方的干涉说成是:“骇人的行为,背离了正常的社会规范乃至国家间应遵循的国际法律规范。”他驳斥道,那纯属一派胡言,“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改变了本国的社会制度,公布了他们革命的野心,还来抱怨西方侵略他们,要知道他们的行为“给西方带来

了本世纪最深刻的革命威胁”。

加迪斯进一步论述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用的是一种“病毒”蔓延式的方法,从“共产党在西欧、东地中海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成功”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不能不让人“对苏联的举动再生疑窦”,就算共产党的威望“主要产生于它对轴心国的有效抗击”。在共产党反法西斯的号召力面前,英美必须迅速而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抵抗运动并窃取其成果,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因为那里的工人夺取了工厂,自治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第一次会议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若共产党在意大利合法地取得了政权,便进行武装干涉的设想。1954年的5411/2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再次提出了这一想法。西方对意大利民主运动的倾力破坏至少持续到了70年代。它们在被解放的地区到处干扰工人运动、分解左翼组织,重建了许多原先的政治经济制度,还让很多曾帮助过法西斯的人恢复了重要的权力职位。颠覆民主政权(特别是在南欧地区)的提议在接下来许多年里都未间断过。西方还不遗余力地防范日本萌生出真正的民主制度。^②

战后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华盛顿对共产主义传播的恐惧与日俱增。杜鲁门主义马上运用了多米诺骨牌理论为希腊发生的大屠杀辩护,并借该理论重建了传统秩序,包括再度起用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人。出于相近的原因,1967年华盛顿支持希腊建立了战后欧洲的第二个法西斯政府,直到1974年这个独裁政权被推翻为止,华盛顿都在帮助它。多米诺骨牌理论被华盛顿反复地用于很多

国家及地区的事务上,为颠覆议会政权、安插独裁者提供正当理由,目的是保证美国需要的稳定格局和重要资源(40年代在希腊的动作就是为了中东的石油)。

1948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State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的乔治·凯南提醒当局,如果印尼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产生的“流毒将向西蔓延”,横扫整个南亚。出于这个原因,凯南坚信:“此刻印尼问题在我们与克里姆林宫的斗争中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不过印尼本身与印尼问题关系并不大,它只是一个制造错觉的工具。在印尼,“穷人的政党”(学术语言)正因它带给老百姓的慰藉赢得了太多的政治支持,由此产生了“印尼共产主义化”的严重威胁,迫使惧怕民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那里支持了一场军事叛乱。印尼民主的威胁直到1965年苏哈托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才得以解除,紧随政变的是恐怖的大屠杀和20世纪后期最专制的政府。自此再也没有人关心印尼的民主,也没人在乎那里发生的战争罪行和对人权的践踏了。用克林顿政府的话说,苏哈托是美国的“自己人”,一直到他于1998年第一次真正犯罪——违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和失去对本国民众的控制。这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马上告诉他,从那一刻起印尼开始了它的“民主转型”。尽管如此,一些苏哈托的铁杆拥护者,如保罗·沃尔福威茨还是认为他是有可取之处的。^⑦

印度支那战争也是一路货色。借口总是相似的,只是对“防范共产主义威胁”的内涵必须得扩大。法国军队前往越南是去收复它过去的殖民地,但对外必须说成是去保卫越南不受越南人的侵略。诺贝尔

和平奖得主加拿大人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认定越南面临的外部威胁是“俄国殖民当局”，可在越南看不到一个俄国人，全是美国武装起来的法国军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东南亚遇到的“侵略”应当包括“武力以外的形式，也就是还有政治斗争和推翻政权的行为”。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约翰·F·肯尼迪痛斥越南遭受的“内部侵略”和“国内发起的攻击……幕后操纵者是北方”。他们说的北方是指北越，当初正是美国把北越从越南分离了出去，起因是美国认为1954年达成的越南统一和大选协议不会有积极作用，于是扼杀了这项协议。^⑧

1963年1月，随着战场捷报传来，肯尼迪通告国民：“北越侵略的矛头在南越遭遇了顽强的阻挡。”他身边的历史学家顾问阿瑟·施莱辛格说1962年是“不错的一年”，因为“越南遭受的侵略被遏制住了”。其实正是在1962年肯尼迪派空军轰炸南越，并批准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武器焚毁粮食作物、清除当地抵抗军用作掩护的地面植被，还把数百万南越人送到了能“保护他们”免受民兵袭击的场所。其实美军是把南越人关进了集中营，禁止他们去帮助游击队员。政府的主要消息来源透露，当地武装正在控制南越的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们是在美国附庸国及北越的野蛮压迫下奋起反抗的，不过北越是在很不情愿的状况下帮助那些附庸国的。肯尼迪坚决表示美军在“越南内部的侵略”被战胜之前会在那里坚守到底，直至1963年11月总统遇刺前，所有的公开和内部文件都没有显示出他的这一决心有任何动摇的迹象。可到了60年代后期，这场战争在美国已很不得人心，特别是在

1968年美军在越南的春季攻势使上层人士也开始反对它。此时传记作家们也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他们的记述,但同时又伙同另一些人出炉了把肯尼迪等人描述成秘密鸽派人物的“回忆录”,以迎合官方宣传的需要。肯尼迪的鸽派活动的确非常保密,在任何记载中都找不到关于它的一丁点蛛丝马迹。^②

最近,维护肯尼迪秘密鸽派人物形象的努力有了一些进展,他们找到了一些零星的证据,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假定的一个前提:他们默认“鸽派人物”是指那些不获胜利绝不撤退的人,正好是肯尼迪的一贯立场。他们找到的证据大多没有什么力度,其中一个是在白宫与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通信记录。白宫指示他告诉印度外交部长德赛(M. J. Desai):“如果河内采取措施减少游击活动,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举措”,如果河内能“彻底根除游击活动,我们会按照惯例撤军”^③。简而言之,如果河内能设法终结当地武装对美国安插的恐怖政权的反叛活动,美国就会留下它的附庸国(继续掌权),自己则满意地凯旋归去。如果让克里姆林宫在80年代提出这样一个针对阿富汗的条件,它也会乐意去做的。

其实美国打击印度支那的原因并不特别,华盛顿是害怕越南的独立可能会成为一种“流毒”传播到别国,甚至感染到资源丰富的印尼和亚洲首强日本。一旦日本融入了独立的亚洲大陆,成为其工业基地,那亚洲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超级多米诺理论”就不幸成为现实。那样一来,日本在30年代四处征战所要建立的“新秩序”(New Order)就通过这种方式诞生了。然而美国在取得了军事

胜利后并不打算失去它在太平洋地区的二战成果。战前的外交记录显示,美国从根本上并不反对日本在东亚建立所谓“新秩序”,但条件是不能把它排除在外。美国在战后的野心更大,用乔治·凯南的话说,华盛顿有意给予日本“对南亚某种意义上的帝国统治权”,即日本想要的“新秩序”,但它必须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凯南的团队还勾勒出了亚太地区的其他“功能”:一是确保英国能从它曾经的亚洲殖民地获取资源;二是促进对战后欧洲重建起基础作用的“三角贸易”,美国公司也依赖这种贸易形式开拓市场,创造投资机会,进而发展成跨国公司。可如果任由越南独立的“流毒”四处扩散,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①

处理病毒的合理方法是杀死它并对可能感染的个体注射疫苗。在上面的情形下,杀死“病毒”即毁灭印度支那,为周边地区免疫就是在可能被感染的国家建立严厉的军事独裁政权。被《纽约时报》兴奋地叫做“亚洲的曙光”的“骇人听闻的大镇压”使印尼免于感染致命的“病毒”。发生在印尼的两宗罪恶使西方得以随意压榨这个国家:一是数十万人民被镇杀,其中大部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二是惟一反映民意的政党——印尼共产党被剪除。西方毫不掩饰地为这一结果欢欣鼓舞,而中央情报局则把这两大罪行同希特勒的罪行归为一类。^②

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阐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基本得失。他回顾那场战争时认为,1965年以后美国在越南“投入过大”,因为对于那里,印尼已经完全免疫了,最基本的战争目标也就达成了。^③到60年代后期,美国工商界

也已意识到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而且美国经济正受其害,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反战运动逼华盛顿不惜血本地采取“既要大炮又要黄油”*的政策。反之如果那是一场像二战那样受民众支持的战争,华盛顿就能开展有益于经济的全民总动员。在当时的情形下,上层的观点和政府的政策只得适时进行转变。

美国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以“美国的失败”告终。就战争的最高目标而言的确如此,因为美国没能在印度支那安插自己的傀儡政府,而且美国力量的“威信”可能也略微有些受损。可如果只考虑战争的基本目标,那美国已经是赢家了,只需看看美国在战争中运用的大量不同种类的暴力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公开版本坚信胡志明将打下整个东南亚,尼加拉瓜将占领整个中美洲,用不了多久游牧部落就会横扫得克萨斯,紧随其后的是俄国人等等。这个版本完成了在国内制造错觉的使命,但后来常常被讥笑为“幼稚的谬论”。然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公开还有一个内部版本却从未被推翻过,因为它看上去十分严谨。这个理论说:美国无法控制的独立运动和民主进程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诱使处于相似困境的人也走上这一条路,这会侵蚀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这就是要经常民众中制造错觉,推销对外干涉政策的原因。错觉中的假想敌人可能是苏联、中国、中苏联盟、匈奴人(伍德罗·威尔逊用于入侵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借口)或毒贩子等任何能够编得出

* 即军事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政策。——译者

来的对象。这方面的档案记录很丰富,也非常一致。

这样的错觉通常不仅是为引导公众舆论而制造的,还有限制情报机构的作用。在被披露的五角大楼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最令人吃惊的例子,它比广受关注的伊拉克战争更有说服力。华盛顿决定支持法国再次侵略越南后,便指示情报机构给胡志明的抵抗活动添加幕后主使——俄国或中国(或两者都是)。可情报机构费尽周折还是发现河内在那个地区只属于与中俄没有任何联系的政府。于是当局就用这一点去证明胡志明是一个对中俄忠心耿耿的“傀儡”,它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特许令”,无需任何指示便可行动。其实稍微想想就不会怀疑,北越的抵抗并不一定是为它的某个主子效力,而完全可能是维护本国利益的行为。然而美国情报机构被彻底洗了脑,以致根据五角大楼的文件记录,它在1968年前的二十年里甚至难以去设想上面的那个可能。至于南越的抵抗活动(民族解放战线)则完全被抹杀了,除了在这个组织直接控制的地方。^④

“不容置疑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没有施加很大的国际影响。除了控制它自己的海外领地,美国还到太平洋地区从事了一些探险和征服活动。到了20年代,美国的开拓行为已为它赢得了中东大量的能源供给。然而在它还未参战之前,一些高层战略家和对外政策顾问就认识到美国应该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拥

有不容置疑的力量”，而且肯定能限制那些可能干预美国战略的国家“行使主权”。那些战略家和顾问还设计了“一套综合政策用以协助美国在一个大范围内取得军事和经济的霸主地位”，那个范围至少容纳了西半球，从前的大英帝国和远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进，很明显“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压倒了希特勒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大范围”应划入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⑤战后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可同样让人吃惊的是上面那套政策的核心内容仍然沿用至今，只为适应形势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动和借口上的调整，这对世界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由于俄国第一个经受住了纳粹的袭击并反攻至其老巢，约瑟夫·斯大林成了我们的盟友，还有了“乔大叔”这个可爱的名字。历史学家奥默·巴尔托夫(Omer Bartov)在文章里写道：“尽管不能否认斯大林的政权令人反感，但如果不是苏联红军做出的巨大牺牲，纳粹军队就不会被击败，纳粹在欧洲的统治就会延续许多代，这一事实是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⑥罗斯福政府的学者沃伦·金博尔(Warren Kimball)认为：“如果军事分析的结论是只有苏联红军才能在地面战中打败希特勒，那对苏援助就需要总统的优先考虑。”这个结论的前提是相信苏军能碾碎德军，让美国士兵免于陷入地面战争。金博尔私下里吐露，罗斯福的战略是要使美军成为后备力量。他还说，“然而罗斯福考虑得更多的不是对苏援助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实际价值，而仅仅是维护自身‘良好信誉’的一种手段。”美国的援助约占苏联产值的百分之十，对苏联而言的确非常重要，但在罗斯福的总体战

略中的地位是次要的。加迪斯发现,罗斯福战略的一个目标自始至终都没变过,那就是要让美国的盟国完成欧洲战场上的“大部分战斗任务”,以将“(美军)的伤亡降至最低”。这里的“盟国”主要是指苏联,在战争中每阵亡1个美国士兵,“相应就有60名苏联士兵牺牲”。与此对应的另一个战略目标是要让美军支配整个太平洋地区,不允许任何盟国甚至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插手,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⑦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战争初期的观点很简单:“如果德国要赢了我们就去帮苏联,要是苏联快胜了我们就去帮德国,让它们尽可能地两败俱伤。”政治学家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称之为“延长战争的中心战略”。然而,后来杜鲁门这种以实用主义为主体的战略,却因他本人对“老乔(即斯大林)”的喜爱和敬佩而有所改变。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正派的人,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1948年时还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斯大林其实是苏共政治局的囚犯。”可杜鲁门的顾问们告诉他对外这么说会“铸成大错”,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只在私下里夸奖老乔“诚实”、“坦率”和“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像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彭德格斯特是密苏里州的首领,引导他走入了政治生涯。作为一个总统,杜鲁门觉得只要美苏在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里能相安无事,那么他就能跟斯大林搞好关系。^⑧

然而战争策划者们对此的看法要悲观得多,特别是英国认为,西方与俄国的战时同盟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西方军事情报机构早

在1944年前期就“把苏联定为它们的下一个敌人”，于是它们对俄国人隐瞒了有关德军的重要情报，并着手搜集关于俄军“极其具体和准确”的信息。到1944年底，西方同苏联的情报合作几乎全部停止，英美情报机构已开始寻找空袭俄国所需的情报。战时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从不掩饰对俄国这个“半亚洲种族”的厌恶，也许这个种族与外交部高级官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所讨厌的日本“黄种矮子奴隶”几乎一样劣等吧。布鲁克在1943年时曾说，苏联在战后“绝对会构成对我们的主要威胁”，因此很有必要“培育德国，逐步使其强大起来，再将其并入西欧联盟”，尽管在“美英俄神圣同盟的背景下”实施这样的政策还很困难。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认为“同华盛顿的哈里·S·杜鲁门一样”，布鲁克和他的副职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将军也“乐于看到(苏德)全力互相攻击”。英国军方早在1944年就开始筹划袭击俄国的战争了，其中包括重新武装德国。英国情报机构也发现“华盛顿正在流传一个‘超级机密’——苏联已被评判为西方的下一个敌人”。^⑨

1945年5月纳粹德国被彻底打败后，丘吉尔就下令制定一个名为“不可思议的行动”的战争计划。奥尔德里奇写道，他“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俄国’”。这个直到1999年才解密的计划“提出由数十万英美军队和10万名被重新武装的德国军队突袭俄国”，同时英国皇家空军“将从北欧的基地起飞，空袭苏联城市”，核武器也将在混战之中登场。战争还未结束时，卡多根就已对俄国人十分恼怒，原因是他们“始终带

着一种神经质的怀疑”，以致和他们打交道时需要“无尽的耐心，我们曾经还以为他们是理智的人种”。^⑩

他们在同这个世界上的“非正常人”打交道时始终都面临着上面的难题。越南战争结束 30 年了，当年暴行的指挥者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仍想不通为什么南越人始终拒绝放下武器，像印尼那样适时“改变路线”，加入“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南越”中去。不过印尼回心转意也是在屠杀了“30 多万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后的事了……现在的印尼共产党掌控在苏哈托领导的独立民族主义阵营手中”。^⑪

为什么越南人会不向往麦克纳马拉展现给他们的美好未来呢？也许答案就在同期亨利·基辛格对“当代国际秩序最深刻的症结”的思考中：原因不是饥饿或战争之类，而是将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分隔开的“哲学观念上的差异”。西方“深信真实的世界是存在于观察者之外的”，而其他地方的人则认为“真实的世界几乎完全存在于观察者的内心中”。也许这就是越南人在遭到我们的轰炸，并被我们要挟到谈判桌前时表现得不理性的原因，要知道在谈判桌上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是同独立后的印尼共产党同样的命运。基辛格进一步说，俄国人在这个观念的鸿沟之间艰难地保持着平衡，由于他们错误地认为“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及居于第一位的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比个人对政治家的信任更为重要”，那他们就不会像我们那样“在表面上接受他人善意的反对”，因此他们尤其难对付。^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些年后，英国开始改变对安全形势的认识。1951 年前，已退休的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埃里克·郎利-库克

(Eric Longley-Cook)中将为了进一步在“心理和经济上打击苏联,‘而不是采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告诉“最核心的决策者,冷漠的俄国人是维护国际格局稳定的力量”。他间接地表明:“对全球战略稳定和英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因为美国正准备“与苏联展开一场热战”,美国自身不会受损害,但英国则会毁于那场战争”。^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次会议(NSC 68)的备忘录的内容如果被公开,那英国的担忧就会加剧。这次会议的备忘录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候编制的,它被视作是当代世界秩序的奠基之作,在学界被广为引用。不过它的许多内容都被忽视了,包括里面了不起的修辞体系和体现苏联军事实力弱于西方的零碎信息。^⑤第68次会议备忘录是保罗·尼采在迪安·艾奇逊的指导下起草的,此二人都属“智者”,他们因冷静而缜密地创造了当今国际秩序而享誉。他们将“极权国家的根本意图”同美国的“基本宗旨”作了对比。极权国家“无法压抑的欲望”和与生俱来的“冲动”,是夺得对“其他国家的完全控制”并毁灭所有的别国政府和“社会结构”。同我们纯粹的完美相比,这是彻底的邪恶。美国的“基本宗旨”是保护全世界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美国领导人有着“慷慨和建设性的激情,并杜绝了对外关系中的贪欲”,这些品质在美国影响下的传统地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些地区在“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创造和发展美洲国家关系体系”的过程中享受着美国给予的特别待遇。因此才出现了活跃在美国边境以

* 热战(shooting war),指真枪实弹的战争,与冷战相对。——译者

南的美国力量的景仰。

同“参与过创造(美洲国家关系体系)”的杜鲁门政府的智者相比, 布什演讲词的作者从古代史诗和儿童神话中剽窃来的善恶对比的词句看上去要圆融一些。

又一个历史事件体现了美国政策主体的延续性, 那就是前苏联解体。这一事件使美国政府又有必要制造新的错觉, 当然它同时也是一次崭新的机遇。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打压, 但名义变了: 它不再是为了防备前苏联, 而是由于美国诚心要到海外将民主发扬光大, 需要从事国家恐怖活动并扼杀古巴这个国家。干涉借口的骤然转变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 甚至都没有多少人明显注意到它。(很清楚, 这同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消失后的情形如出一辙。)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 布什出兵巴拿马的事件对这个地区而言不过是它们历史的一个注脚而已。但它却反映出了一些变化, 其中之一被里根政府的国务院官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点明了。他认为“布什可能会更加易于使用武力”, 因为不必再担心会引起俄国的反应了。巴拿马战争也需要新的借口, 不能再打前苏联威胁的旗号了。于是, 美国扯出了诺列加走私毒品的由头。诺列加曾一直是中央情报局很看重的一颗棋子, 可后来却变得不合作了(但这不足以构成出兵的理由, 于是美国政府又添加了一些他威胁美国安全的故事)。1990 年 8 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 英美感到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大量远征军集结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上, 以备在 1991 年 1 月进攻伊拉克, 因为它们再也不用面对一个超级大国

对手了。^⑤

当美国不再有冷战可资利用时,就有必要寻找新的借口,不仅仅是为了海外干涉,还可以在国内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军事化。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后,五角大楼呈送给国会的国防预算没有多大改变,但使用了新的语言包装,1990年3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开了这套包装。《国家安全战略》再次以传统的方式给予了先进工业部门一个优惠政策,这严重违反了它们鼓吹并要求他人遵守的自由市场原则。该《战略》呼吁加强“国防工业的基础”(实质是高科技产业),刺激“对新设施设备和研究开发的投资”。同过去一样,发展新一轮工业经济的风险和费用都由全社会承担了,可最终的利益却被私人攫取,这是典型的为富人服务的国家社会主义。尤其是二战以来,领先的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模式,而且在工业革命早期的经济强国也有这样的先例。^⑥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未来的经济增长点由电子行业变为生物产业,五角大楼也压缩了对前者研究开发的资助,转而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国家部门增加了相关投入。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其他理论家可能会为“企业的龙头作用”、“消费者的选择”及“自由贸易”制造的经济奇迹而喝彩,不过那些把公共资金不当投进个别产业和那些从中获利的人更了解其中的内情。^⑦

我们有时会听到一种言论,即借“国防”的名义掩藏本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对社会的一种积极贡献。可那些并不藐视民主的人可能

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众有机会了解实情并就是否进行上面的公共投资做出选择，他们会如何决定？也许他们宁愿公共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医疗保健、教育、良好的住房，为后代营造可持续的环境，资助联合国、国际法和外交事业的发展等领域，这也是民意调查的结果经常反映的现实。然而上面只能是我们的猜想，因为惧怕民主的人不会允许公众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甚至不会让公众了解统治者们正借着他们的名义策划些什么。

面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对国家投资的产业的大力支持必须取得新的理由。无疑前苏联威胁论已经不能再用了，于是借口变成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冲突时对复杂技术的更多需要”，这种需要是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严峻考验”，而且即使在没有“超级大国与我们竞争”的情况下，“美国的利益仍然面临着威胁”。国防部的第二项职能也需要做这样的更改：变成保障全球“稳定”——也就是保证全世界都服从美国。政府的说法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时期”里，“我们预见到我们的军事力量仍将是维持世界平衡的支柱，只是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而且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改变。我们发现可能更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的地区已不再是俄国，而是第三世界。而在那里可能需要新的能力和手段”。——其实完全是老手段，只是需要新借口和相应的新能力罢了。政府还称：“估计在未来前苏联以外的国家将给美国的利益造成更大的威胁，需要我们更多地加以关注”——事实上关注程度是相当的，还要依具体对象宣布和执行不同的政策。和过去一样，我们必须有“增援驻于前方的部队或向没有永久军事存在的地区

投放军力”的手段。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尤为重要，因为“自由世界离不开产于这个地球中枢的石油”。如果在这里“我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需要进行直接的军事斗争，那它也不可能“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门口”——用了几十年的借口*终于在这儿被丢弃了。这种突然的变化却没有引起任何评论。而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还不属于前苏联以外的威胁，相反他还是美国宠爱的一个朋友和同盟，得到了大量援助和支持。^⑧

为了重复和响应政府的态度，军队指挥官们纷纷强调冷战的结束不会显著改变美国的安全政策。1990年5月，海军陆战队将领A·M·格雷准确地指出：“事实上，战后美国所处理的大部分危机事件都与前苏联没有直接关系。”美国眼前的问题和过去一样，也是因“不发达国家对富国与穷国间的差距越来越不满”而诱发的暴乱活动。这些问题可能会“危及地区稳定，妨碍美国获取关键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而美国及其盟国对那些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会不断上升”。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有效的力量结构中保有军事投放的能力，和机动地应对全球各种暴力冲突的能力”，以保证“畅通无阻地进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市场”和“获取我们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⑨

这条基本思路在10年后仍在沿用。新千年情报计划认为“全球化”（这里指的是官方宣传里的全球化）将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下去。“全球化的演进将会困难重重，表现为经济发展长期不规律和贫富悬

* 指前苏联威胁。——译者

殊越来越严重”，这会“加剧经济停滞不前、政局动荡和文化排异的问题”，这样的环境会“滋生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上的极端主义，以及常常与之相伴相生的暴力”，其中许多都是冲着美国来的。2004年的最新情报结论预计，随着“全球化的受益国……同不发达国家及一些国家里落后的隔离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将出现比今天更加显著的冲突和不稳定现象”。不巧的是，这里的“被隔离的地区”非常多，特别是在“全球化”诞生之后。^⑤

2004年的情报结论还提出了警告：“未来15年里，新老种族问题将逐渐发展为世界的中心问题”，这“有可能会在以下主题上分化世界人民的态度，挑战美国的权威”，包括“环境与气候变化、公民隐私、克隆与生物技术、人权、规制冲突的国际法以及多边国际组织的作用”。美国“越来越多地需要与世界公众舆论斗争，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婉转地反映出，小布什使全世界比以往更加惧怕和憎恨美国。^⑥

亨廷顿提出的为控制本国人民有必要制造错觉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纯粹的真理：理智的观察者不应相信领导人们坦言的所谓善意。这些表白是世界通用的，内容也不难想象，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些罪大恶极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苏哈托和萨达姆·侯赛因等都曾用华丽动人的辞章来描绘自己崇高的目标。他们追求的同样是“维护和平的规则”和“对民主的贡献”。可一个严谨的人不会过于注意他们的言辞，而会探究他们的行为，正是这条基本观点引导帕斯卡(Pascal)、扎米亚京(Zamyatin)和奥威尔

等人写出了大量评论文章。

“民主化的浪潮”

看了这些现象后,让我们再回到伊拉克看看复苏的“发扬民主”的热情,这一目标被视为布什“大战略”的中心。

伊朗外长为表示对2005年1月伊拉克大选的恭贺,宣称伊朗“支持伊拉克人民,并祝愿伊拉克选出一任民主的政府,富足地生活在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里,同邻国和平共处”,伊朗还希望伊拉克取得完全的主权,有一个民主、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理智的观察者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伊朗发展别国民主的意愿,也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布什、布莱尔、赖斯和他们的同僚发表的类似声明。其实和伊朗比起来,英美的这类声明非常值得怀疑,其原因是不容忽视的。最明显的证据尽管很少被人提到,但偶尔也能见到。中东问题专家奥古斯塔斯·理查德·诺顿(Augustus Richard Norton)在文章中记述道:“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被揭穿后,布什政府越来越强调这场战争带给了伊拉克民主制度,于是学者们也纷纷去赶这个民主化的潮流。”在那以前,尽管也偶尔有人虔诚地祷告让伊拉克走向民主,但从未超出合乎情理的限度。而且人们在查阅约翰·普拉多斯所做的关于攻伊借口最全面的研究时,甚至都没有检索到“民主”这个词。^②

直白地讲,英美领导人一方面要求我们欣赏他们雄辩地表明要真诚地转向“民主改造”,可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明白他们是一帮厚颜无

耻的骗子,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一场战争用的理由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萨达姆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计划吗?到2003年8月这个故事已无法继续成立了,于是媒体报道说:“由于在伊拉克境内对违禁武器的搜索毫无结果,布什政府已把宣传重点转向另一个倒萨战的理由:把伊拉克作为改造中东的一个‘突破口’,以减小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准确地讲,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增加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点甚至得到了他们本国情报机构的证实。^③

那条“不同的理由”提出的时机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怀疑它的可信度,然而事实证明它的提出仅仅是一场颠倒黑白的宣传的开始。2003年11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成立20周年大会上,总统发表了名为“伊拉克和中东的自由”的演讲,从那以后美国领导人增进民主的真诚性就再也没有受到过质疑。“简单的问题”被抛进了记忆深处,代替它的是布什“拯救世界的使命”,即通过一场“也许是现代最高尚的战争”(被称为“理想主义第一人”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想出来的话)给中东带去民主。^④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媒体报道和学术评论中找出了一丁点对那些宣传表示质疑的言论。美国倒是有不少批评家,他们提出那些“高尚”和“慷慨”的目标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他们担心的是实现那些目标的代价太大,又或许受益者太落后,让热心的美国实在帮不了它们。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受命到伊拉克讲授民主,并为他们起草(违背他们意愿的)宪法。一些批评家认同他所从事的工作,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把进程缩得过短(即不

要像伊拉克人要求的那样快)”，否则“他们可能选不出正确的人选”。戴维·布鲁克斯给出了一个概括性更强的解释：尽管先后有英国和我们的耐心教导，“诺亚·费尔德曼……认为中东人的行为有时还是不理智”。^⑤

布鲁克斯和费尔德曼对中东人做出的评价，在布什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后不久就有了证据证实。在巴格达举办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让被测者有机会同西方知识分子一道加入到“民主化潮流中”去，可他们中的一部分却没有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相信美国的民主意图。当他们被问到怎么看待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时，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觉得美国是来推行民主的，百分之五的人猜测美国是来“援助伊拉克人民的”，其余的人大都认为美国的目的是攫取伊拉克的资源，并按自己和以色列的利益需要重组中东格局——这就是理性的西方人所嘲笑的“阴谋理论”，那些嘲笑者相信就算伊拉克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莴苣和泡菜而不是石油，伦敦和华盛顿也一样会投身于“伊拉克的解放事业”中。^⑥

中东人民的愚昧落后不断被展示出来，其中一次是在2005年9月，白宫派出公共关系专家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去让伊拉克人明白，他们没能理解华盛顿为他们的幸福和自由付出的努力。然而她在外交活动中开展的“我是一名母亲”主题宣传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媒体对此作了如下分析：休斯的错误在于她把方法限定在了“简短的广播发言上，没有进行持续的论述。在美国的选举过程中，仅通过重复播出这样的发言就会有效果，原因是总统候选人用他发表

的所有这类讲话占据了新闻时间。要是这都不起作用,他们就会大把烧钱进行充分的广告宣传。然而在这块各种思想涌动和撞击的土地上,休斯女士仅占据媒体的制高点没有任何意义”。简而言之,广播发言,媒体传播和充分宣传对这些原始人都没多少效果,他们只相信有深度的论述和踊跃的讨论是民主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个教训似乎并没有被很快吸取,几周后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场辩论会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员朱丽叶·沃尔(Juliet Wurr)对听众说,美国正努力发展“四个 E”: exchange(交流)、engagement(接触)、education(教育)和 empowerment(授权),以“接近当地人民,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可是很显然,她的努力在那个长期以来“各种思想涌动和撞击”的环境下是完全失败的。很清楚,在那里“推行民主”十分艰难。^{⑤7}

其实理查德·诺顿的评价对学术界还是有一点不公道。有些学者的确认识到,在那个“简单的问题”不证自破以后,“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才开始充满激情地呼吁给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带去‘民主和自由’”,那是在“侵略已既成事实后再给战争找的借口”,因此显然不能信任。可是其他学者的声音同学术界以外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都令人压抑地证实了诺顿的评价。^{⑤8}

除了那个新借口提出的时机问题外,民主的传教士在他们布道之前的一些行为也让人们有些难以对新借口产生信任。2002年布什和布莱尔在推进侵伊战争时,规避民主之害的功绩已经讨论过了。单是这个明显的事实就已经令人无法相信他们,另外唐纳德·拉姆斯

菲尔德在侵略前的集结阶段还公开提出了旧欧洲和新欧洲*的区别,一群评论家和政客很快就热切地接纳了这一理论,而我们很难想起像它这么明显的蔑视民主的言论。区分二者的标准十分清晰和明确,其中有一条说明了民主的实用定义:旧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同其大部分国民都一致,而新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此问题上支配着绝大多数国民,并听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发出的指令。因此旧欧洲应该被抛弃,而新欧洲值得赞颂,因为它是民主和革新的希望。⑤

新欧洲最尊贵的代表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贝卢斯科尼因批准了一场遭到百分之八十的意大利人反对的战争,而被赐予了一次拜访白宫的机会(原因还可能是他为逃避贪污指控而改组了整个意大利司法系统)。阿斯纳尔得到的奖赏更高,他被邀请参加亚速尔群岛峰会,同布什和布莱尔一道宣布对伊拉克开战。不过就在那之前的一场西班牙民意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二的国民支持他帮助英美侵略伊拉克。⑥

一个引起各方震惊的事件使仇视民主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土耳其政府尊重百分之九十五国民的意愿,拒绝了华盛顿在其境内开辟一条攻伊战线的要求。美国的媒体痛斥土耳其缺乏“民主资格”。科

* 新欧洲(New Europe),指支持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欧洲国家。——译者

** 克劳福德(Crawford),即指美国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牧场,布什总统每年都回克劳福德牧场度假,其白宫班子随同前往牧场办公,故有“西部白宫”之称。——译者

林·鲍威尔宣布要严惩这种背离良好秩序的行为。保罗·沃尔福威茨的态度最夸张，他斥责土耳其军方没有强迫政府服从华盛顿的指令，还命令军队领导人为此道歉，承认“我们错了”，错就错在他们否决了几乎一致的公众意见。他们应当这么说，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懂民主。难怪沃尔福威茨得了“理想主义第一人”这个美名，他惟一的缺点就是“太理想化了，以致他对伊拉克战争寄予的高尚希望，可能盖过策划者通常遵循的审慎和务实原则”。^⑥

美国上层的媒体给予沃尔福威茨的评价对我们很有启发。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说，沃尔福威茨的“全部热忱都在于推进民主的进程”。安德鲁·鲍尔斯(Andrew Balls)在《金融时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对他表示景仰的报道，里面写着：“发展民主是沃尔福威茨事业生涯中最坚定的目标之一。”可惜的是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些赞美词，除了沃尔福威茨的自画像。为赞颂沃尔福威茨作为2005年世界银行新任行长当之无愧，马拉比在文章中写道，沃尔福威茨“发扬民主的主要事迹发生在他担任美国驻印尼大使的时候，当时他用国家干预的手段奇迹般地减少了那里的贫困”。那段经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华盛顿达成的一个“新共识”就是“穷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腐败以增加私人投资者的信心，以及开启法治”。^⑦

稍微看一下沃尔福威茨的历史记录就能了解实情。研究印尼问题的专家杰弗里·温特斯(Jeffrey Winters)写道，沃尔福威茨担任美国驻印尼大使时，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绩就是为1997年“苏哈托一手

造成的印尼经济大崩溃创造了条件，那场灾难使数千万印尼人一贫如洗”。沃尔福威茨提出的最不寻常的倡议就是对“印尼银行系统进行历史上最轻率的反调节措施”，正是那项措施导致了印尼经济崩溃，导致无数人破产。可与此同时，沃尔福威茨最喜爱的领导人苏哈托却赢得了“一个问题头衔——近代史上最腐败的统治者”。苏哈托总共积聚了“大约 150 亿到 350 亿美元”的家庭资产，“设在英国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认为他显然是印尼经济危机的大赢家”。他的财产远远超过了全球第二大贪官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第三大贪官刚果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不过沃尔福威茨效力过的几任政府在其流氓政府展览馆里给这三个人的地位都很高。此外，沃尔福威茨还有更多的大使国书，他还是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设计师。可是透明国际却警告道：“如果不尽快采取严厉的反贪措施，伊拉克的重建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⑤据我们所见，目前还没有任何措施，而这个预测也正在逐渐被证实。可见，被小布什亲热地称为“沃尔菲”的那个家伙在落实反腐败和发展经济的新共识上确实实有不一般的资格。

温特斯进一步指出，这个理想主义第一人“自他在印尼工作以来，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记录比上面更差，逐字检索沃尔福威茨当大使期间在媒体上的所有表态，我们发现他从未提起过印尼的民主和人权状况。相反，他一直都在替苏哈托政府赔罪，始终都把舆论的焦点放在商业、投资和苏哈托着力维持的本国和地区稳定上”。当“澳大利亚记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南亚这个邪恶和残忍的美国盟友时”，沃尔

福威茨不仅“破坏他们的工作，还教导澳大利亚人如何去处理这个令人尴尬的不安源头……逐步看淡它，忽视它”。沃尔福威茨的“怯懦行为罕见地激起了澳大利亚政府首脑的非难”，他的言论遭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的指名批评”。^④

沃尔福威茨获得世界银行行长提名一事马上“激起了印尼人权社会活动家的批评”。印尼官方发起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称：“在以前所有的美国大使中，我们相信他对苏哈托一家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亲近的。可他从未对印尼的民主化问题和人权事务表现过任何关注”，甚至都没有去过国家人权委员会。这位主席还说：“而且我一次也没有听到他公开提起过腐败问题。”其他人权和反腐败活动家也表示，他们记不起：“沃尔福威茨先生对践踏人权的现象做出过任何批评，从没感觉到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进而指出沃尔福威茨“直到整个90年代都还捍卫着苏哈托政权”，即使那个世界级的独裁者已被印尼人民赶下了台。^⑤

沃尔福威茨“热心于”人权和民主事业的历史，从他早年供职于里根政府国务院一直持续至今，只是从没有出现过什么明显的变化。地区事务专家约瑟夫·内文斯(Joseph Nevins)写道，在沃尔福威茨担任大使期间以及期满至今，他一直都“拥护着印尼群岛上压制民主和人权的政策”，还支持印尼军队在东帝汶被占领土上干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内文斯写道：“当1999年印尼似乎打算撤出东帝汶时，沃尔福威茨驳斥了有此意图的美国政策。他借用了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的常用托词，预计印尼一旦撤军，东帝汶就会因部落和宗族矛

盾陷入内战。按他的意思只有印尼军队留下才能避免这样的灾祸。”当时，印尼军队正不断升级他们的罪恶，并在最后一波暴力狂潮里把这个沦陷的国家所残存的一切都荡尽了。内文斯还说：“根据人权组织的报道，大面积的军队暴力还在发生，尤其是在亚齐省和西巴布亚岛地区。”在东帝汶犯下滔天罪行的印尼军政领导人得到一次虚伪审判的赦免，可那场遭到人权组织谴责的审判却被参与他们暴行的西方人轻易地容忍了。沃尔福威茨在2005年1月访问雅加达时呼吁美国增加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可正是这些援助和训练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祸害了印尼人民和印尼军队所及范围内的其他人民。内文斯写道，他那印尼之行借的“人道主义幌子”是海啸后的赈灾活动，可“其真正意图在于加强美国同印尼军队的联系，这也是沃尔福威茨执行了多年的任务”。^⑥

布什及其幕僚还在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继续履行总统的民主化使命。在2002年，他们支持了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一场军事政变，致使委内瑞拉民选政府和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被推翻。可随后在拉丁美洲暴雨般的谴责声下，他们只得灰溜溜地逃出了委内瑞拉，毕竟在拉美，民主可不像在华盛顿那样“怪异”和“过时”。然而在委内瑞拉掀起一场人民起义恢复了原来的民主政府后，华盛顿又故伎重演，借着“发扬民主”的名号再次颠覆了他们的政府。当他们以委内瑞拉政府不配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扫毒活动为借口，撤销了该政府后，华盛顿“恢复了‘撤销委内瑞拉政府’时一并削减的对委内瑞拉援助，以便继续支持在委内瑞拉境内反对左翼查韦斯派别的民主团体”。^⑦

上面的逻辑十分有趣。华盛顿支持反查韦斯团体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可要是伊朗胆敢在美国资助反布什的团体,特别是在这之前它还支持了一次推翻美国政府的军事政变的话,恐怕有些人就要拍案而起了。另外,如果支持查韦斯的团体被说成是“民主”的,那肯定不合逻辑,因为华盛顿已经反对查韦斯政府了。按照这个道理,以下事实也都无关紧要:一是查韦斯多次在(美国)媒体一致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情况下,赢得受到监督的选举和公投,他的支持率达百分之八十;二是拉美主要的民意测验组织拉美晴雨表公司(hatinobarómetro)在2004年发现,尽管整个拉美的民众对本国民主的满意程度令人担忧地持续走低(奇怪的是,这个过程同破坏有效民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施过程相当吻合),但还是有三个例外——居于首位的就是委内瑞拉,1997至2004年间那里支持民主的民众比例从百分之六十四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四。现在,委内瑞拉正引领着其他拉美国家维护本国国民选出来的政府。⁶⁸

与之相对照的是,大多数美国公民都认为公众意愿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很小,很少有人相信国会能尊重“大多数美国人会做出的决定”。在一个从毫无民主直至完全民主的等级序列表中,美国公民将他们的政府置于英国、瑞典、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政府之后。⁶⁹

另一个证明查韦斯支持者反民主的性质的事实,是2005年9月他本人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的表现。在那场会议上,“当一个世界领导人大肆攻击所谓的美国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他报以最响亮的掌声。”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对美国的古怪评价分明表示“他在联合

国最高会议上扮演了反面角色”。处于美国监控范围以外的一家爱尔兰先驱性刊物，刊登了一篇拉美老牌记者休·奥肖内西(Hugh O'Shaughnessy)写的文章。美国读者能看到这篇文章，它分析了查韦斯鼓掌的原因，而且在分析中没有利用布什之流的哀叹：我们美国这么善良，全世界怎么还这么恨我们？文章里写道：

过去几十年里，石油经济已在委内瑞拉创造出了闪耀的富豪阶层。可在这个国家，15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四分之一在忍饥挨饿，59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百分之六十没有任何收入，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享有社会保障。现在，只有1998年被选出来的查韦斯总统，这个曾当过伞兵上校的总统，才有办法帮助这个国家贫困的大多数人，才能拿出良方治疗这个富有社会的痼疾——严重的分裂和职能的丧失。自他通过民主选举执政以来，就着手对无法满足大众需要的医疗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改革。改革的进程是缓慢的，但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的是委内瑞拉已和古巴结成了医疗合作战略伙伴关系，这使约两万名古巴医生和卫生专家来到了委内瑞拉提供服务，他们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区，从加拉加斯市到委内瑞拉自己的医生都不愿去工作的偏远地方。

这个“奇迹行动”的模式已传遍了加勒比地区，看起来已深刻地影响到了穷苦大众的生活。^⑩

2004年3月，由于担心萨尔瓦多大选的结果可能出问题，美国的

海外民主传教士警告说,如果萨尔瓦多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命线,也是那里“经济奇迹”的支柱——来自美国的援助款将被切断。传教士们为使自己的使命更加明晰,把他们给萨尔瓦多带来的经济成就作为样本展现给伊拉克。看到宣扬这些无耻言论的报道后,一名研究中美洲问题的权威专家托马斯·沃克(Thomas Walker)向全国报纸寄发了一篇反社论的文章,详细讲述了那些得到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人欢呼的“自由选举”(在美国的控制下)的真相。他提醒我们,那些选举“笼罩在国家恐怖主义阴影下,死于这种恐怖活动的无辜公民数以万计,文明的社会不再健全,媒体的不同意见不再能被听到”。此外,候选人全部都来自“从折衷派到极右派的狭隘范围”;放弃投票权利者会受到被谋杀的恐吓,选票上都有编号可被识别出来,“投票箱是透明塑料制的,就算选票被折起来还是可能被看到内容,票箱前就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⑦

这样的反社论内容显然行不通,所以没有一家报纸刊登那篇文章,沃克对此毫不感到意外。沃克还是尼加拉瓜问题主要研究成果的作者。在80年代尼加拉瓜是最大的国际热点时,有一年他也向《纽约时报》寄送了几篇反社论文章,当然和上面一样,由于观点问题一篇也没被登载出来。在这家自由国家媒体对尼加拉瓜问题报道得最多的时候,也出现了许多社论和反社论文章的交锋,两者的数量相近,彰显了自由媒体的平衡与开放。但细看一下这两派观点的文章就能发现,它们的分歧似曾相识,属于鹰派和鸽派的争议:鹰派要求升级对该国的恐怖打击行动,而鸽派认为暴力的效果不佳,主张美国应采用其他

手段迫使尼加拉瓜人接受“中美洲模式”，参照美国所青睐的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两国，适用它们的“地区标准”，其时，这两个国家正处在可怕的国家恐怖状态。沃克和一些拉美专家基本上被排除在了上述两派之外，因此被人们遗忘了，有时候这种遗忘是超出我们意料的。还有一个“推进民主”的例子是，1984年的尼加拉瓜大选得出的结果是我们官方所无法接受的——桑地诺主义者(Sandinistas)获胜，所以美国说，那次大选从未发生过。尽管那次大选始终都有人密切观察，其结果也得到了大多数观察者的认可，包括反对桑地诺主义者观察者和拉美学者协会派往尼加拉瓜的专家团，可他们的意见全被压制了。其中一个观察者是哥斯达黎加的若泽·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他按拉美的标准参与了1984年选举结果的宣布，但同样没被理睬。菲格雷斯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和桑地诺主义者，还是一个华盛顿当局及美国对外投资的坚定支持者，可他还是认为尼加拉瓜的事情应该由尼加拉瓜人自己来解决。结果，里根在该地区发动恐怖战争的那些年里，在美国投身于海外的“民主事业”的岁月里，这位中美洲的民主先锋人士就这样被美国媒体封杀了，至少从未得到过正面报道。大家有目共睹，这是政府的常用手段。^⑩

布什政府的民主促进者们仅仅赞扬了萨尔瓦多的民主模式，却没有提到里根“反恐战”的一个重要贡献。作为“联合阵线”的第二大组成部分，伊拉克私人警卫公司“成了老练的职业军人云集的地方”，估计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来自萨尔瓦多。这些训练有素的杀手来自里根操纵的国家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在伊拉克施展自己的本领能比

在本国那个残缺的社会里挣得更多。^③

这种熟悉的模式无论是在西半球传统美国势力范围内,还是在新开辟的中亚地区都有应用。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暴乱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选了个不错的立场,他们说他们对暴乱事件感到‘十分惊诧’,同时也感到该国应对反政府暴力活动提高警惕。相比之下,英法及欧盟官员是断然谴责发生在那里的血腥镇压行为,并要求乌兹别克斯坦允许国际观察者进入调查”。在这里华盛顿甚至同英国的轻微惩戒态度都保持了距离,更为公开地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独裁者伊斯兰·卡里莫夫。据那里的前任英国大使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说,卡里莫夫有些特殊的小“爱好”,比如将持不同政见者扔进沸水烫死。由于默里这种不慎言的行为,他被伦敦召回了。其实这算不了什么,他还曾把卡里莫夫说成“乔治·布什安置在中亚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不仅得到了布什政府高官的高度评价,还得到了他们的“鼎力相助”,当然其中的原因是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默里在2002年和2003年发往伦敦的电报里写道:“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是危险的,它恶化了那里的人权状况,造成了更严重的压迫和贫困,这会催化伊斯兰教信徒的恐怖活动。”他还写道:“从塔什干(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的情况看来,美国在那里的政策并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是为了获得石油、天然气和霸权。美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不惜去支持一个冷酷的暴君。”默里还说,美国国务院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权状况的评价很不错,那是为便于向其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2003年3月18日,正当布什和布莱尔发动伊拉克战争时,默里在一

封秘密信件里写道：“去年美国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5亿美元援助，其中四分之一都是军援。布什和鲍威尔一再夸奖卡里莫夫是他们的朋友和同盟。然而就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至少关押着七千名政治犯，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活动自由、集会自由，也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它有组织地对数千人实施了酷刑。这个国家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环境同中世纪的农奴制国家没什么两样。”^⑭

然而，卡里莫夫感到他得到的支持还不够热烈，也不对他的胃口。于是他强行要求华盛顿将其空军基地挪到邻近的另一个国家去。默里写道：“美国竭力扔出一个烟幕弹来遮挡自己的仓皇撤离，那就是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权问题迟来的关心。它给我们的感觉是，美国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们最钟爱的一个盟友居然是‘独裁者’。（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萨达姆？）”看起来卡里莫夫更喜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风格，而不是他的西方追求者，不过他也没有将所有的西方追求者都拒之门外：“西方各国的部长中，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这个时尚的德国外长和60年代的激进派，是造访乌兹别克斯坦最多的一个，也是对该国政府评价最高的一个。”^⑮

在卡里莫夫当面给美国政府一记耳光之前，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戴维·沃尔(David Wall)评论，美国被广泛认为可能成为“这个政府的救星”。沃尔这么说的依据一是华盛顿“增加了对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资助”，二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独立观察者说，美国在该国的力量存在十分庞大，以致华盛顿只愿承认其中的一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为乌邻近的哈萨克斯坦能获得

持续的军事援助而放弃了美国的权利，她这么做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尽管国务院承认那会使人权状况“倒退一大步”。华盛顿“将保持‘全面的参与’，不考虑(赖斯)指出的哈萨克斯坦近期出现的一系列衰退现象”。——参与的出发点并不高尚。此刻赖斯又吟诵起了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台词，美国的军援“改善了民主”，人们同样熟悉的是这句台词的不祥的涵义。^⑥

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阿塞拜疆开通了一条能将里海石油送往西方的输油管线，这条管线绕开了俄罗斯和伊朗。在它启用之际，美国能源部长向阿塞拜疆传达了布什总统的高调发言：“随着阿塞拜疆深化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改革，这条输油管线将有助于贵国全面的经济增长，并为贵国建立一个繁荣和公正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也为贵国推进自由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可就在几天以前，《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在阿塞拜疆的反对党无视政府禁令，向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提出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时，警察用警棍镇压了高喊‘自由选举’的示威人群。”阿利耶夫是美国的盟友，在那不久前他刚“赢得了一场十分可疑的选举，从他父亲——一个在前苏联曾经很有权势的人物手中接过了权杖。”土库曼斯坦的情况与此很相近，人权观察组织把这个国家评为“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⑦

《纽约时报》评说道：“在一个存在军事基地，能源供给和强大对手的地区，我们在追求民主理想时需要佐以耐心。”所以华盛顿有必要调和一下它在阿塞拜疆等国推进民主和人权的热情。^⑧

帝国主义强国及其爪牙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我们应当忘记过

去，一往直前：这表现为每隔几年就要重演一次的“改变路线”活动，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把戏。然而如果真想了解这个世界和其中受苦受难的人，你就会发现能从历史里面找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两名学者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一切事情都很重要，因为一国的历史记忆或记忆缺失都会产生不寻常的政治后果。一个国家和社会对其过去的态度会影响到它未来的发展。”我们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当美国只知道一味指责它的对手们健忘时，我们又感到十分担忧。例如，有人讨论俄罗斯的“国家历史记忆”从不涉及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还有人对于日本对其历史罪行认识不够一再表示担心。这种用双重标准看待历史记忆的例子还有很多。⁷⁹

历史上的常胜者，尽管只有本国公民能够责问他们，也应该同那些需要为过去道歉的国家一样妥善保留他们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当一国过去的行为留下的制度根源一直留存至今时，保留记忆对它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你想了解当今世界，你就会留意到英国为自身的利益创造出（一个依赖于它的）伊拉克后的所作所为。你肯定不会忽视英国在伊拉克安插和支持的政府被推翻（1958年）前，它做过些什么事。你同样不会忽视那一年7月英国外交部公开的一个结论：在英国支配下的伊拉克，“权力和财富被集中在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部落酋长手中，他们围绕着宗教审判庭这个核心野蛮而专制地统治着那个社会”。⁸⁰

1958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Abdul Karim Qasim）推翻了被英国操纵的伊拉克政府，首次打破了英美两国对世界主要能

源产地的控制。英美立即双管齐下做出反应,一方面在黎巴嫩和约旦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秘密商议联合出兵伊拉克的计划,以确保民族独立的“流毒”不会感染到其他国家。用侵略者的话说,不管这种“流毒”的根源在哪,都要“冷酷无情地清除它”。它们的计划与1991年伊拉克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①

宗主国的评论家们对卡西姆政权的评价进一步增加了对它的担忧。控制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名官员告诉外交部,卡西姆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同其他阿拉伯民族紧密合作,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他还要“增加并重新分配国家财富……建立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的民主制度。再利用一个强大、民主和属于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去解放和激励其他阿拉伯人和亚非人民,并参加摧毁‘帝国主义’的事业。他所说的帝国主义主要就是指英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干涉”。^②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焦虑的话,那还有一种担心:卡西姆可能会借用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的策略“利用沙特的石油资金提高各国穷困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抱怨道,有一个纳赛尔就够糟了,“现在又冒出一个和希特勒有几分像的酷爱扩张的独裁者”,一个嗜权如命的魔王,其《革命哲学》和《我的奋斗》别无二致。艾森豪威尔总统惊呼卡西姆正在窃取“整个中东阿拉伯人的忠诚和爱戴”,并警告说他正妄图“控制(中东的石油),得到了金钱和权力后去摧毁西方世界”。艾森豪威尔言之凿凿地告诉国会,伊拉克的政变和黎巴嫩、约旦的骚乱“都是纳赛尔在克里姆林宫的指使下煽动起来的”。情报机构的报告中写道:“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包括沙

特和科威特,社会公众总体上都是支持伊拉克政变而敌视英美的干涉,所以革命的火种四处传播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是美国把持的,拥有世界主要石油资源的专制国家也难以幸免,甚至像利比亚(全球另一大石油产地)这样一个当时被美国的傀儡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也是如此。华盛顿还曾轻视过卡西姆可能是“共产主义”的筹码这一想法,不过那也只能是在1961年以前,因为那一年卡西姆决定将跨国石油公司“特许开采区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收回”。此前跨国公司控制着整个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包括已探明的油田和估计储量巨大的未探明油田。^⑧

这个卡西姆政权显然有很大危害,于是美国在1963年将它铲除了。曾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透露:“约翰·肯尼迪任总统时,萨达姆·侯赛因(及复兴党)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篡夺了伊拉克政权”,这一陈述得到了其他消息来源的证实。“在篡权当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告诉肯尼迪,‘几乎可以肯定那对我们有利’。”篡权后常发生的野蛮杀戮在伊拉克也未能避免,遇害者中有“被怀疑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分子的人士”,名单则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1954年的危地马拉和卡西姆政权被颠覆两年后的印尼。莫里斯还说:“复兴党成员在伊拉克有组织地杀害了难以计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大量医生、教师、技师、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还包括许多军政要员。”还有许多罪行我们不必一一细述了,要指出的是这些罪行得到了华盛顿和伦敦等幕后参与者的大力支持,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有

好处。莫里斯在 2003 年英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回顾了这段历史,他敏锐地提出:“如果在伊拉克发动一场新的战争看上去很危险而且结果难以预料,那就等待和平吧。”有学识的分析家们还发出了许多这样的警示,但从来没有被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人听进去过。^④

值得注意的是,对伊拉克民主的恐惧一直到 1990 年萨达姆成了华盛顿的敌人后都未曾改变。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直到战争结束,伊反政府民主人士不仅遭到了华盛顿的打压,甚至连媒体都不支持他们。^⑤

可是,假如我们像往常那样把不愉快的过去扔进记忆深处,把那些很明显的教训当成老黄历抛到脑后,患上让我们感到舒适的“历史健忘症”(敌人得了这种病却要遭到我们的指责)。现在让我们假设华盛顿和伦敦经历了一场神奇的转变,和过去它们常常自称的那些不同,这次是真实的:美国愿意改变自己在伊拉克和别处一贯的作风,帮助(或至少容忍)伊拉克获得一点点独立和主权。可一名理智的观察者也许会觉得,伊朗外长的发言比华盛顿和伦敦发言人嘴里的话更可信。这样伊朗就将与一个多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主权的伊拉克和平共处。当然,我们很难想象华盛顿和伦敦怎会做出这样的事。

接下来让我们估计一下伊拉克可能会采用何种政策。伊拉克人可能对伊朗没有任何好感,但他们也许更愿意同这个强大的邻居搞好关系,而不想有敌对和冲突。他们甚至可能会与其他国家一同努力使伊朗融入这个地区,其实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很久以前,这项事业就

已经开始了。此外,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与伊朗有着紧密的联系。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成功,已经激起了其邻国沙特的那些饱受压迫的什叶派穆斯林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如果伊拉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主权,这种要求只会变得更高。沙特的什叶派穆斯林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已有多年历史。在80年代前期,他们试图推翻有美国撑腰的暴君时遭到了野蛮的镇压。《纽约时报》报道说:“沙特人相信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同伙能在这方面开个好头,因为王族正想方设法压制其亲手扶植的瓦哈比教派*激进分子,他们现在要推翻沙特王族的统治。”报道还说:“唯独在沙特东部什叶派穆斯林才占人口多数,他们期待着在那里赢得有限的政治权力”,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凑巧的是,沙特东部还是其大部分石油资源的埋藏地。^⑥

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可能会诞生一个以什叶派为主导的,包括伊拉克、伊朗和沙特产油区的松散联盟。它控制着世界大部分能源供给,而且独立于华盛顿。这几乎就是华盛顿的终极梦魇,但它还不是最糟的。这种独立的集团有可能会在伊朗的引导下同中国和印度联合开发大型能源项目,甚至还可能与亚洲能源安全网(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和上海合作组织结盟。这个集团也许还会改用自己的的一套货币作为石油的价值单位,改变目前主要依赖美元的现状,这一举措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如果美国控制不了

* 瓦哈比教派(Wahhabi),近代伊斯兰教教派。系反对派根据其创始人瓦哈比(Abd al-wahhāb, 1691—1787)之名对他们的称呼,因其严格遵守《古兰经》而闻名。——译者

伊拉克,还会产生一个附带的问题:没人能保证掌管这个国家石油资源的人还会给美国石油公司以优惠待遇。^⑦

即使是在2005年1月大选后伊拉克政府得到的十分有限的主权,也向人们预示着将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伊拉克国防部长在一次对伊朗的正式访问中,同伊朗国防部长共同宣布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包括两国将进行军事合作及由伊朗帮助伊拉克训练军队和更新武器装备。这一举措显然完全出乎华盛顿的意料,因为它取代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伊拉克国防部长表示:“谁也不能在伊拉克的对外关系问题上指手画脚”,意指美国无须担心伊朗会插手地区事务。同时,爱德华·旺(Edward Wong)报道说,在伊拉克南端靠近伊朗边境的“巴士拉曾是一个毫无拘束的石油港口,如今在什叶派的统治下正一步步变成一个微型的神权王国”。报道中还说:“同伊朗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清晰可见。1979年伊朗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头像在街头和省府中心随处可见。当6月伊朗大选开始时,伊朗政府会在这里开放一个投票站,供伊拉克境内的伊朗移民投票。伊拉克地方长官还急切地讨论向伊朗购买电力的事宜,由于美国提供的帮助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省委员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教士同反对英美占领的萨德尔运动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CIRI的关系都很密切。SCIRI是由流亡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主要什叶派团体,它还控制着萨德尔的武装组织。该组织在伊拉克南部广大地区进行集结和训练,并在该地区活动,同伊朗有着长期紧密的联系。SCIRI的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

姆在访问伊朗归来后赞扬了向伊朗购买电力的提议,并呼吁加强同“伟大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因为“该共和国同伊拉克交往时的态度十分可敬”。^⑧

彼得·加尔布雷思(Peter Galbraith)在文章中写道:“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之一是要给中东带去自由和民主,可这场战争居然促成了另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的诞生。”^⑨入侵别国的目的竟然是“给中东带去自由和民主”,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理解这一主张,它都显得极其可笑,而且愚蠢得让人难以想象。这是目前人们怀疑侵略者这一主张的另一个理由,除了领导人们十分及时的宣言,这一主张还没能被任何东西证明或支持,倒是有数不清的反面证据可以推翻它,其中一些已有了实例。另一个怀疑它的理由是,独立后的伊拉克(如果伊拉克分裂了,那就是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可能会努力恢复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样它就会重新武装自己以应对它在该地区的敌手——以色列,还很可能会发展核威慑力。

由此我们还得相信:当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附庸国)面临严峻的挑战时,当世界一大能源产地被游离于美国控制之外的穆斯林集团接管时,当长期同美国一起抵制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沙特王室被移除时,美国会安静地袖手旁观。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攻击“民主化浪潮”时是在告诉我们,华盛顿会有教养地等候这些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局面出现。也许华盛顿真的会静观其变,但这种几率是微乎其微的。^⑩

鉴于上述事实以及许多其他原因,一名理智的观察者有理由像

伊拉克人民一样,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伊民主化的救星,并给予以下结论充分的重视:多年以来,中东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已是困难重重,现在又出现了一道“终极障碍,就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并不希望那里出现民主,尽管它虚伪地借用了新保守主义的名义”。^⑩

包括这条理由在内的大量事实还说明,将伊拉克同越南相比较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在越南,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只要毁灭了民族独立的“流毒”,并使那个地区都免于“感染”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留给越南人民一副烂摊子让他们去行使主权。但伊拉克与之完全不同,那绝不应是一块被先毁后弃的地方,因为它的价值太高了,所以别说那里有了真正的主权,连一点点民主在美国看来都是危险的,绝不能轻易接受。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算不用布什政府所期望的方式,美国也一定会将伊拉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同样道理,各种“撤离战略”的提议也很不合时宜,^⑪决策者们根本不需要它们,这些简单的策略他们自己就能想出来。不用质疑,等到一个听话的傀儡政府在那里建立起来后,领导人们也会想撤军的,只留下一些军事基地防止未来发生什么变故——这是大多数侵略者都青睐的方案。

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必要记住一些相关的根本原则。首先是占领军没有任何权利,只有责任,他们的首要责任就是按照被占领地人民需要的方式尽快和尽早撤离。他们无权留在被占领土上,除非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他们留下。如果这些原则无人遵守,那些“撤离战略”的提议所反映的不过是帝国的意志,而不是对战争受害人民的关

心。如我们所见,在可知的范围内伊拉克人民的意愿都是强烈要求美国撤军的。此外自伊拉克遭到侵略以来,大部分美国民众都认为在与伊拉克人民携手进行主权的移交,经济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事项中,应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国而不是美国。尽管较少地被侵略者们控制的联合国会员大会比安理会更适合担任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但只要有伊拉克人民的认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占领军当局强加给伊拉克的可耻的经济制度和反工会法律应该被废除,他们强占伊拉克土地的行为应该遭到唾弃。伊拉克的重建应该掌握在伊拉克人民手中,而不应按华盛顿宣称的那些计划变成控制伊拉克的一种手段。^⑨除了对伊援助,修复伊拉克经济社会的费用也应由那些对伊拉克负有责任的霸权主义国家来承担,因为它们不仅以残酷的制裁和军事打击摧毁了伊拉克社会,还在萨达姆的铁蹄践踏这个国家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包括在萨的暴行最猖獗的时期里助纣为虐。承担这些费用是最起码的道德准则的要求。我们在评判美国推进海外民主的行动时,方法之一就是探究一下这些费用的问题解决得如何,或者到底是否有人提起这一问题,遗憾的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清晰的轨迹”

权威学者和“推进民主”最热心的倡导者,应是布什总统“弥赛亚使命”的最有力的见证人。其中,卡内基基金会民主与法治项目的主持者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是最突出的一位。他将

自己的立场定义为新里根主义。英美入侵伊拉克一年后,而且也在“弥赛亚使命”取代了“简单的问题”之后,卡罗瑟斯出书回顾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进海外民主的历史,这本书“随着美国和盟国奋力改变伊拉克的民主状况,目前在新闻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卡罗瑟斯发现有一条“清晰的轨迹”贯穿了冷战后的所有美国政府,包括小布什政府,“当海外的民主十分符合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时,美国就会培育它。而只要民主同其他重要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得降低它的位置,甚至抛弃它”。卡罗瑟斯发现所有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都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共性,即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政策)——其实我们通常称之为“出尔反尔”。^⑨

学术界在80年代对推进拉美民主行动的标准研究成果,又被卡罗瑟斯再次演绎。这一课题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原因在于美国投身于别国民主事业的高尚传统已成为大家谈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传统在里根时期“得到了格外发扬”,而现任政府在里根时期打下的基础上正更加投入地延续这项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卡罗瑟斯是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在叙述,因为他曾参与过里根政府国务院的“民主增进”计划。他表示那些计划是诚挚的,旨在全面推进别国民主制度,只是没有取得成功而已。然而在美国影响力最微弱的地方南美,民主的进步却最大,特别在80年代前期,“当时里根政府正努力扶持那里的即将被推翻的军政府,如果说那时的美国政策有什么不同的话,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反民主潮流的”。而在邻近地区,美国的影响力最强,同时民主进程也最缓慢。卡罗瑟斯对此的解释是,华盛顿的意图在于努

力维持“那些国家的基本秩序,至少在历史上那里都是不民主的社会”,同时华盛顿还要“避免人民党给拉美带去变故,它会危害那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使那里滑向一条左倾的激进路线”。于是里根政府“为延缓发生更为极端变化的趋势,采纳了保护它们民主状况的政策。不可避免的是,美国追求的只能是一种十分有限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变革,这样才不会威胁到它们传统的权力结构,而且当权者都是美国的老盟友”。美国最成功的范例是萨尔瓦多,它现在已成为华盛顿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样本。在那儿,里根政府的目标有两个:“举行一场规则上让人放心的选举,并确保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获胜。”政府“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军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萨尔瓦多。在那里经济界的精英不再掌控国民经济,左派政党被并入其政治体系中,所有的萨尔瓦多人只拥有在形式和实质上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并不是真的有萨尔瓦多民主的观念”。^⑤

就在“民主增进”计划在以这种方式实施的同时,由华盛顿在幕后支持的国家恐怖主义分子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反对者,犯下了骇人的酷刑和其他罪行,清洗了独立媒体。用那些幸存的萨尔瓦多耶稣会会士的话说,他们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使人民大众不得不放低了对未来的期望”,而且他们还浇灭了人们选择“有权势者以外的人”当政的渴望。

从里根主义者偏爱的那些中美洲人物身上,就能看出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其中一个人物是危地马拉最大的杀人犯里奥斯·蒙特(Rioss Montt)。里根却疾呼,这个“全身心投入到民主事业中”的人

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另一位是洪都拉斯武装部队总司令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马丁内斯(Gustavo Álvarez Martínez), 他的历史同现在的美国有着特别的关联, 原因是他曾受到过时任驻洪都拉斯大使, 并管理着世界最大的中情局分站的约翰·内格罗蓬特的保护。人称“代理领事”的内格罗蓬特现负责美国反恐怖部门。国家安全档案馆高级分析员彼得·科恩布卢(Peter Kornbluh)参考了该馆搜集的秘密档案后认为, 内格罗蓬特“是那里的镇压活动实际上的组织指挥者, 这对于一名外交人员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在1983年里根政府国际恐怖活动的官方资金被截断后, 内格罗蓬特的任务有所变化。他被白宫授命去督促和买通洪都拉斯军队的将军们继续支持美国的国际恐怖活动, 所用的资金来自其他渠道, 包括从美国对伊朗军售所得中非法转移的款项。

作为洪都拉斯军队的首领, 阿尔瓦雷斯将军是藏在内格罗蓬特羽翼下的该国最大和最凶残的刽子手和酷刑的主使。然而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调查发现, 就这样一个人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鼎力协助, 哪怕他告诉了卡特政府派驻的外交官杰克·宾斯(Jack Binns)“打算效仿阿根廷的做法, 处决所有涉嫌颠覆政权的犯人”。宾斯的继任者内格罗蓬特为了保证他掌管的国际恐怖活动能继续得到军援, 对洪都拉斯发生的可怕罪行一概否认。《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 “在1983年美国大使馆早已熟知了阿尔瓦雷斯的镇压手段, 可里根政府仍授予他军功章(Legion of Merit), 以‘奖励他为洪都拉斯民主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内格罗蓬特赞扬了阿尔瓦雷斯“为民主做出的贡

献”，用的颂词和里根的一模一样。在洪都拉斯犯下最恐怖恶行的部队是它的精锐3-16营，其组织与训练者就是美国政府和它一直在支持的拉美最凶残的阿根廷新纳粹组织。指挥该营的军官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在编人员，甚至当洪都拉斯政府最终平息了这起罪行并将战犯绳之以法后，里根政府还拒绝法庭的要求，不批准内格罗蓬特出庭作证。^⑤

这些都是我们在了解里根主义者“推进民主”的激情时不该忘记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也值得我们牢记。

简单地讲，那条“清晰的轨迹”可追溯到10年前的里根时期，而且还能继续延伸得更加久远。推进民主一直都被奉为我们的指路明灯，可美国却一再推翻民主政府，还常常在海外安插和扶持野蛮的独裁者，如果把它们排列起来名单将会很长，包括伊朗、危地马拉、巴西、智利等等。这些事实在美国竟然从没引起过争论。冷战时期的侵略借口再也经不起调查了，而我们却找到了一个在当今行之有效的新理由，用卡罗瑟斯的话说就是：民主是好的，但前提是而且只能是它符合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撇开那些蒙蔽人的政治宣传，我们很难驳倒拉美学者查尔斯·伯奎斯特的观点：美国在拉美“并没有推进民主”，相反倒一直在粗野地妨碍拉美人民要求改变不公正和不民主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美国的行为“在其本国和海外都阻挡了（民主）的历史进步”，完全是为“北半球特权阶层的‘安全利益’服务，让那些特权者依靠他们既有的社会地位坐收其利”。严肃的主流学者早已认识到：“美国在促进拉美的议

会民主上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除了“接受一些程序上的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这种早被证明是一场闹剧的民主活动之外，美国真正想要的是完全相反的局面”。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下，人民关心的问题会得到解答，而“美国所关心的从来只有如何为它的私人海外投资营造有利的环境”。因此，“当拉美发生多起右翼军事政变时，（美国）从未真正考虑过进行干涉”。——当然这里可以加一句，除了支持和引发那些政变的干涉。但如果“美国眼中的民主（几乎等于私营或资本家的企业）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的共产主义只是名，民族独立运动才是实。考虑到那个提出美国对外政策框架的组织的性质，我们也不必奢望美国在拉美以外的民主活动有何不同了，也难怪美国今天的政策仍然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⑦

卡罗瑟斯希望民主推进能成长为一门“主要学科”，尽管它的成长步伐相当慢。卡罗瑟斯说：“考虑到美国在20世纪早期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干预后，在那里为建立民主政权而付出的努力，我们认为民主推进已不再是一块处女地了。”^⑧其实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水准的学者，卡罗瑟斯十分清楚美国那些行为的本质。而且海地、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这三个美国干涉的主要目标已经将那一本质暴露无遗。通过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事例，我们都能发现，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因冷战的开始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且美国的军事行动也很少与冷战有何关联，除了利用冷战来制造错觉。因此我们反观整段历史所发现的也不过是卡罗瑟斯阐述的那些有用的原则。

1915年，伍德罗·威尔逊入侵了一个典型的“失败的国家”——

海地,同时派出海军陆战队解散了该国国民议会,用其指挥官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少校的话说,那次行动是真正的“海军陆战队风格”。国民议会被解散的原因是它拒绝通过美国为海地起草的宪法,因为这部法律赋予了美国公司购买海地土地的权利——侵略者觉得这是个“有进步意义”的条款,只可惜海地人不能领会。于是由海军陆战队主持了一次公民投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宪法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绝对多数通过,不过参加那次公投的人只占海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威尔逊派去的侵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抵抗者,还在事实上恢复了奴隶制度,并让这个国家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理论出现 19 年后仍被凶恶的国民卫队统治着。有美国在幕后操纵,海地人民的苦难生活一直延续到了 1990 年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选举的结果让华盛顿警觉起来了,因为一些很少被注意到的底层民间组织让那次选举有可能成为一次真实的民选。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民众仍然推出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人民党牧师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而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马克·巴赞(Marc Bazin),仅得到了百分之十四的选票。出现了这样不光彩的局面后,华盛顿立即采取对策,大幅度增加了对海地的“民主推进”援助,援助的对象是那些反政府并亲工商界的组织,援助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洲自由劳工发展机构(AFL - CIO 的分支机构,因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反工人运动的活动而臭名昭著)等组织来实施。作为一个最关注海地局势的观察家,艾米·威伦茨(Amy Wilentz)在文章中写道,

USAID 制定“民主增进”这个大型计划“是专门资助那些反阿里斯蒂德政府的政治派别的”。其他可供挑选的美国政策也旨在遏制海地民主力量的威胁，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大选结束几个月后，海地就发生了一起军事政变，美洲国家组织为此对它实行禁运。可老布什宣布这项措施对美国公司没有效力，克林顿上台后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同海地的贸易。这两任总统尤其是克林顿还特许德士古石油公司违反总统禁令，向海地军政府及其有钱的支持者们提供石油，这使美洲国家组织对海地的封锁形同虚设。^⑨

海地历经了 3 年国家恐怖的祸害后，克林顿终于准许当年的民选总统回国，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他必须按照 1990 年大选中被击败的那个代表美国利益的候选人提出的计划施政。不出人们所料，那项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施政计划剥夺了海地残存的经济主权，使这个国家陷入动荡和暴乱，再加上布什不怀好意地禁止国际援助流向那里，海地局势更是雪上加霜。2004 年 2 月，在美国主使、法国帮凶下，阿里斯蒂德再次被暗中挟持出境，使海地再次落入那些匪徒手中，包括已被阿里斯蒂德解散的小股军队。9 个月后，迈阿密大学法学院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海地人，特别是贫民阶层正在向不人道的恐怖活动抗争。噩梦与恐惧伴随着那些挣扎求存的穷苦人民，海地的安全及司法部门制造的暴力循环是他们贫困的根源。”^⑩

与此同时，海地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伊曼纽尔·康斯坦特，海地恐怖军事组织 FRAPH 的头目），背负着数千条人命的血债，却安然地生活在纽约。海地民选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引渡这个罪犯，可华盛顿

不是拒绝就是压根不理睬——引人注目的是，就在同时，美国公众却因为塔利班不愿听从华盛顿的指令，交出几名“9·11”事件的（没有证据证明的）疑犯而民愤高涨。通常认为，美国不肯引渡康斯坦特的原因是担心他在审讯时会供出中央情报局同海地恐怖事件的关联。^⑩

被强国的铁蹄践踏了几个世纪后，又一个国家的民主火种就这样被扑灭了，它建立社会正义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过去100年里执行此项任务的华盛顿对这个国家不再有兴趣，只有其宣传机器仍在报道说：海地已被“它自己掀起的风暴摧毁了”，海地人民对这个破败国家的绝望，是1991年阿里斯蒂德当政以来他们对“一个失败的政府的失望态度”。^⑪华盛顿如此致力于推进别国的民主，只是再努力也无法帮助别国克服它们社会的缺陷。

华盛顿对危地马拉民选政府的颠覆“触发了一场长达40年的血腥压迫和恐怖事件，死于这场浩劫的危地马拉人可能多达20万人”，尽管里根政府为了防民保权，取消了例行的解密程序，意欲掩盖那些暴行，可它们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把那场灾难形容为“一桩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⑫美国以冷战为名耽误了危地马拉有望建立民主制度的10年，这个借口就算说得通也是可耻的。其实美国干涉的真正目的在各种内部文件中多有记载，是统治者惧怕危地马拉发展民主，以及当地人民十分欢迎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可能“感染”那个地区。当一份揭露里根时期那些最恶劣的恐怖活动的独立报告，终于被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真相调查委员会提交出来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

的恶行都可以被追究到国家恐怖主义者,这一点自始至终都清晰可见。

对尼加拉瓜实施军事占领的美国制造出了野蛮的国民卫队,使该国人民受到了残酷的压迫。同时对该国实施独裁统治的索摩查家族,直到其最后一名暴君在1979年被国内起义推翻以前,一直都在华盛顿的庇护下。当索摩查彻底扶植不起来后,为保留住他的国民卫队,华盛顿对尼加拉瓜发动了一场一路持续到1990年大选的恐怖主义战争,最终尼加拉瓜选民选择了华盛顿为他们指定的候选人,不过那是在“脑袋被顶着一把枪”的情况下(引自托马斯·沃克的权威史书)。按照人口比例换算,在尼加拉瓜丧生的人数相当于225万美国人,这比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包括内战的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④

在美国于1990年再次控制了尼加拉瓜后,这个国家逐步成为那个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仅比海地略富一点。同时海地还是美国干涉的首要目标,而尼加拉瓜也是紧随其后。仅10年的工夫,很多尼加拉瓜工作人口都移民到别国干一些脏活挣一点养家钱寄回国。他们大部分都去了哥斯达黎加,那是在中美洲还算运转得比较正常的国家(也是惟一没有遭受美国的直接干涉的国家)。据卫生官员在2003年的报告,由于营养不良,尼加拉瓜两岁以下的儿童中有百分之六十都患有贫血,并可能智力发育迟缓。2004年,尼加拉瓜人的营养不良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并且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同时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乡村人口长期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人每天吃的饭不超过一顿,百分

之四十三的人每天吃的饭不超过两顿。医疗保健系统陷入停顿。由于极度贫困使环境遭受的破坏(如砍伐森林等)使尼加拉瓜“配得上人类社会脆弱性的终极试验场这一称号”——这是《新闻报》在2004年的年终回顾中对尼加拉瓜做出的评价。此外,那里百分之六十的少年儿童都辍学了。尼加拉瓜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时间是4.6年,在乡村这一数字则只有2年,而且由于缺乏资源教育质量极其低下。尼加拉瓜得到的国际援助大部分都被用来偿还债务,最后几乎都进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金融机构,这类机构是在80年代华盛顿成功地对尼加拉瓜实施恐怖打击和经济扼杀后蓬勃发展起来的。^⑩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恐怖活动是大获全胜,以致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诞生的所谓“民主政权”比其邻国更乐于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示,《纽约时报》在1990年尼加拉瓜大选后激情洋溢地把此事称为“美式公平竞争的胜利”。以能源产业为例,从这种服从的后果来看,国际金融组织所要求的私有化进程似乎就是造成民众的苦难的根源。尼加拉瓜作为最听话的国家,承受的灾难也最重。该国人民的用电水平比邻国低得多,用电价格则比邻国高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私有化),因为那里发电主要依赖进口石油而没有开发国内能源。(像哥斯达黎加就已基本改用水力发电。)而在1996年尼加拉瓜还没有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号令时,它的电气化水平同危地马拉是同等的,可现在就只有危地马拉的一半多了。其实尼加拉瓜有着大量过剩电力,只是由于无利可图没人愿意给庞大的农村人口供电。这是新自由主义计划造成的一种十分常见也不难

解释的结果。^⑩

在极端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媒体中,评论家们对尼加拉瓜“极力从25年(原文中的数据)的失败改革和经济停滞中恢复时”出现的“长篇反美文章”表示迷惑不解。可能尼加拉瓜人和文明西方人一样,由于丧失理性而有一种挫折感吧。就像如今的伊拉克人,感到“完全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何会无私地付出自己的鲜血和钱财来帮助自己”。^⑪

尼加拉瓜在早年推翻美国撑腰的独裁者后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让一些发展机构和国际组织赞叹不已,可现在这些成果又已化为乌有。其实尼加拉瓜的苦难状况可以通过保守的方法获得很大改善,首先需要美国依照最具权威的国际机构、国际法院和安理会的指令向尼加拉瓜提供补偿。补偿数额要远远超出自美国对尼加拉瓜开展恐怖战争以来就压在该国人民身上的沉重债务,而要将尼加拉瓜由里根炮火下的一片废墟恢复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003年科林·鲍威尔出访尼加拉瓜,以确保这个国家会以适当的方式配合美国的“反恐战”(“9·11”事件后美国再次向恐怖活动宣战)。由于鲍威尔曾在80年代参与指挥美国的第一阶段“反恐战”——专门以尼加拉瓜为目标,因此他是在以自己的经历说话,可没人对此表示谴责。就在鲍威尔到尼加拉瓜传达命令时,美国驻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大使向记者们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回顾,说:“尼加拉瓜在自然和他们自己造成的风暴的冲击下,成为这个半球仅胜过海地的第二号穷国,将来的情况也无望转变。”(这是我着重引用的部分)可

尼加拉瓜人似乎对鲍威尔传达的信息反应有些冷淡,也许那个“带有鄙视口吻的”回顾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大多数尼加拉瓜人对他们国家以外的世界都漠不关心”。^⑩

鲍威尔在拉美其他地方传达信息也遇上了麻烦。在2003年6月的美洲国家组织年度会议上,“鲍威尔先生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强调他所谓的三大祸首:‘独裁者、毒贩、恐怖主义分子’。而与会的另外33国代表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上,他们指出如果经济问题和不公正现象越来越严重,将会威胁到民主本身”。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的军事干涉、恐怖行动和它的经济理论及政策造成的。^⑪

华盛顿再次宣布打响“反恐战”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以伊拉克为例,布什政府驻阿富汗特使认为:“伊拉克人民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无须任何人的提醒”,因为“他们在去年因恐怖活动失去的同胞,比美国历史上所有死于恐怖事件的人还多”。从人民生命上的损失看,“伊拉克每个月,也许每个星期的损失都和美国在‘9·11’事件中的损失相当。不幸的是,伊拉克人不仅会认为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本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同样还可能把这一切归咎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我们能推测出一些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也许是他们认识到本国的恐怖和动乱事件(不出大家的预料)是英美人侵造成的,兰德公司的国际防务与安全政策负责人肯定也是这么看的。^⑫

显然,民主推进这一主要学科想发展成熟,还会遇上一些阻碍。

在抨击民主化的浪潮的学者中,有一些比较细心的会暗示哪儿可能有问题。本章在开头就引用过这类学术文章。乔纳森·蒙顿(Jonathan Monten)对“布什主义根源”的研究在例行性地歌功颂德了一番后,还是指出它并不完全是布什的发明。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民主推进一直都是“美国的政治特征和国家目标的核心”,在“美国界定其政治利益”的方式中也居于中心地位。它还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蒙顿对定义美国例外论所需的这个前提进行了冗长而细致的论述,但避开了任何能证明美国曾推行过该政策的论据,仅提出了大量的宣言。其中有一个脚注解释道,这个有争议的民主推进并不是历史事实,“但美国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历史是例外于别国的,影响着它的对外政策”——准确地讲,受影响的只是美国的政策措词而已。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可以认为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推进民主”是布什主义的灵魂,只是在解释布什主义时我们必须把目光限定在各种文章和讲述上,不能触及“事实”或者是社会状况。

在所引用的文章中,只有卡塔琳娜·德拉库拉(Katarina Delacoura)试图去找一些依据,来使别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制定的确受到了民主推进的指引,她把寻找的范围限定在了小布什当政时期的中东地区。除政策用语外,她还举出了一些实例:布什政府对“经济自由化”的鼓励(在当地意味着由西方公司接管它们的经济);设立一些新电台以“向一些(年轻听众)展示美国文化,好让他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这一点我们无需评论);入侵伊拉克——我们即将谈到这一点,此外她还对一些具体的措施提出了批评,原因是尽管那些措施“宣

布得很隆重”，但它们同以前一些的措施差不多，而且没有得到多少资金支持。她还批评美国的民主推进活动“不连贯”，致使“美国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她格外强调了这一点），其实她说的正是卡罗瑟斯发现的那条“清晰的轨迹”，前后是高度一致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布什当政时采取的那些连贯政策引发了中东国家对美国动机的猜疑，还激发了一项研究，对象是美国的“隐秘计划，例如帮助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或掌握伊拉克的油田，或者概括地说，要扩大美国的霸权”。然而，德拉库拉又（十分常规地）强调，“这只是对美国立场的粗略描述，布什政府是非常重视民主问题的”。这里面惟一缺少的只有证据。

卡罗瑟斯遗憾地预计道，华盛顿的对伊政策将会延长那条清晰的轨迹：也就是他们“在声明的原则和政治现实间可能又会像往常那样自相矛盾”。卡罗瑟斯的书出版时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占领当局虽竭力排除伊拉克民主的威胁，妄图将一部否定选举的宪法强加给伊拉克人民，但最后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计划。有眼光的观察者基本都会同意《金融时报》编辑的观点：“[2005年1月的伊拉克大选]之所以能举行都要归功于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他拒绝了美国领导的占领当局提出的三个暂缓或淡化大选的阴谋。”中东学者艾伦·理查兹说：“美国开始反对过早在伊拉克搞大选，当阿亚图拉西斯塔尼派出大量追随者到街头游行请愿后，美国才无奈地同意了。”《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解释说，西斯塔尼“命令游行队伍传播这样的消息：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坚决要求新政府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而不能把伊拉克交给美国或美国任命的领导管理”。后者正是美国寻求的结

果。老牌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补充道：“只有在形势十分清楚地显示美国承受不了一场什叶派骚乱时，大选才成为美国眼前的目标。”^⑩

英美一发现他们阻碍伊拉克大选的阴谋显然无法得逞，自然就要利用它沽名钓誉。大选很快就变成“美国发起的选举程序”，这使我们想起了被美国阻挠了30年之久的巴以“和平进程”最后成了“由美国引导的中断的巴以和平进程”。^⑪

尽管占领军被迫接受伊拉克大选，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去规避大选的影响。代表美国利益的候选人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lawi)得到了各方面的优惠：美国提供的资源，电视报道的便利以及占领军的支持。可他仅获得了百分之十二的选票位居第三，与前两名的差距十分明显。美国为确保这场选举是“自由”的，还驱逐了该国最重要的独立媒体。令人注意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遭到了那个地区掌权的独裁者的鄙视，因为它是阿拉伯世界追求民主的先锋力量，这使它不适合出现在伊拉克大选的现场。有关该电视台的一些背景事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美国所谓拯救民主使命的本质。

多年以来，美国的高官——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和鲍威尔一直都在强迫卡塔尔封杀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还轰炸了该台设在喀布尔和巴格达的分站（还炸死了一名约旦记者）。卡塔尔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施加的压力“太大”，因此“政府正加紧实施出售该台的计划，尽管布什政府的官员反对这样做，认为在这个地区设立私营电视台没有好处”。^⑫

因此布什的中东民主观又有了一个诠释：任何媒体，不论是公共

的还是私营的,只要不受美国制约都不能容忍。这一举动同样是我们常见的,也不难理解。

华盛顿对半岛电视台的不满源于它在美国攻打费卢杰时“着重于平民伤亡”的报道,以及“充满感情地报道巴勒斯坦的冲突”,这些新闻在民众中引起了共鸣。该台另一个不合新闻业规则的行为是播放“奥萨马·本·拉登的讲话录像”,而这种报道在伊斯兰世界显然具有新闻价值,因为那里的人民对恐怖主义威胁是十分关注的。^⑩

对于莫斯科“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的举动,美国社会既有大肆的嘲讽,也有严肃冷静的关注。此事的背景是俄国在美国广播公司录制了一档车臣领导人的访谈节目后便禁播了该公司的新闻,理由则是车臣领导人“曾下令实施或亲自执行了一些俄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恐怖主义行动”,包括在别斯兰制造的导致 330 人死亡的学校血案。这种区别对待的反应方式十分常见,有时表现得非常出格。遭受了美国猛烈袭击的尼加拉瓜因其新闻审查制度而被痛斥,不过美国特别小心地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尼加拉瓜的主要报社都得到了美国的资助,它们公开叫嚣要超级大国的恐怖主义军队来推翻自己的政府。美国在谴责别国时还掩盖了许多其他事实,如华盛顿的附庸国以色列在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方面的记录是无可比拟的,而它不需要面对什么严重的威胁,美国就更不待说,周围根本就不存在多少威胁的它却有一个可耻的限制新闻自由的记录。华盛顿在一些地区设立的傀儡政权还利用国家恐怖力量清除了所有的独立媒体,并谋杀了这些媒体的编辑和记者或强迫他们流亡,然而这些行径在应为这一切负

主要责任的国家里面却几乎没人注意。^⑭

回顾 2005 年 1 月的伊拉克大选,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就是一次“种族和信仰方面的人口普查”。在那次大选中,什叶派教徒大都选西斯塔尼的什叶派候选人,库尔德人都选库尔德候选人,而逊尼派教徒则联合抵制这次大选。然而,大选还是一次对美国军事占领的成功非暴力反抗。选举当天,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以饱满的热情和巨大的勇气庆祝他们能够“主张自己在这块国土上的合法权力”。^⑮

华盛顿面对的基本问题在它企图扼杀伊拉克的民主时经常被报道出来。在伊拉克大选前夕,两名老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每个伊拉克人都认为占领应该尽快结束。”可这将直接破坏美国的目标,即打造一个“亲美的民主伊拉克政权,使美国未来能在那里建立军事存在,以取代它目前在沙特的军事存在,以便在该地区形成力量平衡”。同美国传统势力范围一样,美国欢迎“民主”,但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按常规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让那些支持美国目标的上层人士进入统治集团。《华尔街日报》记者约奇·德雷曾(Yochi Dreazen)总结了让华盛顿头疼的那个问题:“可能即将成为伊拉克政府首脑的人承诺,周日的大选结束后他只要上任,就会马上要求英美撤军。”就连美国支持的候选人阿拉维也迫不得已暗示他支持撤军。但这一点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因为它要是不能在伊拉克牢固地安插一个傀儡政权,并保证自己在那里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那么对伊拉克的侵略就毫无意义。德雷曾说,所以美国希望且等待在伊拉克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联盟“会接受美国的一个较模糊的撤军承诺,而不去划定一个确定的期

限”。可这一点不容易做到，因为不管伊拉克的领导层想要什么，“他们都很难公开为美军继续留驻辩护”。^⑩

扼杀伊拉克民主的主要目的：一是在于强迫其政治领导层接受那个“模糊的撤军承诺”，二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侵略者强加给伊拉克的非法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标准原则是打着“经济自由化”的旗号开放该国经济和资源，任由外国（主要是英美）来控制。可见无论在伊拉克还是在侵略者本国，弱者的抗争还远未结束。

侵略者们这边是毫不犹豫地公开了他们干扰选举活动的意图，正如他们曾努力避免选举发生一样。布莱尔首相在接受一个长时间访谈时，一开头便表示“托尼·布莱尔说英美决不会列出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下一句：不管他们伊拉克人怎么想。接下来是“布莱尔先生仍对英美是在占领伊拉克这一想法感到愤怒”，可是他肯定清楚这是绝大多数伊拉克人的观点——确切地说，百分之八十一的伊拉克籍阿拉伯人都这么认为。布莱尔强调：“联军驻扎在伊拉克”得到了伊拉克临时政府（由联军设立）的“允许”，而且伊拉克民选政府“更高的法律效力将使联军在伊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华盛顿的观点与此几乎没有两样，只是照例加上了一些美国投身于民主事业的颂词。^⑪

我们无法肯定伊拉克人对此事的确切态度。但在选举当天进行的一次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Zogby International poll）显示，百分之八十二的逊尼派穆斯林和百分之六十九的什叶派穆斯林“希望美军要么立即撤离，要么在民选政府成立后立即撤离”。英美入侵伊拉克

后不久,由西方举办的其他一些民意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有一项最深入的调查是牛津国际问题研究所实施的,它发现在2003年秋季,“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伊拉克人担心占领军真的会离开”。它还发现:“百分之七十九的人不信任英美军队,百分之七十三的人不信任伊拉克联盟临时权力机构,只有百分之八的人表示他们‘十分’相信英美军队。”军事及中东问题专家安德鲁·科德斯曼(Andrew Cordesman)在报告中说,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伊拉克人要求美军在2003年秋季以前撤出,而到了2004年中这一数字就升至百分之八十了。新近选出的议会国家主权委员会发表了一篇报告,“要求制定出一部让英美军队撤军的时间表”,并称它们为“占领军”。伊拉克最大的什叶派穆斯林政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发言人说:“英国军队应当待在军营里,只在伊拉克部队要求时出动。”在伊拉克各派到开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SCIRI中央委员会的一名重要人物阿里·阿达德(Ali al-Adad)博士声明:“伊拉克所有的力量: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都要求外国军队拿出撤离伊拉克的时间表”,并认同这应该是他们政治纲领的“首要主张”。与会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首领也发表了相近的宣言:“要求外国军队按照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重建计划,制定详细的撤离时间表。”宣言还加入了一句:“抵抗侵略是所有国家的合法权利”,只是不能采取恐怖行动。^⑩

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民意调查是在选举结束后完成的,或至少是在选举后才公开的。有两名了解实情的评论家写道:“2004年春季,不欢迎美国的伊拉克人已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从那以后美

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就基本不再调查伊拉克对美国及美军的看法了。”史蒂文·克尔(Steven Kull)是研究大众观点的权威专家,他透露说当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的民意调查“结果对美国在伊拉克的继续存在非常不利”时,它就不再让那些数据流出伊拉克了。可还是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让英国民众知悉了,这项调查是2005年8月伊拉克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受英国国防部的委托进行的,调查结果后被透露给了英国媒体。该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八十二的伊拉克人“强烈反对”英美联军留在伊拉克,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相信联军会改善伊拉克的安全状况,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对他们没有信心,百分之六十七的人感到伊拉克在占领下更不安全。“在伊拉克全国范围内,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认为(袭击占领军)是合法的”,而在英国控制的省份则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这样认为,甚至在什叶派武装居统治地位的巴士拉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持这种观点。如果这项调查真的覆盖了伊拉克全境,那么在占领军活动的阿拉伯人的领域里,这些数字还要高得多。此外伊拉克的重建工作“看上去很失败,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一的伊拉克人很少能有清洁和安全的生活用水,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从未得到充足的电力,百分之七十的人反映排水系统基本不起作用,另外在伊拉克南部百分之四十的人都没有工作”。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在定期调查“伊拉克现状”的过程中报告说,在2005年11月有百分之八十的伊拉克人希望“美军在近期内走人”,这与英国国防部的调查结果相吻合。^⑩

如今在伊拉克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也许已经是非常难了。占领军在那里制造的灾难是如此严重,使得记者们的行动受到的限制比以往其他冲突地区都严得多。我们只能去猜测伊拉克人对野蛮的占领及其引起的后果的态度在上述条件下会如何变化,还有伊拉克人会怎样看待占领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伊拉克人时,在那里挑起的种族和宗教上的冲突。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侵略者们会挖空心思去防范伊拉克获得主权和“民主”后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特别是这种“民主”并不限于英美地盘上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民主。

正像卡罗瑟斯所担心的,伊拉克遭受的灾难又一次显示出那条“清晰的轨迹”。由于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上都有着不寻常的重要性,伊拉克有此遭遇也并不奇怪,只是他们的灾难会达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第五章

确实证据：中东

除了领导人们的声言和自相矛盾的伊拉克战争外，还有一些额外的证据被人列举出来，让人们相信美国是真心拯救别国。这些证据中最重要的是黎巴嫩爆炸事件，埃及的凯法雅运动(Kifaya，意为“够了”），以及巴勒斯坦的局势。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来研究它们。

黎巴嫩爆炸事件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证据，除非中央情报局打算通过刺杀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获得公众好评，那一事件在黎巴嫩国内触发了一场反叙利亚的游行示威，示威活动又使这个国家开始了一场复杂但意义非凡的对外开放。尽管这个事件作为证据一点也不合理，但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美国的证据说在黎首都贝鲁特也许还有一些反响。原因可能是黎巴嫩人还不准备遗忘 1985 年在贝鲁特发生的那次历史上最恐怖的汽车爆炸事件。那次袭击的目标是一名穆斯林教士，可他侥幸逃过了一劫，共有 80 人死于那次灾祸，两百人受伤，他们大多是离开清真寺的妇女和女孩，而炸

弹就安放在出口处。最终那次恐怖袭击被查出有中央情报局和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的背景,而且很清楚有英国提供的帮助。所以,它没有被记入西方的历史。^①

学术界和媒体都认为,1985年是里根“反恐战”期间中东恐怖活动的高峰期。发生在那一年的迄今影响最大的几起恐怖事件有:贝鲁特爆炸事件,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以色列占领的黎巴嫩地区,针对“乡村恐怖主义分子”采取的邪恶的“铁拳行动”,以及以色列轰炸突尼斯事件。据以色列记者阿姆农·卡佩柳克(Amnon Kapeliouk)的现场报道,那次轰炸让75名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丧命,他们的死状极其惨烈。美国协助以色列的方式就是在以色列飞机奔向目标时不通知突尼斯这个盟国,其实美军第六舰队肯定知晓这一情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称赞以色列干得漂亮,但很快联合国安理会就传来了谴责声,几名成员国一致(除了美国弃权)指出以色列的行为是“武装侵略”。那次轰炸的借口是三名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被杀,那一事件显然是叙利亚所为,以色列拿突尼斯当替罪羊一是因为它不设防,二是攻击它不会违背公众意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于是,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被害也被说成了对以色列人的报复活动,因为以色列海军常在公海上袭击塞浦路斯和北部黎巴嫩之间的过往船只,无任何理由地将船上乘员绑回以色列作为人质关押起来。^②

从居于支配地位的单方面标准来看,一项主要的恐怖主义行径,确切地说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却不属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范畴。1985年是

“邪恶的反人类文明者四处传播瘟疫”最猖獗的一年，这一年的特殊性源于两起事件，它们各造成了一名美国公民死亡。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阿基列·劳罗(Achille Lauro)”号游船被劫案，在这起回应突尼斯爆炸事件的行动中，一个名叫利昂·克林霍弗(Leon Klinghoffer)的残疾美国人被残杀。无疑这是一宗令人震惊的犯罪，与它相仿的还有两名残疾巴勒斯坦人凯末尔·祖格海尔和贾迈勒·拉希德被杀案，他们是以军在摧毁杰宁难民营时杀害的。祖格海尔是奋力从以军坦克前逃开时被射杀的，坦克随后把他轧成了肉泥，他死时手中还握着白旗。坐轮椅的拉希德则是和家人在自己的家中被活埋的，以色列用美国提供的推土机推倒他的房子时拉希德一家还在里面。在当今主流的道德标准下，这些行为被某个不恰当的机构排除在了恐怖主义(准确地说是战争罪行)的范围之外。^③

“阿基列·劳罗”号游船被劫案和克林霍弗被害成了巴勒斯坦恐怖活动之野蛮的标志。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博恩(Michael Bohn)对此进行的一项细致的研究具有典型的意义。博恩是白宫局势研究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的主任，因而对此事的了解十分深入。他写出了长达两百页的详细报告，其中关于突尼斯爆炸事件的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是用来说明“中东和平进程的复杂性”的，里面关键性的事实(如前面所讲的)都被省略掉了。^④

可惜的是，那些毫无理性的中东人似乎不懂得透过西方道德与知识的意识棱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甚至可能不会欣赏那些以非凡的力量指引着西方前进的领袖们“纯净的品德”。也许正因如此才有百

分之六十一的黎巴嫩人反对叙利亚的干涉，而反对美国干涉的黎巴嫩人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九。^⑤

在民主问题上，黎巴嫩人的观点同美国的官方意见还存在其他分歧。对真主党的态度就是个例子。真主党在黎巴嫩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2005年6月的大选上它的代表得到了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可是在200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380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真主党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并敦促欧盟“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随后参议院也一致通过了一个类似的决议。中东学者斯蒂芬·朱恩斯于是联系了数十个国会办公室，向他们询问真主党在过去10年进行恐怖活动的例子，但谁也举不出这样的例子。美国国会没有为支持黎巴嫩的民主事业而欢迎真主党转型成一个政党，倒是追随着总统的步伐，为真主党犯的真正错误而继续惩罚它。在1982年以色列以美国为后台入侵黎巴嫩之际，真主党宣告成立并开始驱赶侵略者。可在接下来的22年里以色列都无视安理会的命令，拒不撤离黎巴嫩，并在美国的支持下作恶多端却仍然逍遥法外。诚如朱恩斯所说，“几乎整个美国国会包括以前的自由派民主党人都以这个计划为敌，这个事实又一次令人揪心地提醒着我们，这个国家离正确的理性政治观还有多远。”^⑥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放心地把黎巴嫩排除在恐怖主义的范畴之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埃及，它是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军援对象，因此美国对它的特别关注不光是出于它在那个地区的重要地位。

在埃及国内早已有推动民主事业的力量,过去几年里最活跃的就是凯法雅运动,即人们熟知的“革新运动”,它致力于反对亲美国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凯法雅运动成立于2000年,并于当年挑战了该国的紧急情况法。巴勒斯坦人起义有力地鼓舞了它,它的主要成分也是巴勒斯坦的团结组织。在巴勒斯坦发生阿克萨起义后,以色列采取了行动,但随后它在被占领土上的罪恶行径引发了埃及和别国的强烈反应,尽管这些以西方的标准根本不算什么。在头一个月里,以军为报复向他们投掷石块巴勒斯坦人,用美国的武装直升机袭击了几座公寓楼和其他一些民用目标,打死了75名巴勒斯坦人(同时以色列的死亡人数是4人)。克林顿对此事的表示是同以色列签订了10年里最大的一笔军售合同,向以出口新式军用直升机。而美国民众对此全然不知,原因是媒体拒绝而不是疏于报道此事。照西方通常的观点,这根本不算恐怖主义行为,甚至连错事都不算,但埃及民主活动家们可不这么看。接下来在被占领土上发生的暴行激发了埃及境内的改革运动,不久又有埃及民众抗议伊拉克战争。凯法雅运动的发言人阿卜杜勒-哈基姆·甘迪勒(Abdel-Hakim Qandil)着重指出,那场运动的目标已经超越了埃及的民主进步,成了一次反帝国主义的运动。^①

埃及的民主运动似乎并不适合用来代言美国的“弥赛亚使命”及其影响。这使得巴以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我们马上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存在那条“清晰的轨迹”。伊朗的改革运

动者们已反复警告过美国的强硬立场会助长反民主的顽固势力，滋生一种“谋杀民主”的环境。但在华盛顿眼里，培育民主远不及惩治伊朗重要，原因是他们推翻了那个邪恶的暴君，而这个伊朗王是英美在1953年通过一场政变解散伊朗议会后扶上台的。然而在美国，关于伊朗的历史记忆只有1979年人质危机以后的部分，那之前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伊朗人估计是不会答应的。^③

其实在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世界里，发展民主和保护人权的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屡屡遭到西方帝国的干涉而不断受阻。这些年最活跃的民主化力量可能就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前面提到过，这也许正是华盛顿和阿拉伯的领导人们如此鄙视它的原因。

在另一个领域也存在着一个对中东民主进步起着积极作用的事务，那就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出版的系列《阿拉伯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了“阿拉伯世界的自由，及它与良好治理和人类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引自2004年《阿拉伯发展报告》的中心议题。记者伊恩·威廉斯(Ian Williams)写道，2004年度及之前的《阿拉伯发展报告》促进了“那一地区的探讨和辩论活动，而这些活动是该地区产生积极改变的先决条件”。伊恩还说那部报告的作者“是认真对待阿拉伯的民主，不像布什只拿它当玩笑”。报告并没有掩藏自己的锋芒，直言批评了国内外的许多现象。它谴责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美国对伊拉克的强占及阿拉伯的种种恐怖活动，指出

* 指美国故意隐瞒自己策划政变的罪行。——译者

这些行为已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有害的作用”。它还指责了“压迫民众的阿拉伯专制者，他们的统治使本国的民主事业受到了限制”，以及支持那些专制者的“世界级强国”。报告还强烈反对：“美国滥用或威胁动用其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使该机构难以在中东地区有效建立和平的局势。”^⑨

伊拉克人民对民主和公正的追求可回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宪政运动和选举，然而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到了一战以后又不出意外地被英国的占领阻断了。政治学家阿迪德·达维沙(Adeed Dawisha)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当民主活动被英国认为对自己的利益有害时，英国就会异常敌视它们。”而“美国也丝毫不比英国更乐于看到别国民主的进步”。尽管在英国的铁腕统治之下，伊拉克人民还是建立起了“相对自由和民主的机构和社会生活，如果当代的伊拉克领导人有走民主道路的诚意，那么这些成果会是伊拉克未来民主制度的良好基础”。如前文论及，英美残酷制裁伊拉克所引起的宗教力量得势的局面在它们入侵伊拉克后又进一步恶化，同时还导致了1963年(那年复兴主义者在英美的支持下上了台)以前的非宗教民主进步潮流被逆转。然而，即使伊拉克人民能夺回他们曾取得的民主成果，我们也非常难以相信当今世界的霸主会听任他们的民主选择突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模式：即“自上而下”的统治并由亲美的上层人士掌权——只能是有名无实的民主。想改变这种局面，除非让那些霸权国家受到某种压力，特别是来自它们本国人民的压力。^⑩

以色列—巴勒斯坦

华盛顿在巴勒斯坦的“民主推进”事业相当复杂，需要单独讨论。美国在 2004 年 11 月亚西尔·阿拉法特逝世之前，对巴勒斯坦民主事业的投入十分有限，阿拉法特辞世被美国欣喜地视为实现布什对巴勒斯坦民主国家的“构想”的大好时机。需要指出的是，布什的“构想”只是模糊和简略地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主问题的共识，而美国在此前的 30 年里一直都在阻挠该共识成为现实。《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名为“民主取代巴勒斯坦偶像的希望”的时事分析说明了为什么阿拉法特的死带来了新的希望，该文的开篇句为“后阿拉法特时代将考验美国信念的精华部分：选举赋予各种制度，哪怕是最不稳固的制度以合法性。”下一页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然而，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困境很多。过去布什政府反对在巴勒斯坦举行新的全国大选，是考虑到大选可能会提升阿拉法特先生的形象，使他拥有更大的权力，还可能让哈马斯拥有更多的威望和权力。”^①

简而言之，“美国信念的精华”意思就是：美国是赞成选举的，但前提是它必须合美国的意。美国宣布的“弥赛亚使命”推动了“民主化浪潮”，在其出台 1 年后那条清晰的轨迹再一次浮现出来，同时也暴露了它固有的矛盾：令人费解，所有的行动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言行不一。但这些问题决不能让我们对领导人们表态的真诚有丝毫的怀疑。

在民主推进问题上,布什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同样也信奉美国信念的精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于2005年9月告知联合国,如果哈马斯获准参加巴勒斯坦大选,以色列将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这场选举,因为哈马斯支持暴力。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工党或由沙龙和佩雷斯新成立的前进党参加以色列大选,那哈马斯也应该破坏它们的选举,伊朗也应当阻止美国的大选等等。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报告说,以色列的态度使巴勒斯坦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让(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融入主流政治组织,以脱离暴力”的努力付诸东流。华盛顿也没有丧失其信念精华:“由于担心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会在合法选举中找到立足点,(华盛顿)正敦促阿巴斯要求所有的候选人都谴责暴力和‘不合法及不民主的手段’。”这一条件让美国和以色列都省掉了去操纵巴勒斯坦选举的麻烦。与此同时,沙龙表示以色列将抛弃在“路线图”第一阶段冻结犹太人定居点的承诺,重申“以色列绝不放弃它在西岸地区的定居点,那里住着大量的定居者”,并特别提到“去年布什总统在一封给他的信中承认,在确定以色列与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边界时必须考虑‘人口因素’”。^⑫

阿拉法特在1996年大选中被选为总统,华盛顿本来承认那次选举,但后来又回过头来否定了它的合法性,因为阿拉法特成了华盛顿的敌人。中东问题专家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指出:“阿拉法特是通过全民投票的民主程序选出的总统,却得反复要求再次组织巴勒斯坦选举的权利,还屡遭拒绝,原因就是新的选举中巴勒斯

坦人肯定还是会选他。”布什刚一宣布完接受给阿拉伯世界带去和平的使命,就许可沙龙将一名阿拉伯民选领袖囚禁在拉姆安拉的一所建筑中。同时,布什还把沙龙称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全然不顾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至今一直对平民施加的各种恐怖暴力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略。^⑬

牢牢地控制住了阿拉法特后,布什和沙龙就要求用阿巴斯取代他,因为阿巴斯是巴勒斯坦实现民主的崭新希望。媒体的评价是:“同阿拉法特不一样,阿巴斯的民众支持率不高,因此与他同一年代出生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挑战他的权威。”这一事件再一次见证了美国政府推动民主事业的诚意。^⑭

我们通过调看已有的报纸新闻记录中对阿拉法特之死的报道,就能对美国的民主构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阿拉法特“既是巴勒斯坦人渴望建立一个独立、有生命力的国家的象征,又是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主要障碍”。他永远无法企及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达到的高度,因为萨达特凭着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走进以色列人的内心,解除他们的恐惧,满足他们的希望”,最终“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赢回了西奈地区”(引自以色列前政府官员,政治哲学家什洛莫·阿维纳里的著作)。^⑮

让我们再来看看实际情况:在1971年2月,萨达特就向以色列提出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条约,以换取以军从其占领的领土上撤离,尤其是埃及的西奈半岛。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领导的工党政府拒绝了萨达特的提议,而是宁愿在西奈半岛上继续扩张。当时沙龙

将军指挥的以军正在那里将数千名贝都因人赶进沙漠,拆毁他们的村镇以供犹太人建立自己的亚米特城及集体农场和其他犹太村庄。萨达特提出的协议十分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然而华盛顿为支持以色列竟决定抛弃自己的政策,转而采用基辛格的“坚冰”政策:只用武力,决不谈判。美国和以色列堵死外交途径的做法直接引来了1973年的中东战争,当时的形势对以色列乃至全世界都可谓千钧一发,美国甚至宣布进入核战备。基辛格意识到埃及不好对付,于是同意和谈,最终美以接受了萨达特在1971年给出的条件,双方于1979年签订了《戴维营协定》。在历史上,这个《协定》似乎是美国的一场外交胜利,其实不然,华盛顿当时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一场外交灾难,给别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战争威胁。

萨达特在1971年提出的和平协议根本没有涉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这在当时也没有被国际社会列入议程。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一点有了改变,萨达特坚决要求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利益也得到保护,在美国和以色列排斥这一国际社会共识的时期,萨达特几乎是独自一人在为巴勒斯坦呐喊。因此在美以看来,埃及提出的条件比它们在八年前拒绝的更加苛刻。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接受了萨达特在1971年提出的协议,很多国际冲突就不会发生;要是它们能考虑一下终止战争的可能,巴以也许就能向和平共处迈进。在1967至1974年间担任占领区总指挥的什洛莫·加齐特(Shlomo Gazit)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巴勒斯坦领导人在那几年里提出了在占领区上实施多种形式的地区自治。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同情地将这些提议转达

至政界高层,但不是遭到拒绝就是杳无音信。一心要“在边境变化上有大动作”的以色列决策层毫无达成协议的诚意,而是“决意要打破巴勒斯坦人的幻想,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政治上的作为”。^{①6}

加齐特相信,正是由于70年代前期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工党政府采取了这种排斥和谈的立场,加上多年的国家恐怖行为、定居者的野蛮行径及对巴勒斯坦人珍贵的土地和资源的抢夺,才有了狂热的信仰者集团运动,以及在许多年后的第一次阿拉伯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中东除了可耕地外最珍贵的就是水了,以色列从西岸蓄水层攫取了百分之八十的水,使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整个中东最缺水的人民,也是全世界最缺水的民族之一”。明显假借安全需要修建的“隔离墙”又将这种局面进一步固定了。为继续掠夺和羞辱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打算利用西岸最大的采石场非法运出本国的垃圾,污染问题专家认为此举会剥夺巴勒斯坦人使用那座采石场的权利,还会危及他们余下的水资源。^{①7}

尽管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和外交史,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那里的平民在占领下的生活状态。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简要描述了一下有关情况:

以色列人乐于相信和宣称他们的占领行为是“文明”和“善意”的,本质上不同于世人所见的其他占领活动。可事实截然不同,与其他占领没什么差别,以色列的占领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暴力、压迫、酷刑、恐吓、羞辱、操纵,以及勾结和驯服部分被占领

者等等。确实,被占地区人民这些年来反抗活动较少,相对服从占领者,使以色列可以用一支规模较小的武装力量维持表面上正常的秩序。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包括一些以色列防卫营(IDF),一些军警(从巴勒斯坦人中招收的士兵警察)和100名左右的国内情报机构人员和侦查员。^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完全可以推动一个联合受托管理的巴勒斯坦(处于约旦河这一侧),这个托管国分为两个部分自治的区域,分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其实被政治决策层回绝的巴勒斯坦提议就是朝这个目标推进的积极步骤。联合执政可能会在环境允许时促进两个社会的融合,引致两个民族的共处安排,这在犹太复国主义里有深刻的根源,在那个地区以及更大范围内都是很自然的事。事实上存在许多民族国家的模式,有一些运行得相当成功,常常比那些靠武力和可怕的暴行维持的国家要成功得多。任何熟悉约旦河这一侧情况的人都明白在这一带划的界线都很不管用,尽管这肯定比军事占领要好。在那些年里,有一些两个民族联合建国的公共提议,不过十分有限,在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这种机会就再也不存在了。当时惟一可行的短期方案就是国际社会达成的让两国和平共处的共识,可美国和以色列抵制了这一方案。^⑪

所以,基本的事实很清楚,阿拉法特并不是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要障碍”,美国和以色列才是,它们借助媒体和评论界的作用压制和歪曲事实。如果我们看看70年代中期巴勒斯坦的民族权益得到国际社

会的重视以来的历史,就能更清晰地得到上述结论。美国在 1976 年否决了叙利亚提出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号召在巴以之间划定一条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都认可的边界,该决议还纳入了被各方承认为基本外交文件的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中的关键内容。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又一意孤行地排斥了国际社会在一个类似的外交决议上达成的共识,并帮助以色列继续扩大它的占领区。然而,以色列抢夺别国领土和资源行为的合法地位却没有遭到充分的质疑。希伯来大学国际法教授、著名的以色列法学家戴维·克雷茨默(David Kretzmer)称巴以和解方案的非法性已得到下述机构的确认:“联合国安理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公约》的成员国”,此外还有一些外国政府和学术论文的作者,最近又有联合国国际法院美国籍法官伯根撒尔等确认这一点。^⑩

此后美国仍在封堵平息巴以冲突的外交途径。最近的例子是关于 2002 年 12 月《日内瓦协定》的,该《协定》是和平处理巴以两国关系的一个详细提议,是杰出的巴以非官方谈判专家拟定的。这个协定一如往常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共识,也同样一如往常地被美国和以色列否定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轻描淡写地说:“美国政府显然不在发出支持信的政府当中。”以色列则干脆地拒绝了这一《协定》。^⑪

这在美国的此类外交记录中只是一个小片断而已,这个记录事实清晰,内容翔实且高度一致,从它里面恐怕难得曲解美国的意图。然而这个历史实在有悖于我们领导的正直形象,因此必须把它作为政治上的谬误加以抛弃。对于华盛顿为巴勒斯坦国及其民主做出的

真诚帮助,阿拉法特肯定是一个“主要障碍”。

《纽约时报》的中东问题专家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在阿拉法特死后写的关于他的长篇报告也是这一风格。她在文中写道:“(阿拉法特)在1988年前一直都拒不承认以色列,顽固地对以采取武装斗争和恐怖活动方针。他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与萨达姆交好之后才选择外交途径解决巴以问题。”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历史,阿拉法特在80年代就多次向以色列伸出和谈之手,但以色列方面,尤其是它的鸽派“实用主义者”根本不接受任何谈判,这一立场还有华盛顿撑腰。《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总是在报道中歪曲发生的事实,美国媒体也大都不愿公开在以色列媒体上很常见的报道。^②

本尼·莫里斯与同时期的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米勒特别提到1988年估计是因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是在那一年按照国际社会的共识提出了巴以两国和平共处方案。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它1974年的会议上就曾“隐约提出过”上述方案。一年以后的1989年5月,以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和希蒙·佩雷斯为首的以色列联合政府在其和平计划中再次声明了以政府的态度:首要原则是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不允许存在“另外一个巴勒斯坦国”,因为约旦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了;第二大原则是,对被占领土的处置“将依照(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方针”。以色列的计划在美国又称为“贝克计划”(Baker Plan),它得到了无条件的通过(1989年12月6日)。当时我就曾在文章中这样写:按以色

列的意思别人也能说，“犹太人不应得到‘第二块国土’，原因是他们已经拥有了纽约，在那里有庞大的犹太人口，有犹太人控制的媒体，市长是犹太人，犹太人还是当地文化和经济的主导者。”贝克计划还让美国和以色列选择参加巴以“对话”的巴勒斯坦人，而且前提是这些巴勒斯坦人只能接受以色列的条件——要进一步扩大上述类比的条件。^②

就在华盛顿宣布它再次认可以色列极端的排斥主义的同一天，联合国大会又一次呼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召开一场和平会议。这场会议公开的宗旨是为外交解决（1967年6月以前的）国际边界问题奠定基础，并保证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在公认和稳定的边界内”获得安全，让新巴勒斯坦国“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受联合国的监督，这是和平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问题的投票结果是153比3，投反对票的国家是美国、以色列和多米尼克，伯利兹弃权。这个结果自70年代以来十分常见。^③

事实同米勒的叙述及官方宣传恰恰相反，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华盛顿才愿意考虑谈判，因为它知道已经到了可以单方面讲条件的时候了。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greements）签订后，美国和以色列依然固守排斥主义立场，而那部《协议》压根就没有涉及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按照《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的任务就是在被占领土上充当以色列的警察，以色列总理拉宾把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要阿拉法特能完成任务，不管他是如何腐败、凶狠，如何压制民众，美国和以色列都会称赞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只有在以色列不断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资源时他却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人民

的情况下,阿拉法特才会变成一个阻碍和平的罪魁祸首。在以色列,第一个正式提到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的是极右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政府,该政府允许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留给他们的残存的土地称作“国家”,或叫成“炸鸡”(出自戴维·巴-伊兰之口,巴-伊兰是总理办公厅联络与政策拟定部主任)。1997年5月似乎是以色列工党第一次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而且不排除他们在主要的犹太人定居区域”以外“有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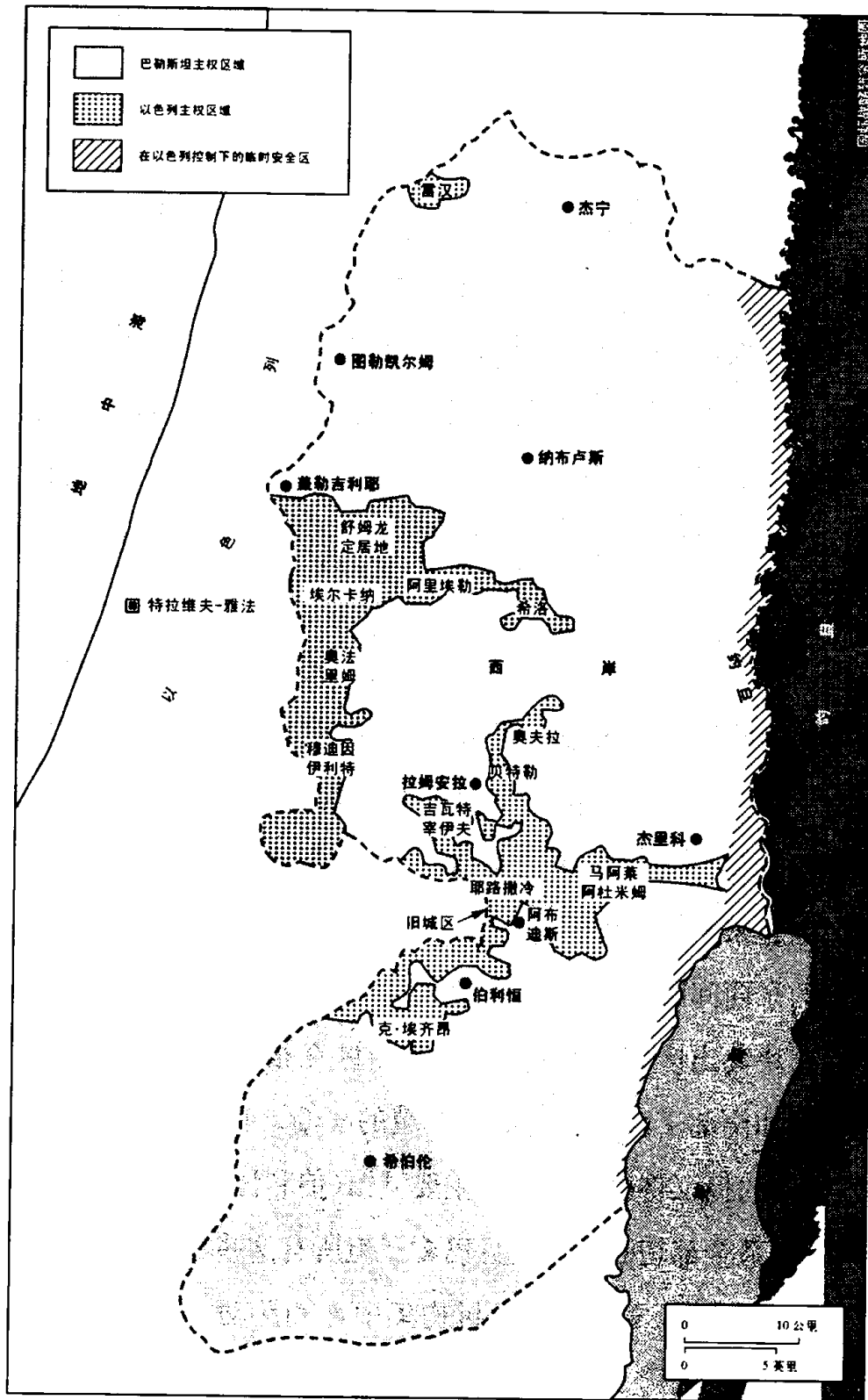
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在1998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概述了以色列鸽派人物的目标,本-阿米在2000年仍是巴拉克派往戴维营的主要谈判代表。他在著作中写道,“奥斯陆和平进程”最终会使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产生对以色列的“永久性新殖民主义从属”,并在形式上表现出一定的自治。以色列仗着美国的全力支持,在整个90年代期间不断增加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人口,并努力将其划入自己的版图。《奥斯陆协议》签订后,犹太人定居点扩张的高峰出现在2000年,那是克林顿和以色列工党主席任职的最后一年。^⑥

米勒的讲述以一个标准结局收场:阿拉法特在2000年的戴维营谈判上,对克林顿和巴拉克慷慨的和平提议“置之不理”,后又拒绝同巴拉克一道接受克林顿在2000年11月提出的“限定因素”,这足以证明他坚持暴力方针,这是个让人痛苦的事实,而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热爱和平的国度又不得不忍耐这一事实。

而事实上,美以在戴维营的提议是任何巴勒斯坦领导人都不能接受的(包括阿巴斯都否决了它们)。只要看一下标明巴勒斯坦局

势的地图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这种地图通过正常渠道即可得到，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却显然看不到。以色列学者罗恩·蓬达克(Ron Pundak)和沙乌尔·阿里埃利(Shaul Arieli)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巴拉克开始的提议使以色列能控制百分之十三的西岸地区，而且在峰会结束前一天以方仍然拥有这一优势，只是巴拉克最终给出的条件将以色列的控制区域缩小到了百分之十二。蓬达克在另一部分分析报告中提供的最有权威的地图显现，美国和以色列给出的条件把巴勒斯坦剩下的西岸领土划分为三个子区域。这三个子区域的界线是以色列控制的两块突出地区，它们从以色列的版图深入到了西岸地区。

其中一块突出地区包含马阿莱阿杜米姆镇，它从以色列将夺走的大耶路撒冷地区穿过杰里科城，一直向东延伸至约旦河边的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区”，将西岸地区分割为两个彼此隔绝的地区。这块突出区还向北一路延伸，将巴勒斯坦在中部子区域的主要城市拉姆安拉包围起来。以色列控制的另一块突出地区在北部，它横贯了西岸一半多的东西间距，伸向未被犹太人定居的地区。阿里埃勒镇和希洛镇都在这块突出区域的东部，这块突出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巴勒斯坦中部和南部子区域与北部子区域的隔断。再加上其他的扩张行动，以色列的提议将巴勒斯坦的主要城镇(伯利恒、拉姆安拉和纳布卢斯)间的联系全部切断了。而且巴勒斯坦所有这些零碎区域都被隔离于它的政治、商业、文化和宗教机构集中地和活动中心：东耶路撒冷的一块狭小地区。^⑦



戴维营谈判破裂后，克林顿在2000年12月提出的限定因素中承认阿拉法特的反对声不无道理，向巴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迈进了一步，这就推翻了米勒一再重复的那个官方版本。2001年1月7日，克林顿在以色列政策论坛上的发言这样描述巴以对他的限定因素的态度：“巴拉克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都已认同限定因素是进一步推进和平路线的基础。另外他们双方都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这又一次攻破了米勒的标准版本。^②

2001年1月底在塔巴(Taba)举行的会议上，巴以双方的高层谈判代表都视克林顿的限定因素为“进一步推进和平路线的基础”，同时都提出了各自的“保留意见”。巴方对这些谈判是有所重视的，这再一次否定了上面的标准版本。尽管双方依然存在分歧，但塔巴谈判是有可能创造和平的。蓬达克和阿里埃利发现，以色列在塔巴谈判上开出的价码仅是戴维营谈判上的一半。他们批评了那些声称以色列在戴维营谈判上已触及其“底限”（即以色列给出了“能想到的最优惠的条件”）的人，提醒他们要看到“以色列提出的前后两张地图的差异：戴维营谈判上的那张吃掉了百分之十三的西岸地区，而塔巴谈判上的那张只并入了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遭到蓬达克和阿里埃利批评的人可能想到了著名的以色列鸽派人物，小说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奥兹告诉他的西方读者，以色列在戴维营谈判上提出了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和平协议，只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这是以色列能给出的最优惠的条件”。奥兹表示，以色列这样做“的代价是在国内引起前所未有的巨大分歧和政局动荡”，然而即便如此巴勒斯坦还是

拒绝了以色列伸出的橄榄枝,坚决要“彻底消灭以色列”。奥兹进一步说,鉴于以色列政府已同意终止占领活动,可巴方仍然拒绝,以色列应该“再次考虑采取”以占领为核心的立场。然而事实与此截然不同,以色列国内十分清楚这一点。^⑨

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1月27日终止了塔巴谈判,这比预定计划要早,且10天后的2月6日就要举行以色列大选。这样一来谈判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在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他们“从未离达成协议如此之近,因而我们都相信剩下的分歧将在以色列大选后谈判恢复时得到解决”。欧盟特使米格尔·莫拉蒂诺斯(Miguel Moratinos)提交的一份详细的报告也有这样乐观的预计,巴以双方都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十分准确,以色列媒体还对其给予了醒目的报导,然而美国却少有人注意到它。当被问及为何要提前四天停止谈判,巴拉克“直截了当地表示”谈判进展无望,他说:“结束谈判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迟早要结束。”巴拉克告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龙·布雷格曼(Ahron Bregman),他决定否决克林顿的限定条件后立即就通知了克林顿,而且他“在大选之前不打算签订任何协议”。^⑩

另一方面,巴以间的非官方谈判却在继续,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具体的就是《日内瓦协定》,但它在2002年12月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承认和美国的排斥。

蓬达克总结了上述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后认为,在戴维营谈判以前巴以双方都未能履行各自的义务,“但以色列的违约行为不仅数

量更多,而且性质更加恶劣”,即使不考虑双方力量悬殊这一因素也是如此。在1996至1999年内塔尼亚胡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暴力事件本来是很容易失控的,可巴勒斯坦领导层竭力控制住了局面”,然而“内塔尼亚胡却在那毫无顾忌地妨害和平进程”。1999年巴拉克的当选本给中东和平带来了一丝希望,但随后他的一些举动又让这点希望荡然无存,首先是他拒绝向大耶路撒冷地区周边的巴勒斯坦村庄移交权力,甚至在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了移交后仍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发生在居民区的一些事件:袭扰事件不断增加,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治,贫穷,缺水,犹太人不断定居而巴勒斯坦却被限制在“班图斯坦*一般的聚居地中”,还有军队及权力机构对定居者一些恶行的支持等。在戴维营谈判上,巴勒斯坦领导层和大多数公众都愿意做一些“必要的让步”,但还需要看到占领者与被占领者间的关系发生改变的迹象,可巴拉克并没有让他们看到这一点。蓬达克否定了——一个被四处流播的传言(西岸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五都被拱手让人等等),说那是“企图篡改历史”。

戴维营谈判的破裂引起了民间骚乱,在那期间蓬达克在他的论著里写道:“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并未改变他们自1993年来一直奉行的根本立场:沿1967年确立的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和平解决巴以两国争端,以及务实地处理难民问题。”塔巴谈判则使领土问题接近于最终的解决,这个问题是“达成任何协议的主要基础”。

* 南非白人政权时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划定的黑人居住地。——译者

难民问题常常被蓄意用来指责巴勒斯坦态度强硬导致了和谈努力失败,而在蓬达克的笔下,巴勒斯坦代表参加戴维营谈判时在此问题上“谦和而务实”,并且在后来也一直如此。塔巴谈判形成的协议草案“十分明确地强调,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特征决不能因这份协议的履行而有所改变”。在论著的结尾,蓬达克的结论是尽管双方都有过错,但内塔尼亚胡缺乏诚意和巴拉克治理不善是“阻碍塔巴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两大因素”。巴勒斯坦人自然会对这一事实心怀憎恶,但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背景下,更要紧的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的最博学的观察家会如何解读这一事实。^⑩

米勒的叙述主要立足于一部广受赞誉的书,它的作者是克林顿的中东特使及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正像每个严肃的评论家都必须留意的,只要来自这种背景的论述都非常值得怀疑。浅析一下罗斯的大作就能发现它的价值非常有限,里面800多页的内容大多是歌颂克林顿(和他自己)对和平事业的贡献,而依据几乎全是从他声称的非正式谈话中“引用”的只言片语。对于路人皆知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几乎一字未提,即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这些在签订《奥斯陆协议》的时期一直都有美国的支持,2000年是这些活动最疯狂的一年。罗斯在他的书中指出,阿拉法特是整个事件的祸首,他在戴维营谈判上拒绝了美国和以色列提出的慷慨的和平提议,还否决了克林顿的限定条件,让巴拉克独自接受了那些条件——看看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就知道这些都是谎言。罗斯处理塔巴谈判的方式很简单:让他的书在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夏

然而止(这种手法还让他省去了克林顿评估巴以双方对其限定条件的反应的内容,前面刚讲到)。如此他还让书中的主要结论免于被轻易驳倒。很明显,除了让我们了解到整个事件还有个参与者之外,这本书实在乏善可陈。正像中东学者杰罗姆·斯莱特(Jerome Slater)所写的那样:“从书末尾的分析来看,罗斯的陈述不过是对以色列、克林顿政府以及他自己作出恰当却没有说服力的简评。”^②

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十分重要但被人们忽视的证据。以色列高层情报官员的最终评价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官员里有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阿莫斯·马尔卡(Amos Malka),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领导人阿米·阿亚隆(Ami Ayalon),辛贝特首脑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特别顾问马蒂·斯坦伯格(Matti Steinberg),负责研究巴勒斯坦政治环境的研究部官员埃弗拉伊·拉维(Ephraim Lavie)。马尔卡这样讲述他们的共识:“我们的推论是,阿拉法特更愿意走外交解决争端的道路,而且他会尽一切努力将这一方针推行下去。只有在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他才会诉诸武力,即使使用武力他的目的还是调动国际社会的压力,以便把外交道路继续走下去。”这几乎与蓬达克的结论相同。^③

除了米勒外,本尼·莫里斯在《时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对阿拉法特之死的评论。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展露了全文的基调:阿拉法特是个骗子,嘴里说着和平和结束占领,心里却想着“夺回巴勒斯坦”,这暴露出了他无可救药的野心。莫里斯的这番话显露出的不仅是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极端蔑视,还有他对美国读者的不屑。看来莫里斯是觉得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从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中偷用了一个恐怖的词：犹太复国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核心原则——“夺回我们的土地”。这条原则的外在表现是莫里斯所说的犹太复国运动开始以来的中心计划：把当地人“迁移”（也就是驱逐）到别处去，让两千年后回到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夺回他们的土地”。^④

莫里斯在人们眼中是一位研究阿以冲突的学者作家，尤其着重研究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根源。这一点没错，他对以色列档案资料的研究是最广泛的，也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他还相当具体地描述了以色列在 1948 到 1949 年间的野蛮行径：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迁移”走，并在他们的家园上建立了以色列，同时还侵占了美国为巴勒斯坦人建国准备的部分土地，并与其约旦盟友（双方的结盟是心照不宣的）对半瓜分了这些土地。用莫里斯自己的话说：“让我来复述一遍，总的来说造成难民问题的原因是犹太武装的袭击和当地人对这种袭击的恐惧。犹太军队攻打了阿拉伯村镇，用驱逐、恶行及制造相关的谣言等手段引起当地人的恐慌，此外还有一个恐怖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内阁在 1948 年 6 月做出的禁止难民回家的残酷决定。”那个决定挤垮了“巴勒斯坦难民，使约 70 万人遭到流放，15 万人生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莫里斯批评了以色列政府这种针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确切地说是“种族纯化”）政策，理由之一是它还不够彻底。他觉得戴维·本-古里安总理犯了一个巨大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把整个国家——也就是约旦河范围内的以色列所有的土地都清洗一遍”。^⑤

莫里斯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在以色列遭到了猛烈抨击，这是以色列值得赞扬的地方。然而在美国，他却因其在斥责敌人时的言论而被视为一个不错的评论家。^⑤

可以肯定，巴勒斯坦人是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和谈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但以色列人自己同样也不好受，甚至在他们没有遭到被占领者的任何报复（这很难得）的那几十年里也不例外。巴勒斯坦人默默地承受了入侵者多年的践踏和酷刑，忍看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自己的土地和资源被掠夺；可另一方面，以色列在1971年仗着美国撑腰拒绝和平解决方案的行为也给它自己带去了许多磨难，并险些把国家拖入灾难中。四名辛贝特的前任首脑都呼吁以色列放弃大部分定居点，使巴以实现和解，并警告以色列自1971年以来一直拒不采用政治解决冲突的做法正在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他们中的亚伯拉罕·沙洛姆（Avraham Shalom）表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面前“表现得有失体面”。东正教学者与科学家耶沙亚胡·莱博维茨（Yeshayahu Leibowitz）很早就开始反对以色列占领巴领土，他因一条预言而闻名：压迫别的民族会使压迫者自身道德沦丧，腐化堕落及引起本国衰败。目前他的这一论断已被以色列主流社会接纳。以色列权威法制分析家摩西·内格比（Moshe Negbi）哀叹以色列已呈现出“香蕉共和国”^{*}的特征。除了政局中愈演愈烈的领导层腐败现象，

* 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指经济仅依靠出口诸如香蕉等单一农作物或单一工业产品，且受外资控制的拉丁美洲小国。——译者

内格比还极尽辛辣地讽刺了以色列的法院。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以色列法院竟然可以对一个将人犯折磨致死的刑讯逼供者和一个被控谋杀一名阿拉伯儿童的犹太人仅判6个月徒刑，而且还能容忍“秘密监狱”和无数其他罪行的存在。以色列的“秘密监狱”如同新纳粹当道的阿根廷的监狱，犯人在里面会莫名地“消失”，上面这些罪恶在内格比眼中是毁坏以色列民主和法治的祸害，因为它们放纵了“信奉种族主义的宗教激进主义的右派分子”。^⑩

以色列从占领巴领土初期开始就纵容定居者在被占领土上的恶行，外事记者阿基瓦·埃尔达(Akiva Eldar)和历史学家伊迪特·扎特尔(Idit Zartel)严厉地控诉了以色列政府的这种行为，同时指出被占领土上的“封建领主”式的“丑恶和种族主义”的状况，不仅“践踏了巴勒斯坦最基本的人权”，还“瓦解了以色列的基本民主制度”。军事与政治分析家鲁文·佩达佐写道：“埃尔达和扎特尔写的书不只是让人愤慨，还使所有关心以色列民主的形象、命运和未来的人都感到哀伤。”埃尔达和扎特尔强调道：“犹太人定居点是不可能独自发展的，它要依靠各类政治机构给予的大量协助，要靠法庭的授权，还要依靠定居者同军事指挥官间的同情关系和一致目标。”遍观各界以色列政府，从1967年的艾希科尔(Eshkol)工党政府到拉宾和佩雷斯乃至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免去”扩张定居点及破坏人权和以色列民主的罪名。^⑪

埃尔达和扎特尔还着重论述了“司法机构造成的特别严重的危害”。他们列举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种族歧视性审判，其中有对残忍杀害阿拉伯儿童的凶手处刑畸轻的，甚至还有以“如果没有设身处地为

领导着想,就不能对他妄加评判”这样的谚语为由拒不给犹太犯人定罪量刑的。埃尔达和扎特尔在书中写着,这样的做法已经“把以色列的整个法制根基都毁了”。佩达佐另又表示,“只有知晓这些背景”,人们才可能理解占领当局的官员普利亚·阿尔贝克(Pliya Albek)的一个离奇决定:一名巴勒斯坦人的妻子被边境警察打死了,他向阿尔贝克请求得到赔偿,然而阿尔贝克在法庭的支持下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竟然是:“他是他妻子之死的受益者,因为他从此不必再养活自己的妻子了,所以他不会有任何损失。”本尼·莫里斯在书中说:“军事法庭在最高法院的指使下,在被占领土上的所作所为必将在以色列的司法史上抹下一个黑点。”^⑨

同时,埃尔达和扎特尔也写下了他们的观点:“生活在绿线(即国际边界)以内的以色列人占该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日子很安宁。但与此同时,边界以外的定居点(在被占领土上)一方面赢得了以色列国的疆土,另一方面也在毁灭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以色列人能平静地生活的原因不难揣摩,以色列记者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解答了这一谜题,她已在被占地区生活和报道了多年。她说:“每个以色列人内心都想成为一个定居者”,至少那些有点特权的都是如此。“在西岸定居已成为许多以色列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由于有政府补贴,定居者能享用他们在以色列境内买不起的好房子。随着以色列逐步采纳其保护国(即美国)的某些最糟糕的政策,“境外定居是在一个福利越来越差的国家生活的一条出路”。此外,定居还保障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资源的控

制,这样“我们犹太人就可以奢侈地生活,就仿佛我们脚下的土地有着充足的水资源一般”,其实巴勒斯坦人连饮用水都缺。犹太人还能使用现代化的公路,可它们“就建在从巴勒斯坦人手中偷来的土地上,受益于它们的不只是定居者,还有许多(其他以色列人),这些人正在形成便捷、高效和省时的中产阶级意识”。“得益于定居点的兴旺发展”,众多商家又得到了一个新财源:由于持续存在安全忧患,定居点“不能没有保安业的发展”。这样就难怪公众“不在乎定居点会给这个地区的未来造成何种影响”。由于当代人根本“看不到”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压迫和他们的社会受到的冲击,至于将来的事就由别人去操心吧。^④

哈斯在报道中写道:“走在许多年来一直都靠近巴勒斯坦区域的加沙公路上,你会看到以色列留下的满目疮痍的景象。”其中有这样的语言:

这种景象再多的词语和图片都无法描述,原因不在于那些词汇和照片没有力度,而是以色列人对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的本事。他们感觉不到以色列的人民军队把多少葡萄园、树林、果园和良田变成了沙漠,把多少绿色染黄涂灰,他们似乎看不见眼前的黄沙、荒地、荆棘和杂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定居者的安全……以色列国防军(Israeli Defense Forces)花了五年时间拔除了加沙的绿肺,废弃了那里最美的地区并断了数万户家庭的生计。以色列人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使政治家们无法对现状形成

正确的认识,还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继续毁坏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像(隔离)带沿线、定居点周围和约旦河谷这些地区。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进一步制造既成事实以及确保将来的巴勒斯坦实体尽可能多地分裂和尽可能少地拥有土地。^④

1971年以色列政府选择扩张放弃安全的决策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1973年并直接导致了当年的中东战争。以色列选择追随美国,从而拒绝了和平,一名以色列权威政治评论家在谈及美以关系时说,对以色列而言美国是一个“被称作‘伙伴’的老板”。只要按美国的需要行事,以色列就能得到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以建设一个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同时攫取被占领土中有价值的部分。可老板一旦做出了规定,以色列就得照办,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2005年就发生了美国责令以色列停止对华出售先进军事技术的事件。以色列还曾试图规避或少执行美国的禁令,但都没有成功。美国为使以色列屈服动用了制裁手段,五角大楼官员甚至拒绝同以色列国防官员会面,还要求以色列国防部长沙乌尔·莫法兹(Shaul Mofaz)取消了对华盛顿的访问。这样,美以的“战略对话”实际上就终止了。美国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首先是命令以色列议会立法加强对军售的监控,其次指令以色列政府签署一份官方谅解备忘录,最后还要求以色列政府和莫法兹本人向美国出具一份书面道歉。以色列一名优秀军事记者宰伊夫·希夫(Ze'ev Schiff)在一篇报道中

说：“在以色列被迫举起白旗并接受了美国大部分要求后，美国又下达了一些更严厉的命令，而且据说对以色列派去的代表团十分怠慢。”^④

这些都是对以色列的迎头痛击，除了受到直接的羞辱，在以色列这个高技术出口型国家里，军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既然老板发了话，以色列也没有其他选择，它清楚这时不能指望到美国进行游说，因为游说者也不敢在这种重要事项上去挑战国家权力。走依靠美国扩张的道路已经毒害了以色列的社会机体，由于早已抛弃更有益的选择，以色列必须在这个风云难测的国际格局中承担不可预计的风险。

布什总统一面设想着自己要在中东创造的民主和正义的景象，一面又马不停蹄地“践踏巴勒斯坦最起码的人权和瓦解以色列最基本的民主制度”。美国否决安理会有关以色列的决议的记录又是一个明证。小布什作了7次这样的否决，这等于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总统的否决次数的总和（不过他还没有打破里根的记录：19次否决）。下面就是被他否决的安理会决议：要求被占地区的联合国观察部队制止暴力活动的决议；谴责所有的恐怖和暴力行为并设立监督机构的决议；关注以色列杀害联合国雇员和破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仓库的行为的决议；重申驱逐活动的非法性的决议；关注贯穿西岸被占地区的隔离墙的决议；谴责2004年3月的刺杀四肢瘫痪的教士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同时还炸死了他身边的好几人）的行为的决议；以及谴责以军入侵加沙地带打死许多平民和毁坏大量财产的行为的决议。^⑤

随着布什正式承认以色列保留西岸定居点的权利和为以色列继续向西岸扩张提供必要的帮助,美国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支持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有对修建隔离墙的支持,立起这种墙的用意在于把西岸地区富裕的犹太人居住的郊区并入以色列的版图。一起被划入以色列的还有当地最肥沃的土地和主要水源,留给“巴勒斯坦国”的土地都是零碎和贫瘠的。梅龙·本韦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写道,隔离墙囊括了所有的犹太定居点社区,在西岸制造出了“三个子区域:第一个是杰宁—纳布卢斯区;第二个是伯利恒—希伯伦区;第三个是拉姆安拉区”。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勒斯坦的城镇和村庄几乎完全被隔离墙包围了,使居民和他们的土地被隔开,根据奥斯曼法律(Ottoman laws),这样的土地经过一定期限后就会成为“国有土地”。以色列是想借这部刚被恢复效力的法律为其窃取土地的行为蒙上一层合法的面纱。以色列边境的盖勒吉利耶镇周围的隔离墙增加了它的财政负担和安全隐患,而那座城镇也濒临消亡,这正符合以色列极端恶意行为的目的。^④

其他的巴勒斯坦城镇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以色列人权组织 B'Tselem 对许多例子展开了调查。现仅举其中一例,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安全”理由的情况下,在它非法并入的大耶路撒冷地区周围建起了隔离墙(事实上它反而增加了犹太人的危险,因为它把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区域也划入了自己的边界内),这堵墙“将彻底隔绝”位于耶路撒冷市以东并同东耶路撒冷的邻近地区相连的谢赫萨阿德村,那里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就业、中等教育、食品和各类生活用

品等”都依赖于东耶路撒冷。由于地处一片悬崖,只有一条道路能进出那个村庄,而有了隔离墙后那条路就被以色列国防军封锁了。理论上说,村民可以向以军提交申请,获准后即可通行,但实际上申请很少得到准许,他们要想进入耶路撒冷就只有通过非法的途径了。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这里的隔离措施是有意折磨当地居民,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是继续像囚犯一样生活下去,还是放弃自己的家园另谋出路”。熟悉犹太复国史的人能看出,这种手段同 20 世纪 20 年代时以色列“一德南一德南”^{*} 不知不觉地蚕食巴勒斯坦土地的手法如出一辙。如果把视野放得宽一些,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 70 年代向以色列工党内阁提出的建议也属这种手法:我们必须告知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我们的行动没有了结的时候,你们会像狗一样生活下去,想离去的人请自便,我们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这得一步一步地来,要低调,这样将来我们的辩护人到时就能否认这一切了。^④

修建隔离墙的根本逻辑同克林顿与巴拉克在戴维营谈判上的提议一样,只是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2005 年 10 月,《国土报》公布了“将西岸分割为若干‘块’”的蓝图。根据这张图,西岸的北端突出区域(以色列控制的区域)将像南端突出区域(马阿莱阿杜米姆)一样一直延伸到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谷。延伸的目的在于“把西岸北部(包括纳布卢斯和杰宁)同其中部地区断开”,并隔断巴勒斯坦的交通线,

^{*} 德南(dunam),土耳其等国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大小不一,但常小于 1 英亩。——译者

这是“在西岸制造出三个相互分离的区域的大战略”的一部分。几周以后沙龙告诉记者,以色列“准备控制西岸被占地区的约旦河谷,以宣示其无论未来签订何种和平协议都不会放弃定居点的决心”。照这种发展态势,西岸的三个子区域都将处于以色列的包围之中。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摧毁残存的巴勒斯坦社会的另一道工具。中东和平基金会(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对被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权威性的评论,该评论指出以色列自1970年以来一直都精心设计和扩大它在西岸的公路系统,目的是“巩固以色列对西岸一半左右的领土的永久性占领,以及它对自己在1967年6月的战争中夺得的土地的战略控制”。这一阴谋意在“杜绝巴勒斯坦人使用穿越耶路撒冷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使他们的通行权只限于一条由伯利恒通往北部的破旧公路上(在那条路上行驶的经历让人难忘,因为你时刻要担心自己会掉进路旁的干涸河床里去)。而这个阴谋还将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资助。^⑥

既然华盛顿点了头,以色列就开始得寸进尺。克里斯·麦格里尔(Chris McGreal)从以色列的《Ma'ariv》日报上摘取了这样的新闻:“政府在本周早些时候默许了军方全面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西岸地区属于以色列的公路的计划。”该报还报道说:“该计划的目的是在未来一两年内逐步实现两个民族的完全隔离。眼下的第一步是将被占领土上的公路分为以色列人专用道路和巴勒斯坦专用道路两种。”而计划的长远目标是“使隔离墙内的以色列地盘彻底成为巴勒斯坦人涉足的禁区”——也就是说被占领土最终将被划入以色列的版图。麦格里

尔还说,以色列人的专用道路将是高质量的交通干线,“而巴勒斯坦人的只会是次等公路,比土路和未完工的道路略强一点”。^④

以色列记者吉迪恩·利维(Gideon Levy)从被占领土上发出的报道实属难得的高品质新闻,对细节的描述非常生动。比如,“每次前往西岸都如同身处梦魇之中,紧张和屈辱会时刻伴随着你”。他还在报道中说,当没有以色列定居者出行时,

西岸大部分的道路都是空荡荡的,既没有人也没有车……像是闹过鬼……睁大眼睛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在路旁有为巴勒斯坦特设的行车道:穿过梯田蜿蜒上山的小路和牲口走的土路,上面颠簸着载有病人、临产的孕妇、小学生和普通市民的汽车。这些乘客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司机,只为能花上两三个小时去一趟邻近的村庄。

用安全当借口是不值一驳的,利维在报道中表示:“如果恐怖主义分子想去以色列,他会想方设法钻进去的,很多巴勒斯坦人就不经许可进入了以色列。让巴勒斯坦人交通不便无益于减少恐怖活动,相反迫使他们花上几个小时往返希伯伦与伯利恒之间只会诱发更多的恐怖事件。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回应’或‘惩罚’袭击事件,那么当恐怖主义分子埃登·纳坦-扎达(Eden Natan-Zada)从 Tapuah(西岸的一个犹太定居点)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Shafaram 袭击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后,为什么不限制 Tapuah 的定居者的行动自由呢?”事实上纳坦-扎达的确杀害了不少巴勒斯坦人。^⑤

一些支持以色列扩张的人称巴勒斯坦各地仍能保持“联通”，因为他们能设法建起自己的交通网。只要熟悉当地的情况和以色列的计划，就很清楚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如果有下面这样一个提议，问问以色列的辩护人将怎样应对它就明白了：即让以色列（以色列当地的一半的人口占据了约旦这一侧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八）像巴勒斯坦那样（只拥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承受一个相同的计划。这个提议很公平，一般来说用它作测试得出的结果是相当有启发性的。

根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在 2004 年迁往被占领土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增加了百分之六，此外东耶路撒冷地区已有 20 万犹太人定居。以色列仍在执行它的 E-1 发展计划，旨在把西岸的马阿莱阿杜米姆镇同耶路撒冷连接起来，这个计划不时因被调查而推迟，但从未被放弃。现在 E-1 计划被归咎到了沙龙头上，还有人声称“美国官员多年来一直都反对这个计划”。事实上，在以色列鸽派政客的眼中，E-1 计划和马阿莱阿杜米姆镇的发展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美国也向这两个计划的实施伸出了援手。两个计划的目的是有效分割西岸地区，并进一步把巴勒斯坦人与他们在东耶路撒冷仍拥有的一切隔离开。^④

2005 年，沙龙和布什对被占领土政策的核心被包装成“脱离计划”，这个误导性很强的名字给人们带去了一些虚假的和平希望。诚然，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都希望以色列在加沙的非法定居点被移走，因为由以军主力保护着的几千名犹太定居者在那里占据了大量土地和珍惜资源，使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

美国和以色列更合理的表述是把加沙“变成世界上最大最拥挤的监狱”，那里与外界的一切水陆交通都会被切断，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在那里艰难度日，自生自灭。^④

对于撤离加沙计划的扩张性本质，以色列几乎不加隐藏。在那个计划被公开后，时任财政部长的内塔尼亚胡立即就宣布：“以色列将在撤离加沙地带时向西岸定居点投入数千万美元资金。”就在这个计划被政府批准时，沙龙与国防部长沙乌尔·莫法兹“会面商讨另一事宜：支撑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区，因为根据最终的协议它们将被划入以色列”。沙龙还批准在马阿莱阿杜米姆镇新建 550 套公寓住宅，并告诉其内阁尽管以色列向康多莉扎·赖斯做出过保证（点点头的默示保证），但这些建设项目不会遇到“政治问题”。布什的中东问题顾问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使以色列人了解到，美国关心的不是这些项目本身，而是“媒体对它的曝光”，所以项目可以进行，只要“默默无闻”地进行即可。艾布拉姆斯担当这个顾问的资历，来自他在华盛顿对尼加拉瓜的恐怖袭击事件上对国会说谎的功绩，他的谎言是布什掩盖“伊朗门事件”的招数之一，当他因此被指控时得到了布什的总统特赦。沙龙还批准了“‘对国家土地的宣布占有’，那是新建定居点的第一步”。新定居点都在隔离墙以内，拟建在马阿莱阿杜米姆镇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地段和埃弗拉特定居点附近，后者还将向北扩张。政治评论家阿卢夫·本（Aluf Benn）在文章里写道：“脱离计划的提出和新建定居点的批准在时间上相当接近，这决不是巧合。自沙龙（在 2003 年 12 月）提出脱离计划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确了从加沙地带的北撒马利

亚(具体说是西岸北部的偏远村落)撤军只是三角形的一边,另外两边分别是完成西岸地区的隔离墙和‘更紧密地控制’犹太定居区。”^①

以色列的“脱离计划”显然排除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参与,纯属单边计划,它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图谋。该计划称:“在西岸地区对未来以色列永久性地位的显现,就是要有一些地区属于以色列的国土,其中有大型以色列人居住中心,主要城市、村镇、安全区域和其他对以色列有特殊意义的地区。”至于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就如同国际法一样无关紧要。哈佛大学中东问题学者萨拉·罗伊(Sara Roy)是研究占领问题的权威学术专家之一,他在专著中写道:“以色列是借脱离之名确立其占领地位。加沙地带的居民将生活在周围的电网圈内,而随着西岸人民的土地被犹太定居点无情地肢解,他们仍将在墙与墙之间和隔离物后面的零碎的空间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只要美国继续帮助以色列在西岸地区抢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状况就几乎难以避免。^②

媒体对脱离行动的“曝光”相当动人,制造出了当年最具轰动性的新闻之一。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图片都是关于犹太人如何凄惨地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和暖房,哭泣的孩子拼命阻挡士兵却无能为力,还有士兵在受命驱赶犹太定居者和数千涌向定居点的抗议者时是多么的痛不欲生(不过他们驱逐的手段如果放在巴勒斯坦人身上肯定会有伤亡)。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报道和图片里居然一点也没有涉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铁腕治理。以色列的医生促进人权协会惊奇地发现,媒体在大量报道脱离行动对犹太人造成的痛苦时,居然遗漏了

“现今发生在加沙地区的人道灾难”。多年来承担了加沙地区大量报道的记者阿米拉·哈斯概括了这个被隐匿的事实：“为着加沙地带百分之零点五的犹太居民，却要毁掉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的生活。”那些不一般的犹太人住在“繁茂的花园和漂亮的别墅里，20 米外就是一个拥挤且憋闷的难民营”。犹太人可以用“用喷洒器浇草坪，而路对面就有两万人每天从水箱里分得饮用水”。^③

还有一个未被提到的简单事实是，8 月 15 日的遣散行动未动一兵一卒就告完成。政府本可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就在那一天撤离加沙。其实在那一个星期以前，定居者们就可以静静地乘坐专用卡车离开了，他们都得到了迁居补偿。但那样以色列就无法传达一个信息了：犹太人决不能再次遭受这种可怕的命运，西岸必属犹太人。

还有一个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实：这出闹剧在历史上曾有过先例，那就是埃及西奈半岛的亚米特的犹太定居者被迁走的事件，最负盛名的《希伯来日报》称之为“82 年的‘国难事件’”。那次表演被以色列记者阿姆农·卡佩柳克形容成“政府策划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洗脑活动，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承受了‘一次国家的伤痛，其影响会波及好多代人’”。精心安排的那次创伤表演意在培养“反对在剩余的占领区再次撤离的国民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海外的犹太资本家心中也树立起同样的决心。曾指挥 1982 年遣散行动的哈伊姆·埃雷兹（Haim Erez）将军承认：“所有的事都是事先同定居者们策划和商量好的”，定居者们会假装反抗。卡佩柳克写道，演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方面西岸的医院里满是被以军士兵乱开枪打中的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

在亚米特甚至没有一个犹太抗议者需要急救,这简直是个奇迹”。^⑤

2005年“国难事件”的戏剧效果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发生了同样的奇迹:除了有士兵受了点伤,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奥里特·舒赫特(Orit Shohat)描述了里面的“苦痛与欢喜”,并总结了其中的涵义:

所有的细节都经过了排练。定居者们要演出最佳水准,达到没有暴力就被遣散的效果,他们的确做到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塑造了这个国家对上个星期的视觉记忆,并突出演绎了以色列国防军,他们总是在最敏感的地点出现,表现得坚决而又投入,这都得感谢犹太教教士。定居者们加强了对西岸的控制,进一步区分了可爱的以色列国防军与可憎的阿里埃勒·沙龙,加强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军队,宗教与定居,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定居者和定居行为更深地嵌入以色列人心中。是电视做到了这些,看完表演后人们会觉得我们正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这时有谁还会想遣散西岸的犹太村定居点或移除其他的定居点?只有邪恶透顶的人才这么想。^⑥

巴鲁赫·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是研究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名望很高的专家,他形容那出“荒唐的闹剧”是“以色列甚至全世界场面最大的表演……这出戏经过精心的指导,定居者们泪流成河,到处都扭打成团,活像拉丁肥皂剧”。基默林认为,如果以色列的目的仅仅是撤出加沙就大可不必上演这出全武行,也不需要为加强画面效果

让“几千个群众演员上镜”。实际上宣布一下撤离时间,做一点必需的准备足矣,不需要“给我们看那些宏大的影像。可要真那样的话,还有谁需要一场遣散呢?”是谁通过这部“经典教育片”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启示呢?是“那些哀号和呼喊口号的专业表演者,他们的目的是运用一切类似屠杀和毁灭的象征元素来打动以色列人民”,还有被动员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写手们“协力放大哀痛的声音”。这一切动作的意图在于“告诉每个人,以色列再也承受不了任何遣散了。具体地说,如果这个国家动用全部资源只能迁走约7 000人,那就不可能遣散10万、20万或更多的人”。^⑤

沙龙总理在这种情形下适时地站了出来。乔尔·布林克利报道说:“在上个月指挥了一场9 000人撤离加沙的感人表演后,沙龙表示他无法想象近期再从西岸进行一次遣散。”用他自己的话说:“有25万左右的犹太人生活在这个地区,那里有许多孩子在教徒家庭里成长。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说‘你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你们生在这里,你们生在这里!”^⑥

定居者们(有许多还来自于美国)都拿到了充裕的补偿金,以购买加沙地区稀少的可耕地和资源,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他们就在肮脏的难民营旁,在被以军袭击和封锁所破坏的村庄附近享受舒适的生活。因此他们迁居到以色列,或是非法占领的西岸地区,或是戈兰高地也会得到大量补贴。不过补偿法律的内容是经过仔细琢磨的。定居点的生产力很高,部分原因就是巴勒斯坦劳动力十分廉价。哈斯在报道中说:“然而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犹太雇主都不会给(巴勒斯坦劳

工)以失业补偿。以色列议会通过的《遣散补偿法》规定了因遣散而失业者应得的两种补偿金……但新法只赋予以色列人获得补偿金的权利”，此外巴勒斯坦工人还无法从即将离去的老板那里取回自己应得的报酬。那些建造了定居点，生产出了出口农作物的工人现在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中了。^⑧

与此同时，以色列占领西岸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负责大耶路撒冷地区的内阁部长哈伊姆·拉蒙(Haim Ramon)承认，用隔离墙分割耶路撒冷的目的是确保当地的犹太人成为多数民族。因此那道墙就把五万余巴勒斯坦人挡在了耶路撒冷外，却将延伸到西岸的犹太“邻近街区”划入耶路撒冷。1967年6月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的行为立即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安理会“要求以色列马上”取消任何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措施，而且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968年5月21日，252号决议)。在以色列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吞并耶路撒冷的合法性，只有以色列的法律规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领土，不管国际法怎么规定，以色列在那里都享有主权”(由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阿哈龙·巴拉克制定)。以色列的另一条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扩大和重建大耶路撒冷得到了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2002年12月，布什第一次正式改变了美国对吞并耶路撒冷的反对态度，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又一项谴责以色列行为的决议时投了反对票。如果美国此举有所图谋，那除了用武力就几乎不可能解决巴以冲突了。^⑨

拉蒙在隔离墙问题上的坦诚十分难得，熟知耶路撒冷和西岸情

况的梅龙·本韦尼斯蒂进一步详述了他透露的事实。受到冲击的巴勒斯坦人远不止官方公布的隔离墙内的 5.5 万人,还有“生活在东耶路撒冷周围卫星区里的”5 万人,他们“由于无法在东耶路撒冷城内找到容身之地而搬到了那些卫星区内”,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征收和对他们建房的限制”,以色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犹太城市。“这就意味着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24 万)受到隔离墙的冲击。”曾任耶路撒冷市市长的以色列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宣布他将批准为巴勒斯坦人在隔离墙上建 12 个通道,但很快又“明确工程的耗费将由国际社会承担,‘因为它们是为巴勒斯坦人建的’”。用本韦尼斯蒂的话说:“他先在别人周围建一堵墙,然后又嘲讽地称墙上的通道是为那些被他囚禁的人‘服务’的。”本韦尼斯蒂相信:“耶路撒冷周围的‘防线’不可避免会造成一种‘软迁移’,这种迁移有可能会达到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更加‘犹太化’城市的目的,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巴勒斯坦社会的瓦解。自从东耶路撒冷被并入以来,经过多次活动,都没有成功地消退城里巴勒斯坦人的社会意志,现在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不可缺少和充满活力的团体第一次真正面临着危险,他们的前景变得黯淡。”这场正在阴谋策划的“人道灾难”还将“把积怨埋进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胸中,孕育出敌视和复仇的种子”,这又是为了扩张牺牲安全的举动。记者丹尼·鲁宾斯坦(Danny Rubinstein)对以军的占领作了多年杰出的报道,他写道:“使阿拉伯内地的中心大都市东耶路撒冷消失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巴

勒斯坦未来选择这个城市建都的可能”，还极大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前往西岸的自由。^⑩

在2005年“国难事件”的最后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了要征收更多土地以延长马阿莱阿杜米姆周围的隔离墙，因为在马阿莱阿杜米姆内还要建造3500套新房屋和公寓。这道隔离墙将“深深嵌入西岸地区，封堵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还将使西岸的南部子区域同西岸残余的小块土地隔离开。一如往常，发布决定后就是拿出广受质疑的借口了，奥尔默特告诉媒体：“很明显在未来某个时候，以色列将把耶路撒冷和马阿莱阿杜米姆连接起来，那样我们最终要实施这个项目时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了。”没过多久，沙龙就重申了这一意见，同时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丹尼尔·库尔策(Daniel Kurtzer)把布什对以色列保留其西岸定居点的支持又详细解释了一番，他说：“在关于西岸最终地位的协议下，美国将支持以色列保留那些犹太人聚居的地区”，也就是那些把西岸隔成三段的定居区(本韦尼斯蒂及其他关注当地事态的人把它们称为“三块班图斯坦”，那“三块班图斯坦”同余下的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耶路撒冷土地几乎完全断开)。^⑪

尽管这些都被归为极右的观点，可它们只是发展了佩雷斯鸽派政府的计划，那些计划始终都有克林顿总统的支持。1996年2月，佩雷斯内阁建设部长本亚明(“福阿德”)·本-埃利泽说道：“政府的立场即我们的最终任务，就是耶路撒冷地区的马阿莱阿杜米姆、吉瓦特宰伊夫、拜塔，以及古什埃齐昂都将成为以色列版图的一部分。这一点无需质疑，也不是什么秘密。”本亚明·本-埃利泽也很坦白地解释了

鹰派与鸽派间的差别：“我（鸽派）在建造定居点时是很低调的，目的是在建设的同时不激起反抗……我所在乎的就是不断地建造，建造，建造，建造还有更多的建造。”不过由于这个过程很安静，所以他的老板就可以装作看不见。可其他人却看得很清楚，一篇欧盟的秘密报告——估计是英国外交部写的，发现各种以色列的工种项目正在默默地进行着，包括将马阿莱阿杜米姆扩张到 E-1 区域和用隔离墙把大耶路撒冷周围的大片地区划为已有等。这些工程将使以色列能把东耶路撒冷同它的巴勒斯坦卫星城伯利恒和拉姆安拉，以及西岸其他地区分隔开。这些行为将给巴勒斯坦人民带去可怕的经济的、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后果，而且意味着建立一个可独立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希望完全破灭，因为那样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东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拉姆安拉之间的有机联系。^②

2005 年“国难事件”大功告成后，以色列在美国的帮助下继续“到巴勒斯坦领土的纵深刻划上以色列的国界……建造得安静而快捷”，以色列攫取的土地和建造的定居点都在迅速增加，特别是“在阿里埃勒和马阿莱阿杜米姆建的定居点已深入到被占领土中”。在 2005 年的前 9 个月里，估计有 1.4 万名定居者迁入西岸，而离开加沙的定居者只有 8 500 人，而且以色列在西岸新占领的土地也比它在加沙这座大监狱里让出的土地更多。各种情况表明沙龙和布什已感到最后的胜利在望了，那是这样一幅“景象”：曾经存在于此的巴勒斯坦民族被清洗掉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一点零碎的贫瘠土地，那里可能会有一个“民主国家”，也可能被称作“炸鸡”。^③

用不着深入探讨了，仅仅这样一个框架就足以显示，巴勒斯坦—以色列是布什给中东带去和平与民主的“弥赛亚使命”的又一个案例。

尽管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同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地区的同胞相比已算幸运了，那些同胞会遭到任意的屠杀，污辱，折磨和驱逐，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被毁灭。他们的意志仍未被摧毁实在让人感到意外。在世界很多角落都能找到这样的受难者，我就曾到过许多可怕的地方，但从未看到过海地贫民区里的人们眼中那种恐惧，生活在克林顿支持的恐怖活动中，他们拼命在周围可怕的环境里生存下去。我也从未见到过哥伦比亚南部贫农受到的那种苦难，他们被迫离开自己被美国的化学战毁掉（“熏蒸”）的土地。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在暴行因目的已达到而有所减轻后，都会留下残存的“恐怖文化”，这是萨尔瓦多那些幸存的耶稣会会员的感觉。然而，一些社会却最终挺过了暴行而生存了下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本尼迪克特·凯里（Benedict Carey）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奇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惊叹于一些“脆弱的社会”从恐怖和暴力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不过他说的社会指的是伦敦，特拉维夫和纽约，而不是指世界上那些遭到压迫的民族，外来的压迫者给它们带来的苦痛是难以估量的。^④

然而，这种比较也许并不合理，只是故作伤感罢了。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经过仔细思考说道：“由于生长在当地的人已经适应了这种传统的痛苦生活，懂得如何应对，所以他们也能够忍受这种生活。

就好像在印度出生即为贱民*的孩子会逐渐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和习惯,以适应他(她)所必须要扮演的那个悲惨角色。”这么说,我们就不必为他们的命运(就捏在我们的手里)操心了。^⑤

被压迫民族的看法

对于伊斯兰世界同西方的所谓“冲突”的原因,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以后给出的解释听起来比较舒服:是他们对我们的自由和价值观的仇恨。另一个原因难以理解一些,是我们在表达自己真实意图上的无能。《纽约时报》的一条新闻标题这样写:“顾问团说,美国没能向伊斯兰世界解释清楚自己的政策”,这里的顾问团是五角大楼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它在2004年12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得出了这一结论。顾问团的研究结论同总统的意见十分不同:“穆斯林并不‘恨我们的自由’,他们恨的是我们的政策。美国的政策打出的为伊斯兰社会带去民主的旗号,在穆斯林看来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伪善。”报告里还写道:“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后并没有给它们带去民主,而是造成了更多的暴乱和苦难。”对此穆斯林们也有同感。^⑥

其实在多年以前就有了同国防科学委员会的研究相似的结论。在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对阿拉伯世界“仇恨我们的浪潮”表示

* 贱民(untouchables),印度的一个种姓,由许多阶层构成,被排除在印度的四个种姓之外,并被这几个种姓的人认为在宗教上是不洁的。——译者

不解，这种仇恨“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民众”，他们“都站在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一边”，支持独立的非宗教民族主义。国家安全委员会简要分析了这种“仇恨浪潮”的根源：“在大多数阿拉伯人民的眼中，美国似乎是阿拉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敌人。他们认定美国的目的是保护自己对近东石油的利益，手段是维持现状并妨碍阿拉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进一步说，这种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很自然地决定了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某些势力会走得很近，那些集团由于利益需要必须同西方保持联系，并维持本国现状”，以及阻碍民主和发展。^⑦

《华尔街日报》在“9·11”事件刚发生后调查“富有的穆斯林”的态度时，也得到了几乎相同的发现。忠于官方的“西方价值观”和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中的金融家、商人和专业人员看到华盛顿支持极端独裁的政府，和“扶植压迫人民的政权”以妨害当地的民主和发展时，都感到非常失望。此外，除了195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的内容外，他们还对华盛顿制裁伊拉克的做法以及支持以色列占领和掠夺土地的行为而愤慨。至于大批贫穷受难的民众，没有人调查过他们的想法，但他们很可能也有上述态度而且强烈得多，另外他们还可能会痛恨围着西方转的上层社会，以及有西方强国撑腰的残酷暴君，那些暴君要做的就是让本国财富大量流入西方，并中饱私囊。如人们所料，对伊拉克的侵略让人们的怒火烧得更旺。^⑧

戴维·加德纳(David Gardner)写了一篇对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研究的评论，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阿拉伯人都相信改变

阿拉伯现状的是奥萨马·本·拉登而不是布什。这种观点看上去有些道理,因为在‘9·11’事件以后西方和它在阿拉伯的专制附庸国再也不能无视一种政治力量了,这些组织正酝酿着针对它们的不顾一切的怒火。”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就持这一观点。^⑩

依照复杂的国际事务的标准,关于华盛顿的真实立场和作用的证据(高调的宣言除外)是清楚和有利的。然而,有一点始终都是可能的,就是华盛顿的行为也许会意外地发挥某种积极的效应。重击一个像人类社会这样复杂而微妙的体系所产生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即使用最恶劣的暴行侵害一个社会也常常如此。如前所述,本·拉登的恶行据信在推进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促使了欧洲的人侵者被逐出亚洲,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例如印度在英国离去后就免遭可怕的饥荒,并得以从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站立起来。也许很多伊拉克人和其他人眼中的第二次蒙古入侵最终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不过如果一些有权力的西方人仅让这种结果凭运气出现,那就是他们的耻辱了。

一直延续至今的“清晰的轨迹”再一次证明,美国与其他的强国没什么不同,一边追逐着重要领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一边还自吹对人类至高价值的卓越贡献。结果人们发现除了老套的宣言外,华盛顿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履行的“弥赛亚使命”,相反的证据倒是堆积如山,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本文开头所指,对于人们对此现象的态度,那

些关心美国民主状况的人丝毫不放在眼里。至于国外的民主,只要它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能够杜绝公众妨碍强国和富国在那里的利益就行。其实美国国内的民主政策也大体相同,我们即将论述这一问题。

第六章

推进国内民主

在国内推进民主的提法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和荒唐。毕竟美国是现代第一个(多多少少)民主的社会,而且一直都是供其他国家学习的范例。另外在真正的民主必不可少的许多方面,如保护言论自由等等美国也是领先于世界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有理由为美国的民主表示担忧,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这样的原因。^①

这类担忧我们并不陌生。在民主理论和实务方面最负盛名的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对美国政治体制中不民主的因素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改革措施。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的政治“投资理论”尖锐地批评了严重束缚美国有效民主的制度因素。同样的批评还来自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对媒体危害政治民主现象的研究。他认为媒体的消极作用使总统大选在2000年前已变成了一场“闹剧”,变质的选举反过来又使媒体的水准和对公众利益的服务不断萎缩。另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是私有

力量的集中对民主的破坏,主流评论家们如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轻描淡写地说:“商界完全操控着政府的机制。”与此相仿的还有伍德罗·威尔逊在上任前几天说的话:“美国政府的真正主人是资本家和工厂主。”20世纪美国的权威社会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是“政治是大资本力量覆盖在全社会之上的影子”,而且这一现状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只要国家权力还属于“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商业机构,这里私人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对银行、土地、工业的私人控制,还需要对媒体和媒体掌握者及其他宣传手段的控制”。看来,一般的改革是不足以改变现状的,要想带来有意义的民主,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②

“时代的新精神”

作为上述批评对象的政治制度同其设计初衷有一些类同之处,只是它的设计者要是看到它在后世的一些发展一定会非常吃惊,特别是将部分个人权利赋予“多人构成的法人实体”(即公司)的司法能动主义,而且在最近的国际经济安排中(有人给它起了个不适当的名字“自由贸易协定”),法人实体更是得到了比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更宽泛的权利。制度的每一步这样的演变都是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市场原则的重创。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人”拥有很多权利,而且在法律的规定下还要承担许多道德上的缺陷,这些缺陷放在普通人身上早就被视为病态了。英美公司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公司必须一心致力于

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它们也可以做一点“好事”,但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以间接地增加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法院的行为有时会比法律更进一步。美国特拉华州大法官法庭认为:“当代法庭承认,除非公司不断承担更多的支持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责任……否则法律赐予公司的商业优势可能会被证明是那些受到商业影响的民众的代表们所无法接受的。”杜威谈到的有力的“宣传手段”肯定会保证那些“受到影响的公众”不会了解国家—公司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③

美国政治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设计者詹姆斯·麦迪逊*清楚地讲述了他的初始设计思想。他坚信权力应当被掌握在“这个国家的富人……和最有能力的人群”手里。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指出,“不能指望那些没有财产也没有希望获得财产的人会充分认同他们的权利,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善用手中的权力对待他人的财产。”这里的权利不是属于财产的,而是属于财产的拥有者们,因而照此推理有产者就应当比一般公民拥有更多的权利。研究麦迪逊的著名学者兰斯·班宁(Lance Banning)认为:“通过麦迪逊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多数人侵害的决心来看,很明显他格外地关注那一小部分有产者。”麦迪逊不太可能没有注意到过亚当·斯密颇有影响力的观点:“只要一个国民政府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建立,那它成立的宗旨实际上就是保护富人防备穷人,或保护有产者防备无产者。”麦迪逊曾警

*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7—1817),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为阐述制宪思想,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合撰《联邦党人论文集》。——译者

告制宪会议里的同事留意民主的危害,并让他们思考如果英格兰“的选举向所有阶层的人开放”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利用手中的投票权使土地得到更公平的分配。为了杜绝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发生,麦迪逊建议进行一定的安排以“保护少数富人的权利不受大部分人的侵犯”。^④

麦迪逊提出的问题并不新奇,世上第一部政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通过比较各种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发现民主是“最能被接受的”一种制度,当然他所说的民主仅限于当时的自由民,这种概念同两千年后的麦迪逊不谋而合。然而,亚里士多德也承认民主制度存在缺陷,其中之一也被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提了出来。亚里士多德发现,如果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垂涎于邻人财货”的穷人们就会利用自己人数上的优势使财富被重新分配,这是不公平的:“在民主社会里富人应该得到优待,使他们的财产不被瓜分,他们的收入也受到保护……因此一个国家拥有大量财富是一件幸事,那样就能使大家都获得一点微薄但够用的财产;如果一个社会里一部分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那里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富人的权利不会被承认,甚至还会遭到削弱。

亚里士多德与麦迪逊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但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麦迪逊拿出的解决方法是限制民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办法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正是现代福利国家采纳的方案。亚里士多德说,为了使民主制度正常运转,“就应当采取措施让(所有人)都享有长

久的富足生活”，这样“公共财政收入就应该被积累起来发放给穷人”，以使它们能“买一点田地，或至少能有足够的钱开始耕作或经营事业”。亚里士多德还提到了其他的措施，像用“公地”的产出为人们提供“公餐”等。^⑤

美国宪法体系建立后的一个世纪里，民众的抗争极大地扩展了民主的内涵，其中不仅有扩大公民权的政治变革，还有通过“自主研究”建立起来的更广义的民主概念。历史学家罗伯特·威贝(Robert Wiebe)写道，在19世纪民主已成为“所有人的准则”。当时，在工厂里劳动在人们看来与被奴役没有什么区别，到了19世纪中期，劳动人民就已痛斥工业社会迫使他们变成了“专制统治”下的“不起眼的小东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苦役”，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有钱的贵族阶层，就像一场雪崩，只要有任何人胆敢质疑贵族们有权奴役和压迫贫穷和不幸的人，就要吞没他们”。他们为“时代的新精神：一心牟利，忘记自己以外的一切”而悲哀，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尊严、自由和文化的无情鞭挞。^⑥

上层花了很大的气力欲将上述思想从人们心中抹去，要让他们接受“时代的新精神”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与从前很不相同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得为公司服务……”这是伍德罗·威尔逊说过的话。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美国里，“你们将不再看到个人企业，个人机遇，个人成就”——“国家的权力和对国家财富及商业机会的控制权都属于那些掌握着大企业的一小群人。”威贝还在他的专著中写道，随着公司化的进程越来越不可阻挡，市场机制和个体自由受到限制，“自

治”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他进而说，“19世纪的民主展示橱窗里的灯光越来越黯淡”，这一过程是由“对服从和控制的强烈欲望”所驱使的，而这一“强烈欲望”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爱国精神，（威尔逊时期的）“红色恐怖”^{*}，以及其他用以“严密管制下层人民的”伎俩。^⑦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民主并不是循着一条平稳上升的轨道发展的。在公众的努力下民主出现了一定的周期性前进，但紧接着就是在统治者干预下的倒退，至少是部分抵消了前面的进步。虽然随着时代的前进，民主的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有时逆转的巨大幅度又使公众在虚伪的民选中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最近的两场选举“闹剧”就是2000年和2004年总统大选，后者更是堪称极品闹剧。

救世的邪念

本章的开头概览了对一个企业化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批评，那些批评有着相对固定的形式。然而人们对布什政府政策的担忧却表现得更为迫切，有的担忧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谨慎的观点对“美国政治体制能否继续存在”表示怀疑，除非它能

^{*} 红色恐怖 (Red Scare)，指宣传共产主义威胁、打击共产党人所造成的恐怖。——译者

人。如果不是一切突然被打断,今天我们就该歌颂魏玛*文化了,它堪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媲美。那里曾有独一无二的文学,心理学,绘画和建筑,是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一颗举世无双的明珠”。这段评价还是比较可取的。^⑨

有人也许记得,纳粹的宣传手段是从当时英美最领先的商学理论和实践里学来的。一篇当代评论文章认为,纳粹宣传的精髓在于借助简单的“标记和口号”来“大量反复灌输”受众,以商业广告的方式唤起他们的各种基本情绪,如恐惧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把德国大部分的一流商业广告人才都招进了宣传部”,还吹嘘“他将使用美国的广告方法”来“推销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商人推销“巧克力、牙膏和专利药物”那样。这些手段极其成功,迅速导致了施特恩所担忧和警示的社会变故,即由正直的国家变成为野蛮的民族。^⑩

当领导层全力为少数权贵牟取短期利益并谋求全球统治地位时,向民众灌输拯救世界的邪念便是很自然的事。不容忽视的是,目前美国的政策正被这样的信念牵引着,政策的目标和实施的方案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公众的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向大众施加影响就是必需的了,使用的正是在这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社会里,各产业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思想的手段。在过去几十年这个美国经济史中不平凡的时期里,那些手段也显示出了不寻常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

* 魏玛(Weimar),德国中部的一座城市,历史上曾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译者

代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出台之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在这样无可比拟的优势下很自然美国人的实际工资也是工业国中最高的。可现在形势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基本上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有所下降,现已接近工业国的最低水平了。同时美国相对薄弱的福利水平也退步了。美国人收入水平的维持完全依赖于延长工作时间,现在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已远远超过了同类社会的水平,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之前的25年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里最快的,而且收入分配也较为公平。在70年代中期以前本来紧随经济增长的各项社会指标,从那时也开始变糟,到了2000年它们已降到1960年时的水平。^①

财富分配领域的权威专家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在专著中写道:“整个9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提高,而上层人的财富和收入的快速增加却有力地拉高了美国的平均收入。”从1983到1998年,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飞升了百分之四十二”,而同时最穷的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的(微薄)财产竟丧失了百分之七十六”。沃尔夫认为“大部分美国人甚至在90年代最繁荣的时期都没有受益,富人才是最大的赢家”。这延续了自70年代末以来一直未间断的发展趋势。布什政府全心全意为富裕和特权阶层服务的原则更是在这一潮流中推波助澜,结果使“公司利润,专业人员的收入,投资收益和管理所得”都大幅度提高,然而“产业工人和不参与管理的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到了2005年中期却仍未达到2001

年经济衰退时期的最低点。美国人口调查局 2004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已整整 5 年没有上升了,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美国人的平均税前实际收入达到了 1997 年以来的最低点,而贫困率却是连续第四年上升,达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七。全职工人的平均工资“显著下降”,其中男性下降百分之二点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几乎到了历史最高点”,而且这还没有把“股票收入算在内,否则差距还会拉大”,因为美国股票的持有是高度集中的。根据美国劳工部 2004 年的报告,除了极少数熟练程度很高的工人,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又进一步下降了。经济学家迪安·贝克(Dean Baker)在报告中说:“美国经济自 2001 年衰退以来,经历了除大萧条以外最长的失业期。”工作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依然比衰退前低两个百分点。以劳工市场的恢复情况作衡量标准,我们发现美国经济自战后以来从未像(衰退以后)这样回升乏力。^⑫

2004 年,因买不起食物而忍饥挨饿的美国人数上升至 3 800 万人,在过去 5 年里增加了 700 万人,波及了百分之十二的家庭。可在美国政府公布这一数字的同时,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却表决取消了 30 万人的食品券* 预算,还削减了 4 万名儿童的学校早午餐。这只是许多同类例子中的一个。^⑬

然而这样一个事实却被人兴奋地解读为“健康经济”的特征,并值得其他社会效仿。艾伦·格林斯潘因在主持国民经济当中达成了上

* 食品券(food stamp),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家庭用来购买食品的纸券。——译者

述成就而受到了尊敬。格林斯潘把上述现象部分归因为“对工资上涨的反常抑制,而上涨的趋势主要应是工人的不安全感上升导致的”。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所必需的东西。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辛辣地说道,事实上美国经济这个榜样在历史上并没有一面打击“底层人民”,一面奖励“富有阶层”的先例。^⑭

为了让那些每天都要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的底层人民依然循规蹈矩,美国政府自然会利用“伪宗教的政治变形体”这一工具,它采纳了长期严密偏离工业社会常态的大众文化元素,自里根时期以来这些元素因政治需要已被人操纵了。^⑮

另一个经常被政府利用的工具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对无比邪恶的敌人随时毁灭美国的恐惧。这样的认知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对摧毁敌人的正义性的深信不疑,回顾历史就能发现,这样一种坚信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布鲁斯·富兰克林(Bruce Franklin)对美国早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一次启迪性的回顾,他发现了类似“英美战争辛迪加”这样的重要主题,该辛迪加为推行其“和平而开明的规则”可能将“扫除”妨碍它的人,它还将给落后的民族带去“文明的精神”(1889年)。富兰克林还回顾了历史上美国对即将毁灭自己的敌人的出色选择,通常被选中的都是正被美国踩在脚下的人,如印度人、黑人和中国劳工等。参与挑选的还有像杰克·伦敦这样的一流进步作家:1910年时杰克·伦敦在一家很受欢迎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议用生物武器灭掉中国,以阻止其打垮美国的“阴谋”。^⑯

不论这些文化元素的根源何在,它们都很容易被居心不良的领导人操纵利用,而且常常是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利用。里根当政时期,企图暗杀美国领导人的利比亚刺客的形象被设计了出来,目的是让美国人担惊受怕;世界肉豆蔻之都的一个空军基地可能被俄国利用来轰炸美国;凶残的尼加拉瓜军队两天内即可抵达得克萨斯的哈林根市;无孔不入的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街头犯罪;西班牙毒贩……以及任何可以编得出来的东西,用以骗取民众对下一场国内或国外行动的支持,这样的行动均是害人又害己,特别是国外因此受害的人遭受的打击要沉重得多。

2004 年大选

2004 年大选的结果在美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很多人担心美国会成为“分化的国家”。这种选举结果会反映到政策制定中,催生出对国内广大民众有害,以及威胁到全世界和未来社会的政策。美国大选还让我们对“失败国家”的标准特征——民主赤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但选举并没有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国家或大众的态度,倒是有许多其他渠道可以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解。事实上对美国公众观点的调查是很密集的,对调查结果要进行审慎和仔细的解读和研判,而这些研究成果也是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源。但是强大利益集团所不欢迎的民调结果常常会被宣传机构隐瞒起来。2004 年大选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反映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因此其结果也遭到了雪藏,回头

我再详细谈论此事。^{①7}

就在2004年大选结束不久,科林·鲍威尔告诉媒体:“乔治·W·布什总统应美国民众的要求,将继续推行他的‘强力’外交政策。”这纯属谎言,美国人民也不会相信。选举结束后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问被调查者:布什是否“应该着重实施两党都支持的计划”,或者他是不是像鲍威尔和另一些人声称的那样,“在民众的要求下推行共和党的议程”。结果百分之六十三的人认为他应该着重实施两党都支持的计划,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相信他是在民众的要求下推行共和党的议程的。^{①8}

其实选举没有给予布什做任何事的权力,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选举”。2004年大选只是在这方面走了极端,而它的许多特征我们都不陌生。托马斯·弗格森和乔尔·罗杰斯分析了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后,得出了以下结论:“那次大选反映了政党组织结构的退化,以及将一个在美国政治生活的‘生命中枢’中并不重要的角色打成一个成功的候选人,只需要动用信仰的力量和大量的金钱。”那次选举暴露出“曾在上一代给了美国政党政治一定稳定性和清晰定位的政治联盟和经济结构,正在不断地瓦解”。^{①9}

对1980年大选也有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便是沃尔特·迪安·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的文章,那篇文章的观点是,美国的选举证明了“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相当反常的重要特征:在选举人市场上完全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党派和劳工党派竞争者”,正是这种缺陷导致“部分阶层只得放弃了自己的选举权利”,还致

使部分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投里根票的百分之二十八的选举人里,百分之十一称选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里根在1984年大选中又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投他票的选举人也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其中又有百分之四以“他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为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选举人选择一个“真正的保守派”作总统,然而就凭这一点“保守主义”就成了民众对政府的强烈要求。此外民意测验显示,不希望里根的立法计划被执行的选民数与希望如此的选民数的比例为三比二。同往常一样,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支持为实施“新政”^{*}和“伟大社会”^{**}计划增加税收。在1980年,百分之八十的选民都同意保持和增加公共开支额,而到1984年支持者又增多了。另一方面,削减社会保险投入几乎遭到了全社会的反对;而反对削减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资金的人是支持者的3倍多。更倾向于削减军费而不是医疗费用的公众约是持相反意见者的2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制定保护工人健康和劳动安全的政府规章,支持保护消费者权益,帮助老年人、穷人和生活困难者等社会公益事业。^②

然而用维布伦的话说,只要选举仍被操纵在少数人手中,绕开公共事务并排斥下层人民,那上面的问题就都无足轻重了,被选上的领导层也就能随心所欲地为富人服务了。事实的确如此。

* 新政(New Deal),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后为挽救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施政纲领。——译者

** 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于1964年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译者

弗格森和罗杰斯还分析了对 20 世纪 60 年代“民主危机”的协力重击所产生的早期影响。那场“民主危机”曾引起“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高度警觉,“民主危机”这个名词正是该委员会杜撰的。三边委员会由来自三个主要的工业化地区——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著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从卡特政府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该组织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它的总体立场是什么样的。前面谈到的那场令他们忧心的危机是指在 60 年代出现的所谓“民主过度”的现象:通常不参与或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妇女、青年人、老年人、工人、少数民族和其他底层人民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比三边委员会政治立场偏右的精英阶层和整个工商界都把这场“民主危机”看得更为可怕。三边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人,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带着一丝怀旧和不太过分的夸张口吻回忆道,“民主过度”可能会阻碍早年建立的机制的良好运转,那时“杜鲁门仅靠较少的华尔街律师和金融家的协助就控制了全国”。面对这种“危机”,有关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其中包括代表公司利益的游说者的频繁活动和右翼智囊团的扩散,目的是保证对立法活动和宣传机构的控制。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手段也为了恢复原来的规则和秩序。“民主危机”是在公众努力闯入政治舞台的过程中爆发的,当拥有强大实力者面对“民主危机”时,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上面那些“对服从和控制的强烈欲望”(威贝语):威尔逊制造的“红色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攻势就是两个有明确记载的例子。两者都至少在短期内使秩序得到了恢复,然而在 60 年代迸发出的公众力量不仅比往常要

难以驯服得多,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有时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④

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也有力地推动了上述恢复秩序与规则的计划的实施,该计划在那之后又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带来了一系列经济与政治上的影响。经济史学家们对其在经济上的影响不会感到奇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对此概括道:“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和最长久的快速增长时期(如东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过去的例子则是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并没有与大规模经济自由化的阶段或事件同步出现,甚至当它们大量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商业机会时也是如此。”我们在此还可以加上一句:对于工业强国情况也是这样。

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在回顾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四分之一一个世纪的实施情况后,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表示,伴随其实施的是各国(不论富裕还是贫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和社会发展减缓。当然在这个大趋势下也有例外:在一些不遵守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则的国家出现了高增长率(如中国和印度,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有极不均衡等严重的副作用)。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在一篇详细的分析报告中写道:“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是很清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同它之前的发展时期相比,在增长速度上明显放慢”,速度还不及之前的一半,如果按人均计算这一趋势就显得更为“严重”。另一些后果还包括不平等现

象加剧,贫困状况几乎没有被扭转(中国除外)以及经济最脆弱的国家还遭遇了毁灭性的负面作用。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存在着一个被低估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问题”,可能还包括贫困和国内国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它们都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而中国是个例外,因为中国排斥了该政策,而且切实采取了有效的扶贫措施。有时这些问题被一些假象给掩盖了,一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世界经济总体上还是在增长(其实不管是什么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几乎始终都在不断增长);二是滥用“全球化”这个概念,它易使出口经济被混淆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这样一来若是10亿中国人在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下创造了高增长率(却严重违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那全球平均增长率的提高就会被归功于那个被违背的原则。尽管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了解甚少,还不能确定它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原因,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很长一段经济史中,该政策的实施总是伴随着强大和不良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史学家们对此了如指掌。^②

不难预料,“经济改革”对政治也会产生影响。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自主权,这一点被奥坎波认为是:“惟一与推进民主相符的制度。”很明显,“如果民众代议或民众参与活动不能在重大的经济社会决策中发挥作用”,那民主必将流于空洞的形式。应当明确的是,所谓“改革”和使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协定”毫无掩饰

自己妨碍上述活动发挥作用的目的。“自由贸易”的内涵就被这样的事实界定了,于是在“自由贸易”下,垄断定价权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也被用来帮助跨国公司实现其利益。“自由贸易”还禁止采用某些经济措施,而各工业国就曾使用过这些措施以达到它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如政府依公众的意愿干预经济,使公众的权益高于投资者的利益。此外,“自由贸易”保障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却否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后者是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贸易的核心原则之一。“自由贸易”还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范围,例如把一个公司内部的跨境交易也视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与真正的自由贸易关系不大外,那些“自由贸易协定”也并不是真正的协定,因为参加国的公众总体上是反对它们的,除非公众不是那些国家的一部分。“协定”的达成用的是秘密谈判或其他方式,将公众完全排斥在外,这使他们十分愤怒。所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惟一正确的用语就是“北美”,其他协定也大都如此。^②

正如奥坎波所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同推进民主是完全对立的。它的作用根本不是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限制国家权力,反而是让国家机器能更好地满足富人的需要。其中影响最大的阴谋是剥夺公众的发言权,将决定权都交到大量专制的私营业主手中。方法之一是通过推行私有化,排除公众可能对政策造成的影响。它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便会出现“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所有关系到百姓生计的行业都被囊括在内,像医疗、教育、供水和其他重要的资源等。一旦出现了“公共服务产业”把这些内容都排除在了公众评论的范围之外,那大部

分程式化的民主活动就都会变成定期动员公众为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闹剧。那样“民主危机”就实质上被平息了。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建立的金融自由化大抵即是如此。国际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类自由化措施制造出了一个由投资者和贷款人构成的“虚拟参议院”(Virtual Senate),其投资者和贷款人能够用资金抽离,对货币的攻击等威胁手段来“否决”政府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实际缔造者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这种破坏民主的手段加以了限制。凯恩斯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政府有权限制资本的流动,而现在美国财政部却表示随意调动资本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像良好就业那样是一项被主张的权利。^④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金融投机和对货币的攻击也进行了限制。这种规定的结果是促成了一种“内嵌式自由主义”制度(部分人使用的一种称呼),在这种制度中社会民主政策能够被施行。在它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确切地说是国家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较为平等,重要的福利措施被颁布出来以使广大民众受益。可这一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都被改掉了。

在早些年,对资本家来说公众并没有构成什么大问题。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讲解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解释道,在政府政策“在全世界的男性选举权以及工联主义和议会中的工党崛起的影响下,开始变得与政治密不可分”之前,由那个“虚拟参议院”在

金融上的正确判断所带来的大量成本可以被转嫁给社会底层。然而随着大萧条时期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公众开始向极端化发展,私营大企业家和富豪们不再享有这个奢侈品。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又取代了对民主的限制,后者是在市场压力下产生的一种隔离民众的措施”。^⑤但在70年代这个系统解体后,真正的民主开始变少,以某种方式误导和控制公众也越来越重要。

“对公众的欺骗与压制”

在2004年大选中,布什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多的选票,克里则以微弱差距败北。那次选举与2000年的大选很相似,“红”“蓝”两个阵营里的美国各州数量之比在两次选举里基本是相等的(不管有什么意义)。选民的偏好只要有一点微小变动就会把克里送入白宫。不管是谁当选,我们都无法从选举结果中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有丝毫的了解。国会的选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参议院的26名议员中仅有一名落选——代表南达科他州(一个仅有77万人口的州)的民主党议员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在众议院,若不是反民主党的得克萨斯共和党人在该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的领导下不公正地划分了选区,就只会有8个席位在选举中易手(历史最低水平),共和党就将从整体上丧失其多数党地位,结果是共和党在得克萨斯以外的选区里失去了3个席位。这次选举对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仍是历史上激烈程度最低的一次。

而且根据已有数据记载,布什是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低的连任总统。^⑥

选举结果谈不上反映了什么民众的呼声,也体现不出选举自身多么的没有意义,只要看看选举数据以外的事实就能了解到这一点。

同往常一样,2004年大选活动是由公共关系行业操作的,这是一个在平常负责销售牙膏、非治疗用途的药物、汽车和其他商品的行业,它的主导方针就是欺骗。广告的任务就是侵蚀我们所孜孜以求的自由市场,那是一个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和理性的消费群体的理想市场形态。在那样的市场中,商家会按照廉价、易得、易解的原则实实在在地提供它们商品的信息,然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商家是这样做的。恰恰相反,它们所做的是一年花上数千亿美元来制造假象蛊惑消费者。这就是广告不争的目标:不说实话。举例来说,汽车业不会轻轻松松地让公众知道其来年上市的新款车的性能,而是在广告里填进诸如性感模特,沿着峭壁悬崖直冲云霄的神车等景象。另外,诚如维布伦在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商业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虚构顾客”,这一招也用来制造“国家极权主义的所有典型表征:粉碎一切,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理性,让所谓的民主政治程序变得空洞而庸俗,让民众有更大的挫折感等等”。

对商业宣传的根本认识早在亚当·斯密时期就形成了,亚当·斯密警告公众,商人和工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欺骗甚至压迫民众”,而且他们已经这样干了“很多次了”。现在的一些主要产业都是他们为这一目的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听

起来却和有名的“企业进取精神”和“自由贸易”同样逼真。其实那些长期统治着这个社会的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或是一直在忍受着)那些好听的大政方针和经济理论,除非这些东西能满足他们一时的利益需要。^⑦

有时,为欺诈所做的努力表现得很极端,有一个例子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自2003年开始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谈判中途受阻,原因是华盛顿担心澳大利亚在“销售处方药物时,以顾客为中心”,以“证据为基础”采取相应的市场流程或禁止性措施,然而美国“的生产商更喜欢依照市场需要,自由地定价和销售自己的产品”。美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中表示不能接受澳大利亚这种干预市场的行为。制药公司在美国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最新产品比廉价同类药物效果更好,或是在电视广告上让某些运动健将或电影明星请大家去“问问你们的医生这种药是不是有用(它对我是有用的)”,有时甚至用不着在广告中说明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然而它们在澳大利亚就得拿出依据来证明自己的宣传是真实的,于是它们就认为澳大利亚剥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华盛顿必须得保障被那些激进的立法活动创造出来的,无比强大永远都死不了的怪“人”*的欺骗公众的权利。^⑧

澳大利亚的公共医疗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尤其是同美国相比微不足道的药价: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种药物在美国能收获与其价值毫不相称的大量利润,而且开出这种高价的理由是令人怀

* 指公司法人。——译者

疑的：里面包含了研发费用。经济学家迪安·贝克发现，只要向该领域投入与制药公司所支出的研发费用等量的公共资金，那制药商就没有理由开出垄断高价，公众就能大量节省购药支出。可事实上由于开发药物所依赖的基础科学的进步几乎完全靠公共资金支持，所以公众已经为药物研发支出了许多费用，只是没有被商家承认。即使采信商家的研发费用说，那些费用也是被集中用于了市场营销：美国的大制药厂花在推销、广告和管理上的费用是研发方面经费的两倍以上，而且还在赢取巨额利润。^⑳

澳大利亚医疗体系高效的原因之一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政府购买药品使用的正是五角大楼购买回形针时的策略：利用政府的购买力来压低价格，可美国法律禁止在药物采购上使用这一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采购药物的一项基本程序是举证：“要让澳大利亚政府出高价买一种新药”，美国制药公司“必须证明这种新药的疗效是明显可见的，然而这被美国视为对澳贸易的一项障碍”。澳大利亚还要求美国制药公司在推出新药时“必须证明”与现有的药物相比，它“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和令人满意的性价比”，这也遭到了美国制药公司的反对，它们还抗议整个澳大利亚民众都“把药品的性价比看得重于一切”。整个行业都谴责澳大利亚政府的措施“用心险恶”——说得没错，因为这些措施侵害了制药商们欺骗患者的权利，而这种欺骗是现存的药品市场的核心。^㉑

当被授予推销总统候选人的任务时，公共关系行业自然会借助它们销售商品的手段。在破坏市场规则的过程中用过的欺骗手法再

次被用在了扼杀民主制度上。然而选民们似乎察觉到了这种滑稽的模仿,在2000年大选之前,一大半选民把即将开始的选举斥为一场华丽的表演,策划者就是赞助人、政党首领和公共关系业,他们把候选人训练成善于树立个人形象和抛出空洞口号拉选票的玩偶。民意调查人发现只有一个问题是半数被调查者都视作候选人的真正立场,那就是戈尔在处方药物问题上的态度。经常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中超过百分之六十都感到“总体来说美国政治十分令人作呕”。哈佛大学“消失的选民项目”^{*}主任表示:“美国人无力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感觉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应当引起社会的警觉”,这种现象比以往要严重得多。^③

上述事实很可能就是整个民众对(以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为对象的)“被窃的选举”表现得几乎毫无兴趣的部分原因。它可能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2004年大选被控作弊一事漠不关心:如果国王是通过抛硬币选出来的,那么这枚硬币的重心有偏差又算得了什么。

2000年大选中,选民对“重要问题的知情”,也就是对候选人立场的了解创历史新低。不过在2004年大选中这一指标可能更低: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选民把“计划、思想、纲领、目标”等作为他们投票的首要依据(其中有百分之六的选民因这些理由选择布什,有百分之十三的选民因之选择克里)。看起来国家安全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有百

* 消失的选民项目(Vanishing Voter Project),研究美国民众参与大选、旨在提高投票率的一个研究项目。——译者

分之二十二选民“愿意为改善伊拉克局势贡献一些力量，百分之十二的选民提到了恐怖主义”。^②另外，有许多人投票的依据是公共关系行业宣扬的“品质”和“价值观”，这些是它们精心设计和推出的卖点，其真实性同牙膏广告中展示给大众的形象没什么两样。媒体则把评论的焦点集中在候选人的“风度”、“可爱”、“亲和力”和“性格”等方面，于是布什偶尔的“急躁”和克里说错了一个足球场的名字等这些小缺点都成了炒作的对象。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在报告中“分别提到了美国选民中经常参加宗教活动者的态度，和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观点都不赞同的人的态度”。虔诚的福音派白人新教徒在选举中是一个强力支持共和党的群体。“这一选区的选民把总统看成一个有着优良品质的人：诚实、纯朴、耿直、坚定、严肃及敬畏上帝”，一个“真诚而高尚”的人，一个“善恶分明”的人。这是市场营销手段的巨大胜利，让领导层能抛开公众的观点自如地实施他们的计划。^③

极端的宗教信奉现象早在殖民地初期和蛮荒时期就存在于美国了。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周期性的宗教复兴，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认为50年代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让公认的无能昏君但同时又是一名虔诚天主教徒的吴庭艳(Ngo Dinh Diem)担当南越傀儡政府的首脑，雅各布斯认为其原因是美国当时正处于宗教大复兴时期。沃尔特·迪安·伯纳姆在他1980年所写的著作中写道：“美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宗教意识(将成为)这个发达工业社会又一

个相对另类的重要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在前面提到过，是阶级偏见。一般说来，笃信宗教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是负相关的，然而美国是个特例。直到过去的25年里政党的领袖们才意识到，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为美国的富人和资本家们的利益展开竞选，可那些人并不怎么参与选举；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可以轻易利用教徒这一选民群体将选举变成“文化盛会”。1980年时已有一些细心的观察者发现了纳粹得势过程中所利用的宗教极端团体（德国基督教会）同美国国土上正在生成的“基督教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个名字是哈佛神学院的詹姆斯·卢瑟·亚当斯（James Luther Adams）起的，他曾有过相关的经历：1935到1936年间他曾在德国与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地下反纳粹教会一同工作过。前文提到的弗里茨·施特恩对“德国从一个正直的国家沦为纳粹统治下的野蛮民族的过程”的回顾，更体现出前面警示的重要意义。新闻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在报道中说：“目前在百分之三十六的共和党国家委员会中，或在全美18个州的共和党国家委员会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而且他们在“余下各州的百分之八十一的区域里还是最大的少数派”，乔治·布什总统为他们的动员活动立了不小的功，或被他们利用办了不少事。这一重要现象早就被注意到了，尤其是在以色列，最近以色列一家英语报纸《耶路撒冷邮报》面向美国右翼基督教徒增发了一份特刊，右翼基督教徒在美国大选中是对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最有力的支持力量。^④

2004年最细致的研究报告证实，选民们毫不知晓候选人对他们

特别关心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布什的支持者们愿意相信他们的候选人在关键问题上与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在共和党公开排斥他们的意愿时仍忠心不二,前面提到过的《京都议定书》一事就是个例子。我们查过那些研究所用的资料来源,发现克里的支持者们也遇到了基本一样的问题,除非我们对大多数选民都没听到过的克里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谈作出十分有利于他的解释。克里对他的支持者们所关心的国内国际问题几乎没有作过任何表态。而按照惯例,人们关心的那些美国国内问题就是选举开始几天前的最后一次竞选辩论的中心议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医疗困境是数一数二的国内问题,可据媒体报道,克里却在竞选辩论中“煞费苦心”地解释,他扩大人民得到医疗保障途径的计划不会催生出任何政府项目,因为“美国政府要介入医疗市场能得到的政治支持太少”。^⑤

这一言论很有意思。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大多数美国民众都支持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广泛的干预。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举行了一次联合民意测验,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认为政府应当保障‘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最好和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手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认为普及医疗保障“比减少税收更重要”。《商业周刊》上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七的民众认为美国应当像加拿大和英国那样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医疗保障,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表示相反意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过调查发现百分之六十四的美国人愿意“以提高税率为代价,让政府为每个公民都提

供医疗保障”(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对)。到80年代后期,已有百分之七十多的美国人“认为应该用宪法保障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这项权利已经写入了宪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议题没有被排除在议程之外,那上述数字会是多少。^⑥

上述事实有时也被承认,但又被怪异地歪曲了。政客难得提及公众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但评价却是这一想法缺乏“政治支持”,或“政治上无法接受”,原因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这是在委婉地告诉大家人们的要求遭到了制药业、金融界和其他的资本力量的强烈反对。公众的意志上不了政治论坛。^⑦

不论是在公共关系行业创造的商业市场上,还是在它们操纵的民主选举中,它们的第一要务就是精心制造出一些同现实只有一点微弱联系的幻象来迷惑公众。难怪选民们不答应他们的这种行径。多数选民认为:“只要领导人们能多关心一点公众的意见或民意测验的结果,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更好。”然而有那些被精心创造出来破坏市场规则的手段作梗,“消费者的选择”就无法进入政治论坛,公众的呼声就可以被抛在脑后。^⑧

在竞选中,布什在那些关心恐怖威胁和“道德价值”的选民中很受欢迎。可惜我们并不能从这一事实里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公众对恐怖活动的判断是政府和媒体宣传活动的又一个杰作。然而他们几乎完全不知晓布什政府的某些政策的目标,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那些使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不降反升的政策不是为公众的利益

设计的。关于“道德价值”，我们从选举结束第二天的商业媒体报道中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信息。报道里说那天各公司的董事会和会客室“充满了欣喜的气氛”，倒不是因为总经理们反对同性恋结婚，而是因为“现今美国的政治形势是近代以来最有利于公司成长的”，因此“美国工商业前方的发展道路非常畅通”。^③

看到布什及其同伙们不加掩饰地把自己为权贵们进贡所产生的代价转嫁给后代们承担，我们得以进一步认清了他们所谓的道德价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出警告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布什当政的这些年从未消除财政赤字的做法，是“拿他们的子孙当‘牺牲品’”。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告诉商业媒体：“当前这一代人也许能挺过这一关，但我们的孩子从我们手中接过的将是一笔严重缩水的资本。”“双赤字”中的另一个是高额贸易赤字，它同样引起了经济学家及其他关心未来的人们的担忧。不过在这里要指出，贸易赤字的规模取决于我们对“国家”内涵的界定。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统计数据显示得那样严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其原因为：“赤字的一部分来自于赢利不断增加的美国公司将其(在海外)生产的产品返销国内，或(从境外)向国内提供服务。(这促使)美国公司的整体利润走高。”到2005年，“美国公司利润增长总量已有百分之四十源于海外投资”，证券市场资本总额达到27 000亿美元，这使极少数大股东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看成是所有美资公司的集合体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总和，那贸易赤字的确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好的转变。^④

布什“签署”的教育促进计划再次暴露出了这种对我们的后代及社会健全度的轻视。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对孩子的测试而不是培养,但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现代高校体系的奠基人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观点,任何严肃的教育计划都应培养“质疑和创造”的能力为核心。集中于测试的教育计划对培养这样的能力非但无益,反倒可能有消极作用,显然洪堡特提倡的教育计划所需要的动机同布什的很不相同。

如果让我们给布什的教育计划另起一个浅显的名字,那就是“不留任何机会”——只用一种方式把这一代人该付的代价遗留给后代,不用任何其他方式。《美国科学发展协会》杂志声称,“由政府资助大学承担的研究项目对于如何在信息技术这一特殊领域激发创意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根本性作用”,熟知美国经济的人都明白其言下之意。该期刊提出警告说,政府对该项目的资助政策被布什改动后,使信息技术得到的资金减少了一半,可能会使“学术界、政府和信息技术产业间原本非常有益于生产力进步的相互作用突然消失”,使“这条创新链的存在受到威胁”。^①。三者之间的互动还延伸到了许多别的领域,因而布什的新出资政策也危及了那些领域的“创新链”: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因特网,卫星,电信和其他很多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行业,还有一个新兴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政府出资方式有两种:直接出资(给政府实验室和大学)和通过向私营公司提供补贴,进行采购和在必要时给予保护的间接出资。

就算抛开能揭示那些主流道德价值本质的清楚和稳定的证据不

谈,说选民把道德价值作为投票依据也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于选民心中的“道德价值”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有趣例子。在一次民意测验中,“选民要选出国家正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危机,结果百分之三十三的人选‘贪婪和物欲’,百分之三十一的人选‘贫穷和经济正义问题’,百分之十六的人选堕胎,百分之十二的人选同性恋婚姻”。在另外一次民意测验中,“被调查者被要求列举出对自己投票影响最大的道德问题,结果伊拉克战争位居榜首(百分之四十二的人选它),百分之十三的人选堕胎,百分之九的人选同性恋婚姻”。另一些研究表明,绝大多数赞同在全国推行医疗保险的人把这也看做一个“道德问题”。^④

不管选民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它们都不太可能是商业媒体赞颂的政府信守的那些道德价值。

公众观点和公共政策

证实大众观点内容最可靠的依据来自本书前文提到的一些研究,它们是长期关注公众意见的两家最受尊重且最可信赖的机构在即将举行大选前发布的。显然这样的信息对于一个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而言意义非同一般,这样的社会不是许多孤立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融合起来形成公众观点和公共政策的群体。在政治、科学及任何其他需要奋斗来实现的事业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上,了解他人的想法是得出本人结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几乎

是一条公认的真理。另外,单从前述重要信息我们就可判断出,一国的决策层让该国的公众意愿对其公共政策的形成起了多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是确认民主社会的一条独特标准。如果要评判美国的民主状况,我们当然首先要了解美国公众对主要社会问题的观点如何,这些观点同公共政策有什么联系,以及在总统选举前夕公众对它们的了解程度如何。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很少被公开,只有一些地方媒体和零散的言论提到过它们,难得的是在一家国家级媒体上(《新闻周刊》)出现过一条这样的言论。公众无从知悉那些关键的信息,如前文所讲,其中有些信息是能够启迪民众的。^④

一大半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当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管辖,签订《京都议定书》,让联合国在国际危机的解决中扮演领导角色,以及在“反恐战”中更多地运用经济和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同样也是多数人认为只有“存在有力的证据显示美国面临着遭到袭击的威胁”时,美国才能动用武力,这反驳了两党都赞同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像2004年12月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和一年后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一样,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一小部分美国人甚至提出放弃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这样美国就不会因其领导人的意愿而脱离联合国的领导了。在国内事务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扩大政府公益项目:头号问题是医疗保障(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其次是增加教育和社会保障经费。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对国内问题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前面所指出的,其他一些颇有影响的民意调查也表明多数美国人愿意政府扩大医疗保障,哪怕是以提高

税收为代价。然而美国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仅站在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甚至也站在其本国公民的对立面上。^④

华盛顿孤立于国际社会的一个例子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它违抗国际法院的决定。华盛顿排斥国际刑事法院的某些行为已达到了被很多国家嘲笑的地步，尤其是美国通过的一个所谓“尼德兰入侵法案”，这个法案允许总统使用武力营救被掳掠到海牙的美国公民——这种几率和小行星撞地球的差不多。由于华盛顿极端反感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干涉到美国的绝对主权（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它一面强调达尔福尔*将发生一起大屠杀，一面还阻止了国际刑事法院对那里的罪犯进行刑事审判。而且安理会通过的1593号决议（2005年3月31日通过，依据是允许联合国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武力的《宪章》第七章内容）授权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福尔事件进行调查和审理。这次美国愿意改变一贯投反对票的做法在表决中弃权，可大概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在决议中加入禁止联合国为调查出资的文句，这就意味着调查根本不可能开展起来。两周以前，《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在社论中写道：“历史不会宽恕那些有能力结束又一次屠杀，但为了自己残酷的游戏而冷眼旁观的人。”这是针对欧美推迟做出决议的行为，尽管这是事实，但大家比较欢迎的故事却是：“美国认为中国是通过安理会决议的主要障碍，否则联合国就能向苏丹施压，迫使它停止在西部达尔福尔村庄里的屠杀和破坏行为。”人权观察组织可不这么

* 达尔福尔(Darfur)，苏丹西部一地区。——译者

看,其国际司法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迪克(Richard Dicker)说:“达尔福尔的屠杀和强奸事件还在发生,可美国却提议继续推迟(安理会决议)……布什政府架空国际刑事法院的防守行为使达尔福尔的无辜人民生活危险当中。”^④

华盛顿的孤立还体现在了其他领域。在各国纷纷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公约并加入该公约时,惟有美国(和以色列)表示反对意见。其实早在20年前里根当政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国际信息系统的倡议就遭到了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抵制。美国还为此找了个诡辩的借口:让更多的国家进入国际信息系统会打破西方的垄断地位,导致媒体被他人控制并影响到新闻自由。美国还几乎一意孤行地反对国际社会对因特网进行监控,坚持由它独自来控制互联网。^⑤

美国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事例是过去25年里美国监狱的在押犯人的大幅度增加。起初美国监禁率与欧洲相仿,后来却升至欧洲的5到10倍,被关押者多数是黑人。如此高的监禁率却没有相应的犯罪率与之对应,美国的犯罪率基本与欧洲保持同一水平上。美国的监狱人数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比中国和俄罗斯高得多,而且在2004年又有所上升,尤其是女性犯人的数量。联邦监狱中半数以上的在押者犯的都是与毒品有关的罪。还有一件人们都熟知的事情:美国几乎是惟一保留了死刑的工业国家,奇怪的是有人把它称为一种“保守”的做法,其实这是国家集权的一种极端表现。此外,据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美国是世

上惟一监禁青少年并不准保释的国家。根据这两个组织的统计,美国关押了 2 225 名青少年,而世界其他国家关押的所有青少年的总和也只有两万多名,主要集中在南非、以色列和坦桑尼亚。美国部分州的法律甚至允许判处十岁大的孩子刑罚,目前在美国服刑的犯人最小的仅有 13 岁。很多人被控在抢劫的过程中杀人,过去 25 年里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青少年数量迅速增加,甚至比成年杀人犯增加得还要快。美国的这种司法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除美国和索马里(一个政府无力管理社会的国家)外,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参加了这个公约。^⑦

公众对待社会公益事业长久未变的态度清晰地显示出,他们是支持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社会经济条款的。那些条款肯定了“每个人都有权过上足以让他(她)本人及其家庭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包括有权获得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房、医疗以及必要的社会服务,还有权在遭遇失业、疾病、伤残、丧偶、年迈和其他非本人能控制的令其难以维持生计的情况时得到生活保障”。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的原文,同《宣言》的其他条款具有同等地位,这一点在 2005 年 9 月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再次得到了与会各方包括美国的正式承认。那次首脑会议“再次肯定了所有的人权都是世界性的,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且相互促进的,还肯定了所有的人权都应以同样的方式,在同等地位上被同等对待,并受到同样的重视”。假若如此,公众会再一次向布什政府的“道德价值”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这个政府一面在表面上正式承认上述人权,一面又以实际行动剥夺它们

的效力：2005年4月美国在“(联合国)对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在53个参会国中再一次成为惟一投反对票的国家。该决议旨在保障人们获得食品的权利和人们在可达到的范围内保持最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的权利”。^⑧

在那一个月前，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呈交了国务院的年度世界人权报告，充满激情地强调：“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任务，更是我们的政策和确定我们的焦点问题的基本原则。”以维护人权为职责的多布里扬斯基在别的场合下曾解释过人权的概念。多布里扬斯基在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曾担任负责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在那期间她总是努力打破一些关于人权的“神话”(这是她自己发明的称谓)，最显眼的—个神话是所谓的“构成人权的‘经济与社会权利’”。多布里扬斯基强烈反对把这种不存在的权利引入到人权事业中来，使之变得难以把握。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上面那些杜撰出来的权利，可它所代表的美国政府连《宣言》都否决了。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句话说，那些权利就像是“写给圣诞老人的一封信”；另一位大使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则认为那些权利“不过是只能装些模糊的希望和不成熟的想法的空船”，是“荒谬甚至危险的煽动性言论”(艾布拉姆是代表美国对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投下惟一反对票的人，它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的内容十分相近)。^⑨

在两党都信奉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遭到普遍反对的背景下，

更深入地了解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是颇有裨益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从事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4年大选的前夕有百分之七十四的民众认为,如果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没有向基地组织提供过支持,那美国就不该侵略它(持这一观点的占布什支持者的百分之五十八,克里支持者的百分之九十二及中立者的百分之七十七)。另外,百分之六十的民众反对美国在萨达姆仅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但还有将近一半人支持攻打伊拉克。这项研究的带头人史蒂文·克尔指出两者并不矛盾。尽管(前后两任伊拉克武器核查官)凯(Kay)和迪尤尔弗的官方报告都否认了对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对于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断言,美国从未认真去证实过),但进攻伊拉克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支持,因半数美国人始终相信伊拉克向基地组织提供了大量帮助,而且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至少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所以这些美国人把入侵伊拉克看成是预防一个紧迫而严重的威胁。政府媒体自2002年9月启动,并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看起来是又一次成功地在民众心中埋下了持久的恐惧。^⑤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经研究发现,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几周后的2003年4月,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应当领导伊拉克的“经济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到了2003年12月,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坚信联合国在“同伊拉克人民共同制定新宪法和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的过程中也应起领导作用”。这些数字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在

这些问题上的公众观点很少被报道出来,没有几家媒体公开过这些公众态度,这些议题也从未被安排进入竞选议程,结果是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实情的了解可能是世界上最少的。^⑤

前面提到过,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对美国民众的意见有一丁点尊重,愿意像伊拉克人民一直要求的那样把管理伊拉克的权力移交给联合国,那它现在应执行的就是“退出策略”。

西班牙选民在2004年3月遭到了美国的痛斥,原因是他们将自己的政府赶下了台,而他们这样做是由于西班牙政府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遵照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发出的命令出兵伊拉克——此举赢得了美国嘉许,称赞西班牙在“新欧洲”这个寄托着民主希望的集体中走在了前列。其实西班牙选民在2004年3月就表达过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的态度:本国军队留在伊拉克境内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可惜这个事实几乎没有一个评论家注意到。两个国家的主要差别在于:首先,在西班牙民众的态度是公开的,而美国不是;其次是西班牙将这类问题交给民众投票表决,而在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用同类社会的标准衡量,美国有效民主制度严重退化的证据更多了。^⑥

如果美国两党中的任何一个愿意支持和表达他们眼中的那些重要问题上的公众态度,那2004年的大选结果会是怎样?如果这些问题能在主流范围内交由公众讨论,那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只能去猜测,我们所知道的是那种情形并没有发生。

按一个失败国家的模式实施的选举会产生相应的后果。2005年2月布什政府发布了年度财政预算,国际政策态度项目随后对其进行

公众也提出了增加部分预算的要求,最主要的是社会公益支出,包括大幅度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费用以及扩大就业的费用。要求大量提高医学研究经费和退役军人待遇的人也占明显多数。“到目前为止,(公众所希望的)预算增幅最大的项目是对保存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公众要求投入的金额比原来投入的要多 240 亿美元,增幅达百分之一千零九十,支持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例也是最高的(百分之七十)。”在公众意见中,另一项预算增加最多(超过百分之二百)的项目是向联合国及其维和行动的资助。

简而言之,公众最强烈要求减少预算的项目恰恰是增长最快的项目,相反,他们最希望大幅增加拨款的项目在政府预算中却缺乏资金。这又一次向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摆出了有力的事实。幸运的是,美国还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对于它的公民来说获取信息是可能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得靠自己去调查收集,因为从媒体中根本得不到所需的信息。^⑤

公众对政府支出的意见同一些对民众观点研究的结果十分吻合。这些发现揭露了美国公众观点与公共政策的分离。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前面探讨过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一个例子。偶尔也有一些学术专著对两者分离的部分原因做出了分析。劳伦斯·雅各布和本杰明·佩奇在仔细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原始资料后有了毫不令人惊奇的发现:美国政策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国际化的商业机构”,其次是“专家的意见(可这些人又让商业机构影响了自己)”。相比之下,公众态度“对政府官员产生不了多

少实际的作用”，其实他们的发现只是对之前研究的一般结论的重复。诚如他们所指出的，美国政策的现状正是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所欢迎的，李普曼“认为公众意见的特点是信息不足妄作判断和反复无常”，他还“警告说跟随公众观点的结果将是‘国家权力功能的病态紊乱’，还会制定出‘给一个自由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政策”。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义”是相当露骨的思想偏见。亚当·斯密的发现很准，他认为谁要是想在那些能左右公共政策的人身上找出什么超人智慧的证据，肯定会一无所获，最多能看出那些人十分善于保护自己的利益。^⑤

几十年来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人没有感觉到政府对公众意见的重视，尤其是在里根当政的几年里这种状况迅速恶化。在大多数近期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对华盛顿当选者的决策有多大影响，让受测者在零到10之间打分（零代表毫无影响，10代表有极大影响），结果平均分是4.5分”，只达到了合格分数的大约一半。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信心都不及对英国和加拿大的信心。有分析家表示，美国人对海外“民主推进”的保留态度可能源于他们的一种看法，即美国国内可能也需要这项事业。^⑦

制度化的政府——商界控制

保守的集权主义者手握的政治权力较小，他们是一群尽心尽力的斗士，其始终如一和充满激情的程度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他们的

政策都是为富人阶层服务的,而且通常只针对富人中的一小部分,对于底层人民和后代则置之不理或损坏其利益。他们还极力运用现有的机会把自己的政策转化为制度,这样就使重建一个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变得障碍重重。

杰弗里·伯恩鲍姆(Jeffrey Birnbaum)精辟地指出:“掌权的共和党人不仅仅亲商界,还亲政府。”例证之一是2000至2004年间,联邦开支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大部分用在了“作为主要游说目标的项目”,那些项目的承办者是公司企业,而服务对象则是政府。在这样一种亲商界和亲政府的环境下,“在册的华盛顿游说者自2000年以来已增加了一倍,达到了34 570人,而那些说客的新雇主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也翻了一番”。^⑧

那些丑化了“保守”一词的保守集权主义者为了进一步使他们与商界的关系制度化,启动了所谓的“K街*计划”——这是共和党的政治捐客起的名字。华盛顿资深记者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把这种清除聚集于华盛顿K街的商业协会和游说组织的行为描述成“在华盛顿所能看到的,对民主党游说者及另一些代表着商业和其他组织的民主党人实行的最彻底,冷酷,凶狠,有力的打击”。其目的是保证“华盛顿所有的权力中心点”,包括商界都忠诚于政党的路线。“K街计划”的作用是进一步巩固了“制定政策的人和想要影响政

* K街(K Street),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条街道,以设有许多法律事务所和咨询公司著称,美国很多企业、团体和机构通过他们进行游说活动,以在法律制定上对国会施加影响。——译者

策的人之间的关联”，正像雅各布和佩奇又一次肯定的那样，试图影响政策的人几乎都集中于商界。在这一现状下，不难预料的是会出现“新的，更高层次的腐败”，腐败的一种表现是为防止本党在众议院的席位遭到挑战而大范围操纵选举。众议院是国家权力机构中民主党所占成分最大的，因此也最令人担忧。一名共和党游说者说，腐败行为“预计会变得更为隐蔽和低调”，除非走得太极端而损害到商界的利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这个权力愈加泛滥的国家里，“不光是立法活动越来越倾向最富有阶层的利益，而且国会本身也已变质”成了一个执行保护商业政策的“交易机构”。⁵⁹

对政府专权的又一个证明是“政府机密总体数目的大量增加”，据美国信息安全监督局(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ISOO)的报告，政府对公众保密的信息增长为原来的五倍。政府的理由是为了防范“恐怖主义活动”，可无论是从政府忽视防范恐怖活动的表现(前文分析过)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借口都很难站得住脚。要是那些秘密被公之于众，结果很可能就像对解密文件进行研究后通常发现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密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免于被那些“信息不足妄作判断和反复无常”的公众检查，(在现实主义者们看来)让公众知道了政府正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些什么，会危及“自由”。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打算阻碍解密活动的激进极权主义者。里根政府曾禁止披露50年代前期政府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议会政权的事件，那并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珍视的极权

政府不受那些讨厌公众的窥视。当政的小布什政府也是因同样的原因插手正常的解密程序,以阻止约翰逊政府在 60 年代颠覆希腊民主政权的行为被曝光,那次颠覆导致了欧洲法西斯势力的首次复辟。其实极端右翼分子并不在乎民主党的罪行败露,他们在乎的是公众了解政府的行径后就不便于被教导去敬重当今强大而高尚的领导人。^⑩

为了达到与亲商界的保守派极权主义者同样的目的,共和党领导人正把国会和政府都重建成“自上而下的极权系统”,凡是重要的决定都由政府里的“一小群拥护现政权的白宫西翼派(West Wing)组成的紧密团体”做出,国会则交由“一些领导人和忠于现政权的保守派”控制,控制的方式就像“世界 500 强企业的管理流程图显示的那样”。从结构上看,公司在政治上的对应物就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系统内,忠诚者会得到奖赏,而谁要胆敢“跟政党领袖作对”将会马上受到惩处。这种反民主的风潮当然也有先例,但从未达到过此次这样的程度。不过熟悉历史的人都不会为此感到诧异,因为历史中充斥着这类庄严的使命和民主的假象。^⑪

教育系统还不是完全由国家—公司所有的附属物,因此它也遭到了极权主义保守派的攻击。保守派们愤怒地指责“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保守的学生”受到处罚,还使学生们被灌输反美和同情巴勒斯坦及其他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而自由派的教职人员十分钟爱这些看法,我们在后面会了解到这些。奥威尔著作的读者们都会预料到,国家对学校的课程设置、人员聘用和教学安排施加控制时都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又是无耻的“有贼”(贼喊捉贼)伎俩。

可奇怪的是,那些反美亲巴勒斯坦的“左倾”分子控制教育系统的事竟没有出现在任何学术出版物上,而喜欢搜集不可信的奇闻轶事的“学术自由的捍卫者们”竟有意地疏忽了这件事。另一个在媒体上找不到的信息是,对据传已经占领了各学院的反以色列极端主义者的影响范围进行评估的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只需发起一次民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认为以色列应当与其他国家拥有同等的权利即可。这种评估很容易,但最好还是不要做,至于原因是调查的组织者心里清楚的。

媒体报道里说:“国会向着维持高校内部意识观念平衡这一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在支持者的强烈要求下国会采取的这一举措是十分必要的,它能使保守的学生免受自由派教授的不公评价。”这种论调在熟悉美国学术界现实的人眼里甚至不值得去嘲笑。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它的职能是调查该州公立大学里教职人员的选聘和晋升,学生得到的评价是否公正,他们是否有权自由地发表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处罚等问题”。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评论道,这项决议“是学术自由的巨大胜利”,他所著的“学术权利法案”是上述立法的依据。他还说,学术群体对这项决议的反对“十分激烈,他们在反对无效后败得更为惨痛”。结果是“学术自由”赢得了又一场对学术自由的胜利。

俄亥俄州参议员拉里·芒珀(Larry Mumper),同样是受到了那些保护学术自由不受“左倾”分子破坏的勇敢卫士的启发,向议会提出了一个“限制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讲授内容”的法案。他提出的“高

等教育学术权利法案’禁止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还禁止他们利用课堂宣讲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反宗教方面的看法”。芒珀说,很多教授在“侵蚀他们学生的价值观,因为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教授)都是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正式的共产党员’,这些人企图向学生灌输自己的理论”。这么看来,这些学者对学术自由的反对是那样“激烈”,失败又是如此“惨痛”的原因也不难解释了。^②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提案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能为国家节省大笔的经费,原因是照他们的议案,像经济、行政、历史等涉及人类社会问题的专业院系都必须撤销,因为在这些学科里宣讲个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持续地探讨有争议的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把这些科目降格为对学生技能和表现的测试。

还有许多州的立法机构也接到了类似的提案。中东问题研究的院系和和平研究的项目是这些提案的重点攻击对象。联邦政府也加入了这场闹剧,2003年10月,众议院“以全票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可要求高校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系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多支持一些,否则就可能失去来自政府的经费”。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中东问题研究的,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写道:“那部法案隐含的意思是,如果大多数权威专家都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错误的,那问题也是出在专家身上而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各院系感到:“如果华盛顿以外的(学术)中心不同官方路线保持高度一致,学术中心就要遭到惩治,这种联邦政府介入到大学的地区问题研究中的情形是史

无前例的。”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以往学术界受到的不那么直接的干预，那上面的结论就值得商榷了。在一篇评论研究中东问题及和平问题的院系所遭受的丑恶攻击的重要文章中，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巴鲁赫·基默林对“由一些‘主流’犹太组织支持的新保守主义及狂热的犹太学生联盟，在‘霍罗威茨十字军’理论的鼓动下对学术自由的攻击”可能造成的不祥后果进行了警告。基默林的文章题为“‘爱国’的暴民能掌管大学么？”可《高等教育纪事报》拒绝收录这篇文章。哈佛大学中东问题学者萨拉·罗伊在研究一个相似的主题时，调查了霍罗威茨对 250 项和平研究项目的攻击，同时霍罗威茨还声称：“教给学生如何辨别恐怖主义分子，以及让他们学会把美国视为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让他们挨饿的恶魔……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在其教育机构继续这样被误导下去的同时，还能同本·拉登及扎卡维战斗多久？”^③

就这一主题，不同的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有弗里茨·施特恩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问题；也有典型的权力卫道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出的截然相反的观点。霍布斯提醒国人“大学对于这个国家就像木马之于特洛伊”。他还表示应对大学“管教得严一些”，“在大学放下架子，使自己的研究……教学都绝对服从于国王的法律之前，我对这个社会能获得安宁不抱任何希望”。霍布斯还斥责大学“教学生造反”，主张分散权力，甚至还“散播陈旧的自由观和无神论”(引自科里·罗宾)。^④

在美国历史上，对科学的广泛排斥是一个有着深刻根源的现象，过去 25 年里一些人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而利用了它。在这种背景下

那些“爱国者”努力控制教育体系的活动就显得格外危险。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所有生物从世界第一天起的形态就是现在的样子”，认为学校不能教授进化论而应推广上帝创世说的美国人同样也占百分之四十。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要求学校把这两种理论都讲给学生，美国总统就是这个观点，他赞同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要教“智慧设计说”——“这样人们才能理解两者的区别所在（总统原话）。”^⑥ 布什的竞选班子肯定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论”。由于近年外国师生在美国遇到了许多困扰——上面的反科学行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已越来越不愿意留在美国工作和学习。布什政府敌视科学，并且乐意减少大学研究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是建立发达经济的基石）“让创新链不再运转”，其后果是外国人才的离心倾向又变得更增强了。大学的企业化进程正在进行当中，还将是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催生短期计划，信息秘密和其他后果；长此以往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次“明显的商业化的竞选”

这种亲商界、亲政府政策的危害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面前再也掩盖不住了。联邦紧急措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将新奥尔良发生一场大飓风列入了三大最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件。该署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报告里说：“新奥尔良飓风是我们想到的头号灾害，我们时刻牵挂着那里，因为那儿非常危

险。”联邦紧急措施署事前组织过防灾训练,并设计了完备的预案,可发生灾害时没有执行。《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个中原因:国民警卫队被派到伊拉克去了,“还带走了大批在应对大范围自然灾害时必不可少的装备,如数十台高压水车、悍马车、加油车和发电机等”。另外“一名高级军官说,军方不太愿意让波尔克堡军事基地的第十山地师第四旅承担救援任务,因为这个旅的几千名士兵正忙于部署到阿富汗之前的准备工作”。^⑥

按照布什政府眼中的轻重顺序,飓风灾害就和恐怖威胁一样不重要,在很大的范围内都存在着对飓风的轻视。就拿在阻击飓风和暴雨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湿地来说,在桑德拉·波斯特尔(Sandra Postel)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湿地已经消失了不少”,部分因为“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就废弃了老布什时期起用的‘无净损失’的湿地政策”。不止这些,据曾在联邦紧急措施署任职的官员说,由于布什政府把联邦紧急措施署并入了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减少了它的资源却扩大了它的官僚体系,这个机构的作用被“有力地压缩了”,随之而来的是里面的民主派左翼成员大量流失,这与白宫因中央情报局不够顺从而惩治它以后的情形十分相似。该署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联邦紧急措施署曾是“联邦政府的一级机构”,到了布什手里却连“后排座位都享受不到了”,被扔进了“国土安全部这辆车的尾部行李厢中”。这样一来,联邦紧急措施署就无力在新奥尔良成功组织每年一次的模拟飓风救灾训练,直到卡特里娜飓风的到来。布什削减了这项经费后,陆军工兵部队被迫取消了

很多防汛工程,包括对保护整个城市意义重大的大堤加固工程。然而布什政府在2005年2月提出的财政预算再次要求对该经费进行大幅度削减,《金融时报》对它的评价是:“有史以来被政府削减得最狠的一次”,而且布什政府这么做的时候恰好也很特殊,使人想起了2005年7月伦敦发生公共交通爆炸案之前英国政府刚刚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其公共交通安全支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指出,考虑到国家经济规模的变化,联邦紧急措施署的预算开支在过去3年里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九。小布什上台后新奥尔良的贫困率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八,而本来就不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又被进一步削弱。情况如此糟糕,任何一家媒体看到新奥尔良某些阶层和种族全面陷入困境时都为之震惊。对这个令人扼腕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道,布什的政策为广大美国人树立了一个“无能的政府”,这是失败国家的又一个显著的特征。^⑦

媒体开始把受灾者的惨状展现在国人面前后,共和党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采取赈灾措施救助海湾岸边的受灾人民,帮助他们获得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里有暂停联邦承包商(他们可能是下一个腐败丑闻的主角)支付现行工资的义务,以“降低投资成本”;还有限制受害者上诉权利的政策;给孩子们收费单据而不是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的补贴(津贴给了私立学校);削减食品券经费和学校早午餐计划经费(在公布出来的饥饿者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取消环保禁令;“废除受灾地区死者的房地产遗产税”——这对逃离新奥尔良贫民窟的黑人是个大恩惠,而且又一次表明了玩世不恭的统治者心里没有

任何顾忌。^⑧

无疑是布什这类极端主义者推动了被新奥尔良受灾事件暴露无遗的不良趋势,可这种趋势的根源深埋在黠武的国家资本主义中。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等学者多年以来一直都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城市和人民需求的轻视而哀叹。政治经济学家汤姆·赖弗(Tom Reifer)在一篇分析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的文章中表示:“事实又一次证明,对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在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外还包括本国民众——的残酷斗争中起着关键作用。”^⑨

乔治·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的主要成就是让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同时让工资水平维持原状甚至下降,还通过大力减少有钱人的税负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这些只是他造福于极少数美国人的众多政策中的一部分,使用这些政策会导致长期的“财政列车失事”(fiscal train wreck),会危及将来的社会支出,还会让后代们去承担今天的富人们掠夺财富造成的后果。^⑩

布什在第二个任期里的果断决策使他不愧于《华尔街日报》上一个评价他的新闻标题:“布什开始助大企业走向成功。”他在立法上的第一个胜利是《破产法》的出台,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部法律是在“工商界的协助和布什总统的支持下起草出来的”,它“坚定地认为借款人破产是其自身的问题,而不是贷款给他的机构的问题”,因而“它将在这个古老问题上把法制的天平偏向贷方”。这部法律旨在解决下面这个问题:大信用卡公司努力刺激偿还能力不强的群体无节

制地借款消费,这些债务人在无法还清到期债务后便不得不申请破产以生存下去。这部法律明显偏向富人和强势的一方,而“几乎不追究金融机构过于轻易让对方申请到贷款的责任”。提案人甚至排除了他人提出的“在法案中加入这样的条款:限制向未满 18 岁的学生发卡和给某些信用卡的利率设置上限”。信用卡机构的指导原则同国际贷款机构的基本一致。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鼓励穷国的富豪和权贵向其借款,这种风险性投资会产生高额回报,如果借款者无力偿还,它们就会运用一些结构调整计划以将债务转嫁给当地的穷人(既未借过款又未享受到贷款)和发达国家的纳税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籍行政主管十分确切地指出,该机构就是“信用财团的操作者”。高收益的风险贷款的成本由贷方承担的机制是众所周知的,只是没人留意到它。^①

因金融机构的贪婪引发的问题十分严重。破产申请在“过去的 30 年里增加了 7 倍,从 1978 年的 20 万例飙升到 2004 年的 160 万例”,估计到 2005 年会增至 180 万例。“绝大多数破产者是个人而不是机构”,导致这种现象的是家庭债务的持续增加,目前美国家庭的债务“与它们的可支配收入相比规模空前”。如此高额债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产业无休止的推动消费,而现在它们面对自己(高收益)的活动导致的后果不得不寻求法律的保护。研究表明:“有孩子的家庭申请破产的几率是无小孩家庭的 3 倍,超过百分之八十的申请破产者提供的理由是失业,医疗费用问题和离婚。”2001 年约有一半的申请破产案例都是负担不起医疗费用所致。“甚至有医疗保险的中产家庭

在家庭成员患病后都陷入财政危机。”^②

盖洛普调查组织发现：“对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最大因素是因没有钱而得不到所需的医疗服务。”从2005年1月开始，“美国家庭眼中最严重的财政问题变成了医疗支出。”调查者们认为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仅有百分之六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总体医疗费用表示满意”，而有百分之七十一不满意，百分之四十六“完全不”满意。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称在过去的一年里曾因费用过高而推迟了治疗，不难预料，收入较低或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人对医疗费用尤其不满意。超过一半的人曾推迟治疗相当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疾病，年收入低于25 000美元者则有百分之六十九推迟治疗相当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疾病。盖洛普调查组织认为“收入成了获取所需服务的一大障碍”，这就意味着最需要治疗的人得不到治疗。撇开有4 500万左右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这一重要因素不谈，美国人对本国的医疗保健制度的满意度仍低于英国和加拿大。^③

正如前面指出的，多数公众就算要缴更多的税也愿意让政府扩大医疗保障。然而，建立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可能会大幅度减少医疗支出，免除许多沉重的负担，像庞大的官僚体系、严格的监察、无止境的报告和伴随着私有化过程的其他负担。这些费用加上制药商和金融机构独有的能力，让美国的医疗体系成为工业化国家中最低效的，耗费却远高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各国的平均水平，在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上导致了一些最恶劣的后果。

飞速攀升的医疗费用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无法衡量

的生命损失。婴儿夭折率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2005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披露:“自 2000 年来,(美国)半个世纪来一直都稳定下降的婴儿夭折率第一次减速下滑并开始回升。”到 2005 年这一数字已达到了马来西亚的水平,可马来西亚的平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该《报告》还评估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比如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政时儿童贫困率急剧上升,而工党实施了到 2010 前将儿童贫困率降低一半的计划后,这一数字就开始下降。该《报告》的结论是:“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在社会发展战略中起着核心作用,大幅增加对有孩子的家庭的财政支持”加上其他的财政措施,“提高了有孩子的贫困家庭的收入”,这样就有力降低了儿童贫困率。^④

美国医疗体系的财政危机是众所周知的。据媒体报告,百分之三十的医疗费用都属管理费用,这一比例远高于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包括美国国内的这类体系(尽管它们还远不是最高效的政府医疗体系)。其实上面的数字还被严重低估了,传统观念的作用使医疗界不去计算个人的费用——医生在这方面不作为或被迫不作为,而病人则被“置身于一个文书的世界中,离奇得就如同属于卡夫卡作品中的那些没有身份的得胜的官僚机构”。治疗账单复杂得超乎想象,连作为总统高级顾问的医疗信息技术全国协调员看到他四岁孩子的账单都“既不明白里面有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其实政府官僚体系的荒诞性恐怕连卡夫卡都想象不到,想眼见为实的话就去看看厚达 98 页的政府处方药计划手册,那是供患者了解国会在 2004 年 6 月通过的法案中有哪些药可供他们选择的。为了那部法案能被通

过, 制药业派出的游说大军和大量健康维护组织* 没少努力。《华尔街日报》告诉其有钱的读者们, 出那部手册的精神是: “鼓励病人通过讨价还价获得较便宜的医疗服务”, 如果他们能雇用足够的助手去逐个审查自己面前的大量选择, 而且能幸运地找准对象的话, 他们也许就能节省一些医疗费用。《华尔街日报》编辑推荐的健康储蓄账户大致也是这个作用。对于富人和从中受益的公司而言, 这些动人的新计划就如同普通医疗一样好, 可余下的美国人就只能得到他们配得上的医疗服务了, 谁让他们没能成为前两种人呢。^⑦

布什政府处理医疗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减少给穷人的补助(医疗补助), 而且又选择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时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共和党领导们一面在国会推动削减数十亿美元医疗补助资金的议案, 一面还要参与拯救一个名为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的病人, 而夏沃可能是应享受医疗补助的病人中最出名的。”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表达了他对夏沃的深切担忧, 表示将为夏沃能得到“我们都应得的”生存机会倾尽全力, 可同时他又带头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预算案, 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从医疗补助项目中削减 150 亿至 200 亿美元资金。仿佛从一个可怜女人的人生悲剧中榨取党派利益还不够可耻, 狄雷和他的同党们又去抢夺她和无数像她这样的人的生存基础。除了这件事, 他们还在很多地方向我们

*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 美国常见的医疗保险形式之一, 是为自愿参加者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的组织。——译者

展示了他们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神圣性的信仰。^⑥

政府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医疗危机转移开的主要手段是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声称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以此为由要对其进行“改革”,也就是取消它。政府宣传的极大欺骗性已经无须多讲了,帮助这种宣传成为华盛顿的“热门话题”的是媒体的评论,不必多说里面尽是歪曲事实和颠倒是非的内容。华盛顿以外的这类宣传也是泛滥成灾。惯常出现的大肆欺骗活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平日少见的分析家们的失望评论都出现在了受管制的媒体上,比如布什“一再就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撒谎”,他的表态“明显是假话,这一点他的幕僚们肯定清楚”。^⑦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倒不是没有瑕疵,大幅减少的工资税就是一大缺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研究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评价是:“有一个发达国家中几乎最吝啬的养老金制度”,这与美国相对薄弱的社会福利措施相符合。^⑧

政府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危机是源于一个人口统计数据: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这是个事实,但还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情况。还有一个相关数据是工作人口与他们所扶养的人口(20岁以下,65岁以上者)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这一数据达到了1965年的最低点,而且无望在预期的时间内(2080年以前)回升到正常水平。可政府用来说明社会保障危机的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即将到达退休年龄,这将对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严峻的考验。可事实上在1983年格林斯潘增加了工资税后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已被反

复提到过。另外还应认识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曾在孩童时就得到了社会的照料,那些年猛烈上升的教育开支和其他抚养儿童需要的费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说并不存在政府所说的危机。如果当年美国社会能把这么多人从出生养到20岁,那么让一个更加富裕、人均产值比当年高得多的美国来把这批人从65岁养到90岁就不是个大问题。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多需要一些调整,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绝不存在什么大的危机。^⑩

对布什企图利用“所有者社会”计划*来废除社会保障的批评有了一些成效,因为强烈的公众反对让相关法律无法被通过。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政府的欺骗活动已达到了不少目的,为将来继续破坏社会保障制度打下了基础。为了回击政府的宣传,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第一次把社会保障列入了公众“最关注的事情”,结果发现它的公众关注程度仅次于“可否获得及能否承担医疗服务”。近一半美国人表示对社会保障“非常”担心,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相当”担心,恐怖活动和油价上涨等问题都不足以与之相比。经济学家马克·韦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说:“据人民的受托人(布什总统)提供的数据,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状况比历史上大多数情况都强”,可尽管如此,佐格比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一的美国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重困难”,而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感到它处于“危机”中。年轻人

* “所有者社会”计划(“ownership society” schemes),倡导让人们规划自己的未来,不依靠任何政府或社会组织。——译者

对它尤其担心,百分之七十的学生都“害怕等自己退休时已经没有养老金可拿了”。^⑩

意欲废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得胜了,这又一次揭示了在这个资本至上的社会里,有媒体帮着推波助澜,那些精心设计的宣传活动成了一项有力的统治工具,写进规则的谎言成了一项高超的技艺。与这次宣传胜利相对应的是政府与媒体通力使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他们的紧迫威胁,给他们灌输了与世界人民截然不同的观点。

人们已经开始讨论一个怪现象,那就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按照人们的意愿改革医疗体制却还没有被排上日程,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极其低效和功能弱化的医疗体制存在着的财务危机不算大问题,而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都运转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得马上着手修补。另外,就算社会保障制度在很久之后会遇上什么麻烦,那最可能的诱因就是高额医疗支出。政府在社会规划中预计将来支出的医疗补贴费用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急剧上涨,从2000年的不到百分之十涨到2080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这还只是规划涉及到的时段。而在同一时期内社会保障费用预计最多不会超过2000年的百分之五。医疗补助的微弱上浮与医疗保障的扶摇直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可分析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医疗体制私有化下的极度低效。^⑪

理智的人会从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体制的差别中寻找那个悖论产生的根源。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两者的确存在本质区别,在很多领域

中都能看到这种区别：那个悖论反映了各届政府都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举例来说，藏在“民主推进”事业的“清晰的轨迹”下的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症。社会保障对富人毫无价值，可对于工薪阶层、穷人和需要他们扶养的人，以及残疾人却是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富人眼中的这笔微不足道的收入，是近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退休后最可靠的“主要生活来源”。另外，社会保障作为一项政府职能所耗费的行政支出是非常少的，无法为金融机构带来收益，它只能帮助底层人民，而非有钱人。所以很自然，它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相反，富人向社会配给的医疗服务能给他们制造大量财富，资本家们通过医疗收取巨额利润后分给对其有用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监察机构、高价药品生产商以及其他低效组织。下层人民只能得到关于责任义务的说教。^②

此外还有抛弃社会保障制度的不错的理由，它的根基是一些道德价值，说出来会让政治领袖们和他们代表的阶层听了很不快，不过说给选他们上台的人民听没有关系，因为选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社会保障的想法可以形容为，一个社会有责任让住在城市另一面的残疾寡居的人不会挨饿，也有义务帮助街对面的小孩上得起一个像样的学校。这种邪恶的想法必须杜绝，因为它与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时代的新精神”相悖，即不符合“努力赚钱，忘记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按照这种正确的思维方法，那个寡居者找错了对象不是我的错，那个孩子的父母投资失败也不是我的错，我干吗要向公共基金捐出几十美分来帮助他们呢？相反，“所有者社会”就不会有这些道德缺陷。

回到 2004 年 11 月的大选,有关民众态度和意见在大选中的意义,我们知晓很少,但我们可以从那些未曾发表的研究中了解到很多东西。而且,整个事件使我们更加理解当今美国政府的民主——工业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因为特权部门和权力部门从他们的领袖那里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

后记

熟悉历史的人都不会奇怪民主赤字越来越高的美国还宣称要履行“弥赛亚使命”，给苦难的世界带去民主。霸权者常常使用各种暴力来展示自己高尚的目标，美国推进海外民主时也是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美国也的确接受某些形式的民主。正像倡导“民主推进”的权威学者所说，我们在国外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轨迹”：如果而且只有民主符合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它才会被美国认可（托马斯·卡罗瑟斯）。这条原则在美国国内同样适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难题，这个问题有时会被某些鸽派极端自由主义者直率地承认下来，例如，专为卡特总统提供拉美问题咨询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就是其中之一。帕斯特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尼加拉瓜支持残酷腐败的索摩查政权，而且在无法继续扶植这个政权后还全力在那个国家保留美国训练的国民卫队，甚至在这支军队“像对待敌人那样残忍地”屠杀了四万名左右的本国公民时仍不改变态度。帕斯特的理由听起来很耳熟：“美国并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那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但也不愿那里的形势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美国希望尼加拉瓜能独立，但前提是这不会影响美国在那儿的利益。”^①

布什政府的策划者们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局。他们想要伊拉克“独立，除非这会影响到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因此伊拉克必须是一个主权和民主的国家，但这种主权和民主又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一定要把它建成一个听话的附庸国，就像遵循传统秩序的中美洲国家。总的来看，这一常见的模式会给受害国

带去极端反动的体制结构。比如,克里姆林宫能同时维持几个卫星国,让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去控制它们,自己只需要摆出铁拳威慑它们。德国甚至在战争状态下都能对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实施这样的控制。日本则是一面打仗一面统治满洲(它的伪满洲国)。法西斯意大利则为了类似的结果在北非制造了大屠杀,那种屠杀行径决不会影响到它在西方的良好形象,或许还给希特勒带去了启发。传统的帝国秩序和新殖民主义秩序给人异曲同工的感觉。^②

可事实已经证明,美国要在伊拉克达到像上述国家那样的传统目标,其难度超出它的想象,尽管本书前文提到过,伊拉克的总体形势对美国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美国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让伊拉克独立,另一方面又要紧紧地控制这个国家,这个矛盾问题从入侵后不久就以一种严酷的外表浮出水面,因为侵略者在伊拉克民众的非暴力抵制下被迫允许伊拉克拥有比他们预期中多得多的主动权。这种结局让侵略者脑中出现了一个噩梦般的前景:拥有一定主权和民主的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同伊朗及邻近的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聚居区可能组成一个松散的什叶派联盟,这个组织控制着世界大部分石油资源,而且不受华盛顿支配。

局势还可能进一步恶化:伊朗可能不再指望欧洲能摆脱美国的影响,转而投向东方。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谈论过一个非常有关联的背景,他认为:“伊朗与欧盟间的核谈判存在着一个基础条件,可欧盟由于受到了美国掣肘,没能遵守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欧盟则向它提供安全

保障。双方的联合声明说得非常的“清晰，上面写着，‘双方都接受的协定’，不仅包括伊朗方面的‘客观保证’，即它的核计划‘仅限于和平用途’，还有欧盟‘对伊朗国家安全的坚定承诺’”。^③

协议中说的“安全”，很明显就是指要阻止美国和以色列(准备)轰炸伊朗的活动。这方面有一个常被引用的先例：以色列于1981年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似乎就是此举促使萨达姆启动了核武器研究计划，这个例子又一次证明了暴力只会引发暴力。华盛顿肯定也明白，如果对伊朗采取相似的打击措施，会立即招致它的报复。在什叶派颇有号召力的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一次访问德黑兰时对外发出警告说，不论何时只要伊朗遭到了攻击，他的武装组织将保卫伊朗。《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那里发来的最强的信号之一，如果西方与伊朗发生冲突，伊拉克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战场，引来可怕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甚至还可能招来美国亲手训练的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军队，这些军队出于对伊朗的同情也会同美军交战。”拥护萨德尔的团体在2005年12月的大选中所获颇丰，它可能即将成为伊拉克最强大的单一政治力量。它正在有意识地效仿其他成功的伊斯兰组织的模式，将对军事占领的有力抵抗与参加底层社会组织及帮助穷人结合起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就是这样做的。^④

华盛顿不愿把地区安全问题交给公众讨论，对此我们并不陌生，美伊冲突时常能看到这一点。在它的背后是以色列核武器问题，华盛顿禁止国际社会对以核武器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哈里森曾指出的“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核心问题”：有核国不遵守《核

不扩散条约》中“逐步销毁自己的核武器”的义务——华盛顿甚至公开否定了这条义务。^⑤

与欧洲不同,中国不惧华盛顿的恐吓,这也是美国的决策者们日益担忧中国的主要原因。伊朗已把相当一部分石油出口给了中国,中国也向伊朗提供了武器,估计这被美国看成了对自己的威慑。还有一件华盛顿更不乐意看到的事,那就是“中沙关系的快速发展”,体现在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援助和沙特许可中国在其境内从事石油勘探。到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中的百分之十七都来自沙特阿拉伯。中沙石油公司已签订了共同开采石油和建设大型炼油厂(埃克森莫比尔公司还是它们的合作伙伴)的合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在2006年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还可能会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增进双方的合作和在石油、天然气及矿物开发方面的相互投资”。^⑥

印度分析家阿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认为,伊朗可能“在大约10年以后成为亚洲能源安全网的关键环节,中国和俄罗斯都已认识到这个能源网是摆脱西方对世界能源供给的控制和保障亚洲大规模工业改革所必不可少的”。韩国、东南亚国家,还包括日本都有可能加入这个能源网。关键是印度会持什么态度,它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终止同伊朗签订的铺设石油管道合同。可另一方面,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表决反对伊朗核计划的议案时,印度又站在了美国和欧盟一边,不过它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与欧美一样都是虚伪的,因为它也反对《核不扩散条约》,而伊朗总体上是遵守该条约的。艾哈迈德说印

度在伊朗的威胁下可能已经暗中改变了其解除价值 200 亿美元的石油合同的打算。华盛顿在后来曾警告印度,如果它不听从美国的命令,那“美国就可能停止与它的核合同”,这引发了印度外交部的回击,也使美国大使馆低调地软化了其提出的警告。^⑦

印度也面临着抉择。它可以选择当美国的附庸国,也可以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比较独立的亚洲国家集团,这个集团与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印度教徒报》的副主编通过一连串很有启发意义的评论表明:“如果 21 世纪是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那亚洲国家被动的能源状况一定会终结。”目前尽管亚洲“包含了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发展最快的能源消耗国”,可它仍要“依靠外来的机构、贸易体系和武装力量,才能同它自己进行交易”,这种状况是西方帝国扩张时期的遗留物,目的是削弱亚洲。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印合作。他指出,印度和中国在 2005 年“做了一件让全世界的分析家都意想不到的事,即从毫不掩饰地争夺第三国油气资源的对手变为可能改变全球能源市场基本格局的全新合作伙伴”。2006 年 1 月双方在北京签订的协议“为中印把合作领域从技术合作拓展到碳氢化合物的开采和加工扫清了道路,这一伙伴关系最终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领域的根本规则”。几个月前亚洲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印度在会上“提出了一项价值 224 亿美元的宏伟计划,内容是泛亚洲天然气网络和石油安全管道系统”,这个计划囊括了整个亚洲,包括从西伯利亚的油田到中亚地区再到中东能源巨人的广大地区,还包括了能源消费国。进一步

看,亚洲国家“掌握着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全是以美元计算的。但按审慎的原则外汇币种应实现多样化,为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步是在亚洲石油市场上用欧元交易。这个举措已在各国的考虑之中了,一旦实施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力量平衡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继续谈到,美国“把印度视为即将出现的亚洲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因此竭力用核利益作诱饵,并向印度许诺与它结盟将拥有世界强国的地位,企图使新德里远离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地区共同体”。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的阴谋有得逞的可能,那“印度就必须抵制那些诱惑”。另外还出现了一个与此相仿的问题,那就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是以中俄为基础的反对美国势力向前苏联中亚地区扩张的力量。据莫斯科资深记者弗雷德·韦尔(Fred Weir)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正迅速发展为一个地区安全集团,可能就要吸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员”,还可能成为“以北约为对手的欧亚军事同盟”。^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决策者们就一直满腹担忧欧亚可能会逐步摆脱自己的影响,到如今随着三足鼎立的格局不断形成,随着新的南南对话的开展,还随着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快速发展,这种忧虑与日俱增。^⑨

美国情报机构已经为美国的能源供给进行了精心谋划,它认为一方面美国要以传统的方式控制中东的石油,同时应把能源的主要来源放在能够更加可靠地供给油气的大西洋海盆(位于西半球的西非地区),因为中东的石油现在已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来源了。而就是

这种打算也随着西半球的发展变得不保险了,加上布什政府的政策使美国在国际社会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布什政府甚至把美国同加拿大的关系都弄糟了,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政绩。据乔尔·布林克利的报告,美加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友好和充满火药味”,原因要归咎于华盛顿否决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加拿大的决议。“这件事是促使加拿大努力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原因之一,一些官员还说加拿大可能会将相当一部分贸易额,尤其是石油那一部分从美国转移给中国。”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表示,加拿大将在几年内把它目前出口给美国的石油的四分之一转售给中国。对美国能源政策造成更大打击的是委内瑞拉的行为,西半球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也许是拉美国家里同中国关系最紧密的,它为了减少对美国这个霸权者的依赖,采取的一个举措就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出口。从总体上看,拉美国家正加强同中国的贸易等各方面联系,特别是巴西和智利这样的原材料出口国,尽管它们的努力受到了一些阻碍,但很可能会取得更多的成果。^⑩

与此同时,古巴与委内瑞拉之间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也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委内瑞拉向古巴供给低价石油,而古巴则将数千名高水平的技术人员、教师、医生派往委内瑞拉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从事扫盲和医疗活动,古巴对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给予了这样的帮助。古巴与委内瑞拉的合作活动还延伸到了加勒比国家,古巴医生们在委内瑞拉资金的支持下为那里的人们治疗疾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奇迹行动”,牙买加驻古巴大使称赞它是“南南合作及

融和的典范”，而且它还激发了穷苦大众的极大热情。古巴的医疗援助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受好评。2005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地震是近年来世界上最严重的灾害之一。那次地震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还让难以计数的生还者在缺吃少药、无家可归的条件下承受冬季严寒的折磨。然而只有南亚的媒体对那里的情况作了全面报道，报道里说：“古巴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医生和护理人员队伍前往巴基斯坦”免费提供医疗服务（也许费用是委内瑞拉支付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古巴医护人员的“勇敢和善良”表达了“深深的感激”。据报道，派往巴基斯坦的团队里有1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古巴医护人员，其中百分之四十四都是女性，他们一直都在巴基斯坦的偏远山村里工作，西方援助人员都撤离后他们仍“顶着寒冷的气候，克服陌生的环境，住在帐篷里”，他们建起了19个野地医院，每天12个小时轮班工作。^①

一些分析家甚至认为古巴和委内瑞拉可能会合并，这将更深入地推进拉美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未来将出现一个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拉美国家集团。委内瑞拉已经加入了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一个南美国家的关税同盟组织。阿根廷前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称委内瑞拉的加入是该组织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也欢迎委内瑞拉加入进来，表示它“开启了我们更好地融合的新篇章”。有独到见解的专家说：“把委内瑞拉吸收入这个集团深化了把南方共同市场扩大到整个南美地区的地缘政治观。”在一次

庆祝委内瑞拉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的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我们不能只把合作限定在经济事务上,那仅仅有利于精英阶层和跨国公司。”可以听得出,这段发言是暗指美国发起的那个饱受民众反对的“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协定”。委内瑞拉向阿根廷提供燃料油,帮助它挺过能源危机,它还收购了阿根廷 2005 年发行的外债中的近三分之一。这是该地区的国家为摆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所做的一种努力,20 年受制于这个机构已使它们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基什内尔总统在宣布将还清近 1 万亿美元的债务以永久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这个组织“是导致阿根廷人民贫穷和苦难的政策推行者和承载者”。阿根廷在抛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后,大步走出了过去的经济困难。^⑫

南美地区融和独立的进程又被另一个事件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 2005 年 12 月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当选玻利维亚总统,他是第一位从本土民众中诞生的总统。莫拉莱斯上任后很快就与委内瑞拉达成了能源协议。《金融时报》报道,莫拉莱斯的举措“有望为即将发生在玻利维亚经济和能源领域的深刻改革打下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玻利维亚拥有大量石油资源,其储量在南美仅次于委内瑞拉。莫拉莱斯还决心取消玻利维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5 年来对这项政策的有力实施,使玻利维亚的人均收入比起初没有实施的时候还要低。在那 25 年间,玻利维亚政府只有一次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中止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政府接纳了世界银行的建议,让供水业私有化以“实现水的真实价格”,顺便提一下,这个举措让玻利

维亚的穷人连水都喝不起了。^⑬

在华盛顿眼中,委内瑞拉四处“颠覆”的活动竟触及到了美国本土。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有人要求扩大2005年3月布什提出的“遏制”委内瑞拉的政策。《华盛顿邮报》报道,2005年11月一些参议员联名写信给“九家大石油公司说:由于冬季取暖费用预期会大幅度上涨,请你们捐出部分利润帮助低收入者支付上涨的费用”。可他们只收到了一封回信:来自委内瑞拉控股的CITGO石油公司的回答,该公司提出先向波士顿地区的低收入居民提供廉价油,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国务院对此的表态是,查韦斯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它和“古巴政府向医学院提供奖学金的做法有些相似,因为古巴政府的奖学金使美国的医学生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援助与这可不相同,是纯粹的毫不利己专门为人。委内瑞拉CITGO石油公司并不清楚它捐出微薄的“1200万加仑廉价取暖用油”是否会得到“当地慈善机构和马萨诸塞州的45000户低收入家庭”的感激。然而穷人们是在油价上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燃料补助项目又“严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得到这些捐赠的,所以向“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救济粮发放机构和为贫困家庭提供住处的组织”分发廉价油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认为:“这对于那些本来无法度过这个冬季的人来说是雪中送炭。”那位负责人还“表示他希望CITGO公司的行为能‘友好地刺激’到那些最近公布了季度赢利的美国石油公司,让它们用自己发的横财来帮穷人们熬过冬季”,不过很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⑭

尽管中美洲大部分地区曾被里根政府以暴力和恐怖统治着,然而美洲其余的地方正在脱离美国的影响,尤其是委内瑞拉到阿根廷一带的国家。那些国家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用作它们的代言儿童*,不过那些国家的经济最终都因为这些机构强加给它们的政策而崩溃了。现在那一带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持中性偏左的立场。它们的本土居民开始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活跃和有影响力,特别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两大能源生产国,它们的国民要求要么自己掌握本国的油气资源,要么就不要开发这些资源。看来有些当地国民想不通,凭什么为了让纽约市的人能把运动型多功能车开出去拥堵在路上,就要以破坏甚至毁掉他们的生活、社会和文化为代价。有人甚至呼吁在南美建立一个统一的“印第安国”。同时南美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改变了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的经济模式,即拉美的精英层和国民经济同帝国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联系不是相互的。南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受到了不断扩大的南南合作的影响,另外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正义行动中走到一起的各国民间组织也有力地推动着南美的经济改革。有人给这次正义的行动起了个可笑的名字——“反全球化运动”,原因是它崇尚的全球化是优先保护人民大众利益的全球化,而不是一味维护投资商和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全球化。看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是脆弱的,除了布什政府的决策者

* 代言儿童 (poster child), 作为慈善团体赞助的对象出现在宣传海报中的孩童。——译者

人为的损伤外,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对它也有破坏作用。

布什政府想用传统的手段阻碍别国的民主已经遇上了一些新障碍,这是反全球化运动带来的一种影响。靠军事政变和国际恐怖主义推翻民选政府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2002年布什政府的策划者们就已从委内瑞拉事件里悲哀地学到了这个教训。那条“清晰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改变其延续的方式。正如我们所见,伊拉克民众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迫使华盛顿和伦敦放弃了它们对民主选举的阻挠。选举开始后,英美仍想破坏它的公正性,它们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制造了大量优势,并禁绝了独立媒体的参与,结果它们的图谋还是没有得逞。而且华盛顿的麻烦还不止这些,尽管有占领当局作梗,伊拉克工人运动仍取得了傲人的进展。这种情形同二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十分相似,当时英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削弱这些地方的独立工人运动。事实上它们在本国采取的也是这一政策,原因是一致的:工人组织以其与公众的紧密联系在重要的方面促进着有效的民主。可现在不比当年,像限制食品发放、支持法西斯警察等这一类手段都不能再用了。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再指望通过“美洲自由劳工发展机构”这样的劳工机构去分解工会组织了。如今美国工会已经在别国支持工人组织了,其中有伊拉克,也有哥伦比亚这种暗杀工会领导事件最多的国家。现在哥伦比亚工会至少已得到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另一些组织的支持,可华盛顿却仍在为谋杀事件承担大部分责任的哥伦比亚政府。^⑮

巴勒斯坦的选举出现了和伊拉克同样的问题。正如本书前面一

直强调的,布什政府不允许巴勒斯坦在亚西尔·阿拉法特死之前举行选举,担心那时当选的不是他们中意的人。阿拉法特死后他们才同意举行选举,盘算着让顺从他们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候选人当选。为达到这个目的,华盛顿使用了许多在伊拉克大选中用到的破坏手段,有许多还是在伊拉克选举以前都用过的。华盛顿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这条“暗中渠道”去完成“在重要的选举前夕提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公共支持率的任务,因为权力机构在选举中面临着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严峻挑战”。为此国际开发署在本周把将近200万美元投入到“选举前的数十个短期计划中,以提升占统治地位的‘法塔赫’在选民里的形象”。在美国或任何西方国家的选举中,任何一点外国干涉的迹象都会毁掉一个候选人,但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却使这种时常干涉国外选举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然而,这一次美国的企图又是以彻底失败告终。^⑩

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现在不得不调整心态去同一个伊斯兰激进党派打交道,哈马斯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惯用的拒绝和谈立场,不过只要它的领导人是真心同意在其国际边界上实现无限期休战,那就可以说哈马斯的态度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始终坚持以色列一定要占领西岸的大片土地(以及被遗忘的戈兰高地)。哈马斯拒不承认以色列有“存在下去的权利”,反照出的是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国“存在的权利”——这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很少被提到的概念;墨西哥接受美国的存在,但并不承认美国在墨西哥一半的领土上的抽象的“存在

权”，因为那些土地是美国强行夺走的。哈马斯公开宣称要“摧毁以色列”使它被归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同类，因为美以曾公开宣称（除了约旦外）不得存在“其他的巴勒斯坦国”，不过近几年来它们极端的排斥立场有所转变，转变的方式前面已有所论及。如果哈马斯作了下列表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它并没有说过这些话）：犹太人可以继续生活在目前以色列国的零碎领土上，让巴勒斯坦人利用建造大型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办法来攫取珍贵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并将以色列分解成一块块无法供人生存的子区域，这些区域彼此将完全隔离开，同犹太人可以居住的部分耶路撒冷地区也要分隔开，而且犹太人还可以称那些零散的土地为一个“国家”。如果哈马斯真的有这样的言论，我们会很正当地把他们定性为纳粹的翻版，还会引发一阵思潮。而且，那样哈马斯的立场就与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五年里的态度完全相同——当时美以两国都答应接受某种贫瘠的巴勒斯坦“国家形态”。对于持这种立场的哈马斯，我们可以很公正地把它定义为激进主义分子，暴力组织，和平及公正的政治格局面临的巨大威胁等。不过显而易见，真正持这种态度的并不是哈马斯。

美国在别国用传统手段破坏民主则取得了成效。布什政府最青睐的“民主促进组织：国际共和学会”在海地无休止地从事反对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美国则以最可疑的理由停止发放海地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援助，以此来支持国际共和学会的活动。当形势表明阿里斯蒂德很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赢得一场真正的选举时，美国和海地反对派采用了退出选举的策略，这一招是美国在无法操纵一场选举

时常用的,目的是降低该选举的公信度,1984年的尼加拉瓜选举和2005年12月的委内瑞拉选举都是这样的例子。退出选举之后就该上演军事政变和驱逐民选总统了,接下来人民就会生活在暴力和恐怖统治之下,这是在民选政府治理下不会有的现象。^⑦

一直存续至今的那条清晰的轨迹再一次让我们看清,美国与其他的强国是十分相似的。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国内统治阶层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为掩盖这个真实目标它会用大量华丽的语句来表白自己对最崇高价值的追求。这种行为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理智的人不会相信领导人们表达的高尚理想,也不去理会他们的追随者们的溢美之词。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那些挑剔的批评家们总是抱怨这不对那不对,但他们从来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其实那些指责者真正想说的是:“他们是拿出了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喜欢。”这里除了将美国从生存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所需要采纳的建议外,还有一些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应当认真考虑的简单意见:(1) 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2) 签署并执行《京都议定书》;(3) 让联合国在国际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扮演领导角色;(4) 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而不是武力来消除恐怖主义威胁;(5) 尊重并遵守对《联合国宪章》的传统解释;(6) 不滥用安理会否决权,像《独立宣言》所提倡的那样“宽容地尊重全人类的意见”,即使权力中心有不同意见也要如此;(7) 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大量增加社会公共支出。对于信仰民主的人们而言,这些都只是十分保守的提议,看起来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持这些观点,而

且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这么看的。然而公共政策却与这些建议背道而驰。肯定地说,我们其实并不太清楚公众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怎样的,原因来自民主赤字的另一个特征:这些问题很少得到公众的讨论,因为一些基本的事实还得不到公开。这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因此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统一意见供决策者参考。

另一个保守的提议是应重视事实、逻辑和基本的道德原则。谁要是能耐心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很快就会发现很多我们熟悉的官方宣传内容都应被抛弃。当然,简单地重复那些自吹自擂的颂歌比审视和批判要轻松得多。提议中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能帮助我们向着更详细更清楚的答案靠得近一些。更重要的是,那些事实还为我们展露了实现它们的方法,只要我们能将自己从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理论和错觉中解放出来,实现这一切的机会就是触手可及的。

尽管政府宣传机构要在民众中制造悲观、无奈和绝望的情绪是正常的,但现实就是现实。这些年来人们对正义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已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这种基础使我们将来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继续进行正义和自由的事业。现在就有许多机遇可以让民众受到教益和得到组织。与从前一样的是,我们既不能指望仁慈的统治者们会赐给我们权利,也不能靠着断断续续的行动来争取权利,比如参加一些示威游行或在四年一次的所谓“民主政治”活动中投上一票,因为那不过是一场操纵在个别人手中的铺张闹剧。要获得权利始终都要求我们每天都亲身去创造,或再创造有效民主文化的根基,使公众能在政

治和重要经济领域的决策中发挥一定作用,而目前公众在这两个领域中基本上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改善国内民主状况,并将其向新地域推广的方式有很多。机遇是充分的,但抓不住它们就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对美国,对世界,以及对我们的后代。

注释

序言

- ① Gar Alperovitz, *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Wiley, 2005). 所谓“历史价值观”就是那些被公开宣称的。至于权势者们有效的价值观,总有许多值得我们讨论。
- ② Stuart Eizenstat, John Edward Porter, and Jeremy Weinste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 ③ See, especially, my *Hegemony or Survival* (Metropolitan, 2003; updated, Owl, 2004); additional discussion and sources in the electronic at www.americanempireproject.com.

第一章

- ① *New York Times*, 10 July 1955.
- ② On the shameful record, see Howard Friel and Richar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Verso, 2004).
- ③ 本人举了一个小例子, see “Simple Truth, Hard Problems”, *Philosophy*, January 2005。我所知的惟一公开反驳该原则的例子是国际法教授 Michael Glennon 的广受褒扬的著作 *Limits of Law, Prerogatives of Power* (Palgrave, 2001), pp. 71ff。他对该原则的驳斥也许是无心的,他的理由是一个未经论证的假设:责任是无法分担的。他对“客观主义哲学”余下的驳斥也是相似的。详见本人“Moral Truism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003。
- ④ Philip Zelikow,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3。欲了解事实, see *Action Aid, Real Aid: An Agenda for Making Aid Work*, May 2005。据估计,富国的援助只占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一,其中美国和法国的实际援助又是最少的(接近百分之九十都是“虚拟援助”,最后都流回了援助国),而美国在官方援助方面都几乎垫底。
- ⑤ Michael Phillips, *Wall Street Journal*, 27 January 2005。 Jeffrey Sachs, *New York Times*, 25 June 2005。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3 September 2005。在“我是老大”的形象建立起来后, Bolton 后来同意作一些妥协。
- ⑥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veryman's Library, 1994), volume 2, p. 355.
- ⑦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Modern Library, 1994), book 3, p. 444.

- ⑧ 也许是靠近国际惯例,人们通常保持缄默,但有时也有人说出实话:以色列国防部明确:“法律只把‘以色列的敌对组织’发动的袭击认为是恐怖主义活动。”Chris McGreal, *Guardian*, 1 September 2005. Michael Kinsley, *Wall Street Journal*, 26 March 1987.
- ⑨ Indira A. R. Lakshmanan, *Boston Globe*, 13 June 2005.
- ⑩ Reuters, *New York Times*, 20 July 2005.
- ⑪ Reuters, *New York Times*, 28 September 2005. Jimmy Burns, *Financial Times*, 29 September 2005. Ciaran Giles (AP),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13 October 2005. *El País*, 15 and 16 October 2005.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要求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立场上拒绝让步,而且再次谴责美国的“封锁”政策。在2005年11月8日的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各国以182对4票(投反对票的是美国、以色列、马绍尔群岛和贝劳,密克罗尼西亚投了弃权票)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禁运。然而,媒体对此事几乎不置一词。See Jim Lobe, Inter Press Service, 12 May 2005.
- ⑫ Graham Alliso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For Mueller,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 200.
- ⑬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05 Year Book. Reuven Pedatzur, *Ha'aretz*, 26 May 2005.
- ⑭ Max Boot quoted by Roger Cohen, *New York Times*, 12 June 2005.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news release, 6 April 2005. Max Boot,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2003.
- ⑮ Pedatzur, *Ha'aretz*, 26 May 2005.
- ⑯ James Blight and Philip Bremer, *Sad and Luminous Day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On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 74.
- ⑰ Robert McNamara,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5.
- ⑱ Graham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 (Times Books, 2004). He also cites very close calls.
- ⑲ John Steinbruner and Nancy Gallagher, *Daedalus*, Summer 2004.
- ⑳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5* (Washington, December 2000). US Space Command, *Vision for 2020*, February 1997. Pentagon, *Quadrennial*

-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On UN and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and more detail,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209, 230, 231 - 232.
- ②① 见美国战略司令部 (STRATCOM), “Essentials of Post-Cold War Deterrence”, 1995。欲查引自该重要著述的更多内容, 见本人 *New Military Humanism* (Common Courage, 1999)。另见 1980 年 1 月 29 日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向国会做的 1981 财年预算报告, 该文第 103 页承认了误导公众对“苏联威胁”的认识的必要性。
- ②②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Strategic Master Plan FY06 and Beyond*, 1 October 2003 (emphasis in original). Tim Weiner,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05.
- ②③ William Arkin, *Washington Post*, 15 May 2005. Walter Pincus, *Washington Post*, 16 March 2005.
- ②④ Tim Weiner,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05. Demetri Sevastopulo, *Financial Times*, 19 and 20 May 2005. Jehangir Pocha, *Boston Globe*, 1 August 2004, citing *Jane's Defence Weekly* editor. Edward Cody, *Washington Post*, 12 April 2005. See also *Hegemony or Survival*, Afterword. (On spending, see Simon Collard-Wexler et al., *Space Security 2004* (Northview Press, 2005).
- ②⑤ David C. Hardest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pring 2005. 华裔物理学家、战略分析家、肯尼迪学会成员 Hui Zhang, *Financial Times*, 9 June 2005.
- ②⑥ Neil King, *Wall Street Journal*, 8 September 2005.
- ②⑦ Michael MccGw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05 (his emphasis).
- ②⑧ Sam Nunn, *Financial Times*, 6 December 2004. Bruce Blair, *Defense Monitor*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Washington), January-February 2004.
- ②⑨ Graham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 See also Graham Allis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nline, September-October 2004.
- ③⑩ Bruce Blair (美国防务信息中心主任, 曾任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控制军官), *Washington Post*, 19 September 2004. Blair, *Defense Monitor*, January-February 2004.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etropolitan, 2004), p. 288.
- ③⑪ Walsh, see Stephen Fidler, *Financial Times*, 22 May 2005.
- ③⑫ Science correspondent Mark Henderson, *Times* (London), 7 June 2005. Lead editorial, *Financial Times*, 9 June 2005. Andrew Revkin, *New York Times*, 18 June

2005. Lead editorial, *Financial Times*, 20 June 2005.
- ③ Clive Cookson, *Financial Times*, 19 February 2005. Andrew Revkin, *New York Times*, 29 September 2005. 通过对数据库的一次检索,在当地三家报纸上搜出相关报告。《华盛顿邮报》在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议所作的“对一些值得注意的报道作的简短摘要”,主要是围绕着一篇关于美国北部污染的论文。
- ④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Global Views 2004*. PIPA, *The Separate Realities of Bush and Kerry Supporters*, 21 October 2004.
- ⑤ George Tenet, letter to Senator Bob Graham, 7 October 2002. 欲了解此信及其他文件的内容,见 John Prados, *Hoodwinked: The Documents That Reveal How Bush Sold Us a War* (New Press, 2004). Reuters, *Boston Globe*, 22 June 2005. Douglas Jehl, *New York Times*, 22 June 2005. Douglas Jehl and David Sanger, *New York Times*, 28 September 2004. NIC 2020 Project,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December 2004. Douglas Jehl, *New York Times*, 14 January 2005. Susan Glasser, *Washington Post*, 29 May 2005.
- ⑥ Alan Richards, *Middle East Policy*, Summer 2005. Scott Atran, “Lifting the Veil — the Face of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unpublished ms., Jakarta, Indonesia, August 2005. 其他媒体发布的报道,见 Jimmy Burns and Mark Huband, *Financial Times*, 24 January 2003. Douglas Frantz et al., *Los Angeles Times*, 26 September 2004. Dana Priest and Josh White, *Washington Post*, 17 February 2005. Also Peter Spiegel, *Financial Times*, 20 October 2004,文章的内容是关于伦敦战略研究学会的年度报告的,该报告探讨了伊拉克战争对核扩散的影响,再次表明了这个学会从前得出的结论,即伊拉克战争使基地组织得到了壮大,并“错误地促使一个本已分化和弱化的国际恐怖组织发展得更为‘实体化’及多变,以致更难对其进行确定和压制”。见 Scott Atran 于 2004 年 1 月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巴黎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所作的名为“Confounding Terrorist Networks and Rogue States”的讲座。
- ⑦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IIA), *Security, Terrorism and the UK*, July 2005. Richard Norton-Taylor, *Guardian*, 29 July 2005. Gerri Peev, *Scotsman*, 29 July 2005. MI5 website, 19 July 2005.
- ⑧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19 July 2005. Tony Thompson et al., *Guardian*, 31

- July 2005.
- ③⑨ Bryan Bender, *Boston Globe*, 17 July 2005. Greg Miller and Tyler Marshall, *Los Angeles Times*, 16 September 2005. Nawaf Obaid and Anthony Cordesman, *Saudi Militants in Iraq*,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September 2005. Dan Murph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7 September 2005. John Ward Anderson, *Washington Post*, 19 October 2005.
- ④⑩ Bender, *Boston Globe*, 17 July 2005. Peter Bergen and Alec Reynold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5.
- ④⑪ Dan Murph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5 July 2005. Reuters, *Boston Globe* and *Sydney Morning Herald*, 2 November 2005.
- ④⑫ Robert Pape, *New York Times*, 9 July 2005. B. Raman, *Asia Times*, 16 July 2005.
- ④⑬ Fawaz A. Gerges, *The Far Enemy* (Cambridge, 2005), "Final Thoughts."
- ④⑭ Anonymous (Michael Scheuer), *Imperial Hubris* (Brassey's, 2004). See also Jonathan Randal, *Osama* (Knopf, 2004); Jason Burke, *Al-Qaeda* (I. B. Tauris, 2003).
- ④⑮ 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22 July 2005.
- ④⑯ Jack Synder,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3.
- ④⑰ *New York Times*, 7 March 2003.
- ④⑱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Joel Brinkley, *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2005.
- ④⑲ Prados, *Hoodwinked*.
- ⑤⑰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29 April 2005. Memo from *Guardian*, 28 April 2005.
- ⑤⑱ *Sunday Times* (London), 1 May 2005. Matthew Clar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7 May 2005. Mark Dann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June 2005. Thomas Wagner, AP, *Boston Globe*, 19 June 2005. 关于媒体对此的反应, 见 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 Action Alert, 14 June 2005, 引自 Michael Kinsley (*Los Angeles Times*) and Dana Milbank (*Washington Post*), 他们两人仅是代表。
- ⑤⑳ Michael Smith, *Sunday Times* (London) defense commentator, *New Statesman*, 30 May 2005; *Los Angeles Times*, 23 June 2005; *Sunday Times* (London), 26

June 2005.

- ⑤③ Ed Harriman, *Sunday Times* (London), 11 January 2004.
- ⑤④ Machael Smith, *Sunday Times* (London), 1 May 2005. Chris Tud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 2005. 欲知更多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内容, 见我的 *Fateful Triangle* (South End 1983; 1999)。关于美国国内对侵略原因的承认, 见我的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Columbia, 1994; 1996)。关于科索沃问题, 见我的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Verso, 2000)。James Risen 和 David Sanger, *New York Times*, 15 October 2005。据他们报道, 叙利亚境内也发生了袭击。
- ⑤⑤ 欲见最近的评论, 见 Irene Gendzier, *Middle East Report*, Spring 2005。另见 Gendzier, *Dying to Forget*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即将出版)。关于《生物及有毒武器公约》被违反的情形和炭疽病毒问题, 见 Dominic Kennedy, *Times* (London), 9 August 2005。该文参考了 Geoffrey Holland 的研究报告“United States Export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to Iraq: Compromising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这篇研究报告在全球化研究中心可查到(www.globalresearch.ca)。
- ⑤⑥ James Glanz,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05. Associated Press, 3 June 2005. Rami Abdelrah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2005.
- ⑤⑦ 萨达姆政权的支持名单里有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撒切尔政权里的所有主要人物。关于布莱尔的新工党时至 2001 年的不凡纪录,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p. 30;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
- ⑤⑧ Michael Jansen, *Jordan Times*, 7 July 2005. Javier Blas, Carola Hoyos, and Steve Negus, *Financial Times*, 15 June 2005.
- ⑤⑨ 这部分主要参考了 Stephen Zunes,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4。关于叙利亚与美国在“反恐战”中的情报合作, 见 Steven Van Evera, *American Conservative*, 14 March 2005。1982 年, 古巴取代了美国的支持恐怖组织国家名单中伊拉克的位置。在那不久前, 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发动的恐怖战争发展到了空前野蛮的程度。
- ⑥⑩ Stephen Zunes,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4. Zogby International poll, 7 April 2004. PIPA, *Americans on the Israel / Palestinian Conflict*, 8 May 2002. Mark Sappenfie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5 April 2002。欲了解更多信息,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7。

- ⑥1 Philip Shenon, *New York Times*, 6 June 2005. Shenon, *New York Times*, 21 October 2005.
- ⑥2 Thomas Oliphant, *Boston Globe*, 10 July 2005.
- ⑥3 “Treasury Office Has Four Agents Investigating Wealth of Bin Laden, Saddam,” *White House Bulletin*, 29 April 2004. Marc Frank and Richard Lapper, *Financial Times*, 10 May 2004. Nancy San Martin, *Miami Herald*, 30 April 2004. Christopher Marquis, *New York Times*, 7 May 2004, quoting Baucus. 关于对古巴偏见的内容, see pp. 112 - 114 in the present work.
- ⑥4 Reuters, 23 July 2005.
- ⑥5 Robert Dreyfuss, *American Prospect*, 23 November 2005.
- ⑥6 Stephen Grey and Don Van Natta, *New York Times*, 26 June 2005. 关于意大利境内的恐怖活动与情报勤务, 见 Edward Herman and Frank Brodhea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lgarian Connection* (Sheridan Square, 1986)。关于美国在其中起的作用的最新信息, 见 Daniele Ganser, *NATO's Secret Armies* (Frank Cass, 2005)。在复审中, 穆特萨迪格被认定“对伊斯兰圣战组织给予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但允许其上诉。Hugh Williamson et al., *Financial Times*, 29 August 2005.
- ⑥7 Keith Johnson, *Wall Street Journal*, 20 October 2005. José Calvo, *El País*, 20 October 2004.
- ⑥8 Bosch, Posada, see pp. 5 - 6, 35 in the present work. On Constant,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 204, and my 9 - 11 (Seven Stories, 2001).
- ⑥9 Téllez, see Duncan Campbell, *Guardian*, 4 March 2005. Carla Anne Robbins, *Wall Street Journal*, 27 April 2004. On Negroponte, see p. 151 in the present work.
- ⑦0 Michael Lind, *Financial Times*, 2 May 2005.
- ⑦1 Walter Hume Long, cited by Ian Rutledge, *Addicted to Oil* (I. B. Tauris, 2005). Stephen Rabe, *The Road to OPEC* (Texas, 1982).
- ⑦2 Zbigniew Brzezinski,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3 - 4.
- ⑦3 关于这些问题,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3, 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20 研究计划。参见本书“后记”。
- ⑦4 Arctic Power, “ANWR Face of the Day”, posted 21 April 2005. Quick access to

Arctic reserves should not pose huge difficulties, by developing shut-in-spare capacity for emergencies. See Rutledge, *Addicted to Oil*, p. 43.

- ⑦ 见能源顾问 Alfred Cavallo,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 - June 2005。为了眼前的收益而耗尽国内资源,把国家的安全撇开一边,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另一个例子是 1959 年开始的对外国石油实施的十四年强制配额限制,该计划“消耗了国内的石油资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据麻省理工学院石油专家阿德尔曼估计,它给消费者造成了高达每年四十亿美元的沉重负担”,尽管该法案声称旨在保障国家安全,但它丝毫不顾及这一点。见 John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Pantheon, 1976), pp. 171ff。见布莱尔负责的英国政府对工业界的调查。

第二章

- ①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hn Mikhail,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 ②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second session, 5 June - 29 July 1950 (Document A/1316).
- ③ John Murp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7. Pedatzur, *Ha'aretz*, 26 May 2005.
- ④ Sanford Levinson, *Daedalus*, Summer 2004.
- ⑤ Michael Isikoff, *Newsweek*, online edition (MSNBC.com), 19 May 2004. Alberto R. Gonzal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Decision r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on Prisoners of War to the Conflict with Al Qaeda and the Taliban, 25 January 2002.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post.com.
- ⑥ Levinson, *Daedalus*, Summer 2004. Burke, *Observer*, 13 June 2004. Dana Priest, *Washington Post*, 2 November 2005.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犯罪行为可被追溯到“政府拒绝坚持给予对被扣押者合法的、一直都被承认的和清楚的待遇标准”,见 Human Rights Watch, “Leadership Failure”, 25 September 2005.
- ⑦ Paust,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3, no. 3 (2005).
- ⑧ 人权观察组织 2005 年 4 月 24 日的新闻稿,以及该组织报道中写的“远离酷刑? 指挥层对美军虐囚的责任”,2005 年 4 月。大赦国际组织 2005 年 5 月 25 日举行的新闻发

- 布会。Farah Stockman, *Boston Globe*, 26 May 2005.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26 May 2005.
- ⑨ Casey and Rivkin,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5.
- ⑩ MccGw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no. 1 (January 2005); Philippe Sands, *Lawless World* (Viking, 2005). Peter Weiss, *Arab Studies Quarterly*, Spring-Summer 2002. Wayne Smith, *South Florida Sun-Sentinel*, 28 November 2003. Charles Lane, *Washington Post*, 29 June 2004. Eric Schmitt,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05.
- ⑪ “Declaration of Judge Buergenthal”,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5 September 2005. 2005年9月1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7957/04号“The Judgment on the Fence Surrounding”。Alfei Menashe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November - December 2005. 关于国际法院的详细陈述,以及与之相矛盾的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见 Norman Finkelstein, “Recoupling Irreconcilable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⑫ Zunes, *Middle East Policy*, Winter 2004.
- ⑬ Harald Frederiksen,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5.
- ⑭ Michael Byers, *War Law: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med Conflict* (Atlantic Books, 2005), p. 85. Nermeen Al-Mufti, *Al-Abram Weekly*, 21 - 27 October 2004.
- ⑮ Al-Mufti, *Al-Abram Weekly*, 21 - 27 October 2004.
- ⑯ Richard Opiel, *New York Times*, 8 November 2004. Eric Schmitt,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4. Robert Worth, *New York Times*, 17 November 2004. Dexter Filkins and James Glanz,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4.
- ⑰ Schmitt,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4. Filkins and Glanz,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4.
- ⑱ Dexter Filkins,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4. 关于当地居民将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行为斥作“疯狂的暴行”,以及管理层的责任,参见注释⑥以上部分。
- ⑲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2005. See additional discussion, p. 161 in the present work.
- ⑳ Dr. Miles Schuman, medical network of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Victims of Torture,

- Nation*, 24 November 2004. Annie Kelly and Alison Benjamin, *Guardian*, 15 December 2004. Annie Kelly, *Guardian*, 15 December 2004.
- ⑳ Fadhil, *Guardian*, 22 December 2004. Erik Eckholm, *New York Times*, 6 January 2005. Edmund Sanders, *Los Angeles Times*, 29 December 2004.
- ㉑ Carr,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7 June 2005.
- ㉒ Reuters, 15 October 2005. A database search found reports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and *Boston Globe*, 15 October 2005. On the same date, an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by Bradley Klapper appeared in the *London Independent*.
- ㉓ Ahmed Hashim,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5. Aamer Madhani, *Chicago Tribune*, 5 October 2005. Farnaz Fassihi, *Wall Street Journal*, 13 October 2005. See also Dan Murphy and Jill Carrol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 October 2005, for similar reports.
- ㉔ Luttwa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 ㉕ Mark Danner, *New York Times*, 6 January 2005. 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其致命的后果却被完全忽略了,参见我的 *Necessary Illusions* (South End, 1989), p. 138。关于美军虐囚的长串记录,参见 Alfred McCoy, *A Question of Torture* (Metropolitan, 2006)。Les Roberts 等人,“Mort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03 Invasion of Iraq”, *Lancet*, online, 29 October 2004。2005 年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进行的年度轻型武器调查。Hamit Dardagan 等人, *Iraq Body Count*, July 2005。《柳叶刀》上的研究论文未将费卢杰的情况包括进去,根据伊拉克专家安德鲁·科伯恩的估算,如果把费卢杰计算在内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最可能得出的死亡人数将是 268 000 人。 *Los Angeles Times*, 17 December 2005。
- ㉖ Milan Rai, “Iraq Mortality”, 14 October 2005 (iraqmortality.org/iraq-mortality)。Sabrina Tavernise, *New York Times*, 30 October 2005。
- ㉗ Robert Worth, *New York Times*, 24 October 2005。
- ㉘ Louise Roug, *Los Angeles Times*, 19 June 2005. Karl Vick, *Washington Post*, 21 November 2004. Peter Feuilherad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15 April 2005。
- ㉙ Anthony Shadid and Steve Fainaru, *Washington Post*, 20 August 2005. Bill Spindle, *Wall Street Journal*, 1 April 2005。

- ⑳ 欲了解针对英国政府的反应的回应,见 Les Roberts 等人, *Independent*, 12 December 2004, 摘自 *Open Letter to Jack Straw*。见 Lila Gluterma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7 January 2005, 该文章将科学家们对此的支持和媒体的不屑一顾加以了对比。
- ㉑ Sut Jhally 等人, “The Gulf War: A Study of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Knowledge”, February 1991 (也可在线阅读, 网址 www.sutjhally.com)。Justin Lewis, *Constructing Public Opinion* (Columbia, 2001), p. 210. 一个例子是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学生, 他们在这方面可能比一般公众了解得更多。关于肯尼迪政府于 1962 年发起了化学武器攻击, 参见 *Necessary Illusions*, chapter 2; *Hegemony or Survival* (电子版), chapter 2。摄影记者 Philip Jones Griffiths 为之展示的图片纪实是惊人的, 见 *Agent Orange* (Trolley, 2003), 该作品在英国受到了关注, 但在美国却无人理睬。对 2004 年总统大选的解读有一个有趣的特点, 那就是对 “the Media’s Vietnam Obsession” (这是 2004 年 9 月 12 日由 Howard Kurtz 主持的一个 CNN 高级评论委员会给出的题名) 的迷惑不解。事实上, 越南战争在竞选中几乎未被提及, 竞选宣传被刻意定位在了克里 1969 年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部队服役的经历, 那是在肯尼迪派美军直接攻击越南的七年后, 是在德高望重的军事史学家和越南问题专家伯纳德·福尔提出那个著名警示的两年后: “有着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越南……有被彻底毁灭的危险……它的农村地区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实际已被摧毁了, 这是在如此小的领土上动用的最为庞大的军事机器。” Bernard Fall, *Last Reflections on a War* (Doubleday, 1967)。
- ㉒ 欲了解人们对 Ignatieff 在国际法各种问题上的观点的探讨情况, 见 Friel an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Michael Walzer, *Arguing About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关于 “正直的左派” 的行为 (*Dissent, American Prospect*), 见 Paul Street, *Empire and Inequality* (Paradigm, 2004), chapter 4, 以及 *Z magazine*, May 2005。
- ㉓ 关于在入侵前精心展开的贿赂与间谍活动, 见 Harriman, *Sunday Times* (London), 11 January 2004 和本书第 27 页 (原书页码), 有一个例子能证明国防部官员的无能, 参见监督伊重建的特别检察长的报告, 那份报告的结论是执掌国防部的官员 “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管理和人员调配上没有全面的计划和指导方针”。Stephanie

Kirchgaessner, *Financial Times*, 30 October 2005. 见 Carl Kaysen 等人, *War with Iraq*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2)。Patrick Cockburn, *Counterpunch*, 16 - 31 March 2004.

- ③⑤ 个中缘由是华盛顿愿意伊拉克被“一个没有萨达姆·侯赛因的铁腕政权统治”(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7 June 1991),但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那么萨达姆还得在位,因为华盛顿及其盟友“有一个惊人一致的观点,即不论伊拉克领导人有多大罪过,在维持伊拉克的稳定方面,他比那些受他压迫的人更能让西方和中东放心”(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11 April 1991)。这个原因当时是被说明白了,但从那以后却被深深隐藏了起来。
- ③⑥ John Mueller and Karl Muell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Anthony Shadid, *Night Draws Near* (Holt, 2005), pp. 39ff. On the effects of the sanctions, and the fraudulent justifications, see, among other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raq: 1989 - 1999, a Decade of Sanctions”, 14 December 1999; Eric Herr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02; Anthony Arnove, ed., *Iraq Under Siege*, 2nd ed. (South End, 2002); Joy Gordon, *Harper's*, November 2002. INICEF, see Frances Williams, *Financial Times*, 12 December 2002.
- ③⑦ Kamil Mahdi,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24 December 1999.
- ③⑧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127, 190. See also Hans von Sponeck, *Spokesman* 86, 2005.
- ③⑨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7 January 2005. Judith Miller, *New York Times*, 10 January 2005. Claudio Gatti, *Financial Times*, 13 January 2005. Joy Gordon, *Harper's*, December 2004.
- ④⑩ Mark Turner, *Financial Times*, 14 and 19 January 2005.
- ④⑪ *Financial Times*, 9 December 2004. Gareth Smyth and Thomas Cattan, *Financial Times*, 21 June 2004. Claudio Gatti and Mark Turner, *Financial Times*, 30 November 2004. Julia Preston and Judith Miller, *New York Times*, 15 April 2005. Yochi Dreazen, *Wall Street Journal*, 26 July 2005. Julia Preston and Simon Romero,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2005.
- ④⑫ Ed Harri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 July 2005. Stuart Bowen, in Stephanie

- Kirchgaessner, *Financial Times*, 19 October 2005. See also Pratap Chatterjee, *Iraq, Inc. : A Profitable Occupation* (Seven Stories, 2004).
- ④③ Alan Cullison and Yochi Dreazen, *Wall Street Journal*, 14 June 2005. Judith Miller, *New York Times*, 14 June 2005. Todd Purdum, *New York Times*, 14 June 2005. Howard LaFranchi,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August 2005.
- ④④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7 September 2005. UN correspondent Ian William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005.
- ④⑤ Richard Thornburgh (Bush I), Christopher Burnham, a major campaign contributor (Bush II). Editorial, *Wall Street Journal*, 9 September 2005. See also william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005.
- ④⑥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27 and 28 October 2005. Doreen Carvajal and Andrew Kramer,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05.
- ④⑦ Carola Hoyos, *Financial Times*, 29 and 30 October 2005. For Spain, see m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Pantheon, 1969; New Press, 2002), pp. 121 - 122 and notes. For Haiti, see pp. 153 - 155 in the present work.
- ④⑧ Eric Herr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02.
- ④⑨ Gareth Smyth, *Financial Times*, 20 July 2005. South Africa,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 110.
- ⑤⑩ Edward Alden, *Financial Times*, 10 June 2004.
- ⑤⑪ John Murp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2004), 他在该书中又提出《禁止酷刑公约》在美国被批准为非自动生效的条约,这又为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 Michael Mandel,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Pluto, 2004)。
- ⑤⑫ Friel an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Murp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 ⑤⑬ Robert H. Jackson, *The Nürnberg Case* (Knopf, 1947), p. 86. 1974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第3314号决议中,“侵略的定义”无需投票即得到了通过。Carsten Stah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ctober 2003.
- ⑤⑭ Telford Taylor,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Knopf, 1992), pp. 50,

66, 627.

- ⑤ Abram Sofa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urrent Policy*, No. 769 (December 1985).
Colter Pauls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July 2004. Howard N. Meyer, *The World Court in Ac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chapter 9.
- ⑥ *El Universal Online*, 20 March 2005. Also Fred Rosen, NACLA's *Report on the Hemisphere*, May-June 2005.
- ⑦ Charles Lane, *Boston Globe* and *Washington Post*, 10 March 2005.
- ⑧ Murp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17.
- ⑨ Sands, *Lawless World*, pp. 132ff., 162.
- ⑩ Dean Acheson, *Proceedings, ASIL*, 13, 14 (1963). Acheson was referring specifically to US economic war, but surely knew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 ⑪ MccGw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05 (emphasis in original).
- ⑫ MccGw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05.
- ⑬ Mohamed ElBaradei, *Economist*, 16 October 2003. Frank von Hippel, in Rakesh Sood, Frank von Hippel, and Morton Halperin, "The Road to Nuclear Zero: Three Approaches"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1998).
- ⑭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 John Deutsch, Arnold Kanter, Ernest Moniz, and Daniel Poneman. *Survival*, Winter 2004 - 5.
- ⑮ David Sanger et al., *New York Times*, 1 and 3 May 2005.
- ⑯ *Australian*, 1 May 2005. *Dow Jones Newswires*, 9 March 2005. 它们似乎都刊登了之前一天 *Washington Post* 所登的同一篇文章。 *Washington Post* 报道基辛格拒绝自己的文章被存档。 Dafna Linzer, *Washington Post*, 27 March 2005. 她指出基辛格的文章发表于 2005 年 3 月 9 日。
- ⑰ Martin van Greve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August 2004.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Afterword. Dan Williams, Reuters, 23 September 2004.
- ⑱ Matthew Karnitschnigg, *Wall Street Journal*, 28 January 2005. Dilip Hiro,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21 January 2005.
- ⑲ Robert Norris and Hans Kristense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y-June 2005. See Afterword in the present work for more discussion.

- ⑦ John Mearsheimer, *New York Times*, 24 March 2000. Lawrence Korb, *Defense Monitor*, July-August 2005. On options in 1990 - 1991, see my *Deterring Democracy* (Hill & Wang, 1991). On 1999, see *New Military Humanism* and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 ⑧ Ambassador Jackie Sanders, US Mission to the UN, Statement to the NPT Conference, 20 May 2005. Nick Wadhams, Associated Press, 21 May 2005. *Boston Globe*, 21 May 2005. Farah Stockman and Joe Lauria, *Boston Globe*, 28 May 2005.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2002, 公布了一系列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行为。Farah Stockman, *Boston Globe*, 9 May 2005, 另见 Guy Dinmore, *Financial Times*, 5 February 2005。美国政府已经表明它“不再支持条约第六条的一些规定”, 并已在 2005 年核不扩散条约评审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告知其他国家, 美国政府以前做出的承诺对它没有约束力, 并拒绝签署涉及那些承诺的大会议程。一名参加过历届评审大会的荷兰代表团顾问表示, 美国这种立场是“史无前例”的。他还说, 大会的后续磋商“不得不有一定的延迟, 因为美国拒绝承认 2000 年大会上通过的‘十三’步措施和它自己做出的核裁军和停止试验等广泛承诺”。这又一次契合了总统及其顾问们的“新构想”。见 2002 年 7、8 月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公布的一系列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行为。
- ⑨ John Burrough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awyers' Committee on Nuclear Policy), *News at Home*, 27 January 2003. Thomas Graham,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5. Ambassador Jackie W. Sanders, “Remarks to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UN), 29 July 200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Policy”, July 2004. Press release, 11 April 2004, GA/DIS/3291, General Assembly, First Committee. Jean du Preez, “The Fissban”, *Disarmament Diplomacy*, April-May 2005. On the general background, see Nicole Deller et al., *Rule of Power or Rule of Law?* (Apex, 2003).
- ⑩ 见 2004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大会 A/Res/59/65 号防止外层空间军种竞赛的决议。
- ⑪ MccGwire, *Internaional Affairs*, January 2005. 联合国在 1981 年通过的决议是对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回应, 轰炸后不久就证实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其实并没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而似乎正是以色列的这种侵略行为导致了萨达姆开始研制核武

器的计划。参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p. 25。

- ⑦ Charles Hanley, Associated Press, 28 May 2005. Stockman and Lauria, *Boston Globe*, 28 May 2005. Maggie Farley, *Los Angeles Times*, 28 May 2005. Jimmy Carter, *The Advertiser* (Australia), 28 May 2005.
- ⑧ Robin Cook, *Guardian*, 27 May 2005. 在强大的压力下,政府可能已经放弃或推迟了开发核穿透武器的计划。Associated Press, 26 October 2005.
- ⑨ Graham,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5.

第三章

- ① 2004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研究威胁、挑战及变化的高层专家小组提交的 A/Res/59/65 号报告。
- ② UN General Assembly, 20 September 2005(A/60/L. 1).
- ③ Report of the UN High-level Panel, 3 December 2004.
- ④ 欲了解其他此类宣言,见 *New Military Humanism* 及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 ⑤ Mark Curtis, *Unpeople: Britain's Secret Human Rights Abuses* (Vintage, 2004).
- ⑥ Bruce Cumings, "American Airpower and Nuclear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in M. Selden and A. Y. So, eds.,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citing the *New York Times* (emphasis added).
- ⑦ 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Times Books, 1970). Taylor, *Anatomy*, pp. 325 - 326, 592 - 593, 640.
- ⑧ Jonathan Steele, Ewen MacAskill, Richard Norton-Taylor, and Ed Harriman, *Guardian*, 22 September 2001.
- ⑨ Michael Sherry, *The Rise of American Airpower* (Yale, 1987), p. 102. Bruce Franklin, *War Stars* (Oxford, 1988), on the backgrounds in popular American culture.
- ⑩ Friel and Falk, *The Record of the Paper* (their emphasis).
- ⑪ Condoleezza Ri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 ⑫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G.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Madeleine K. Albrigh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John Bolton, quoted in Phyllis Bennis, *Calling the Shots* (Olive Branch, 1996), p. xv.
- ⑬ Condoleezza Rice quoted in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8 March 2005. Jacob Weisberg,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mes Trau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6 September 1990.
- ⑭ For recent review, see Joseph Nevins, *A Not-So-Distant Honor* (Cornell, 2005); Ben Kiernan, "War, Genocide, and Resistance in East Timor, 1975 - 1999", in Selden and So,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 ⑮ Henry Kissinger, *Chicago Tribune*, 11 August 2002. 基辛格的文章是对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评论。
- ⑯ Elizabeth Becker, *New York Times*, 27 May 2004 (emphasis added).
- ⑰ Cees Wiebes, cited by Chris Stephens, *Observer*, 10 October 2004. See Wiebes,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in Bosnia, 1992 - 1995* (Transaction, 2003), p. 388.
- ⑱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Harvard, 2004). Matt Ba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0 October 2004.
- ⑲ William Week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American Global Empire* (Kentucky, 1992). 此处及以下相关部分的出处都是此书,除非另有标注。Richard Immerman 和 Regina Gramer, *Passport*(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的时事通讯), August 2005。Gaddis 在回应中并没有对这些评论表示反对。
- ⑳ William Weeks, *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 (Ivan Dee, 1996), pp. 44ff.
- ㉑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ed., *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 (Macmillan, 1916), volume 6, p. 385n. This was brought to my attention by Kelly Gerling.
- ㉒ 这个短语出自 Ernest May 和 Philip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Harvard, 1998)。见 Louis Pérez, *The War of 1898* (North Carolina, 1998); Weeks, *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 p. 144。
- ㉓ 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Cornell, 1985). Weeks, *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 p. 112.
- ㉔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Kosovo Report*, (Oxford, 2001).

Goldstone, "Kosovo: An Assess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Law", Nineteenth Morgenthau Memorial Lecture,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 ②⑤ See *New Military Humanism and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for details and for reactions outside NATO.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56ff., for more recent information.
- ②⑥ Frank C. Carlucci, *New York Times*, 22 February 2005.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Penguin, 2004), p. 146. David Rieff, "Kosovo: the End of an Era?", in Fabrice Weissman, ed., *In the Shadow of "Just Wars"* (Cornell, 2004). Karl-Heinz Kamp,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April 2005.
- ②⑦ James Trau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0 October 2005. 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Harvard, 2003), pp. 104ff., 196. See John Norris, *Collision Course: NATO, Russia, and Kosovo* (Praeger, 2005), p. xxiii. 诺里斯代表的是克林顿政府的立场,他写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最好理由并不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遭受的苦难,而是南斯拉夫拒绝顺应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潮流。”诺里斯在战争期间为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负责通讯,塔尔博特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他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是战争策划的主要人物。塔尔博特在他书中的前言里写道:“感谢约翰·诺里斯”,由于他的工作,所有关心科索沃战争的人“将能够了解到事件的原貌,并能同我们这些置身其中的人一道同时感受那里的情景”。因此,诺里斯的评论在定位战争动机方面作用非同小可。
- ②⑧ See, for example, "Essentials of Post-Cold War Deterrence". See also Chapter 1, note 21.
- ②⑨ 我引用了当时英国政府的那篇声言,但强调了它不可信,如果没有别的理由的话至少也因为冲突双方的力量是均衡的。然而,英国议会的一项调查却证实了那个声明的内容。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p. 56 对此事的探讨。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2000)。
- ③⑩ 引用的内容详见 *New Military Humanism* 及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Drake Bennett, *Boston Globe*, 16 October 2005. 贝内特还提出,米洛舍维奇在后来的一场选举中败于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是人道主义

干涉的又一次胜利。这种主张即使是正确的也毫无意义,况且证据所显示的完全相反。对此有很多例证,见 UPI 的高级分析家 Martin Sieff, “Kostunica Not Clinton Man”, UPI Analysis, September 2000; Simon Jenkins, *Times* (London), 7 October 2000, 该文解释了为何“南斯拉夫的民主比北约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更值得信任”; BBC 的国际事务编辑 John Simpson 在发表于 2000 年 10 月 8 日 *Sunday Telegraph* 的文章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另见 Steven Erlanger 和 Carlotta Gall, *New York Times*, 21 September 2000, 该文评论了科什图尼察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罪行”的谴责以及对设于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的谴责:“一个美国的法庭,其实只能算是一个警察局”。

- ③① Anne-Marie Slaughter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03, and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sletter*, March-April 2004), cited by Sands, *Lawless World*, pp. 174 - 175.
- ③② Sean Murph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 (Pennsylvania, 1996).
- ③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dgment of 9 April 1949. on Corfu.

第四章

- ① Jonathan Mont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2005. Eva Bell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Winter 2004 - 5. Katarina Dalacoura, “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Since 11 September 2001: A Critique,”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2005; 该评论涉及小布什对这一政策的贯彻。我在下文中将回头讨论那些已有的证据。这似乎能成为在这一问题上最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样本。
- ② Huntingt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1;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 ③ George Orwell,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unpublished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Animal Farm* (1946).
- ④ Hirohito 引自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是对日本投降的学术研究中最负盛名的成果。Hasegawa 将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苏联攻入中国东北,这一行动毁灭了日本鹰派保卫本土的最后希望。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193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⑤ For Mill,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and, for more detail, my *Peering into the Abyss of the Future* (Fifth Lakdawala Memorial Lectur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New Delhi], 2002).
- ⑥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4, chapters 4 and 7.
- ⑦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Defense Monitor*, January 1980.
- ⑧ Colette Youngers 和 Eileen Rosin, eds., *Drug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Lynne Rienner, 2005), pp. 15, 26。关于“防御共产主义”的一贯政策是如何变成“毒品战”的,参见 Doug Stokes, *America's Other War: Terrorizing Colombia* (Zed, 2004)。“毒品战”中受害者的真实状况这个被战争罪犯们忽视的问题,参见 Hugh O'Shaughnessy 和 Sue Branford, *Chemical Warfare in Colombia* (Latin American Bureau, 2005)。
- ⑨ Youngers and Rosin, eds., *Drug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 190. Adam Isacson, Jay Olson, and Lisa Haugard, *Blurring the Lines* (Latin America Working Group,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2004).
- ⑩ Petra Minnerop, *German Law Journal*, 1 September 2002.
- ⑪ Arno Mayer, *Daily Princetonian*, 5 October 2001, cited by Mark Selden and Alvin So, “Introduction”, in Selden and So,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On US terror (as officially defined by Washington), see among others, Edward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South End, 1982); my *Pirates and Emperors* (1986; updated edition, South End, 2002); Alexander George, ed.,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Polity/Blackwell, 1991).
- ⑫ Samule Huntingt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Robert Jervis (then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1; Robert Tucker and David Hendricks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4. On difficulties of denial, see William Blum, *Rogue State* (Common Courage, 2000), and my *Rogue States* (South End, 2000).
- ⑬ Alfred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Lawrence Hill, 2003; revision of 1972 edition). Peter Dale Scott and Jonathan Marshall, *Cocaine Politics* (California,

- 1991). Scott, "Drugs and Oil", in Selden and So,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 ⑭ Stuart Eizenstat et a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Thomas Carothers, *Critical Mission: Essays on Democracy Promo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p. 230. See particularly Paul Farmer, *The Uses of Haiti* (Common Courage, 2003). On the March 2004 debacle, see Farmer's essay and others in *Getting Haiti Right This Time* (Common Courage, 2004). My "Democracy Restored", *Z Magazine*, November 1994.
- ⑮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那项 19 世纪就开始的计划引自 Thomas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这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
- ⑯ Daniel Thür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836, 31 December 1999.
- ⑰ Byers, *War Law*, pp. 107, 111.
- ⑱ Charles Bergquist, *Labor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Verso, 1996), p. 100.
- ⑲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Simon & Schuster, 1983), p. 270, quoting Roger Morris;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er 1974, cited by Morton Halperin et al., *The Lawless State* (Penguin, 1976), p. 17.
- ⑳ John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New Press, 2004), p. 65. 见 Kenneth Maxwell,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Letter in Foreign Affairs: Kissinger, Pinochet and Operation Condor* (David Rockefeller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04/05-3, 2004)。该书谈到了政府“封杀国内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有关内容时所采取的手段,具体内容是有关美国和亨利·基辛格在智利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政府官员在一些分歧很大的对外政策上的信誉所施加的影响”。
- ㉑ Dinges, *The Condor Years*. Peter Kornbluh, ed., *The Pinochet Fil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New Press, 2004).
- ㉒ See p. 33 in the present work. 有关“有效的规避”行为,参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89ff. 其他内容引自 Louis Pérez,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May 2002.
- ㉓ Curtis, *Unpeople*, p. 137. On Cuba, see my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4. Eisenhower cited by Pérez,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May 2002.

- ②④ For a detailed account, see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②⑤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②⑥ 欲了解学术成果出处及解密文件上对此的评论,参见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1. Mario Del Pero, *Diplomatic History*. June 2004. See chapter 1, note 66.
- ②⑦ For numerous sources, see my *Year 501* (South End, 1993), chapter 5; *Powers and Prospects* (South End, 1996), chapters 7 and 8; and *Rogue States*, p. 38. See, particularly, Audrey Kahin and George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New Press, 1995). On Wolfowitz, see pp. 133ff. in the present work.
- ②⑧ 在大量有关的学术文献中,George Kahin 的 *Intervention* (Knopf, 1986) 仍是无可替代的。欲了解相关的档案记录对此的评论,包括最近发布的国务院历史记录,见本人的 *Rethinking Camelot* (South End, 1993)。
- ②⑨ My *Rethinking Camelot*. 更新的材料只是使这一点变得更加确凿,对肯尼迪王朝的那些鸽派人物的辩护变得苍白,而在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时产生的诸如“各级政府造出的谎言”和“沉重反思”等不成熟的想法却更加有力起来。
- ③⑩ Gareth Porter, *Perils of Domin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158. Bryan Bender, *Boston Globe*, 6 June 2005.
- ③⑪ Melvi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39. 关于战前外交,见本人的 *American Power and New Mandarins*。关于战争目的,见本人的 *At War with Asia* (Pantheon, 1970) 和 *For Reasons of State* (Pantheon, 1973), 后一本书引用了国防部文件的记载。John Dower, “The Superdomino [Japan] in Postwar Asia”, in Chomsky and Howard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volume 5 of *The Pentagon Papers* (Beacon, 1972). 从那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材料,但它们多半只是在基本结论上的发展。关于战后的策划,存在着大量的文献。欲见相关出处和评论,参见 *Deterring Democracy* 和 *Year 501*。
- ③⑫ See referreces of note 27, above.
- ③⑬ Cited by David Fromkin and James Chace,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5.
- ③⑭ 欲了解对 NLF 的严谨分析,见 Kahin, *Intervention* 和部门顾问们十分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欲见相关出处和评论,见本人的 *Rethinking Camelot*。欲见情报部门和五角

- 大楼文件,见本人的 *For Reasons of State*, pp. 51ff.
- ⑳ Richard Aldrich, *The Hidden Hand* (John Murray, 2002), p. 19, 该书对了解英国秘密情报部门有着极高的价值,里面也有来自美国的文件。欲了解“大范围”(Grand Area)的策划,参见 Larry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Monthly Review, 1977)。
- ㉑ Omer Bartov,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 2001. 总体上,人们估计苏联红军消灭的德国兵是英美消灭的十五到二十倍。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面对的德军第五十八师,而苏联红军仍是同四倍于此的德军战斗。Andrew Bacerich, *American Conservative*, 20 June 2005; Geoffrey Wheatcroft, *Boston Globe*, 8 May 2005; Jonathan Steele, *Guardian Weekly*, 13 - 19 May 2005.
- ㉒ John Price, “Casualties of War”,未出版,该文涉及美国单边主导的旧金山和平会议。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6, 该章很大程度上是在 Price 以前的作品基础上完成的。Kimball, *The Jugg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4ff. Gaddis, *Surprise*, p. 50.
- ㉓ Timothy Crawfor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2 December 2001. Alonzo Hamby, *Man of the People* (Oxford, 1995), pp. 329ff., 443.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 15.
- ㉔ Aldrich, *The Hidden Hand*, pp. 25, 36ff., 43, 48, 57.
- ㉕ Aldrich, *The Hidden Hand*, pp. 48, 57ff.
- ㉖ Robert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imes Books, 1995). See my “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 of Denmark”,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 1996.
- ㉗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rton, 1969). 关于他的学术论文中出现的令人吃惊的表达,见本人的 *Towards a New Cold War* (Pantheon, 1982)。
- ㉘ Aldrich, *The Hidden Hand*, p. 327.
- ㉙ For extensive quotes, see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
- ㉚ Stephen Kurkjian and Adam Pertman, *Boston Globe*, 5 January 1990.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my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5.
- ㉛ For discussion and sources,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e-edition), chapter 9.
- ㉜ See *Rogue States*, pp. 192 - 193, for a review of Greenspan's chosen illustrations, all

textbook examples refuting his claims — which are, however, conventional ideology.

- ④⑧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sources, see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
- ④⑨ A. M. Gray, *Marine Corps Gazette*, May 1990.
- ⑤⑩ 见 Barbara Harriss-White, *India Working* (Cambridge, 2003), 该书深入研究了黑色经济和非正规经济, 她估计全球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口都生活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关于改革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性影响, 见 Utsa Patnaik, “Full Liberalis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de Jeopardises Foo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olicies Against Hunger III, Berlin, 20 – 22 October 2004; “The Republic of Hunger”, Public Lecture, New Delhi, 10 April 2004; 以及印度记者 P. Sainath 的出色报道, 它们大多发表在《印度教徒报》上, 详细叙述了大多数农村人口生活境遇恶化的情况。另参见 Alexander Cockburn, *Counterpunch*, 16 April 2005。在一张统计图表上可以看出, 印度安得拉邦农民的自杀人数急剧上升, 那里离高技术产业兴旺发展的班加罗尔市和海得拉巴市并不远, 这一切都源自那个新自由主义政策, 该政策取消了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并迫使当地农民种植经济风险很大的作物。见 Robert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Verso, 2003), pp. 138ff. *Frontline* (India), 2 July 2004.
- ⑤⑪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December 2004 (NIC 2004 – 13).
- ⑤⑫ Kamal Kharrazi,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5.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5. Prados, *Hoodwinked*.
- ⑤⑬ Dana Milbank and Mike Allen, *Washington Post*, 1 August 2003. 关于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达,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33 – 34。然而, “简单的问题”始终都居于主导。
- ⑤⑭ Sam Allis, *Boston Globe*, 29 April 2004. David Ignatius (《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 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编辑), *Washington Post*, 2 November 2003.
- ⑤⑮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29 November 2003. David Brooks, *New York Times*, 7 October 2003.
- ⑤⑯ Walter Pincus, *Washington Post*, 12 November 2003. Richard Burkholder, “Gallup Poll of Baghdad: Gauging US Intent”,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28 October 2003.

- ⑤7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30 September 2005. Special, *Daily Star* (Lebanon), 14 October 2005.
- ⑤8 Byers, *War Law*.
- ⑤9 关于地理政治理论重要性的其他依据,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6。
- ⑥0 2003年2月的马德里艾卡诺皇家协会民间调查显示: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表示如果一场战争是联合国决议授权的,那他们将给予支持。Charles Powell,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04. 关于那次遍及欧洲的调查的细节,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5。
- ⑥1 Marc Lacey, *New York Times*, 8 May 2003. Ignatius, *Washington Post*, 2 November 2003.
- ⑥2 Sebastian Mallaby, *Washington Post*, 28 March 2005. Andrew Balls, *Financial Times Weekend*, 25 September 2005. 见另一篇表示景仰的文章, Todd Purdum and Eric Schmitt,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2005, 此文同样也格外缺乏证据。
- ⑥3 Jeffrey Winters, “Wolfowitz’s Track Record on Economic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Is Poor”, Joyo Exclusive (online news service on Indonesia), 29 March 2005. “Indonesia’s Suharto Tops ‘Worst Ever’ Corruption Charts”, Agence France-Presse (London), 26 March 2004. Alan Beattie, *Financial Times*, 17 March 2005.
- ⑥4 Winters, “Wolfowitz’s Track Record”, 29 March 2005.
- ⑥5 “Indonesian Activists Slam Wolfowitz’ World Bank Candidacy”, Dow Jones Newswires, 22 March 2005. Shawn Donnan, *Financial Times*, 30 March 2005——文章提到了“印尼的政界精英”中有助益的那些人。欲了解8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更多细节以及沃尔福威茨在苏哈托倒台后对他罪行的庇护,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Afterword。
- ⑥6 Joseph Nevins,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1 February 2005.
- ⑥7 Steven Dudley and Pablo Bachelet, *Miami Herald*, 16 September 2005.
- ⑥8 Argentine political scientist Atilio Boron, “The Truth About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Merlin, 2006). For popularity rating, see Alma Guillermoprieto,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6 October 2005.

- ⑥9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Americans on Promoting Democracy — Poll,” 29 September 2005.
- ⑦0 Colum Lynch, *Washington Post*, 18 September 2005; 欲了解他的演讲, 请查询新闻通讯社发布的新闻。Hugh O’Shaughnessy, *Irish Times*, 17 September 2005. See also p. 256 in the present work.
- ⑦1 Tim Weiner,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2004. Thomas Walker, “El Salvador and Iraq: The Wrong Lesson from Flawed History”, *Athens News*, 18 November 2004. On elections, see Edward Herman and Frank Brodhead, *Demonstration Elections* (South End, 1984); Herman and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Pantheon, 1988; updated 2002).
- ⑦2 Walker, “El Salvador and Iraq”. On media commentary, see my article in Morris Morley and James Petra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Nicaragua* (Institute for Media Analysis, 1987). On Figueres and the press,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and *Deterring Democracy*. See also p. 139 in the present work.
- ⑦3 Dana Harm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 March 2005. 萨尔瓦多也许能为美国提供一支海外军团, 就像历史上欧洲帝国军队以海外军团为主力一样。尽管其规模还比不上在南越为美国服务的韩国军队(那支队伍在 1987 年美国支持的韩国独裁政权被推翻后也不复存在了)。正如同华盛顿在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权垮台后就再也不能利用阿根廷的那些职业军人一样。
- ⑦4 Philip Shishkin, *Wall Street Journal*, 19 May 2005. Craig Murray, *Guardian*, 16 May 2005.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31 December 2005.
- ⑦5 Craig Murray, *Guardian*, 3 August 2005.
- ⑦6 David Wall, *Financial Times*, 26 May 2005. Ann Scott Tyson and Robin Wright, *Washington Post*, 4 June 2005.
- ⑦7 David E. Sanger, *New York Times*, 29 May 2005. Human Rights Watch, “Trukmenistan: Human Rights Update”, 14 May 2004.
- ⑦8 Sanger, *New York Times*, 29 May 2005, unarchived insert.
- ⑦9 Sarah Mendelson and Theodore Gerb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6. On Japan, see my *Year 501*, chapter 10.

- ⑧ Cited by Curtis, *Unpeople*, p. 81.
- ⑨ 关于英美在 1958 年的反应, 见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6, Afterword.
- ⑩ Curtis, *Unpeople*, p. 82.
- ⑪ Nasser's plans: Douglas Little,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4.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p. 225, 228, 240ff.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cited by John M. Blair, *Control of Oil* (Pantheon, 1976), p. 85.
- ⑫ Roger Morris, *New York Times*, 14 March 2003. 华盛顿的盟友约旦国王侯赛因自 1957 年起就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了, 他报道说他“相当肯定”美国的情报机构支持了那场政变, 并提供了那些后来被处决的共产党人的名单, 被捕者中约五千人马上就被杀害;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1978), pp. 985 - 986, 该书是一部经典学术著作。Curtis, *Unpeople*, pp. 80ff.
- ⑬ See *Deterring Democracy*, Afterword.
- ⑭ Neil MacFarquhar, *New York Times*, 2 March 2005. Scott Wilson, *Washington Post*, 28 February 2005.
- ⑮ See pp. 254ff. in the present work.
- ⑯ Neil MacDonald and Najmeh Bozorgmehr, *Financial Times*, 8 July 2005. Edward Wong, *New York Times*, 7 July 2005.
- ⑰ Peter Galbrai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August 2005.
- ⑱ 关于家族独裁的得势、本质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以及沙特社会和民众的艰辛以及他们为自由的奋斗, 见 As'ad Abukhalil, *The Battle for Saudi Arabia*, (Seven Stories, 2004)。
- ⑲ Alan Richards, *Middle East Policy*, Summer 2005.
- ⑳ For example, Robert Kuttner,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2005.
- ㉑ On these matters,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Afterword and sources cited.
- ㉒ Carothers, *Critical Mission*, pp. 7, 42.
- ㉓ See p. 102 in the present work. Thomas Carothers, in Abraham Lowenthal, ed., *Exporting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1991); 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California, 1991), pp. 29, 249.

- ⑨⑥ Peter Kornbluh, interview with Scott Harris, *Znet*, 1 March 2005. Gary Cohn and Ginger Thompson, *Baltimore Sun*, 15 June 1995. For fuller details of Honduran state crimes and US involvement, see Gary Chon and Ginger Thompson, *Baltimore Sun*, 11 – 18 June 1985. Michael Dobbs, *Washington Post*, 12 April 2005. Larry Rohter, *New York Times*, 21 December 1995. Carla Anne Robbins, *Wall Street Journal*, 27 April 2004.
- ⑨⑦ Charles Bergquist, *Labor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 5. Gordon Connell-Smith,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xfor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6), pp. 23ff., 343.
- ⑨⑧ Carothers, *Critical Mission*, p. 262.
- ⑨⑨ 参见上文注⑩。欲了解来自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及其他官方出处的详细消息,见本人的“Democracy Restored”。
- ⑩⑩ Thomas Griffin, *Haiti Human Rights Investigat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December 2004.
- ⑩⑪ Daniel Grann,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1, among others.
- ⑩⑫ Warren Strobel, Knight-Ridder, *San Diego Union-Tribune*, 5 November 2003. Indira Lakshmanan, *Boston Globe*, 27 October 2005.
- ⑩⑬ Stephen Rabe,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4.
- ⑩⑭ Thomas Walker, *Nicaragua: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Eagle*, 4th edition (Westview, 2003). Carothers, *Exporting Democracy*.
- ⑩⑮ *Envío* (Universidad Centroamericana [UCA], Jesuit University, Managua), November 2003. Study financed by the German branch of Bread for the World, *Nicaragua News Service*, 23 August 2005. “2004 Public Health Sector Summary”, *La Prensa*, December 2004; Nicaragua News Service, Nicaragua Network 12.3, 21 – 27 December 2004. Economist Adolfo Acevedo, *Envío*, March 2005. On the Costa Rican exception, see my *Necessary Illusions*, pp. 111ff., Appendix 5; *Deterring Democracy*, pp. 221ff., 273ff.
- ⑩⑯ Adolfo Acevedo, *Envío*, June 2005.
- ⑩⑰ Editorial, *Boston Globe*, 15 March 2005; Thomas Gagen, *Boston Globe*, 15 March

2005. See p. 51 in the present work.
- ⑩ Warren Strobel, Knight-Ridder, *San Diego Union-Tribune*, 5 November 2003.
- ⑪ Larry Rohter, *New York Times*, 10 June 2003.
- ⑫ James Dobbins,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 ⑬ Carothers, *Critical Missions*, p. 51. Leader, *Financial Times*, 5 March 2005. Richards, *Middle East Policy*, Summer 2005. Farnaz Fassihi, *Wall Street Journal*, 22 January 2004. Patrick Cockburn, *Counterpunch*, 21 July 2005. 对有关美国在2004年中期试图规避伊拉克选举的行为的评论, 摘自主流媒体,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Afterword.
- ⑭ John Burns, *New York Times*, 24 July 2005. Elaine Sciolino and Don Van Natta, *New York Times*, 25 July 2005.
- ⑮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2005. Bombing, see Anthony Shadid, *Night Draws Near* (Holt, 2005), p. 114.
- ⑯ Weisman, *New York Times*, 30 January 2005.
- ⑰ Steve Lee Myers, *New York Times*, 3 August 2005. See my *Necessary Illusions*, pp. 123ff., Appendix 5.
- ⑱ Marc Dann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April 2005. Robert Fisk, *Independent*, 31 January 2005.
- ⑲ Scott Peterson and Dan Murph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8 January 2005. Yochi Dreazen, *Wall Street Journal*, 25 January 2005. Farnaz Fassihi, Philip Shishkin, and Greg Jaffe, *Wall Street Journal*, 17 October 2005.
- ⑳ Andrew Gowers, Philip Stephens, and James Blitz, *Financial Times*, 26 January 2005. Richard Burkholder, Gallup Organization, 28 April 2004.
- ㉑ Zogby International poll, released 28 January 2005. Oxfor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003. Andrew Cordesman, "Playing the Cour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November 2004. Nancy Youssef, Knight-Ridder, *San Jose Mercury News*, 13 September 2005. Gareth Smyth, *Financial Times*, 28 September 2005. Islam Online.net, 17 November 2005 (Arabic), translated by Gilbert Achcar. Hassan Fatah, *New York Times*, 22 November 2005.

⑫ Bill Danvers (Clinton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and Michael O'Hanlon (Brooking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November 2005. Steven Kull, director of the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Institute for Public Accuracy, 23 September 2005. Sean Rayment, *Sunday Telegraph*, 23 October 2005. Ned Temko, *Observer*, 23 October 2005. Nina Kamp, Michael O'Hanlon, and Amy Unikewicz, *New York Times*, 14 December 2005.

第五章

- ① See Douglas Little,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4, for recent comment. For more detail, see *Pirates and Emperors* and my article in George, ed.,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 ② See *Pirates and Emperors* and my article in George, ed.,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 ③ Justin Huggler and Phil Reeves, *Independent*, 25 April 2002. Amira Hass, *Ha'aretz*, 19 April 2002, reprinted in Hass, *Reporting from Ramallah* (Semiotext, 2003, distributed by MIT Press).
- ④ Michael Bohn, *The Achille Lauro Hijacking* (Brassey's 2004).
- ⑤ Ian William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29 April 2005.
- ⑥ Stephen Zunes,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 July 2005. On the record until final withdrawal, see my *Fateful Triangle*.
- ⑦ For background and review on Kifaya, see *Al-Abram Weekly*, 23 - 29 June 2005. For the Intifada, see my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180ff.
- ⑧ See p. 63 in the present work.
- ⑨ Ian William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13 May 2005.
- ⑩ Adeed Dawaisha,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2005. See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for indepth analysis.
- ⑪ 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14 November 2004.
- ⑫ Joel Brinkley, *New York Times*, 17 September 2005. 据一名高级官员说,随后以色列退出了“路线图”,理由是它“不实际”。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24 October 2005.

- ⑬ Gilbert Achcar, *Le Monde diplomatique* (English edition), July 2005.
- ⑭ James Bennet,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2003.
- ⑮ 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12 and 13 November 2004.
- ⑯ Shlomo Gazit, *Trapped Fools* (Frank Cass, 2003), chapter 15.
- ⑰ Harald Frederiksen,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5. David Ratner, *Ha'aretz*, 4 April 2005.
- ⑱ Be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Vintage, 2001), p. 341. 欲了解近期以色列军队的野蛮行径, 见 Yonatan Geffen, *Ma'ariv*, 23 September 2005, 其中的事实由军队组织 Shovrim Shtika (Breaking Silence) 报道。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29 September 2005. 以色列军队的这类行为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
- ⑲ 见本人写于那几年的文章, 这些文章载于 *Peace in Middle East?* (Pantheon, 1975)。该书再版时收入了 *Middle East Illusion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一书中的部分文章。
- ⑳ David Kretzme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2005. See also Michael Galchinsky, *Israel Studies* (Ben-Gurion University), Fall 2004. Buergenthal, see p. 45 in the present work.
- ㉑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2 December 2002.
- ㉒ Judith Miller,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04.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5.
- ㉓ 见本人的 *Letters from Lexington: Reflections on Propaganda* (Common Courage, 1992; 2003 年由 Paradigm 再版重印), chapter 1. 关于以色列联合政府和“贝克计划”, 以及那些虚假和稀疏的新闻报道, 见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pp. 231 - 232.
- ㉔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4/42, 6 December 1989.
- ㉕ David Bar-Illan, interview with Victor Cygielman,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Summer-Autumn 1996. Norman 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California, 2005), p. 296.
- ㉖ Shlomo Ben-Ami, *A Place for All* (希伯来语) (Hakibbutz Hameuchad, 1998)。被 Efraim Davidi 引用,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ume 7, nos. 1 and 2, 2000。巴拉克被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描述成“以色列最温和的鸽派人物之一”。Benny Morris, *New Republic*, 8 November 2004, review of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 ⑳ Ron Pundak and Shaul Arieli, *The Territorial Aspect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Final Status Negotiation* (Pres Center, September 2004) (Hebrew). Maps in Ron Pundak, "From Oslo to Taba: What Went Wrong," *Surviv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utumn 2001. 蓬达克是佩雷斯和平中心主任(该中心位处特拉维夫),他积极参与了《奥斯陆协议》及后续协议签订前的谈判。
- ㉑ Jeremy Press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2003. 他在“Lost Opportunities”一文中还写道:“巴拉克给克林顿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信,简明地列出了以色列要保留的土地,其中一部分有着重要地位。”另见 Dennis Ross 发表于 2004 年 11 月 *Boston Review* 上的评论文章 *The Missing Peace*。
- ㉒ Pundak and Arieli, *The Territorial Aspect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Final Status Negotiation*. Akiva Eldar, *Ha'aretz*, 15 and 18 February 2002. Amos Oz, *Guardian*, 5 January 2001 (pre-Taba).
- ㉓ David Matz,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ume 10, nos. 3 and 4, 2003 (cit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and Barak). Ahron Bregman, *Elusive Peace: How the Holy Land Defeated America* (Penguin, 2005), p. 145 (citing Barak). Pundak, *Survival*, Autumn 2001. On the Moratinos document, and Barak's order to terminate the negotiations, see Akiva Eldar, *Ha'aretz*, 15 and 18 February 2002, who shares the optimistic projections.
- ㉔ Pundak, *Survival*, Autumn 2001.
- ㉕ Ross, *The Missing Peace*. Jerome Slater, *Tikkun*, May-June 2005.
- ㉖ Akiva Eldar, *Ha'aretz*, 11 June 2004.
- ㉗ Benny Morris, *New York Times*, 12 November 2004.
- ㉘ Benny Morris, "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of 1948", in Eugene Rogi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Cambridge, 2001); 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 - 1956* (Oxford, 1993), p. 410. Ari Shavit, interview with Morris, *Ha'aretz*, 8 January 2004. See letters in following issues.
- ㉙ 有趣的是讲给孩子们的故事里说道:“(阿拉法特)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国需要一部分以色列的领土”,阿拉法特“向以色列人发起了许多袭击,使人们对他十分仇恨”。颠倒自己人与敌人的暴行数量是十分常见的,但把被占领土视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倒有

- 些创见。KidsPost, *Washington Post*, 12 November 2004.
- ⑳ *Ha'aretz*, 14 November 2003; Molly Moore, *Boston Globe*, 15 November 2003; Greg Myre, *New York Times*, 15 November 2003, 该文附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四名军官站在 一根柱子前, 柱子上写着“我们在走向灾难”(希伯来语)。Moshe Negbi, *Kisdom Hayinu* (意思是 我们已变成罪恶之地)(Keter, 2004)。关于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支出与 收益, 见 Shlomo Swirski,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12. 1 (2005)。关于庭审记录, 见 David Kretzmer, *The Occupation of Justice* (SUNY, 2002); Lisa Hajjar, *Courting Conflict* (California, 2005)。
- ㉑ Reuven Pedatzur, *Ha'aretz*, 21 February 2005 (Hebrew), review of Akiva Eldar and Idit Zartel, *Adonei Ha'aretz (Lords of the Land)* (Kinneret, 2005)。The Eldar and Zartel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review.
- ㉒ Pedatzur, *Ha'aretz*, 21 February 2005。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 341.
- ㉓ Amira Hass, *Ha'aretz*, 6 July 2005.
- ㉔ Amira Hass, *Ha'aretz*, 22 September 2005.
- ㉕ Amir Pren, *Ha'aretz*, 29 November 2002。Ze'ev Schiff, *Ha'aretz*, 27 and 29 July 2005.
- ㉖ 关于谋杀的后果, see p. 23 in the present work.
- ㉗ Elizabeth Bumiller, *New York Times*, 15 April 2004。Meron Benvenisti, *Ha'aretz*, 22 April 2004。Saree Makdisi,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 March 2005.
- ㉘ 由 B'Tselem 组织发布于 2005 年 10 月。Moshe Dayan, quoted in Yossi Beilin, *Mehiro shel Ihud* (Revivim, 1985), p. 42。这些文字显示出“作为被占领土政策的设计者及决 策者”的达扬的总体理念, 其目标是“蚕食土地”及“逐步赶出”“被占领土上尽可能多 的人口”, 手段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p. 337ff. 其实达扬已经是最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工党领导人之一了。
- ㉙ Amira Hass, *Ha'aretz*, 30 October 2005, with maps。Ariel Sharon quoted in Reuters, 1 December 2005。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November-December 2004.
- ㉚ Chris McGreal, *Guardian*, 20 October 2005.
- ㉛ Gideon Levy, *Ha'aretz*, 24 October 2005.
- ㉜ John Ward Anderson, *Washington Post*, 7 February 2005。On the Rabin-Peres plans,

see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Epilogue; *Pirates and Emperors*, chapter 7; *Middle East Illusions*, chapter 6. On Ma'aleh Adumim, see my essay and others in Roane Carey, ed., *The New Intifada* (Verso, 2001).

- ⑤ Maskit Bendel, *The Disengagement Plan and Its Repercussions on the Right to Health in the Gaza Strip*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Israel, 2005), p. 9. See the report on the eve of the disengagement by B'Tselem, *One Big Prison*, March 2005.
- ⑥ Ravi Nessman, AP, 19 April 2004. Aluf Benn *Ha'aretz*, 11 August 2004. 关于“脱离计划”及修建隔离墙的具体时间以及长短期计划, 见 Tanya Reinhart 的 *Israel/Palestine: How to End the War of 1948* 一书后记 (Seven Stories, 2005)。关于此事的总体推理, 见 Baruch Kimmerling, *Politicide: Ariel Sharon'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Verso, 2003)。
- ⑦ Sara Ro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ummer 2005.
- ⑧ Bendel, *The Disengagement Plan and Its Repercussions*. Amira Hass, *Ha'aretz*, 28 August 2005.
- ⑨ *Ha'aretz*, 27 April 1982. Amnon Kapeliouk, *New Statesman*, 7 May 1982. See *Fateful Triangle*, chapter 4.3.
- ⑩ Orit Shohat, *Ha'aretz*, 26 August 2005.
- ⑪ Baruch Kimmerling, *Ha'aretz*, 21 August 2005.
- ⑫ Joel Brinkley, *New York Times*, 17 September 2005.
- ⑬ Amira Hass, *Ha'aretz*, 14 August 2005.
- ⑭ AP, *Boston Globe*, 12 July 2005. *Ha'aretz*, 4 December 2003.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003. 布什 2002 年大选由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 (11 月 3 日)。欲了解更多被布什扼杀的决议,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7。关于巴拉克, 见 Yoaz Yuval, *Ha'aretz*, 7 July。
- ⑮ Meron Benvenisti, *Ha'aretz*, 14 July 2005. Rubinstein, *Ha'aretz*, 31 March 2005.
- ⑯ Greg Myre, *New York Times*, 25 August 2005. Karin Laub, AP, 2 September 2005 (*Boston Globe*, 3 September 2005, unarchived). *Ha'aretz* Service and AP, 19 September 2005.
- ⑰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March 1996, January 1996. For more extensive detail, see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Epilogue. Jerusalem and Ramallah Heads of Mission (European Union), *Report on East Jerusalem*, November 2005. Chris McGreal, *Guardian*, 25 November 2005. 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2005.

- ⑬ Chris McGreal, *Guardian*, 18 October 2005.
- ⑭ Benedict Carey,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10 July 2005.
- ⑮ Jeane Kirkpatrick, *Commentary*, November 1979.
- ⑯ Thom Shanker,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04.
- ⑰ On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e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pp. 79, 201ff.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pp. 225ff., 228, 240ff.
- ⑱ Peter Waldman et al., *Wall Street Journal*, 14 September 2001.
- ⑲ David Gardner, *Financial Times*, 8 July 2005. See p. 145 in the present work.

第六章

- ① 关于布什政府滥用总统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可耻记录有许多参考文献,见 Barbara Olshansky, *Democracy Detained* (Seven Stories,即将出版)。
- ② Robert Dahl,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Yale, 2002). Thomas Ferguson, *Golden Rule* (Chicago, 1995). Robert McChesney,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Monthly Review, 2004). Robert Reich,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01, cited by McChesney. Woodrow Wilson quoted in John Manley, “Theorizing the Unexceptional”, 2005 ms., citing R. Baker and W. Dodd, eds.,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25 - 1927), volume 1, p. 78.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Cornell, 1991). For a more far-reaching critique and proposals, see Stephen Shalom, *Z Magazine*, October 2004.
- ③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870 - 1960* (Oxford, 1992). 在 70 年代,司法裁判赋予了公司法人更多权利。另见 Robert Brady 的经典著作 *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 (1943; reprinted by Transaction, 2001)。关于特拉华州法庭的意见,见 Scott Bowma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6), p. 133。欲参考关于这些主

题的一些专业的介绍,见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 (Free Press,2004)。

- ④ For sources, see my “Consent Without Consent: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Fall 1996.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1976), volume 2, p. 236.
- ⑤ Aristotle, *Politica (Politics)*, book 4, chapters 2, 11; book 5, chapter 8; book 6, chapter 5; book 7, chapter 10. 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Random House, 1941).
- ⑥ Robert Wiebe, *Self-Rule* (Chicago,1996), pp. 96ff. Norman Ware, *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 - 1860* (Chicago: Ivan Dee, 1990; reprint of 1924 edition).
- ⑦ Woodrow Wilson cited in Martin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 - 1918* (Cambridge, 1988), pp. 413 - 414. Wiebe, *Self-Rule*, p. 134.
- ⑧ See pp. 9, 41 in the present work. For Schlesinger,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12 - 13. Fritz Ster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5.
- ⑨ Amos Elon, interview with Ari Shavit, *Ha'aretz*, 23 December 2004.
- ⑩ Peter Cromwell, “The Propaganda Problem”, *Horizon*, January 1941.
- ⑪ 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二年一次(2004—2005)的报告,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作者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和 Sylvia Allegretto. Marc 和 Marque-Luisa Miringoff, *The Social Health of Nation* (Oxford, 1999), 该书提供了福德汉姆大学社会政策改革研究所的社会健康指数报告,这个报告跟踪了各项社会健康指标(这正是其他工业化国家一些政府机构的工作)。
- ⑫ Edward Wolff,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3rd quarter, 2001. Eduardo Porter,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14 July 2005. Census Bureau, see David Leonhardt, *New York Times*, 31 August 2005; Robert Guy Matthews, *Wall Street Journal*, 31 August 2005. Jessica Vascellaro, *Wall Street Journal*, 13 September 2005. Dean Baker,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17 October 2005.
- ⑬ Libby Quaid, AP, 29 October 2005.
- ⑭ Alan Greenspan, testimony,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February 1997, cited in *Multinational Monitor*, March 1997. Edward Herman, *Z Magazine*, March 2005.

- ⑮ On the “comparative peculiarity” of “religious cognitions”, see Walter Dean Brunham, in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eds., *The Hidden Election* (Pantheon, 1981), and p. 223 in the present work. For a review of the earlier period, partially shared with England, see Clifford Langley, *Global Dialogue*, Winter-Spring 2003.
- ⑯ Bruce Franklin, *War Stars* (Oxford 1988).
- ⑰ See, e. g., Ferguson, *Golden Rule*, pp. 389 – 390. 关于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以及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的研究成果,见第一章注⑭。
- ⑱ Guy Dinmore, *Financial Times*, 9 November 2004. Gallup cited by Paul Abramson, John Aldrich, and David Rohd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pring 2005.
- ⑲ Ferguson and Rogers, eds., *Hidden Election*.
- ⑳ For sources, see my *Turning the Tide* (South End, 1985), chapter 5. On the 1984 elections, see more generally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Right Turn* (Hill & Wang, 1986).
- ㉑ Samuel Huntington, in M. J. Crozier, S. P. Huntington,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75). See Alex Carey, *Taking the Risks out of Democracy* (New South Wales, 1995; Illinois, 1997), and Elizabeth Fones-Wolf, *Selling Free Enterprise* (Illinois, 1995), on corporate propaganda.
- ㉒ José Antonio Ocampo, “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Agenda”, 2001 ms., based 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January 2001. Marc Weisbrot, Dean Baker, and David Rosnik,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eptember 2005. Robert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chapter 5. Robert Wade, *Challenge*, September-October 2005.
- ㉓ 关于政府及媒体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付诸实施的手段,见本人的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chapter 2. 5。
- ㉔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st Robert Wade, *Challenge*, January-February 2004.
- ㉕ 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1996).
- ㉖ Gary Jacobs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ummer 2005.
- ㉗ Michael Dawson 引自 Thorstein Veblen, *The Consumer Trap* (Illinois, 2003), p. 154.

该书是对这一成果丰硕的领域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关于广告是市场衰退的反映和媒体的影响,见 McChesney,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chapter 4。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apter 11, p. 278.

- ⑳ K. Lokuge and R. Denniss, *Trading In Our Health System?* Australia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55, May 2003.
- ㉑ Dean Baker, “The High Cost of Protectionism: The C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ims”, m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1996; for summary, see Dean Baker, *In These Times*, 22 August 1999. Lokuge and Denniss, *Trading In Our Health System?*
- ㉒ Lokuge and Denniss, *Trading In Our Health System?*
- ㉓ Thomas Patterson, *New York Times*, 8 November 2000; *Boston Globe*, 15 December 2000.
- ㉔ Gallup poll, released 16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at www.gallup.com.
- ㉕ Jacob Schlesinger 和 Jackie Calmes, *Wall Street Journal*, 8 October 2004; Liz Marlan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2 September 2004; Daniel Yaikelovich,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该民意测验大都是些肤浅的问题, 诸如美国是否“总体上做了正确的事, 而且有许多是值得骄傲的?”
- ㉖ Seth Jacobs, “Sink or Swim with Ngo Dinh Diem”, 81s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Foreign Policy Seminar, 2005. Walter Burnham, in Ferguson and Rogers, *Right Turn*. Chris Hedges,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Fascism”, available at www.theocracywatch.org, citing Adams. Stern, see pp. 209 - 210 in the present work. Chris McGreal, *Guardian*, 20 October 2005.
- ㉗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29 September 2004; “The Separate Realities of Bush and Kerry Supporters”, 21 October 2004. Gardiner Harris, *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2004.
- ㉘ Albert Hunt, *Wall Street Journal*, 26 June 1998. Ceci Connolly and Claudia Deane, *Washington Post*, 20 October 2003. Lee Walczak et al., *Business Week*, 16 May 2005. Peter Research Center, *Public Divided on Origins of Life*, 30 August 2005. Wiebe, *Self-Rule*, p. 239. On the record over a longer period, see Vicente Navarro,

- Wh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a National Health Program* (Baywood, 1992); *Dangerous to Your Health* (Monthly Review, 1993); *The Politics of Health Policy* (Blackwell, 1994), pp. 210ff.
- ⑳ Harris, *New York Times*, 31 October 2004. Adam Clymer, *New York Times*, 17 October 1993.
- ㉑ Frank Newport, Gallup News Service, “Americans Want Leaders to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Opinion”, 12 October 2005.
- ㉒ Dan Roberts and Edward Alden, *Financial Times*, 4 November 2004.
- ㉓ Chris Giles, *Financial Times*, 1 December 2004. Jon Hilsenrath, *Wall Street Journal*, 4 April 2005.
- ㉔ Edward Lazowska and David Patterson, *Science*, 6 May 2005. As they note, IT funding, like most of electronics, has been under a Pentagon cover, with DARPA at the cutting edge.
- ㉕ Glen Johnson, *Boston Globe*, 27 November 2004, citing polls conducted for Pax Christi and by Zogby International. Peter Steinfeld, *New York Times*, 2 August 2003.
- ㉖ Fareed Zakaria, *Newsweek*, 11 October 2004. See Gerald Seib and Carla Anne Robbins, *Wall Street Journal*, 2 November 2004, lead story, referring to the CCFR study but not conveying its contents accurately. Sources, see chapter 1, note 34.
- ㉗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CFR), *Global Views 2004*.
- ㉘ John Crook,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July 2005. 编辑 Michael Reisman 指出,美国在决议中加入的文句可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见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 *Global Views 2004*。 *Boston Globe*, 18 March 2005. Victor Mallet and Guy Dinmore, *Financial Times*, 17 March 2005. Human Rights Watch, new release, 7 March 2005.
- ㉙ Frances Williams, *Financial Times*, 20 October 2005. Tom Wr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 September 2005. 关于政府和媒体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以及它们捏造和欺骗人民的惊人历史,见 William Preston, Edward Herman 和 Herbert Schiller, *Hope and Folly* (Minnesota, 1989),但这本书显然被遗忘了。

- ④⑦ AP, 23 October 2005; Agence France-Presse, 23 October 2005. *Independent* (London), 12 October 2005.
- ④⑧ Ian Seiderman (legal advis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letter, *New York Times*, 21 April 2005. World Summit, see p. 80 in the present work.
- ④⑨ Farah Stockman, *Boston Globe*, 1 March 2005. Paula Dobriansk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urrent Policy* No. 1091, 1988; for comment, see Philip Alst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990. Jeane Kirkpatrick cited in Joseph Wronka, "Human Rights", in R. Edwards,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95). Morris Abram, statement,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11 February 1991.
- ⑤⑩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 "The Separate Realities of Bush and Kerry Supporters", 21 October 2004. PIPA, "Saddam's Intent to Build WMD Not Seen as Sufficient Reason", online reports, 28 October 2004. See p. 25 in the present work.
- ⑤⑪ PIPA, "Americans on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After the Iraq War", 29 April 2003; "7 in 10 Now Say UN Should Take Lead", 3 December 2003. 关于误解及其与新闻来源的关系, see Steven Kull, Clay Ramsay, and Evan Lewis, "Misperceptions, the Media, and the Iraq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Winter 2003 - 4.
- ⑤⑫ 关于伊拉克民选萨帕特罗政府的计划, 见 *El Mundo*, 19 April 2004.
- ⑤⑬ PIPA, "Public Would Significantly Alter Administration's Budget", media release, 7 March 2005. On estimated war costs, see Linda Bilmes, *New York Times*, 20 August 2005.
- ⑤⑭ Jason DeParle, *New York Times*, 11 October 2005. Jonathan Weisman, *Washington Post*, 21 September 2005. See also p. 212 in the present work.
- ⑤⑮ Media search for March 2005 by David Peterson found no mention of the report and its findings.
- ⑤⑯ Jacobs and Pa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ebruary 2005.
- ⑤⑰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Americans on Promoting Democracy*, 29 September 2005. See also p. 137 in the

present work.

- ⑤⑧ Jeffrey Birnbaum, *Washington Post Weekly*, 27 June-10 July 2005.
- ⑤⑨ Elizabeth Dr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June 2005.
- ⑥① George Lardner, *Washington Post*, 17 August 2001.
- ⑥② Jim VandeHei, *Washington Post Weekly*, 30 May-5 June 2005.
- ⑥③ Kaitlin Bell, *Boston Globe*, 8 August 2005. “A Win for ‘Academic Bill of Rights’”, *Inside Higher Ed*, 7 July 2005. Kathy Lynn Gray, *Columbus Dispatch*, 27 January 2005.
- ⑥④ Michelle Goldberg, Salon. com 6 November 2003. Baruch Kimmerling, www.dissidentvoice.org, 29 March 2005. Sara Ro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February 2005.
- ⑥⑤ Corey Robin,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2004, p. 40.)
- ⑥⑥ Laurie Goodstein, *New York Times*, 31 August 2005.
- ⑥⑦ Frank James and Andrew Martin, *Chicago Tribune*, 3 September 2005. Thom Shanker et al.,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2005. Robert Block et al., *Wall Street Journal*, 6 September 2005.
- ⑥⑧ Sandra Postel (a specialist on water policy and ecosystem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7 September 2005. Edward Alden, *Financial Times*, 4 September 2005; Edward Alden et al., *Financial Times*, 2 September 2005. Dean Baker,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Economic Reporting Review* (online), 12 September 2005. Paul Krugman,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2005.
- ⑥⑨ John Wilkes and Brody Mullins, “Marketplace” column, *Wall Street Journal*, 15 September 2005. Dean Baker 算出私立学校的津贴接近百分之五十。见 2005 年 9 月 26 日和 2005 年 9 月 12 日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 *Economic Reporting Review* (在线版)。关于食品援助和饥饿情况, 见 p. 212 in the present work.
- ⑦① Tom Reifer, *Focus on Trade*, no. 113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September 2005. Seymour Melman, *After Capitalism* (Knopf, 2001), 该书总结并大大拓展了他早期的作品以及他提出的创造一个相当不同且更加民主的未来的蓝图。
- ⑦② See p. 226 in the present work.

- ⑦ Alan Murray, *Wall Street Journal*, 3 August 2005. Michael Schroeder and Suein Hwang, *Wall Street Journal*, 6 April 2005. For discussion and many sources, see Robin Hahnel, *Panic Rules!* (South End, 1999); my *Rogue States*, chapter 8. On alternatives, see Robert Blecker, *Taming Global Financ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1999).
- ⑧ Timothy Egan, *New York Times*, 21 August 2005. David Himmelstein et al., *Health Affairs*, 2 February 2005. For summary, see Kayty Himmelstein, *Dollars and Sense*, July-August 2005. See also David Himmelstein and Steffie Woolhandler, "Mayhem in the Medical Marketplace",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2004.
- ⑨ Gallup polls, "Costs Hurt Those Who Need Healthcare Most", 3 May 2005; "U. S. Trails Canada, Britain in Healthcare Ratings", 8 June 2004, available at www.gallup.com.
- ⑩ For data, see Phineas Baxandall, *Dollars and Sense*, May-June 2001. Public Citizen, 14 January 2004, reporting a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U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chapter 2, 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⑪ Katie Hafner,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2005. Vanessa Fuhrmans, *Wall Street Journal*, 27 and 28 October 2005.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Medicare & You" (handbook), 2006.
- ⑫ Jonathan Weisman and Ceci Connolly, *Washington Post Weekly*, 26 March-3 April 2005.
- ⑬ Paul Krugman,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2005. For analysis and exposure, see particularly Dean Baker's weekly analyses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many columns by Paul Krugman in the *New York Times*. Among many others see Alicia Munnell, *Challenge*, March-April 2005. For background, see Dean Baker and Mark Weisbrot, *Social Security: The Phony Crisis* (Chicago, 2001).
- ⑭ Chris Giles, *Financial Times*, 2 May 2005.
- ⑮ 200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s, Table V. A2, Dependency Ratios.

- ⑧ Gallup poll, “Americans Insecure About Social Security”, 5 April 2005, available at www.gallup.com. Mark Weisbrot,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release, 3 February 2005. Holly Yeager,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05.
- ⑨ 美国总审计局的表格是依据政府保险计算数据和国会预算局的数据制作的, 另外还有 Linda Feldman 发表于 2006 年 1 月 5 日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上的文章。
- ⑩ Gallup poll,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bout Retirement”, 21 June 2005, available at www.gallup.com.

后记

- ① Rober Pastor,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Princeton, 1987), his emphasis.
- ② Ali Abdullatif Ahmida, *Forgotten Voice* (Routledge, 2005).
- ③ Selig Harrison, *Financial Times*, 18 January 2006.
- ④ Ellen Knickmeyer and Omar Fekeiki, *Washington Post*, 24 January 2006. Charles Levin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0 January 2006. For Osirak,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p. 25.
- ⑤ See p. 77 in the present work and *Hegemony or Survival*, pp. 157 - 158.
- ⑥ Anthony Bubalo, *Financial Times*, 6 October 2005. Shai Oster, *Wall Street Journal*, 23 January 2006.
- ⑦ Aijaz Ahmad, *Frontline* (India), 8 October 2005. Katrin Bennho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5 October 2004. Also Victor Mallet and Guy Dinmord, *Financial Times*, 17 March 2005. Daniel Dombey et al., *Financial Times*, 26 January 2006. David Sanger and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06.
- ⑧ Siddharth Varadarajan, *Hindu*, 24 January 2006; *Hindu*, 25 January 200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5 January 2006. Fred Wei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6 October 2005. See “Declaration of Heads of Member-State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Kazakhstan, Kyrgyz Republic, Tajikistan, Uzbekistan), 5 July 2005, Astana, Kazakhstan; *World Affairs* (New Delhi), Autumn 2005.

- ⑨ For background see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ter 7.
- ⑩ NIC, *Global Trends*. Joel Brinkley, *New York Times*, 25 October 2005. Dan Molinski, AP, 24 October 2005. 布什的政策甚至连澳大利亚都得罪了,而澳大利亚一向是支持美国的。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居于首位的“外部威胁包括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宗教激进主义”,两者的危险是同样的,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担心中国。只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对美国的态度是正面的,相比之下对新西兰是百分之九十四,对英国是百分之八十六,对日本是百分之八十四,对中国是百分之六十九”。一半人愿意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Tom Allard and Louise Williams,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2005.
- ⑪ Marc Frank, *Financial Times*, 21 October 2005. John Cherian, *Frontline* (India), 30 December 2005, citing Pakistan's leading daily *Dawn*.
- ⑫ Gwynne Dyer, *Guardian*, 25 October 2005. Adam Thomson, *Financial Times*, 11 December 2005. Economist Mark Weisbrot, co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CEPR release, 28 January 2006.
- ⑬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3 January 2005. Diego Cevallos, IPS, 19 December 2005. Weisbrot, CEPR release 28 January 2006. Water, *Rogue States*, pp. 77–78.
- ⑭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13 March 2005. Justin Blum, *Washington Post*, 22 November 2005. Michael Levenson and Susan Milligan, *Boston Globe*, 20 November 2005.
- ⑮ David Bacon, *Z magazine*, January 2006;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October 2005.
- ⑯ Scott Wilson and Glenn Kessler, *Washington Post*, 22 January 2006. 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23 January 2006.
- ⑰ Walt Bogdanich and Jenny Nordberg, *New York Times*, 29 January 2006. See references of chapter 4, note 14, and p. 154 in the present work. Gregory Wilpert, Znet commentary, December 2005.